Futurecast

How Superpowers, Popu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You Live and Work



这是一张引领你迈向未来15年的宏伟蓝图！
金融危机肆虐，经济大萧条之后，全球未来的经济、政治将如何变化
经济发展不平衡，内需亟待提振，中国将如何应对？
认清下一轮的全球发展趋势，是你迈向成功的基本前提！

下一轮
全球趋势
将决定你未来15年的世界

[美] 原商务部副部长　罗伯特·夏皮罗◎著
刘纯毅◎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Futurecast

How Superpowers, Popu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You Live and Work

从全球化来说，世界并不是平的……

全球化对世界上一些封闭、落后的国家来说，那是一个“世外桃源”——只听说那里“繁花似锦”，却找不到进入这个奇幻世界的道路，对它们来说，全球化就等于零。

全球化对欧洲国家来说，是半个全球化。因为这些国家绝大部分贸易与投资都集中在欧洲内部与美国之间，而切断了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

全球化对日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四分之三个全球化，因为它割断了本土企业与全球各个行业领头羊的联系，错失了大量创新成果带来的机遇。

全球化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是能够带来收益和迅速发展的完美全球化。对它们来说，全球化是百分之百的……

“世界新经济正不断呈现在我们眼前。罗伯特·夏皮罗不仅能够准确理解这些根本性变化的广度与深度，而且还能以清晰、有力、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部洋溢着满腹才华的大作，针对当今时代正在经历的历史性重大转型，以及未来几十年将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变化，作者的说理分析极具说服力，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罗伯特·霍马茨 高盛国际副董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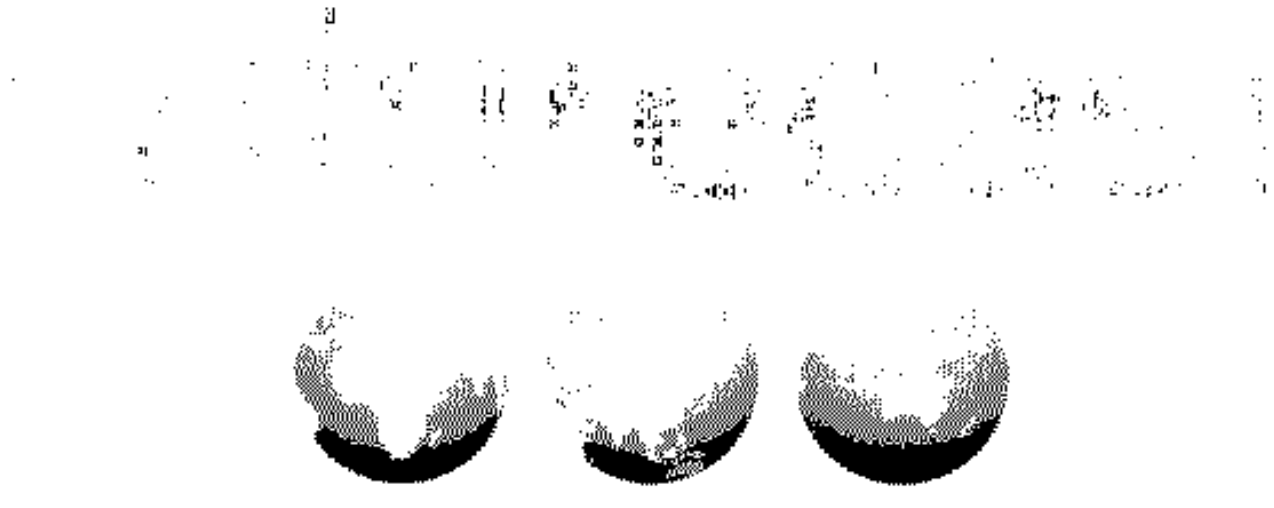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经济读物

ISBN 978-7-5086-1587-5

9 787508 615875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45.00元



下一轮全球趋势

［美］原商务部副部长　罗伯特·夏皮罗◎著
刘纯毅◎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一轮全球趋势／（美）夏皮罗著；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8

书名原文：Futurecast: How Superpowers, Popu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You Live and Work

ISBN 978-7-5086-1587-5

I. 下… II. ① 夏… ② 刘… III. 世界经济－研究 IV. F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9976 号

Futurecast: How Superpowers, Popu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You Live and Work by ROBERT SHAPIRO

Copyright © 2008 by St. Martin's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N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下一轮全球趋势

XIAYILUN QUANQIU QUSHI

著　　者：[美] 罗伯特·夏皮罗

译　　者：刘纯毅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3.7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8-3419

书　　号：ISBN 978-7-5086-1587-5 / F · 1662

定　　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FUTURECAST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1**

人口变迁引发剧烈震荡　6
全球经济的新图景　11
地缘政治新格局　22
创意创造财富　27
医疗领域即将上演《完美风暴》　29
能源争夺战　30
两个变数　33
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　36

第二章　**人口大震荡　49**

世界人口面临挑战　51
多国人口变迁浪潮　55
生育低谷的代价：欧洲与日本的强劲经济增长将告终　64
生育低谷的代价：政府养老体系面临财政危机　71

第三章　**全球化　93**

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新发展　97
全球化背景下的超强企业　103
企业外包　116
全球化对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的影响　125
资本市场的全球化　131
全球资本市场的失衡　139
全球化，路漫漫　146

第四章　**中国与美国　149**

中国：勃勃生机　157
美国：踌躇满志　169
为什么不是俄罗斯或印度？　179

第五章 **欧洲和日本 199**

欧洲的歧途 203
日本经济衰退之路 211
欧洲与日本的前途 217
凯尔特之虎 225
韩国：自力更生的典范 233

第六章 **美国强权下的地缘政治新格局 247**

全球化的影响 255
超级强权 259
美国独霸 265
中国的思维 270
谁能制约强权 275

第七章 **即将到来的医疗、能源与全球环境危机 281**

各国医疗开销比较 287
法国、德国及美国即将面临的医疗危机 294
日本与英国的医疗危机 297
中国版医疗危机 302
世界能源问题 305
石油冲击与能源安全 310
中国与俄罗斯的石油政治 314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319

第八章 **全球发展的变数 327**

恐怖主义变数：恐吓谁 331
恐怖主义变数：怕什么 336
科技变数：期待什么 350
纳米技术与全球能源危机 351
生物科技与医疗危机 355
信息技术与全球化前景 358
无法回避的未来 364

致 谢 373

第一章 01

| 全球大蓝图 |

经济、政治、人口与能源的全球化效应

FUTURECAST

◆ 服务业跨国外包的唯一障碍就是语言问题，因此，美国服务业外包商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印度，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各大公司则首选中欧地区。

◆ 美日公司融入中国这类新兴市场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不仅提高了在中国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而且使得这些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也一样随之提高，这最终将改变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经济形态。

◆ 中国是另一个能抓住全球化机遇而善加利用的主要经济体，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将会继续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向中国转移。就市场经济的自由程度而言，中国是唯一能与美国媲美的大国。到2020年，中国完全能够利用引进的资金、技术和本国廉价劳动力，发展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两大经济体之一。

◆ 至少在未来10年内，是中国和美国，而不是日本与欧洲，将占领全球化的两极。长期以来，由于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中国数以亿计的低薪熟练工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全世界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美国也将会拥有远多于日本和欧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劳动者和经理人，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庞大的全球化网络。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学、教育机构为依托，在不断涌现的新兴企业推动下，美国千千万万熟练工人、管理人员和科学家们将会生产出世界同样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

10~15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会发生一些巨变。不论你从5岁幼童长成20岁青年，从25岁新婚燕尔到40岁步入中年，还是从50岁处于事业之巅到65岁为人祖父母，你的智力与体态、需求与愿望、环境与前景都会发生很大变化。15年内，一个社会发生的变化通常要比个人的变化小得多，因为社会发展往往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尽管偶尔发生的战争或经济泡沫等重大事件会迅速改变一个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但是只有那些极少出现的、超越任何国家或其领导人控制能力的更加深远、更为强大的力量，才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无论是新兴力量颠覆人们的生活方式，新兴技术取代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还是一个超级大国骤然衰落，此类重大变革往往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然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以上三种结构性变革正在同步发生。

三种巨大的全球性力量正在重塑目前社会的发展形态。第一种力量是全球性人口变迁。过去半个世纪，所有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变迁。13世纪一场瘟疫夺走了1/4欧洲人口的性命，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又使得多个国家不计其数的年轻男子死于非命。然而，今天在大部分国家，伴随着老龄人口空前增多，相对就业人数空前减少，这

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这将对不同国家的发展速度、各国政府满足亿万新增老龄人口生活需要的基本能力两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种力量就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极其复杂的资金、资源、产品及消费需求的全球网络飞速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世界范围内贸易与交通突飞猛进的几个时期，其中尤以 17 世纪的航海探险和 19 世纪晚期电报及电力技术的传播最具代表性。如今，新兴信息技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产生影响，我们正经历着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变革。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 151 个成员国都已同意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这将使得我们所经历的变革范围更为广泛、程度更加深入。面对来自同时拥有先进技术和大量廉价熟练劳动力这一空前综合优势的中国及印度的激烈竞争，欧洲、日本及美国的大多数国民是生活幸福，还是勉强度日，这将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下找到繁荣经济的成功途径。

第三种力量来自苏联解体及其欧洲帝国土崩瓦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强大帝国及其意识形态的骤然瓦解，但是，只有当时世界上无可匹敌的罗马帝国的衰落才能与苏联这样一个军事、经济超级大国的解体相提并论。当然，罗马帝国的兴衰历程与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并不合拍。而且，以往帝国解体也没有导致今天所发生的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俄罗斯由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部分摇身一变，成为动力超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性政治中心也从大西洋国家转向太平洋地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冷战及冷战思维已经随着苏联解体而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今后 15 年的地缘政治生态将由这些非凡变化共同主导。

这些发展变化及其综合与交互作用，必将对所有国家的发展进程和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没有哪个国家或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当然，严格说来，这些发展变化并不能准确地决定某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今后 15 年，战争与结盟、繁荣与衰退、社会进步与暴力冲突还都会发生，它们无一不是起因于今天谁都无法预料的不计其数的国际决议和重大事件。

但是，无论世界未来的情形究竟如何，其发端与结局都将受到上述三种伟大力量的深刻影响，这个过程已经悄然展开。

这些力量作用强大，根源在于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过去几十年，数十亿人实行计划生育，这使得大部分国家人口结构随之逐渐改变，并由此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当代全球化发生、发展的根源及其并未半途而废的原因，都是基于类似的基本要素。今天我们知道，全球化源自以下因素：千千万万工商企业对海外出现的大量低薪熟练劳动力作出响应；发展中国家对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吸引力不断加大；生产工艺取得突破，各大厂商得以在遍布全球的不同工厂生产零部件；信息技术广泛传播，管理、协调全球网络成为可能。美国取得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原因，不仅在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苏联解体，而且在于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比别国更加强大的决心持之以恒，以及日本和欧洲各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这些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就像能源一样，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

今后，面对这些历史性力量带来的巨大压力，任何国家都必须积极应对，舍此之外别无选择。世界各国可以制定政策，改变大多数国民和企业的行为方式，以此影响这些力量的作用方式。不过，需要假以时日，这些改变才能实现。至于对未来发展产生深层影响，那还需要更长时间——据我们的判断，至少需要 10~15 年。这些变化存在多种潜在可能，因而我们也就无法对从现在到 2020 年这个历史阶段作出准确预见。

比如，今后由于人口变迁的强大冲击，世界主要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重，各国的居民储蓄比例和经济增长速度将大受影响，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将难以为继，这是无法改变的变化趋势。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需要放松移民限制，以此弥补生育低谷造成的劳工短缺，也要缩减国家养老及医疗保障，以保持其可持续性。如果这些改变很快实现——今天一点也看不到发生此类变化的迹象——未来 10 年，我们就能感受到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前期效果。类似地，法国、德国及日本现在就应该进行艰难的经济

改革，这是保障他们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更加成功地扮演各自角色的必要措施——法国起码已经在讨论这个话题了——但是，至少需要 10 年，才能见到改革措施对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国民收入水平及生产力发展程度产生实际效果。今后，假如中国出现严重社会动荡，延缓了现代化进程，或者美国转向经济闭锁，那么，中美两国在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形成的强大合力也会瓦解。不过，10 年之内，在全球化进程中，中美两国扮演的关键角色不大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在地缘政治方面，很多人相信，从现在开始，中国和欧盟都会永久性地把军费预算提高到现在的两倍甚至三倍。但实际上这不大可能，因为这样做会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让欧洲各国面临的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压力雪上加霜。即使它们真的会这么做，依靠这种规模的军费预算，哪怕是在地区事务方面，要想具备成功挑战美国强权的军事实力，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展望未来一两代人的发展前景，可以预见许多国家必定发生深远变化。我们无法确切知道，2035 年或者 2050 年，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人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未来 10~15 年，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并存，唯一超级大国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果也将逐步显现，这些力量足够强大，以至于影响深远，无法改变，将为今后世界发展进程描绘出独一无二的全球蓝图。

人口变迁引发剧烈震荡

事实上，今天每个国家都在经历历史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都在增长。历史上，同一时期内，类似的人口结构变化只会偶尔发生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因为战争或瘟疫常常会夺走一部分年轻人的生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的青年男子分别减

少了大约 10%，高达 300 多万。爆发于 1918~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波及十多个国家，据称导致 3 000 万人死亡，而死者主要集中在 15~35 岁这一年龄段。而这一次，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一样，先是经历了超常的生育高峰，紧接着又迎来超常的生育低谷，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然而，这种人口变迁的成因及其导致的经济后果，在各国却又不尽相同。

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美国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亿万夫妇选择了晚婚晚育，而一旦世界重归和平，经济日趋繁荣，他们反而比上一代人更愿意多要孩子，由此形成了最初的生育高峰。几乎与此同时，很多欠发达国家也迎来了生育高峰，不过其成因与发达国家并不一样。在这些国家，由于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新生儿成活率空前提高，因而出现了人口膨胀。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地区，人口膨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医学的进步正在不断提高人均寿命。1960~2000 年，美国、日本及欧洲的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 7~13 年，65 岁以上老人平均活到 83~85 岁；而同一时期，中国人均寿命差不多翻了一番，从 36 提高到了 70 岁。

然而，到了下一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妇女工作机会，不断增多，而婴儿养育开销却越来越高，再加上避孕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全世界妇女宁愿少生孩子。这一系列本不相干的因素最终导致生育高峰戛然而止，其交互作用造成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自 19 世纪早期开始形成的一代又一代稳定而有序的人口结构急剧变化。

一个家庭，如果夫妻双方几十年来的收入持续增长，然而，一方却在一夜之间丢了工作，而另一方又无计可施，结果会怎样呢？首先，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危机。日常饮食更加简单，度假次数越来越少，所开汽车越来越旧，抛锚频率越来越高，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教堂或学校助人为乐。最终，甚至婚姻也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宣告破裂，而这个家庭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其表现必然受到影响。

如果这种危机发生在一个国家，结果也是一样——那时，那些能为国家

提供从食品、药品到教育以至尖端武器的有工作能力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期待政府帮助的人却在持续增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的生活状况也会在各个方面不断恶化。生产者越来越少，而接受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税收增加、投资减缓。投资减缓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变慢，甚至停滞不前，更糟的是税收还要不断提高。由于国民收入增速减缓，加上人们对提高税收的天然抵制，政府在国防、教育、医疗、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投资就会越来越少。

人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可是我们并没能彻底预见由此导致的终极后果。自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著名的《人口论》开始，人们就一直担忧不已的是，人口膨胀，就像今天许多国家所经历的，会早在生育高峰出生的那批孩子成年之前，就已经造成国家资源匮乏、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现在已经少有人读，但是他的论断还是与很多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近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院与联合国共同发出警告：由于世界人口激增，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将会因此恶化。由约翰·洛克菲勒三世牵头的总统学者与公务员委员会也宣称："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持续增加对国家并无益处，只有放缓增长步伐，实现人口零增长，才能争取时间解决由此累积的各种问题。"这些人与马尔萨斯一样，忽视了新技术创造新资源的巨大能量，低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增人口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也不明白社会、经济本身具有应对形势变化的良好自我调节能力。

面临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的困境，每个家庭其实都可以有所作为。比如，父母可以重回学校，学习新技能，从而找到好工作；也可以联络兄弟姐妹，集中财力，同舟共济；或动员长辈削减医疗开支。尽管一个国家在这种处境下必须兼顾其他因素，不过也跟一个家庭一样，可以积极应变。在美国，整个社会已经掌握了新的应对本领：政府加大投入，企业家雄心勃勃，科学家兢兢业业，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因此，生产者虽然减少，生产力反而持续提高。中国同样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并且走得

更远。毛泽东之后中国新的领导人，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模式，毅然开放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当今世界，美国、中国、大多数东亚国家及一些欧洲国家都在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投入，并且也都取消了对外国制造业的限制，实现了完全开放。

由于上述变化，美国制造业最终丧失了 1/3 的工作岗位，欧洲与日本也是一样。有所不同的是，欧洲与日本继续实行产业保护，而美国由于取消保护，制造业竞争更加激烈，工作压力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大批制造业工人转向其他行业。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为应对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人年老退休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美国政府扩大边境开放，吸纳大量移民以补充劳动力，而其他发达国家则依然紧闭国门。在中国及东南亚，数以亿计的国民由于这些急剧变革失去了传统的谋生手段；而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亚洲地区新生儿的低死亡率导致了平均生育次数的减少，这又使得千千万万亚洲妇女选择外出工作。

一些国家因为政策得当，已经成功地把人口膨胀转化为经济奇迹。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国家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使国民身体素质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到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爱尔兰的生育高峰则比东亚及欧洲其他地区来得晚一些。自 90 年代早期开始，有“凯尔特之虎”之称的爱尔兰成为全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很多人把爱尔兰的这一经济成就归功于政府对外国 IT 企业降低税负、放松管制，但也有经济学家指出，80~90 年代进入市场的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增劳动力为爱尔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 40% 的贡献。

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周期变化对国家政策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韩国、爱尔兰等小国，由于经济持续繁荣，即使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人年老退休，他们也会衣食无忧，然而，那些对人口增长没能因势利导的国家却是麻烦缠身。德国、法国、日本由于经济结构十分稳定，不太容易利用新技术创造新岗位，因而忽视了新增人口的就业需要，或者把他们当成负担，再

加上这些国家不欢迎外来劳动力，所以过去 15 年来，日本与大多欧洲国家都没能分享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未来 15 年，一旦这些国家的高峰人口大量退休，国民经济必将遭受重创，而少有回旋余地。拉美国家生育高峰出现较晚，现在正赶上大量劳动力涌入市场，这些国家应对后续问题虽然尚有时日，但其前景更加悲观。在拉美地区，由于军事独裁政权都不重视国民教育，拒不实行现代化政策，留给继任者的必然是经济增长迟缓、政局动荡不稳。

各国发生的这些变化，以及为此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正在对世界各地的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产生强烈冲击。在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劳动力已经因为生育低谷而开始持续萎缩。除非通过发展机器人技术造出大量机器工人，否则，今后 15 年，单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就会降低储蓄，减少投资，全面影响经济发展。而在其他主要国家，劳动力会持续增加，但增速也会逐渐减缓，因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日本和欧洲所面临的问题，不过程度要温和得多。以美国为例，从现在到 2020 年，通过大量引进高素质移民可以大大缓和人口减少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东亚、东南亚，还有印度，这些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大幅改善医疗条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延长国民工作年限、提高生产力水平，以此化解生育低谷带来的种种问题。今后几年，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不管是增多还是减少，高峰人口年老退休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显著的。未来 15 年内，上述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会达到 35%~60%，政府不得不因此提高税收以扩大公共支出，甚至为支付老年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而不得不面对巨额财政赤字。在这些国家，由于纳税人数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国民财富缩水，政治观点分歧日益加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最终难保不会导致激烈的冲突。

全球经济的新图景

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已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这成为改变未来社会形态的第二个重要历史性因素。过去 30 年，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持续增长，增长速度达到各国国内贸易与投资总额增速的两倍，全球经济因而呈现全新气象。到 2020 年，欧洲人、美国人和亚洲人衣食用度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将主要来自那些发展速度快、工资水平低的国家，这些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波兰、罗马尼亚、突尼斯以及加纳等。在罗马尼亚，目前已经有雷诺、大宇以及克莱斯勒投资生产汽车，有惠普和 IBM 生产计算机零部件，而宝洁、高露洁和可口可乐也在这里大展宏图。欧美人喜欢的可口可乐、固特异轮胎、宝洁化妆品也很可能产自墨西哥的生产工厂；先锋食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及可口可乐公司也都已经在加纳投资生产。

20 世纪 90 年代学者与政治家们开始谈论全球化。然而，追本溯源，全球化其实从 70 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发达国家内部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开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几百年的新特点。导致国际贸易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1971 年美国单方面终止“二战”之后形成的固定汇率机制。西方跨国公司因而第一次实现了海外利润的自由兑换，而货币汇率此后也随着市场需求而灵活浮动。改变国际贸易特点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就在同一时期把原油价格提高了 3 倍。各大公司在削减成本的同时，纷纷睁大眼睛，在那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因为在这些国家，除了石油，什么东西都比西方便宜得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海外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欧美公司大大拓展了海外事业。由于人口增多，医疗条件改善，教育程度提高，这些国家拥有了大量技术熟练而工资低廉的劳动力。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量西方跨国公司已经在整个东亚地区广设工厂，输入技术。由于投资转移，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始丧

失大量的制造业岗位，而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奇迹却应运而生。

但是，那个年代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因为当时国际经济联系主要发生在两大阵营内部，而两个阵营之间少有往来。一个阵营称为“自由世界”，主要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要向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石油、矿石、食品等产品，而发达国家之间交易的主要是深加工的精细产品。另一个阵营包括苏联、东欧、中国、印度和古巴，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模式与“自由世界”内部大体相当。在长达50年的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彼此对立，经济上几无联系。

20世纪90年代，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的彼此隔绝突然消除，改变了国际经济的基本形态。首先，1989年苏联解体，欧美及日本的各大公司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和印度，而这两个国家当时正忙于解决大量新增人口的教育问题。对西方公司来说，不到10年时间，就获得了亿万劳动力资源，而其工资成本比雇佣本土工人，甚至也比雇佣亚洲新兴国家和拉美国家工人低得出奇，这在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到1990年，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举步维艰，国有企业的低薪熟练工人生产不出西方人肯买的产品，市场经济成了这些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唯一选择。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主导全球谈判，建立了新的世界贸易组织。从技术上说，世界贸易组织只是取代了原来的关贸总协定，世界各国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为削减关税和配额已经谈判了50年。成立之初，世界贸易组织就雄心勃勃，目标远大，这是因为美国及克林顿总统坚信全球化潮流不可避免，全球性投资、全球性市场、全球性技术转移必将造福全球。

1995年1月1日，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巴西、韩国、孟加拉国、肯尼亚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74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首批成员。有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伊始即开展谈判，签署协定，协定涵盖各国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要求各成员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

分，必须履行各自义务。各国必须同意逐步取消限制进口和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实现从家具制造到政府采购、从半导体生产到电信运营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开放。各成员国甚至还得同意修改法律法规，清除壁垒，给予外商国民的待遇，确保外资、内资企业公平竞争。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底线就是，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必须取消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政府对于国内产业的补贴和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必须抛弃国有企业的垄断体制，在各个领域全面开放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与本国企业的公平竞争。相形之下，中国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印度，结果是中国经济动力强劲，而印度恐怕在二三十年内难以赶上。另外，随着中印两个大国和其他数十个小国基本开放国内市场，新兴 IT 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大大强化了其开放程度。欧美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如今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实现资本及经营的洲际转移，从而使得这些公司的供应商、分包商和消费者遍布所有发展中国家。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既极大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建设现代化工厂和商务机构的能力，又极大地提高了西方公司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的移植能力。但是，诸如 IBM 及全球著名阀门制造商沃特水工业集团等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投资商，并没有从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早期合资企业获得多少利润，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运输手段原始粗放，本土传统商业习惯与西方现代经营模式冲突不断。不过，双方都渐渐学会了相互适应。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独有，在亚洲其他地区和欧洲中东部地区也是一样。到 2000 年，在那些拥有无限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掌握尖端科技和经营方式的西方公司早已合法而高效地运作了，因为他们雇佣的大量劳工已经掌握了基本生产技能，而其期望工资又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在引发全球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并且考虑到这些已经和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剧烈程度，世界贸易组织每次

召开年会时都遭到抗议，实在不足为奇；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抗议并没有愈演愈烈。

有了世界所有主要国家的参与，全球经济新态势必将影响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命运。到 2020 年，发达国家主要的重工业将会大量消失，不管哪个牌子的汽车、钢铁、电器，其生产都会从西方国家永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运输成本高的重工业产品会在那些临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生产，比如中国之于日本、土耳其之于欧洲、墨西哥之于美国，其他大部分制造业产品会在中国及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生产。当然，全球制造商仍然会在西方国家保留立足之地，欧美与日本的汽车及计算机工厂并不会从本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彻底消失。然而，到 2020 年，欧美和日本将会失去那些与中国等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直接竞争的制造业岗位。

如果你对全球化导致岗位减少的杀伤力有所怀疑，不妨注意这样一组数据：2001~2004 年三年间，美国丧失的制造业岗位达到 2 800 000 个，比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到 90 年代早期的美国传统重工业地区“产业衰退”期间减少的岗位数量还要多。2003~2005 年，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而电子电气设备制造商、汽车及运输设备制造商和计算机设备制造商却关闭了 600 多家美国工厂。而今，谁也不会再把汽车轮胎制造厂搬回美国的托莱多，也不会再把大型机械制造厂搬回利物浦。面对资本外流，欧美国家的政客及其政党不管如何夸口，其实都无力回天，他们能做的最多不过就是对这股强大力量妥善应对而已。

从现在到 2020 年，全球化也将在服务业领域展现神奇魔力。今天，庞大的全球商业金融网络已经从芝加哥、纽约、法兰克福和伦敦拓展到上海、台北、班加罗尔及布达佩斯，这为服务业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计算机软件技术不断进步，各大服务企业得以像制造业那样将其业务分解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成本低、效率高的外包商。在服务中心、技术研发以及软件开发本身等服务业领域，这种业务分包模式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在商务、金融

及医疗保健等特定行业，借助计算机软件，技术水平较低的从业者一样能够胜任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软件已经承担了税务申报、财会记账和医疗检查等行业的绝大部分技术性工作。到 2009 年，计算机软件的应用将会覆盖库存管理、医疗诊断、工程设计及法律分析等更广泛的领域。服务业跨国外包的唯一障碍就是语言问题，因此，美国服务业外包商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印度，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各大公司则首选中欧地区。

服务业跨国外包的唯一障碍就是语言问题，因此，美国服务业外包商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印度，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各大公司则首选中欧地区。

展望未来 15 年，可以预见，服务业的全球化会比此前发生的制造业的全球化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不论对商家还是对消费者，全球化都会导致许多个人服务和商务服务价格全面下降，正如全球化已经导致汽车、DVD、电视机、计算机等工业产品价格大幅降低一样。这种变化所蕴涵的经济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占到经济总量的 2/3，对比鲜明的是，制造业的平均份额只有 1/5。世界各地市场已经为服务业的腾飞做好了充分准备：今后 15 年内，中国、印度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将会急剧增长，而经济学家通过长期观察发现，随着收入增加，人们的服务业消费比重会不断提高。

软件开发业暂时还没有卷入这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浪潮，这会极大增强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力。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归根结底这应该归功于 IT 产业的推动。IT 技术迅猛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计算机及相关存储设备和传输设备等硬件产品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亚洲国家生产，从而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但在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领域，由于人力成本节省而导致的降价现象还没出现，因为这些业务目前仍然依靠发达国家的高薪雇员完成，这些雇员主要集中在美国东西海岸及爱尔兰、芬兰和德国，近来也可以加上几个印度城市。

但是，且慢。今后 10 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这些工作岗位一样也会转移。由此带给美国人的好消息是，新开发的软件产品价格将会降低，欧洲人与日本人多少也能分享这一利好。但是，同时这也会对西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计算机造价降低，导致西方国家信息技术普及，相形之下，有些行业却是远远落后了，医疗和教育两个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但如果软件价格降低，这些落后行业就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例如，在所有发达国家举足轻重的医疗和教育行业，如果能够像金融业和制造业一样利用 IT 技术提高效率，对于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极其有利的。利用 IT 技术实现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也可以提高国民享受的医疗服务质量。正如美国著名医药销售商美可保健公司资深执行官约翰 · 德里斯科尔所说："对于那些耗费大量医疗资源的真正患者来说，往往是初诊医生对病情了解最多但能施与的治疗甚少，而那些专家虽然知之甚少却不得不倾力救治。"

借由计算机普及的早期经验，可以预见，医院、大学、培训结构以及千千万万小型服务公司将来一定会因为计算机应用的深入而加强竞争、提高效率，这将迫使从业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起码，在那些竞争不够充分的领域，竞争激烈程度必然会大大加强。这样一来，从门诊部到干洗店，从快餐馆到观光团，所有这些服务行业的既有业务将会继续降价，新型业务也会不断推出。结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从业人员势必因此丢掉饭碗。

制造业的全球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随之而来的服务业全球化必将在此基础上产生更加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就像地球一端的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地球的另一端就会刮起飓风一样。我们今天正经历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庞大的中国完成了出口工业的现代化，给世界各国的就业和薪酬带来了新的压力。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放松了服装生产和家具制造等许多领域的行业管制，外资随之大量涌入这些行业，由此中国服装和家具制造业的生产力大幅提高，韩国和泰国的竞争对手随即遭遇惨烈

竞争。面对竞争压力，韩国与泰国的相关公司有的能够奋发图强，立于不败；有的则一筹莫展，束手待毙。那些无利可图的资本和技术随之转移到电子和医疗设备等其他行业。有了更加雄厚的资本和更为先进的技术支持，韩国和泰国一流电子及医疗设备厂商运营效率持续提升，新产品不断推出，与德国和美国同行展开了更加激烈的竞争。过去 10 年来，在许多国家、许多行业，这种情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不管在地球上哪个角落，几乎人人都能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市场竞争。

未来 10 年，同样的进程必将扩展到许多服务行业。

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也会遇到阻力，那就是竞争日趋白热化带来的就业和薪酬变化。今后，很多企业将会发现，即使医疗费用和能源成本不断上升，他们也很难提高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压缩成本，他们只能想方设法减少工作岗位，降低工资待遇。这恰恰就是过去 5 年来欧美许多企业的实际经历。应该说，这些国家近几年经济增长相当不错。然而，即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过去 5 年，欧美国家无论是工人工资收入，还是新增就业机会，不是原地踏步，就是每况愈下。随着服务业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未来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工作岗位增长缓慢的趋势会越发明显。在欧美发达国家，数千万缺乏专门技能的从业人员再也不能依靠经济增长来保证自己的高薪岗位了。

面对如此压力，一个国家依然可以像个人那样有所选择，对于全球新环境完全可以准确把握，努力适应。在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和英国做出了不同于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选择。许多欧洲国家往往对全球化抱有很强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的强度从 2006 年法国爆发的骚乱中可见一斑：法国政府只是发布了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法案，允许企业解雇工作不满两年的新员工，结果法国青年就发动了暴力骚乱。很多欧洲国家对于全球化视而不见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的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欧盟内部或者是和美国、日本之间。而美英两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则要

大得多。说是殖民时代文化偏见的历史遗留也好，说是习惯使然也好，反正许多欧洲人依然认为世界其他地方都是穷乡僻壤，根本不屑一顾，发达国家海外投资结构恰好印证了这一点。2004 年，整个欧洲只持有 7% 的发展中国家公司股票，其中 3% 在德国人手里，而美国和英国持有的发展中国家股票比例分别达到 23% 和 20%。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规模对比尤其鲜明，日本和美国一直都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而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额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 1/5；至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更是远远落后。欧洲大陆的这个尴尬纪录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他们经济观点的不和谐，因为新兴市场的表现常常优于欧洲本土市场。

对一个国家而言，选择哪些地区作为贸易和投资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企业甚至这个国家学会融入另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到 2020 年，美国和日本通过大量对中国的投资和经贸往来，对中国将会进一步加深了解，增强联系，进而建立起一个遍布中国的由供应商、分销商和管理层构成的庞大网络。在中国这个飞速增长而又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美国和日本企业为保持强劲竞争力，必须小心翼翼地积极应对，他们只有不断推出新产品、提供新服务甚至采用经营新模式才能生存下去。美日公司融入中国这类新兴市场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不仅提高了在中国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而且使得这些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也一样随之提高，这最终将改变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经济形态。如果欧洲大国依然不能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保守姿态和贸易、投资格局，那么到 2020 年，他们将不得不疲于应付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

对一个国家而言，选择哪些地区作为贸易和投资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企业甚至这个国家学会融入另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

到 2020 年时，发达国家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简单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必须集中精力实现以下目标：激励国外工人努力工作，制造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品网络，搞好财务、营销和配送管理；在教

育和医疗等领域，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个性化。对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如何促进创新是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增长放缓，税务负担加重，再加上老龄人口增多，劳动力萎缩，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自由竞争的不信任，而自由竞争恰恰是推动创新的强大动力。爱尔兰、瑞典和芬兰等少数欧洲国家的前景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已经展现出发展世界一流新技术的非凡能力。

人们往往认为英国比法国和德国更倾向于放松管制、支持创新，两任首相——玛格丽特 · 撒切尔和托尼 · 布莱尔，也都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很好，但是，很多东西也只是说说而已。我在 1999 年对此有过切身经历：那一次，布莱尔政府的办公厅主任邀请我（我当时担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就美国如何利用新技术大幅提高生产力这一问题，向首相经济顾问们介绍经验。在唐宁街 10 号[①]一个阳光明媚的会议室里，我向他们阐述了竞争，尤其是来自新兴公司的竞争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强调正是竞争导致了 IT 尖端技术的飞速发展，并继续推动其他行业不断改变自身经营方式，以便更好地利用 IT 新技术。布莱尔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提出了很多追根究底的问题，不过，讨论结束时，他们承认，大多数英国人非常不欢迎这样的竞争。两年后，布莱尔的幕僚又向我寻求跳出英国生产力缓慢增长怪圈的妙方，我告诉他们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除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和市场管制形成的创业障碍。结果，我再次听到英国高官们抱怨政府和国民对全球化所需要的赤裸裸竞争抱有根深蒂固的讨厌情绪。

相形之下，美国的发展前景总体说来依然看好。利用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科技研发网络，美国企业应该能够继续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创造、开发出更先进的技术和服务。事实上，美国企业脑力方面的投资已经接近工厂、设备和土地等硬件设施的投资。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已经学会面对日

① 英国首相官邸。——译者注

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够承受市场环境不对等造成的工作岗位不稳定，而大多欧洲人和日本人做得还很不够。这种差异必将推动美国企业持续提高生产力，继续领先其他发达国家。反过来，这一优势也会使美国继续保持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到 2020 年，美国依然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并将继续对世界各国发挥最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对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千千万万公司雇员来说，全球化将会继续危及他们的工作岗位，这是谁都无法阻挡的。以美国为例，1997~2003 年的 6 年间，就有 500 多万人加入失业大军。2003 年，美国这类结构性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芝加哥以及加州的弗雷斯诺和萨利纳斯等城市，波及从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到计算机生产和管理服务等多个行业。在美国，由于国内市场相对自由，新技术持续发展，新企业不断涌现，因而可以为千千万万失业工人提供更多择业机会。但是，即使失业工人找到新工作，薪酬往往也会大幅降低。对本人及其家庭而言，工作变动终究是一个残酷现实。那些上了年纪的失业工人尤其痛苦，退休金大幅缩水，晚景堪忧，尊严尽失。个人前途已经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面对失业大军，政府不可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计划措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找到跟原来相似的工作，更不能指望通过“重新培训”找到比原来更好的工作。如果哪个政治人物宣称，政府通过某项新法案或什么新计划，就能莫名其妙地保证面临失业的工人正常生活，免受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颠覆之苦，那么，广大失业者完全有理由报以愤怒。

中国是另一个能抓住全球化机遇而善加利用的主要经济体，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将会继续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向中国转移。就市场经济的自由程度而言，中国是唯一能与美国媲美的大国。到 2020 年，中国完全能够利用引进的资金、技术和本国廉价劳动力，发展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两大经济体之一。不过，在中国我们一样会看到亿万家庭因为全球化进程而付出巨大代价，广大农民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大批工人被迫放

弃养家糊口的国企铁饭碗。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并没有失业补偿金帮助失业人员渡过难关，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也是十分有限。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如果印度也打算以中国这样的速度和广度实现现代化，那也不得不把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当今世界上效率最低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中印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农民除了卷起铺盖进城打工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在城市一般都能找到工作，至少是青壮年都有活干），而印度农民因为拥有基本的政治自由，不仅可以宣泄愤怒和痛苦，还能减缓甚至阻止整个现代化进程。

尽管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现代化成就光彩夺目，尽管中国30年来全面增长的经济纪录令人称奇，尽管许多西方评论人士对中国经济走势热情赞扬，但是，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优势绝不能说安然无忧。很多中国人依然比亚洲其他地区、拉美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部分非洲地区人民更加贫穷，因为缺乏基本的制度安排，中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经济体系所必需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财政金融制度粗放落后，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抵押贷款和法人证券市场；《物权法》、《合同法》、《破产法》等法律条文随意性很强；除了沿海城市，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不容乐观；能源生产技术及运输方式也良莠不齐；大批劳工无法享受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即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最强的制造能力，这种能力大多也是国外直接转移过来的。到2020年，中国是要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世界经济强国，抑或仍然只是一个专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生产场地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严肃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10年或15年内完成其他现代化国家良性发展所经历的经济、社会变革的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快速增长，因为中国领导人确信，经济增长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所在。

地缘政治新格局

苏联解体引起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调整，这是影响今后 15 年全球发展的第三种历史性力量。这一事件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其影响的广泛程度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苏联解体加快了中国彻底抛弃计划经济、转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苏联解体，中国崛起，这也使得世界事务的焦点转向亚洲，而欧洲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地位则日益边缘化。

冷战时代，军备竞赛紧锣密鼓，整个世界一直笼罩在由冷战变热战的危险之中。然而，当代地缘政治的短期走势将会受到两个新条件的约束。罗马帝国之后，1 500 多年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无与匹敌的唯一军事、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以世界最大的经济、市场规模为依托，以相当于其他各国总和的军费支出为后盾，即使亲密盟友出面反对，美国依然可以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丝毫无损于其军事、经济优势。即使伊战以失败告终，今后面临同样情况，美国仍然有能力再次出兵，而其军事、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一样不会被撼动。

由于没有对手，唯一超级大国就形成了自己的垄断优势，因而改变了世界政治冲突的传统模式，至少在那些至关重要的国际事务上，这种改变已经有所显现。由于全球性贸易、资金、信息网络的紧密联系，千百年来人们第一次发现，国际冲突不再发生在世界强国之间，而是主要发生在利益相关的主流国家与少数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国家之间。苏联解体之后发生的历次海外战争就是这种变化的最好说明：几乎所有的海外军事行动都是由美国发动的，而卷入冲突的当事国差不多都是尚未步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它们分布在加勒比海岸（海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索马里和塞拉利昂）、巴尔干半岛（科索沃和南斯拉夫）、中东地区（伊拉克和科威特）、中亚地区（阿富汗）以及西南亚地区。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例外，那就是同样自外于全球

化经济体系的国家之间因为领土纠纷而爆发的战争，主要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邻国之间的边境战争。

地缘政治新格局的另一显著标志是，旨在帮助已经进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管理经济事务的国际机构渐次兴起，这些机构主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等，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已转变职能，致力于帮助各国应对商品、服务、资金及创意思想的全球性流动带来的冲击。不过，日益壮大的反全球化声浪却也正是由这些组织本身引发的，或许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名称、宣言和年会为反对者提供了很好的抗议靶子吧。就像最近对于传统知识产权的攻击一样，这些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打算让最先进的盗版和仿造行为合法化，从而可以任意抄袭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量生产（甚至出口）仿造产品。在世界各地，世界贸易组织也是饱受质疑，但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两类人群。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保守分子，他们把随全球化而来的西方产品和企业组织视为对其固有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极大破坏，甚至时常担心危及本国政权。在欧洲和美国，世界贸易组织也受到猛烈抨击，1999 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召开的世贸组织年会就差点因为反对者抗议而流产。这些抗议者多数是社会福利化运动突然失败的弃儿，面对新环境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机会，因而极力抱怨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平。

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另一显著标志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抬头。以美国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军事大国为主要目标，国际恐怖主义已经从局限于各国境内活动，发展到跨越国界活动阶段。跨国恐怖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全面排斥全球化，他们把以暴力手段反对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正当使命。这些恐怖分子在发展中大国很难找到长期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同盟军，但是他们在伊斯兰国家极力宣称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宗教原因以博得同情，而一些国家通常默许这些活动，有时甚至提供必要支持。

一个大的疑问依然存在：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是否已经因为

全球化网络的形成和国际机构的建立而宣告终止了呢？答案是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在一个时期内仍然不会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时刻准备主导国际秩序，这种情形就将持续下去。但是，以朝鲜和伊朗为代表的置身于全球化之外的少数国家一定会发现他们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冲突将会日益公开化。不过，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不大可能发生。虽然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迅速提升，但是中国要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与美国匹敌的军事、经济对手，至少还需要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当然，到 2020 年中国很有可能在本地区确立强国地位，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以至整个西半球都不会成为中国的军事范围。不过，在包括日本和韩国的北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10 年之内，中国的影响力将足以与美国抗衡，也许中国还会把触角伸到中东地区。

中美之间数千亿美元的商品、服务、投资及创意思想的交流应该会降低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中国与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也是一样。但是这种经贸往来却无法消除中美盟国之间发生意外事变的可能性——最大的危险可能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味相信全球化会保证全球和平是十分危险的。在 18 世纪中后叶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两个历史时期，国际贸易、投资和通信都像当今时代一样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在前一时期，蒸汽技术广泛传播，国际商船远涉重洋，世界贸易遍及全球，法国和西班牙的全球殖民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即使在年轻的美国，约翰 · 杰伊也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记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与遥远国度之间的贸易情况："我们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往来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因为过去一直由他们垄断东方贸易，我们通过参与得以分享贸易利益，并且因而实现了日用品的自给自足，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必须从这些国家购买。"在后一个伟大的全球化时代，电力技术、电报电话技术日渐普及，跨国投资企业开始涌现，英、德两个全球性帝国达到全盛。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全球化都没能阻止列强发动可怕的

战争——尽管不止一个国家有能力、有希望成功做到。未来 15 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必须深刻反思历史教训：两个国家军事实力一旦接近，再密切的经贸联系也不一定能够阻止战争爆发。

正如从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到苏联解体这段长达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里，美国和苏联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一样，在未来 10 年左右，中国和美国也不会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但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会成为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强大力量。在 2020 年到来之前，中美两国就必须妥善处理日趋激烈的能源争夺。尽管中美在包括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中东问题上还不能达成共识，但是他们必须一道努力，寻求解决地区紧张局势的妥协办法，共同打击全球范围内防止核扩散失败可能带来的恐怖主义，就像最近在朝鲜核问题上那样积极合作。此外，中美两国很可能也要与其他国家一道，设法保护互联网免遭威胁。

只要有心、努力，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同样可以建立全球经济秩序。例如，两国如果能就未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达成协议，世界其他国家应该会跟进支持。这种协议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多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发创意，而这些思想创意正是西方国家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同样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是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潜在危机的关键所在。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飞速发展以来，美国进口额不断增大，如今已经达到每年 2 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为世界很多国家提供了经济增长机会。如果迅速消除这种规模空前的贸易不平衡，那么这些国家将会大量抛售美元，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停滞不前。因此，中美两国必须通过政治合作，实现经济的平稳过渡，双方都得同意调整国内流通结构，美国应该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中国则应该提高国民消费率。

到 2020 年，在全球所有重要事务上，几乎可以肯定欧洲将被边缘化。过去欧洲一直在稳步削减防卫力量，随着经济增长脚步放缓，欧洲防卫能力及其承担的防卫义务还将进一步降低。如果一方面面临经济增长减缓的压

力，一方面又要提高税收以保证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正常支出，国内注定会爆发激烈冲突。这个时候，欧洲和日本的当务之急就是全力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大多欧洲人对美国强权鄙夷不屑，对美国总统深感厌恶，但是形势发展却只会加强大西洋两岸的联盟关系。尽管很多欧洲知识分子颇有微词，但是，加强大西洋联盟仍然是保证欧洲在国际政治中发出自己声音的唯一途径。不管怎么说，如果一定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二选其一，毫无疑问，欧洲当然不会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结盟，而与美国为敌。

随着中国军事、经济实力日益强大，日本也一样会面临很不舒服但又无可避免的选择。而对于与中国有着漫长边界的俄罗斯，情形会有所不同。俄罗斯将会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正像冷战顶峰时期的中国：脚踏两只船，希望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从中渔利。但是凭着疲软的经济、衰退的军力，再加上人口不足导致的人口危机，俄罗斯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在大多数国际冲突中也只能扮演配角。俄罗斯人口数量每年减少 100 万，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说，这个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到 2020 年，俄罗斯人口将会比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还要少 5 000 万，而仅仅与墨西哥持平。此外，由于过去 10 年来俄罗斯年轻人的死亡率高达美国的 3 倍多，兰德公司的专家相信，到 2015 年甚至更早，俄罗斯军队与警察将会严重缺编，难以履行戍国守边、保境安民的基本职责。

纵览全局，不难发现，全球化浪潮在沙滩上划了一条分界线，把世界划分为进入全球化轨道之内的国家和游离于全球化轨道之外的国家两个部分。到 2020 年，中美之间各种形式的竞争将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常态。因此，**为保护全球化进程不受外部势力和国内质疑的破坏，美国和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

创意创造财富

到 2020 年，上述三种历史性力量将会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是直接改变，或是通过使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而间接改变。人口变迁和全球化必将加剧世界各地的贫富差距。作为全球化的两大主要推动者，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状况最不均衡的两个大国，而这绝非偶然。全球化所到之处，如果能够掌握先进技术，那么投资回报率就会大幅提高，富人因而会越来越富，而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尽管工人的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其工资收益却越来越低。在新技术加剧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发达国家亿万工人不仅要经历失业带来的经济和精神阵痛，更糟的是他们最终不得不安于接受薪酬更低的工作岗位。

强力推动全球化进展的信息技术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部分原因：**思想创意已经取代实物资产成为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创意经济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已经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如今，至少是在美国，企业用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投资已经与厂房、设备、办公楼等不动产的投资不相上下。20 年前，美国前 150 家大公司实物资产的账面价值占其股票总市值的 75%，那时，一个企业的价值几乎全部体现在那些可以变卖的工厂、设备、办公楼等不动产上。而到 2004 年，前 150 家大公司实物资产的账面资产价值只占其总市值的 36%。今天，各大公司大约有 2/3 的价值来自无形资产，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掌握的知识、理念、客户关系等方面，其中包括专利和版权、数据与品牌以及用以践行其理念的组织安排和人力资源。

人的思想创意本身可以在市场经济的苍穹当中自由漂移，但其经济价值时常被严格的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牢牢束缚。其实，人人都可以针对生产技术和商业模式提出自己的创新思想，形成生产力，创造利润，从而体现自身价值，最终推动创意经济的发展。一个利好消息是，**当代新的思想创意会比**

以往产生更大效益。因此，短期之内，新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新的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及新的商业经营模式一定会层出不穷，影响深远。一个新思想的价值一旦获得市场认可，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都可以对此加以利用，当然，有时是要付费使用。随着财富和收入越来越直接地受控于新（或旧）的思想、观念，那些在传统经济环境中打拼大半生、全家生活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将会发现，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变得十分困难，他们往往不得不承受家境衰落的痛苦。事实上，在美国和一些经济运行良好的欧洲国家，普通工人已经发现，尽管过去 5 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自己的实际收入却在逐年下降。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只有那些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投资者。

全球范围内，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释放出了强大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正在抬高前 20% 左右能够熟练运用思想、观念赚钱的那些人的身价，而压低绝大多数人所做工作的价值。

就像人固有一死一样无法避免，未来几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发展趋势将更加明显，所有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势必因此加剧。全球范围内，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释放出了强大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正在抬高前 20% 左右能够熟练运用思想、观念赚钱的那些人的身价，而压低绝大多数人所做工作的价值。事实已经摆在眼前：过去 6 年，经济快速发展给大多数人带来的收入增幅是 50 年来最小的，而受益最多的就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员和坐收资本回报的富人。

老龄化国家受这种发展变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贫富差距加大现象更加突出，因为已经退休的老人群体比在职人员的收入更低。在未来 10~15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老龄人口将会持续增长，各国依靠低收入维持生活的居民比例自然就会相应提高。不幸的是，对其他人来说，这就像是一场零和游戏，原因不仅在于全球化进程和创意经济的发展会压低非老龄人口的收入，而且在于为了支付日益庞大的退休人群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大家的税务负担将会不断加重。

医疗领域即将上演《完美风暴》[①]

短期内，医疗方面也是前景黯淡，人口变迁和全球化也把所有发达国家引向逐步降低国民医疗标准的道路。有三个因素正在合力上演卫生医疗版的《完美风暴》。首先，从现在到 2020 年，各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将会增加 35%~50%。其次，医学进步正在把许多致命疾病变成慢性病，病人的弥留时间往往也会因为医学进步而延长几个月甚至数年时间。最要命的是，发达国家一直坚持执行老年人都能享用最新治疗技术的医疗政策，因而老龄人口的医疗支出压力将会无限扩大。比如，这些年来癌症发病率及其治疗费用就都在不断上升。美国著名医生继续教育机构 M|C Communications 公司的总经理艾伦 · 洛特韦恩博士指出，5 年前一般采用两种典型药物治疗盲肠癌，花费是 500 美元，患者平均存活 8 个月；而今天盲肠癌患者接受化疗，平均可以存活 13~20 个月，而其治疗费用则高达 300 000~500 000 美元。

在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共同推动下，价格昂贵的新兴医疗产品和医疗服务种类一年年地持续增加。新的生物科技和医药产品层出不穷，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全球潜在医疗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每个疗程的花费动辄就要成百上千美元，而新型医疗设备的售价也高达几万、几十万美元。医疗市场的急剧膨胀，正在改变医疗技术研发的成本收益模式，那些常常为开发新产品投入十几亿美元的大公司将要面临巨大风险。通过知识产权法保证生产企业形成垄断价格，收回高额研发投入，这是促进医疗科技发明创新的关键因素，所以，成功开发的医药新产品价格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居高不下。

---

① 此语出自 2007 年美国拍摄的电影《完美风暴》（*The Perfect Storm*），影片讲述了五位船员在茫茫大海中和狂风巨浪搏斗的故事。其中，船长是一个叫比利的男人。他刚刚结识了新女友，急需钱来过上新生活。然而附近海域的捕鱼量却一直不景气。除了船长，其余 4 名船员眼下也都需要钱来维持个人的生活。于是，他们决定开往一个相距甚远的海域，就冲着那里丰富的鱼资源。

富贵险中求，尽管比利知道前方可能有风暴，比利还是坚决地往前行使。然而，真实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风暴异常狂暴，他们正在面临出海生涯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编者注

如果不是纳税支持医疗支出的在职人口也在不断下降，欧洲、日本和美国应对医疗领域的“完美风暴”还会容易一些。而现实结果却是，到2020年甚至更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会因为飞涨的医疗开支而爆发政治危机，随之而来的将是无休止的关于老龄人口医疗政策的政治争议，因为所有人的医疗成本同时都在持续上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是未来10年的中心政治议题。

与解决预算赤字和教育问题不同，通常的政治协调模式在医疗危机面前难以奏效。人口变迁本身正在一年一年地积聚着老年人的选票能量，任何政党要想削减他们的医疗费用，尤其是那些依赖治疗维持生命的老人的医疗费用，都会受到选举惩罚。求医问药毕竟是仅次于生死的人生大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这些老人很容易形成统一战线。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在职选民就会容忍政治人物因此提高他们的税负，以满足别人的医疗需要，尤其是在自己已经被日益强化的贫富不均抛到底层，而自身医疗待遇又日渐降低的时候，更是如此。

人口变迁与经济全球化明白无误地带来了这个问题，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无法肯定。如果医疗行业能够因应市场压力而实行变革，大量低成本医疗技术将会获得发展。当然，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深表怀疑。更有可能的结果将是：国库将被掏空；通过税收改革，医疗开支将变相增加，其他预算被迫削减；医疗待遇将形同配给，非致命患者须排长队等候治疗；病人权利将受限，医学进步将放缓；医疗技术水平会悄然降低。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对各国的政治冲突而言，这个问题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能源争夺战

与医疗危机十分相似，能源市场也将进入长期紧张状态。20多年来，

世界石油市场需求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石油生产能力增长。未来 10~15 年，供需缺口还会继续扩大。在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大国，工业化进程急速推进，汽车保有量急剧增长，这两个因素成为拉动石油需求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到 2020 年，这些自身石油储量不足的国家将会成为全世界石油消耗最多的经济体。

近期就会显现的后果将是，能源价格日益走高，混合动力汽车逐渐取代传统燃油汽车。由于对石油和天然气消耗一直实行高税收政策，欧洲和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很高，因此这些国家受油价上涨的影响比美国及亚洲其他地区要小。但是，由于全球一半以上的原油产自中东、中亚及非洲等世界上政局最不稳定的地区，今后 15 年，不管什么政策都无法确保我们不受石油短缺的打击，而这种打击一旦到来，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经济不景气。

未来 15 年，新技术的应用加上合理的资金投入，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石油短缺带来的挑战。全世界将会面临廉价轻质原油的短缺，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源贫乏，因为加拿大、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拥有相当于全球常规轻质原油储量总和的重油储量，俄罗斯和中东地区还有巨大的天然气储量，中国、印度、美国、南非和俄罗斯也同样拥有规模庞大的煤炭储量。不过，要想利用这些能源还得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降低重油的黏滞性和污染物含量；实现天然气的批量液化及全球运输；大规模开采深海石油；安全处置核废料；采用超临界锅炉技术去除煤炭碳素并实现气化。如果各国政府和企业能够筹集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投入，攻克技术难关，并建设、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在今后 15 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应该可以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否则，到 2020 年，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产出必须提高 80%，才能满足全球需求。理所当然，那时的石油价格会比现在高得多。

油价不断攀升，替代产品就会应运而生。虽然在真正实用化之前，我们无法知道哪种技术革新最终可以替代石油，但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相信：如果能取得技术突破，两种新能源将会成为石油的替代品。目前，化石燃料的

首选替代品就是氢燃料电池，它可以应用于汽车、笔记本电脑及家庭制冷、制热等场合。对于生产工厂和办公大楼等能耗大户，把宝押在太阳能技术进步上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利用太阳能可以产生蒸汽，推动涡轮为工厂提供动力，或者带动发电机为大楼供电。

全球环境的严重恶化，应该能够推动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在寻找新能源方面加大投入。从现在到 2020 年，科学家关于全球变暖现象的发端及其影响这一问题的共识，肯定会继续加强，并不断深化，由此也会引发世界各地的政治争论。但是，由于对全球变暖的科学机理仍然知之甚少，在今后 15 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气候变化是否能够最终迫使人类不惜任何代价找到石油的通用替代能源，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情。

石油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将使中东这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经济孤岛，对于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稳定，尤其是对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平稳发展，重要性越来越强。目前，亚洲地区依赖波斯湾供给的石油数量已经达到美国或欧洲的两倍，而到 2020 年，亚洲国家将有 75% 的石油依靠进口，其中 80% 要来自中东地区。尽管面临宗教激进主义分子的叛乱挑战，波斯湾地区石油输出国的专制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抵制外国投资，也不开放国内竞争。这个对世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地区仍然把自己孤立于正在改变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化力量之外。

未来 15 年，中东这个异数会让整个世界更加充满危险。在中东地区，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变局就是，沙特王室大厦倾覆，或者是其几个邻国发生宗教叛乱。即使国际社会不管采用什么办法，最终能够平息这些零星叛乱，而且那些王室专制政权也能保持稳定，石油也会越来越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痛处。由于美国的“撒旦”形象在中东地区深入人心，很自然地，中国、德国、印度等都会尽可能地撇开美国，单独发展与这些石油输出国的外交关系。中国同伊朗、俄罗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及其他石油出口大国，积极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网，这就是最早发出的信号。几年之内，通过此类协议与合

作，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不仅可以深入南亚，也会到达中东、俄罗斯及部分中亚地区。

尽管眼下美军在伊拉克处境不妙，但是，不管是打全球化的算盘，还是打石油的算盘，对中东地区，美国都会更深入地插足其中。为了切身利益，美国一定会全力保证亚洲地区石油自给，并有能力向其他国家出口石油。如果说建立并管理国际石油合作机制已经超出美国的能力，那么，不管采用什么办法，美国一定会不遗余力地维护整个中东地区的政局稳定。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再到大西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美国海军这支全球唯一的“深海舰队”不停地游弋，保护着海上石油运输的安全。作为全球最先进的科技研发平台，美国也得动员庞大资源，用以开发石油能源的替代产品。

两个变数

未来 15 年，还有两个难以预测的发展变化，可能影响各国的发展进程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当然，这两个变数并非决定未来的结构性力量，也无法确切预测其最终结果，而且现在看来其可能的影响力也还很小。第一个变数就是，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日益增大的政治能量。人们通常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是十分危险和极其错误的。虽然说当代很多恐怖分子都是伊斯兰教徒，并且多数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分子也和恐怖组织一样排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及其首要推动者美国而来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价值观，但是，绝大多数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根本不是恐怖分子，而像哈马斯和真主党那样组织严密的极端恐怖暴力集团的成员，反而不是宗教激进主义分子。而且，过去 10 年来，很多大的恐怖活动根本就不是宗教原因引起的，不管是蒂莫西 · 麦克维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发动的汽车爆炸袭击，日本奥姆真理教对东京地铁乘客实施的沙林毒气攻击，希腊“11 月 17 日革命组织”

制造的恐怖袭击，还是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惯用的恐怖行径，其实都和宗教无关。

未来 15 年，中东及亚洲地区大多数恐怖集团的攻击目标主要集中在本国内部，对欧洲、日本、美国的日常生活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他们会图谋动摇甚至摧毁以色列，尽管得逞的可能性极小。这些组织应该会步北爱尔兰共和军和哥伦比亚游击队的后尘，最终走向和平与发展，不会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和地缘政治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拥有数千追随者的“基地”组织与此迥然不同，因为他们有明确的全球攻击目标，那就是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另外还要加上石油输出国。不过，以往纪录表明，除非恐怖组织旷日持久地渗入一个国家内部，否则难以真正改变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像“9 · 11”事件这种单一的局部攻击，并不能对美国的宏观经济和国际地位造成影响。“基地”组织或类似集团，要想给美、日、德、英等西方大国造成广泛深入而又旷日持久的损失和打击，进而改变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核攻击或剧毒生物攻击是其唯一可能的攻击方式。当然，这种可能性甚低，恐怖组织离这个目标还相当遥远，但是鉴于美国在严格控制全世界，尤其是前苏联地区的核材料扩散方面少有作为，这种攻击并非毫无可能。领导调查 1993 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唐 · 克拉克指出：如果“基地”组织再次得到某个国家的支持，比如通过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分子接管巴基斯坦政权，那么，他们具备核攻击能力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大。

同样是未来 10~15 年影响整个世界的变数，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表现又有不同。尽管它既无野心、也没能力使全球化进程和地缘政治演变的滚滚车轮脱离轨道，但是，可能发生的足以警醒地缘政治战略家们的戏剧性一幕是，宗教激进主义分子接管巴基斯坦政权。如果发生这一事变，“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至少可以利用宗教激进主义力量得到临时性的国家保护，从而获得核武器。核武恐怖可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势力的一张王牌，完全可能演变为改变人类文明的历史事件，所有发达国家的生活状态和自由权利都可能因此

生变。

不难想象，会对全球造成实质影响的另一幕场景就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分子接管沙特阿拉伯。宗教激进主义分子在伊朗掌权后，世界各国虽然没有面临大的灾难，但是由此导致的油价飙升却使人人都受到影响。虽然说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上世纪 70 年代有了极大提高，但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地位比伊朗更为重要，况且，全球化又带来了石油消耗的急剧增加。未来 10 年，不管什么时候，沙特石油出口一旦停顿或锐减，都将给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带来浩劫。受影响最大的，也许将是中国政权的稳定，因为中国领导人一直坚信，可以通过经济不断增长来保持稳定。然而，即使沙特真的出现宗教激进主义政权，全球化进程也不会因此而改道，这个政权一样会在短期内设法恢复石油输出，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

科技进步是影响未来发展的另一个变数，与恐怖主义形成一阴一阳之势。毫无疑问，到 2015 年或 2020 年，信息技术将会使人们有能力胜任很多今天难以想象的任务，积极推广、普及信息技术的国家，一定会因此变得更加富强；许许多多的病痛会因医学进步而终被消除；不计其数的生产工艺会被纳米技术改变，千千万万新产品也会由此产生。

科技发展进程也会受到这里所讨论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影响。为应对人口变迁，改进老龄人口医疗技术，提高工作人口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越来越成为科学研究的重点。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新技术将会跨越国界，在不同文化之间迅速传播，其迅猛程度将比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计算机的快速普及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唯一超级大国的独特地位，美国无需担心与之相匹敌对手的挑战，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太空竞赛时期不同，在军事研发方面的投入将会减少。

尽管我们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详细特征和潜在影响几乎全然无知，但是，科学技术一定会取得重大进步，并对经济发展产生根本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科学技术有时也会成为一个令人沮丧的变数，因为要准确预测其发展轨

道无异于猜谜。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罗 · 阿利维萨托斯和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饭岛澄男这些一流纳米科学家，的确成功预见了纳米技术将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阿利维萨托斯开创了纳米半导体晶体研究领域，饭岛首次发现了碳纳米管），使开发、生产丰富的清洁能源成为可能。但是，在其他科技领域，10 年前预期取得的重大突破却至今没有实现。目前，许多卓越的科学家正致力于生物技术研究，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首席执行官威廉 · 哈兹尔廷博士、牛津大学苏珊 · 格林菲尔德教授等人都预期，通过基因筛查、干细胞技术及广泛应用“神经芯片”（植入人体内部的集成电路，含有经过筛选或改变基因的细胞组织）等技术手段，在 10 年之内将最终治愈囊肿性纤维化、亨廷顿舞蹈病、帕金森综合征等疑难疾病。但是，早在 20 年前，这个领域的先驱就希望在 10 年内找到癌症的治疗办法，不过迄今依然没有成功。没有人可以自信满满地描绘出哪怕是 5 年后的科技发展图景，准确展望科技进步将会对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怎样影响，这实在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见和想象能力。尽管我们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详细特征和潜在影响几乎全然无知，但是，科学技术一定会取得重大进步，并对经济发展产生根本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

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这些变化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它们的综合效应，这也导致各国政府对各种变化因素很难分头应对。先说人口变迁，从现在到 2020 年，享受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欧洲老龄人口数量每年都会增长近 3%，而工作人口的数量却在逐年下降，日本也一样面临此消彼长的双重压力。这些国家的人口变迁风暴来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到 2020 年，日本和欧洲的老龄人口数量将达到工作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带来的问题

远未结束，在欧洲和日本，将于 2025~2035 年期间长大成人的少年儿童规模萎缩速度甚至比工作人口还要快，他们可是日后从事生产、纳税养老的中坚力量。

在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将会陷入恶性循环，国民生活水平必然会逐步降低。除非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变化，否则难免出现连年经济增长缓慢、生产收益萎缩的局面，这将使得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来减轻负担的做法成为不可能。更可能的结果是，养老支出与医疗花销在全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于是自然就会造成税收提高、投资减缓，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2020 年法国的经济增长仅能达到 1.5%。这还是假定未来 10 年法国在竞争力和劳动力方面的成本不会因为全球化推进而继续升高的结果。无独有偶，德国最优秀的预测专家也告诫说，2020 年德国的经济增长也就刚刚能够达到 1% 多点，届时德国的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将占到 GDP 的 18%，这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目前财政收入的 80%。

越来越快的全球化进程也将会给千千万万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向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稳步转移，留给发达国家两个选择：一是提高国内那些不能转移的服务业的生产力，二是力争成为技术创新基地，进而发展新产业。二者都需要大量社会资源和政治变革作为支持，这看起来已经超出了当今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正常的经济、政治承受能力。为了更好地利用新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必须具备改变传统工商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自发动力，还要有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倒是不成问题：尽管总是要比美国晚一两年，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和日本在 IT 技术领域的投资跟美国不相上下。然而，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生产力回报，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和强势工会不能接受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工人大规模下岗、职位重组。对欧洲和日本而言，实现高储蓄、高投资也是个棘手问题。经济增长日趋缓慢，再加上税收

负担不断提高，导致多数居民的收入与储蓄不断萎缩，而35~55岁年龄段上储蓄能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口数量又在慢慢减少。

欧洲和日本看起来也不具备推动创新的政治、经济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不仅依靠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一切要素，还要依靠能够为创业者提供直接支持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态度。在今天的日本及大多欧洲国家，一如几十年来的情形，既有企业受到地位不断下降的传统上层社会以及规章制度和非正式关系网的继续保护，而创建新企业仍然会被看做离经叛道之举。在英国，不允许新的临街店面开张，因为这会破坏方圆半英里的绿色环境空间。在法国，新雇员即使技术娴熟，其工资收入也不及平均水平的一半，并且18个月内不能被解雇。长期以来，**欧洲各国一直把资本市场当做解决财政赤字的融资平台，而不是为创立新企业服务。**在日本与欧洲的文化观念之中，充斥着对既有企业的偏爱。在美国，崇尚的是比尔·盖茨、萨姆·沃尔顿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在日本和欧洲，人们似乎更敬重那些祖辈创建工商业帝国的世家望族，诸如法国的斯伦贝谢家族、意大利的阿涅利家族以及日本的丰田家族。

在日本和欧洲，现在依然看不到变化的迹象。就在距今不到5年之前，法国应对失业问题的办法不是放松管制、鼓励创业以增加就业机会，而是把法定退休年龄降低5岁。想想看，这会给养老金的长期成本带来多么大的影响，而且由于推行35小时工作周制度，法国人的工作时间又比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缩短了14%。1997年，法国通过了允许私人揽储法案，但其遭到的抵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直无法实施，不得不于2002年宣告废止。类似地，技术不熟练的年轻德国人如果参加工作就会丧失很多好处，他们失业时的税后收入反而比上班要高。德国最近也通过了一项新法案，禁止企业因“个人原因”解雇工人，也不得因企业技术升级之后的工人重组计划而解雇工人。

在全球化进程中，法、德等国将会发现自己步步失利，因为人口变迁已

经给他们的财政预算造成巨大冲击。为满足老龄人口所期望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财政需要，欧洲各国和日本政府不得不削减其他福利。如果削减其他福利不具有政治可行性——事实正是如此——他们只好提高税收。但是，由于工作人口不断减少，再加上全欧洲高达 45% 的平均税率已经令人痛苦不堪，如果再提高税收，还有谁会乖乖缴纳？这些国家的最终选择只能是年复一年越筑越高的财政债台，而高额财政赤字必将挤压投资、减少流通，最终导致提供财源的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更加延后。

未来 10 年，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福利国家将会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兑现对亿万人民所做的基本社会承诺。这必将造成严重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分化，也将使欧洲和日本面临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经济最糟糕的社会、政治环境。很多欧洲国家对于穆斯林移民充满敌意，激烈排斥，而法、德两国仅仅稍微放松移民管制、改革福利，就引发了大规模暴力示威。这些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环境的恶劣。

大概只有依靠温斯顿 · 丘吉尔的政治智慧，加上罗纳德 · 里根的游说技巧，才能说服欧洲和日本选民，让他们相信减少社会福利、牺牲经济安全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不二途径。随着欧盟东扩，数千万中东欧地区的低薪工人得以在欧盟内部自由迁徙，这一危机只会因此加深。在这种社会发展的危急时刻，伟大的领导人有时就会应运而生，但是，伟大的领导人顶多会在一两个国家出现，而不能指望出现在每个国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政治稳定，在这种压力下，欧洲和日本很可能会进入左右摇摆的极端政治时代。

如果只是面临人口变迁的挑战，欧洲和日本完全可以尽力保护国内产业，人为刺激经济增长，而不必担心外国投资者和制造业者的反应。如果挑战只是来自全球化压力，他们可以降低税收，发展教育，加大投资，而无需顾虑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成本上升。现实情况恰恰是，这两种无法改变的强大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作用，其结果也就让民主政府难以应付。如果日本和大多欧洲国家政府不能说服人民接受他们必定会认为激进的改革措施，那么

到 2020 年，这些国家必将陷入长期衰退。

但是在日本和欧洲，仍然会出现局部的经济成功。如果有好的领导，能够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及时把生产经营转移到税负轻、成本低的地区，那么个别企业就可以避开整个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对于放松管制、实施改革，日本的抵制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厉害，特别是当改革措施会对国内乱七八糟、毫无章法的服务业造成影响时，抵制尤其严重。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服务业的生产力水平是最低的。但是，索尼、尼桑等日本一流出口制造商早已接受了全球竞争的事实；而且日本很多大公司甫一成立，就开始年复一年地制定新的产品和经营战略，同时也将大部分生产工厂转移至中国及其他亚洲低工资国家。

爱尔兰、瑞典和芬兰已经成功找到更大规模地实现局部经济繁荣的有效途径：开发几项全球大量需求的世界一流技术，或培育几家产品行销全球的世界一流企业，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保持一个小国的兴旺繁荣。瑞典通过大力削减法人税，举国支持工程制造，催生了爱立信、利乐拉伐及宜家等世界一流企业，向全世界提供移动通信、廉价包装及家具定制等产品和服务。芬兰的诺基亚原本生产橡胶靴，当发现橡胶靴需求激增但利润微薄时，迅速转型，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手机生产商。“凯尔特之虎”爱尔兰仅用 15 年时间，就从发展最慢、最为贫穷的欧盟成员一跃而起，成为欧洲第一富国，诀窍就是尽其所能，实行一切能够吸引外资、外企的政策，包括降低税负、削减政府总支出、增加教育和培训支出、废除劳工招聘解聘和外商投资的种种限制。另外，爱尔兰也是幸运地赶上了特别好的发展时机：当时，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美、英及欧盟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在积极寻求海外拓展。

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甚至还有西班牙、波兰等国，都派出政策专家和商界领袖，到爱尔兰而不是欧盟大国取经，学习如何在自己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可以在某个领域借鉴小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但是没有办法把这种经验推广到全国，因为他们是正在与人口变迁

和全球化压力苦苦作战、内部环境又极不相同的经济大国。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这些国家就得设法达成启动改革的政治意愿，主要就是改革税收、管制和养老等方面的政策。如此以来，这些国家的传统社会契约就很难继续维持不变了。

就大多数方面而言，面对全球化、人口变迁及其综合影响，中国和美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今后 15 年，中美两国老龄人口会比欧洲和日本增长得更快，但是，其工作人口同时也在增长，各国发展前景将会因此而大相径庭。到 2020 年，美国不从事生产的老年人仍然会比工作人口少 28%；而在中国，老年人数量不会超过工作人口的 20%；再来看看欧洲和日本，老龄人口将超过工作人口的 50%。而且，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福利待遇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英国明显例外），而在中国很多人干脆就没有退休和医疗保险待遇。由于存在这种差异，欧洲各国自然更加公平，政府也必定显得更为慷慨大方。但是，中美两国的现行制度在下一代人身上依然会行之有效，而日本和欧洲就无法做到。

当今时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积极信奉实用主义的两个主要国家。两国大致都能接受世界现状，尽管美国的国际野心和中国的国内战略有时会超出各自的能力范围。对于全球化与人口变迁双重压力之下难以实现的传统义务与美好愿望，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则依然紧抱不放，这严重制约了其应变能力。未来 10 年，如果不能想方设法实施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影响力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价值观，将会因为世界发展变化而遭受严重损害。

对日本和欧洲而言，至关重要而又异常紧急的是，至少在未来 10 年内，是中国和美国，而不是日本与欧洲，将占领全球化的两极。长期以来，由于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中国数以亿计的低薪熟练工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全世界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美国也将会拥有远多于日本和欧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劳动者和经理人，他们能够

更好地融入庞大的全球化网络。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学、教育机构为依托，在不断涌现的新兴企业推动下，美国千千万万熟练工人、管理人员和科学家们将会生产出世界同样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此外，美国远为松散的管理制度使得企业更加灵活开放，更容易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模式，不管是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纳米技术，还是今天只有科学家和工程师才熟悉的全新科技，他们都会及时引进。

中国的经济优势，不仅来自能够使用西方先进技术的亿万廉价劳动力，更来自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推动的有史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僵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死抱形成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最终宣告失败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放。尽管中国在此之前 10 年就已经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没有苏联解体，很难想象中国的现代化会取得如此成就。大多数西方人因为冷战迷雾的笼罩，没能注意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邓小平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需要，开始放弃纯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进程首选农业作为试点，在这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落后国家，这是相当敏感的。农业改革积累的经验让中国领导人获益匪浅，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实现摆在面前的更大范围的平稳过渡。邓小平在北京发布一系列指示，放松了几十年来国家对粮食定价和流通的严格控制，使几千里之外的数亿农民从土地密集型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粮食出现大量剩余，粮价随之下跌，广大农民依然难以摆脱贫穷。与此同时，邓小平打破了限制乡镇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和当地领导一起创建了千千万万个小型乡镇企业，开始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补充。10 年不到，中国就把不计其数的农民转移到其他行业，而欧美国家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完成这个进程。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 GDP 贡献最大、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经济成分。

中国的经济优势，不仅来自能够使用西方先进技术的亿万廉价劳动力，更来自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推动的有史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

苏联解体后，中国实现了更大飞跃。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彻底抛弃了阻碍苏联几代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中国领导人重拾列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质量与国家本身的经济能力成正比，国家比企业更重要，因此开始把给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要求企业上缴利润，以支持公共财政。这项改革雷厉风行，影响深远，结果就是，今天中国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规模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小，而仅比美国和日本大一些。而中国共产党也通过修改党章，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代表广大人民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当一些欧洲知识分子依然坚持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发出信号：党已张开怀抱，欢迎新一代企业家，一道推进现代化进程。在俄罗斯，政府把国有企业卖给管理层，换取毫无价值的股份，把自然资源卖给少数寡头资本家。而中国政府对大多数国有企业依然紧抓不放，但是鼓励千千万万年轻人自己创业，一展身手。

中国领导人快速推动一波又一波的改革，目标就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国内，他们改革了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到城市的户籍制度。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向外贸、外资完全开放，中国新兴企业家因此得以与急切向中国转移资本和技术的外国公司创立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削弱了 10 年前在中国市场上冲锋陷阵的乡镇企业的地位。到 90 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市场处境急剧恶化，先是被外资企业压倒，后来又被内资企业超过。截至 2005 年，将近 50 000 家中国企业有了外资合作伙伴，合资企业的外商投资规模超过 1 250 亿美元，其中 900 亿美元集中在制造业。

西方国家经常批评中国，在其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没有真正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得以快速推进的奥秘所在。在多数欧洲国家，工会、农民及传统行业组织都极力坚持原有的管制政策，拼命维护已经极不适应全球化要求的现行体制。与此不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公开抵制。但是，未来 10~15 年，中

国模式将会接受真正考验。到目前为止，推动中国经济力量日益增强的改革还是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与 19 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十分相似，由于幅员辽阔，革命性的改革进程在远离沿海的广大中国内陆地区依然有待推进。

未来 10 年左右，这些改革离亿万中国家庭将会越来越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必须建立、完善西方发达国家花了半个多世纪才完成的精密复杂的社会、金融制度。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私营化的银行、保险及抵押贷款机构。在中国现行金融制度下，几家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吸收亿万居民的小额储蓄，然后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些企业一旦倒闭，数以千万亿计的银行呆账就不得不一笔勾销。就像制造业一样，中国的金融业也得实现现代化。除非爆发经济危机——比如石油价格涨到每桶 150 美元——否则，外资一定乐见这些大型国有银行破产倒闭。根据当前时间安排，到 2010 年，中国将会向支撑发达国家金融制度的西方及亚洲银行巨头开放市场。实际上，这一进程已经通过合资企业悄然启动，中国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本土银行及保险企业与外资银行及保险企业同台竞争的局面。金融业放开之后，中国真正面临的挑战将是：商业银行再也不愿向依然雇用大量工人的没落国企发放贷款。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情形与此类似。未来 10 年，中国将要兴建大量的公路、桥梁、光缆、机场、地铁、高速铁路及水处理设施，建设规模超过欧美各国的总和。正如中国领导人满心希望的那样，西方公司一定会争取拿到大多数电信与交通运输领域的项目订单。截至 2005 年，在电信及交通运输领域，中国已经有将近 600 个工程项目吸引外商参与，外资投入达到 60 亿美元。以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为依托，中国也会投入上千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兴建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

中国大兴土木，建设现代化公路、铁路、机场和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不仅出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考虑——尽管这在发达国家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是出于使全国各地共同发展的考虑。沿海与内地之间巨大的发

展差距已经显现无遗，不均衡现象有目共睹。如果这种差距持续扩大，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西部地区成百上千的小城镇，兴建现代化基础设施，成为中国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主要途径。

未来 10 年，中国政府还要建立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养老、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险等保障。在急剧的社会变革浪潮中，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些随波逐流、茫然无助的平民百姓才会拥护、支持国家主导的改革进程。根据以往经验，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就会寻求西方咨询服务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帮助，以期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2005 年，就有 4 500 多个社会服务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项目在中国开展，外资投入超过 80 亿美元。此外，近 10 年来，中国还邀请了社会保障领域的大批西方官员到中国参观访问、讲授经验。

对此，我有切身经历。1999 年，我担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获邀随同克林顿总统经济事务顾问委员会主席珍妮特 · 耶伦女士和美联储副主席罗杰 · 弗格森先生访问北京。我们花了三天时间，讨论政府向退休及失业人员提供帮助的不同途径。一个接一个的政府官员，向我们提出了许许多多西方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公共财政方面的基本问题。不能工作或不想工作人员的退休金如何管理？经济不景气时，如何保证这些开支？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后来，朱镕基总理在中南海金碧辉煌的会客厅接见我们一行，这次访问随之达到高潮。会见时，首席贵宾耶伦博士与朱镕基总理坐在高处，我们依次就座，穿着丝绸制服的年轻姑娘不时添茶倒水，朱总理畅谈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的艰巨任务。

对于完成这些艰巨任务，中国具有两个不可估量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一直在讨论的全球化优势：正在不断推进的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英、德、法、美等国过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化挑战时，因为国内没有成例可循，国外也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几乎个个都是茫然无措，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谓生逢其时，因为影响深远的全球商务网络和精

致有效的国际关系网络已经建立。今后 15 年，中国可以选择西方最好的跨国公司，参与国内现代化建设，并能从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本土企业可以为作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而发展壮大，最终发展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

中国还有一个不可估量的优势。与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同，不仅中国领导人矢志改革，而且改革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共识。这比其他国家经常因为反对党和利益集团横加阻挠而难以推行扩大的改革要好得多。到目前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风驰电掣般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艰巨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力领导下，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到 2020 年，美国依然会是全球唯一军事超级大国，无须担心出现实力相近的对手。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土崩瓦解，各成员国积极争取加入北约和欧盟；中国致力于现代化，无暇他顾；欧洲各国面临经济困难，发展军事将遇到强大阻力；美国则一如既往，继续打算以相当于甚至高于其他国家总和的军费预算，支持武器开发和军力建设，并随时准备以强大武力主导国际政治优势。综合以上因素可见，到 2020 年，国际政治格局中，除了美国保持唯一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别无其他可能。不过，全球化进程也会帮助中国取得地缘政治优势，原因不仅在于全球化可以为中国带来发展现代化军事力量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而且在于全球化使得中国的影响力波及所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当然会对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国家给予足够尊重。

未来 15 年，在地缘政治的游戏场上，中国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无可匹敌的唯一超级大国总是会让其他国家紧张不安。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从巴黎到德里，从莫斯科到东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出现可能影响自身利益的冲突和麻烦，他们都会问一问华盛顿将作何反应，问一问自己应如何应对。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很难对美国产生实质影响。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对于彼此经济发展的影响甚深，如果欧洲与中国、俄国与中国或日本与中国能够统一立场，共同施加压力，那么美国至少不得不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因此，未来 15 年地缘政治发展的核心就是中美关系的演变。石油产区动荡不安，核武阴云不散，资本市场危机四伏，诸如此类全球性问题在今后的世界似乎在所难免。为解决这些问题，欧洲、日本和俄国定会竞相展现自己的影响力，美国依然会扮演监视人的角色，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既会团结合作，也会围堵牵制。某些情况下，美国肯定还会把中国视作威胁力量，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部署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美国的这种态度。不管作为竞争对手，还是作为合作伙伴，随着中国经济及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将会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必须承认中国的影响与诉求，至少在亚洲地区会是这样。

我们无法绕开未来。人口变迁、全球化与地缘政治新格局，绝不会仅仅因为哪个国家不喜欢，就不发生。今日世界无法回避这些变化，正如当年这个世界无法回避大规模工业化与德国军国主义崛起一样。面对这些强大的力量，每个国家也会像当年一样，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并最终找到顺应发展潮流的正确途径。未来任何一种发展变化，都不可能为了欧洲、日本甚至美国的亿万民众，而随时准备放缓脚步。未来 15 年，在各大发展中国家，受过良好教育、被来自欧美及日本跨国公司的资本与技术武装起来的劳动力规模将会迅速扩大，不管什么决议，无论什么事件，都无法逆转这一发展趋势。同一时期，除非发生极端历史性事件，否则，美国将继续维持军事、经济超级大国地位，中国也将会在财富与影响力方面取得支配性地位，这都是无可遏制的。

第二章

02

人口大震荡

各国无法避开的大问题

FUTURECAST

◆ 凭着比欧美总和还要多的人口优势，以及大范围、不屈不挠的现代化计划，在2020年之前，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生育低谷给中国造成的大部分不利影响，都会被历史性的经济改革带来的生产力极大飞跃所抵消：经济改革把亿万中国人从18世纪水平的农业耕作一下子带入了21世纪的工商业经营。

◆ 从2005~202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数量将会增加一个亿，增幅约为65%，比欧洲和日本都要高，他们的这一比例分别是57%和30%。但是，由于中国的生育高峰和生育低谷都比西方国家来得晚，即使到202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开始减少，其规模也比老龄人口大得多。届时，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1.67亿，但其数量依然低于劳动人口的20%。

世界人口面临挑战

就今天人们记忆所及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很好，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国民也是时运越来越好。近几十年来，所有发达国家也向国民许诺，退休之后，基本生活标准不会显著降低。在以上两方面，人口结构扮演了关键角色：劳动力规模日益壮大，不断创造财富、贡献税收，供养着退休老人。然而，当今时代，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至于未来 10~15 年内，势必会对全世界亿万退休老人的生活水平和养老保障产生显著影响。

几百年来，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人口规模仅有轻微波动，前后两代相差甚小。根据历史记载，直到 20 世纪前半叶，也只有一些非常事件——可怕的瘟疫、战争，或大规模移民潮——才会在一两个国家导致人口规模的显著变化。

650 年前黑死病爆发之后，同一时期许多国家人口同时锐减的现象，在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世界各国在接连出现人口急剧增多的人口高峰后，又紧跟着出现骤然减少的人口低谷的历史纪录。

当代各国政府，已经自然而然地把许多基本职责当做不朽典范，牢记在心。政府不仅要修建经久耐用的学校，修建稳固平坦的公路，而且，面对稳定增长的人口，政府还得负责促进劳动就业，实现经济增长，提供社会保障。

最近这两代人，已经史无前例地打破了上述模式。首先，由于不同原因，与前一代人相比，世界各国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数量大得多、寿命长得多的高峰人口。其次，也是各有原因，各国高出生率没能持续多久，随之就出现了生育低谷——后一代人，规模大为减小，不仅比高峰期的那一代数量要少，从出生率来看，也比几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代人都低。这种高峰与低谷相继出现的情况，在许多国家渐次出现。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及中东部分地区，世界各国实际上都先后经历了这种人口变迁。

人口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势必影响未来 10~15 年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而且这股浪潮肯定也会在 20 年、30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造成影响。不过，很难猜度更加长远的影响结果，因为我们无从知道正处于生育低谷的这一代人，是回归历史常态而缓慢增长，还是任由生育率继续走低，规模继续减小，抑或以其祖父母那代人为榜样，形成第二个生育高峰。

我们知道的是，从现在到 2020 年，人口低谷期的婴儿完全长大成人之后，由于人数减少，将会导致各国劳动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日渐萎缩。几乎不可避免地，这将造成各国储蓄率与投资率不断下降，经济增长能力因而也会大大降低。此外，随着高峰人口年老退休，比例严重失衡的老年人将会给世界各国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是增加为老年人提供财政支持的工作人口的税收负担，还是降低惠及亿万老人的基本养老与医疗保险水平，将成为痛苦的政治争议和社会分歧。在枯燥的数据背后，人口结构变化浪潮必将实实在在地影响到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舒适度和安全感。

这种无法改变的发展变化，尤其会给日本人与欧洲人造成影响，因为他们国家在人口低谷期出生的人口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劳动力数量年复一年地萎缩。今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好的情况下，也就能够达到 1%~2%，因此，

亿万上班族很难看到持续增长的发展前景。除了经济影响，人口变迁造成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只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环境中，才容易出现乐观情绪，形成拥有广泛支持的政治共识。严谨、宽容的社会态度在许多欧洲国家正慢慢消失，在法国、丹麦和德国，最近明显可以发现，留给那些处于经济边缘地位的少数族裔的，尽是失望和愤怒。战后不久，各国经济不时陷入衰退，如果正好赶上全球化浪潮的横向激荡，一种无形力量就会拉低各国大多数国民的收入水平。未来 10~15 年，生活在里昂、慕尼黑、都灵、大阪及其他许许多多城市的千千万万中产家庭，很可能会发现，他们再也无力维持闲适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了。这些家庭的孩子，对于父辈所珍视的勤奋工作、按规则出牌的价值观，可能会表示疑问，甚至直接拒绝；不用说，他们会比今天许多年轻人做得更过分。如果说历史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就会明白：经济持续低迷，将导致离婚率上升、萎靡情绪弥漫、犯罪事件频发，进而引发其他许许多多社会问题，而要想真正改变这种环境，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在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家，这种政治、社会压力尤其突出，因为这些国家高峰人口已经年老退休，开始享受全世界最慷慨大方的公共养老待遇，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飞速上涨。为此，很多发达国家领导人，要么不惜得罪生育低谷出生的正处工作年龄的这代人，增加他们的税务负担；要么宁可让高峰期出生、已经年老退休的那一代人不满意，削减他们的原有福利；要么为保自己的政治生涯不致断送而大肆举债——这必将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然而，有些欧洲国家却可以绕开这种困境。在爱尔兰，移民大量涌入，出生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经济运行也堪称全欧洲最好，因而它很可能不会出现上述大部分问题及压力。英国人的失望和不满程度也会比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轻，这不仅因为英国的人口结构失衡情况稍微好些，更是因为英国的政府退休金早已大幅削减到位，极大缓解了高峰人口退休带来的财政和政治压力。但是，大幅削减退休金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未来 10~15 年，面对

英国人退休待遇的逐步降低，政府领导人要么提高税收、举借公债，给退休老人以甜头，要么任其生活在贫困状态，不管不问。

美国的人口挑战，则不像大多数发达国家那么可怕。相对较高的出生率在美国形成了比欧洲和日本规模更大的生育高峰。尽管后来出生率持续降低，移民数量不断减少，美国依然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人口高峰。未来 10~15 年，在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劳动力规模会以比较像样的比例增加——1990 年以来，新移民对劳动力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在美国，来自退休人口的政治压力也会小一些，因为有更多的工作人口纳税支付养老金，而且美国老人的退休待遇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低。美国社会保险制度最终也会出现严重问题，但是至少在 10 年内，或者说在 2020 年之前，不会出现。稍后我们将会看到，今后几年，由于人口变迁而扰乱美国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问题在于老年人的医疗开销。

发展中国家当中，东亚地区劳动力的发展前景最被看好，因为在这个地区，经济改革广泛开展，教育投入不断提高，这使得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人具备充分条件，完全能够实现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发展。相形之下，在大部分拉美地区，人口膨胀将会带来数不尽的经济、政治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基本失败，无法为大批膨胀人口创造就业机会；而由于长期忽视教育投入，这些国家也无法把人口大军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快，而且由于出生率急剧降低，也出现了生育低谷。但是，由于具备独一无二的特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依然看好。凭着比欧美总和还要多的人口优势，以及大范围、不屈不挠的现代化计划，在 2020 年之前，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生育低谷给中国造成的大部分不利影响，都会被历史性的经济改革带来的生产力极大飞跃所抵消：经济改革把亿万中国人从 18 世纪水平的农业耕作一下子带入了 21 世纪的工商业经营。因此，除非中国的社会、政治凝聚力开始减退，否则，极不寻常的经济进步将会化解婴儿出生率直线下降导致的种

种问题。但是，中国的人口变迁浪潮也还是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放下了大部分公共养老与医疗保险的沉重包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财政帮助，但这也为以后的领导人提出了两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国家越来越富裕，退休后的高峰人口会接受较低的养老待遇吗？如果他们不接受，低谷期出生的那些人会答应为逐步恢复其父辈、祖父辈所享受的退休医疗制度，而放缓经济增长吗？到 2020 年，中国老龄人口将接近 1.7 亿人，比当今世界上除了 4 个人口大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多，中国将被迫重建社会保障制度，否则就会面临潜在的广泛社会动荡。

多国人口变迁浪潮

18 世纪之前，世界人口已经缓慢但稳定地增长了几百年。从 1500 年到 1800 年，历时 3 个世纪，全球人口翻了一番。但是，从 18 世纪早期开始，人口增长速度稳步提高，这个星球上的人口总量 100 年间就增长了 75%，在工业化国家尤其明显。长期形成的以大家族为组成单位的社会结构开始改变，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卫生设施大幅改善，由于有了公共医疗体系保障，更多的孩子可以平安度过婴儿期、孩提期，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活得越来越久。随着寿命延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接受教育，以提高收入水平，并通过储蓄增强购买力，甚至为退休做好准备。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这种社会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向现代化过渡进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到 20 世纪早期，西方国家人口平均寿命已经得到大幅度延长，但是因为这一变化经历了几代人才告完成，所以没有马上形成人口高峰。

到 20 世纪下半叶，各种因素堆积叠加，使得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生育高峰。“二战”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工业

化国家的婴儿出生率急剧升高，一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 1918~1919 年流感大流行之后出现的小规模人口高峰；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千千万万育龄夫妇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推迟了结婚生育。“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婴儿出生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但是就像 18 世纪的西方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的卫生设施与公共医疗得以大幅改善，婴幼儿死亡率因而大幅降低。在 19 世纪，欧美国家的卫生设施和公共医疗是逐步改善的，因而人口数量也是逐步平稳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 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直接照搬欧美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导致这些国家战后出生的人口数量陡然大幅上升。

在 20 世纪晚期的生育高峰出现之前，西方科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为人口急剧增长给国家造成的后果一直忧心忡忡了 150 年。就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们大部分人都搞错了。从 19 世纪早期的悲观论者托马斯 · 马尔萨斯开始，这些人口悲观主义者就一直认为：由于大量新增人口的衣食住行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人们会为了生产生活必需品而放弃自己的职业，这将导致大部分地方的生活水平螺旋式下降。这种无知的观点极大地低估了大多数国家人民的聪明才智，也没有认识到人们寻求新途径，提高产量、保障供给的巨大能动性，更不会想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人民对于别国成功战略的极强学习能力。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复述马尔萨斯的论点，但事实上，近至 20 世纪 70 年代，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院及欧美蓝丝带委员会都曾郑重预言，生育高峰将会急剧拉低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

与此相反，捧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西蒙 · 库兹涅茨与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 · 伯瑟拉普首次提出了乐观得多的人口论点：人口膨胀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这不仅因为面对资源压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会集思广益，共同发挥聪明才智来解决问题，同时更因为，人口基数增大通常意味着会有更多天资聪颖的人物出现，从而形成更强的发展能动性，而且，人口大国也更容易发挥新兴经济的规模优势。目前还没有证据证

明这个观点不对，因为这种情形从前一直没有出现过。拉美地区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迎来了生育高峰，按照这种观点，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整个 90 年代，这个地区应该会出现经济繁荣。事实上，在整个 80 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规模差不多每年萎缩 1%，而在 90 年代年均增长率也只有 1.6%。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经济增长，这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积极应对，需要为这些新增人口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培训，需要保证人人享有不错的医疗待遇，为此，国家领导人必须积极支持能够解决问题的改革措施。

这种乐观论点的意义在于，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如果确实采取了发展进步的必要措施，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比如，随着年轻人口的增加，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社会投入，以及他们稍后需要的工作机会就得相应增加。家庭、企业、政府都得从收入所得或财政税收中预留更多积蓄，以支付更多的教师、医生、学校、医院及诊所开销。随着数量庞大的新生代长大成年、参加工作，国家还得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建设公路、电信设施，企业也得保证技术、工厂、办公大楼的资金投入，因为这些都是新增工人形成生产力所必需的。推崇市场经济的欧美国家，也一改过去的税收政策，鼓励提高储蓄率，从而扩大私人投资。而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数亚洲国家为给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采取了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以政府补贴的形式向工业大量投资。

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允许外资企业投资落户，保护其财产和思想创意不受侵犯，还得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降低由于国内政局动荡、恶性通货膨胀或致命瘟疫爆发而导致外资撤退的风险。

世界之大，国别差异数不胜数，一些国家在发展先进技术和企业模式方面，总要走在另一些国家前面，而这种先进性往往有助于把生育高峰转化为普遍的经济繁荣。当今时代，由于多数国家互通有无、密切交往，落后国家可以努力吸引掌握先进技术的外国公司以及能够使用这些技术的海外人才，到本国投资落户，这是实现现代化的核心推动力之一。如果高峰人口接受了良好教育，发

展中国家就可以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提供不计其数的低薪熟练工人。当然，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允许外资企业投资落户，保护其财产和思想创意不受侵犯，还得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降低由于国内政局动荡、恶性通货膨胀或致命瘟疫爆发而导致外资撤退的风险。

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地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东亚——生育高峰带来了经济繁荣。在尚未达到上述要求的地区——大部分拉美地区、中东欧部分地区、前苏联地区以及大部分非洲地区——人口膨胀带来的后果，正如马尔萨斯预期的那样，经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不断衰退。而起初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后来达到发展要求的地区——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在经历了长期经济停滞之后，也迎来了国民经济的强劲迸发。

发达国家出现的生育高峰，也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在日本、德国、法国及其他欧洲主要国家，国民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进步，都是战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高峰人口长大成年，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领域的改革为各国创造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在其他发达国家，还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把人口膨胀转变为经济繁荣方面，美国都是独一无二的推动者。欧洲忙于自身重建之时，美国通过发展新技术、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既快速完成了国内重建，又帮助东亚一跃而起，创造了地区经济奇迹。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和德国也是促进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发源地。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日、德两国分别因为顽固保守的工业政策和僵化迟缓的福利制度而受到惩罚。此时，美国企业与金融机构正在中、韩等国攻城略地、大举扩张，一举成为这些强力推进现代化国家的最大外商。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半个世纪以来，在人口变迁的浪潮之中，美国一直就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体。拥有庞大膨胀人口，而又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有很高的储蓄率，能够为新增人口的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及大量本土企业的创立提供金融支持，这是真正实现社会进

步的必要基础。一个国家高储蓄的背后，必然就是低消费，所以当时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国民必须向别国出售自己的产品。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国渐次有序地，有时也是一步到位地，开放了各领域的外贸进口，提供了许多国家投资导向型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消费者。事实上，开放外贸进口倒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学家信奉这种贸易政策，而是因为冷战期间，美国政治家要向任何愿意与自己结盟的国家提供富饶的市场。多年来，这项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贸易政策把苏联及其盟国印度、中国、古巴和朝鲜等孤立于西方巨额财富和先进科技之外，使之无法得到各国膨胀人口发展进步所需要的关键资源。

正当许许多多思想家还在苦苦思索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影响时，很少有人想到出生率会急剧下降——直到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事实证明，正是造成“二战”之后第一代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样因素，又导致了第二代、第三代人口规模的急剧下降。在苏联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由于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亿万夫妇认识到，他们少生孩子，就可以实现理想的家庭规模，出生率因而开始下降。1950 年，平均一个泰国、韩国妇女生育 6 个孩子；今天，这一平均数字是两个。像样的卫生设施和公共医疗体系不仅降低了婴幼儿病死率，也延长了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如亚洲人口平均寿命从 1950 年的 43 岁，提高到了今天的 72 岁。在西欧、日本及美国，基本的医疗卫生进步早已成为久远的历史，新的医疗技术、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和日趋合理的生活方式又降低了中年人及刚退休人口的死亡率。1960~2000 年，美国、法国、日本的人口平均寿命分别提高了 7 年、9 年、13 年，这种增长主要是由 50 岁以上人口平均寿命延长拉动的。而且，这个进程还远未终止。生育高峰刚开始的 20 年间，儿科免疫技术充分发展，婴幼儿死亡率大幅降低；这一代人退休之后，也会看到很多老年疾病治疗技术取得突破，与此同时，人类也会战胜一些成年人疑难病症。很多科学家相信，今后 20 年，生物科技和基因技术的研究进展将会使人们的平均寿命再延长 10 年。

当大多数人对于长寿习以为常时，他们经济活动的时间跨度就会延长。面对更长远的未来生涯，世界各地人民纷纷增加个人储蓄，加大教育投入，而高额储蓄、良好教育，再加上越来越快的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更大规模的企业投资，最终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尤其是为世界各地走出家门的妇女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1950~2000 年，美国成年妇女工作人口比例由 37% 上升到 77%，欧洲国家的这一数字也大体相当。妇女有了工作，就会倾向于少要孩子，在成本低廉的节育措施出现之后，更是如此。有效可靠的口服避孕药由格雷戈里 · 平卡斯医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明，到 70 年代，避孕药丸、宫内节育器以及早期流产术已经在欧美国家被广泛应用。20 世纪 70 年代，人口增长缺乏控制，“增长的极限”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联合国开始在世界其他地区推广普及家庭节育技术。

正如生育高峰浪潮从东亚、日本蔓延到西欧、美国，随后又转向中国、拉美及中东欧地区一样，接下来的生育低谷重复了同样的路线。今天，在中国、中南亚及拉美地区，婴儿出生率正不断下降，紧随其后的就是印度和孟加拉国。在北非和中东地区，最近人口平均寿命大幅提高，如果说其他地方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那么到 2010 年时，这两个地区的婴儿出生率将会开始下降。

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没有卷入这种历史性人口结构的变化进程。一个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里一直没有出现生育高峰，因为基本的医疗、教育进步迄今并没有在该地区普遍实现，而且由于饥荒、战争、艾滋病及其他致命疾病的持续威胁，该地区人口平均寿命依然很短。另一个特例就是俄罗斯。苏联战后经历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生育高峰，随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早期迎来了生育低谷，80 年代后期出现了出生率的短暂回升，但是到 90 年代，出生率又直线下降，只有原来的一半。过去 10 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 300 万，预计未来 10 年还会再减少 300 万。而且，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俄罗斯男人的平均寿命就不断下降，2003 年降低到只有 59 岁，低于埃及、

危地马拉、越南等国水平。其实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种趋势就不断加快，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急剧上升。目前俄罗斯的公共卫生医疗支出已经跌落到世界最贫穷国家水平：2003 年，俄罗斯人均医疗支出仅相当于美国的 3%。在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成为现代社会中，第一个出现平均寿命与人口总量双双急剧下降的工业化国家。

世界范围内，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见，但是，各国又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形和不同态度，因而人口变迁的历史大潮在不同国家产生的震荡强度大不相同。未来 10~15 年，这些差异将会对各个国家的发展命运产生极大影响。

首先，不管是在高峰期还是在低谷期，美国出生的孩子都比欧洲和日本多很多。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间，美国婴儿出生率比瑞典高了近 50%，比英国和德国高了大约 30%，比法国和意大利高出大约 20%，比日本高了大约 16%。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生育低谷期间，美国的婴儿出生率下降比例跟欧洲差不多，不过，这可是与远高于欧洲的高峰时期出生率相比较而言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瑞典是个例外。在生育高峰期间，瑞典婴儿出生率为欧洲最低，而到生育低谷时，瑞典婴儿出生率降低幅度也最小。）结果就是，在生育低谷年份，美国的婴儿出生率依然比德国高 40%，比意大利和瑞典高 25%，比英国高 15%，比法国和日本高 6%~7%。在保持较高出生率的同时，美国还一直允许大量移民入境。近几年，美国的净移民率差不多比日本高 10 倍，比法国高 4 倍，比意大利和英国高 1 倍，也比德国高 50%。

除了这些数字差异，欧洲移民与美国移民造成的后果也大不相同。相当比例的美国移民来自远方，其中近 1/3 来自亚洲和欧洲，他们一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和培训；另外 2/3 来自邻国，主要是墨西哥及中美洲国家，他们通常填补了很多美国人不屑一顾的农业、旅馆、餐馆及私人服务等低层工作岗位。对比鲜明的是，近 90% 的欧洲国家移民还是来自欧洲，其中包括许多

伊斯兰国家，他们极力抢夺那些能提供福利和保障的、令教育程度较低的本国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工作岗位。在欧洲，移民问题是一个混杂着宗教情感与恐怖主义忧虑的热点议题，移民数量加大并没有对经济发展作出多少实际贡献。移民问题在美国也是争议不断，不过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的是如何能够让数百万海外出生、现居美国的新国民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而不是如何把他们遣送回去。

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的下一代也不会走出生育低谷，因为他们已经迎来了低出生率的第二代。在有些国家，出生率还会继续降低，未来潜在母亲和孩子的数量自然随之减少。联合国预计，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 2020 年，西欧国家 14 岁以下儿童数量将比 2005 年减少大约 200 万，降幅达 7%。国与国之间在具体数字上会有差异，但其趋势会很相似。到 2020 年，法国和英国的儿童数量预计会比 2005 年减少 3%~4%，而德国和日本则大约减少 9%。情况最坏的是意大利，2020 年的儿童数量将会减少 100 万，降幅高达 12% 以上。例外的是瑞典，2020 年瑞典儿童数量与现在将大体持平。

不过，美国依然会保持人丁兴旺的不寻常发展势头。在美国，生育低谷已经开始让路于生育高峰带来的直接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数百万第一代移民保持了很高的生育率。到 2020 年，美国儿童数量将会比现在多出 500 万，增幅超过 8%。但是，在发达国家当中，真正一枝独秀的是爱尔兰。在生育高峰期间，爱尔兰的婴儿出生率与美国接近，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爱尔兰婴儿出生率降幅却远低于美国。而且，近年来爱尔兰吸引了大量移民，移民数量增加幅度甚至高出美国 40%。爱尔兰目前人均收入比法国和德国高 12%，比欧盟平均水平高 23%，因而原本生于爱尔兰、后来移居国外的很多人现在选择了回归祖国。另外一些爱尔兰移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移居爱尔兰是因为在爱尔兰的外资企业就职，或是自己兴办企业。综合考虑强大的海外移民潮和较高的婴儿出生率两项因素， 2020 年爱尔兰的儿童数量预计将比现在多出 12%。

在这波人口变迁大潮中，中国代表了一种成功模式，那就是通过社会发展来减小低生育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生育高峰比中国规模更大，因为中国已经由一个家庭规模大、婴幼儿死亡率很高的落后国家，迅速发展成为拥有良好的卫生设施和公共医疗体系、快速推进现代化的国家，国民平均寿命大幅延长，儿童成活率急剧提高，而这个转变过程的迅猛程度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广阔无边的农村和快速发展的众多城市，都建立起了基本的医疗卫生设施，而生育率依然保持以前水平——比欧美国家生育高峰时的两倍还高，结果就是，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新生人口急剧膨胀，增长数量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

然而，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地方的婴儿出生率比中国降低得更快、更猛。随着社会公众和育龄夫妇逐渐认识到，少生孩子就能达到理想的家庭规模，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中国的婴儿出生率开始下降。这个数字一下子就降低了一半，达到了美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间的水平。随着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中国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妇女接受教育的程度和广度都大幅提高，节育措施日渐普及，妇女就业前景良好，于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进入了真正的生育低谷。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官方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降低出生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许会比西方人通常认为的要小，因为这一政策不过是强化了亿万中国家庭已经做出的生育选择而已。在 20 世纪最后 5 年，中国的婴儿出生率已经低于美国和爱尔兰。今天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妇女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为 1.7，低于美国、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而在北京和上海，这一数字更是低至 1.0。中国婴儿出生率下降如此严重，以至于联合国预计，2020 年中国儿童数量将比 2005 年减少 5 500 万，降幅超过 13%。

在人口老龄化方面，中国同样也经历了影响深远的急剧变化。1970 年以来，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从 41 岁增加到 72 岁，现在仅比美国低 6 岁，比欧

洲低 8 岁。事实上，中国今后 15 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快。但是，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很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造成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将是积极的。中国两倍于发达国家的高峰人口现在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强力推行的现代化政策，为内外资企业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熟练工人。未来 10~15 年，中国将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彻底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体系更趋成熟，生育低谷出生的人口应该可以满足增长趋缓的劳动力需求。但是，为了避免出现人口震荡在发达国家所造成的令人头痛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需要逐步弥补几亿老龄人口社会保险的缺失。到 2020 年，中国将有 1.7 亿老龄人口，比现在高出 70%。而且，从现在开始，每年都会有 1 000 万 ~2 000 万人因为经济现代化而失业。然而，今天中国符合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条件的人口还不超过 20%，失业补偿更是无从谈起。在未来 10~15 年，以至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应对席卷中国的人口震荡浪潮的冲击，中国领导人必须尽快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进一步赢得人民对国家政权的广泛拥护，但是步骤又必须足够平稳，这样才能保证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资金投入不受影响。

生育低谷的代价：欧洲与日本的强劲经济增长将告终

未来 10~15 年，任何政府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不会切实影响人口数量，面对人口减少给人们日常生活造成的深刻影响，同样也是无能为力。人口变迁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造成的经济症结在于，劳动力将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或者是会不会增长。在以往年代，大部分国家的劳动力都会以每年 1% 左右的速率稳步增长，因此每年都会有更多人口参加工作，为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经济发展速度随人口膨胀而走高，又随人口萎缩而降低。但当代人口变迁改变了这个基本模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新增

劳动力提供必要教育，不能创造提高劳动力生产力水平的条件和激励，就会坐失劳动力扩张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潜在良机；尽管一个国家劳动力规模日渐萎缩，会使该国经济发展居于劣势地位，但如果此时加大教育、培训、科技投入，创新企业模式，提高生产力水平，也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聚焦人口变化的核心事实，从现在到 2020 年，日本可能面临的可怕情形将清晰可见：到 2020 年，日本 20~60 岁之间的人口数量将比现在减少 900 万，这些最具财富创造能力的人口平均每年缩减近 1%。唯一可以减缓人口萎缩冲击力的因素是，年过 60 岁的日本老人比其他发达国家老人更愿意多工作几年。由于一国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就是工人数量增长速度与生产力增长速度之和，未来 10 年，仅靠 1.5%~2.5% 的年均生产力增长速度，日本经济将会长期徘徊于衰退边缘。尽管最近几年发展速度加快，但其实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生产力增长速度一直在 1% 左右徘徊不前。

日本并不是面临如此困境的唯一国家。从现在到 2020 年，意大利劳动人口数量将会减少 9%，德国和法国也会减少 4%~5%。瑞典和英国的前景则稍好一些：未来 10 年左右，瑞典的劳动人口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今后 12 年，英国的劳动力规模缩减速度大约为每年 0.25%。未来 10 年，随着低谷人口取代高峰人口，成为劳动力中坚力量，德、法、意等国长期以来持久稳固的高达 10% 的失业率将会不断下降，这为他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一线希望。但是，即使失业率降低，未来 10~15 年，一般欧洲家庭的经济进步也不会太大。

前景之所以如此悲观，一个重要原因与人口变迁直接相关。劳动人口是一个国家私人储蓄的骨干力量，而储蓄额又决定了国家用于投资的财政资源的多寡。储蓄与投资，受年龄影响很大，这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显而易见，人们的储蓄行为与其余生境遇密切相关。年轻人为了购房置屋、成家立业，花的要比挣的多；退休老人为维持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会逐步消耗积蓄，而少有（政府养老金之外的）新收入。在任何国家，35~55 岁都是个人收入的黄金时段，这个年龄段人口为国家贡献了绝大部分个人积蓄。

今后 15 年，将会有数以千万计的欧洲人和日本人从黄金收入年龄段退出，步入退休老人行列，自然也会有年轻人步入黄金收入年龄，但其数量要减少许多，因而这些国家创造财富的人力资源将会缩减。在日本，人口变迁浪潮对储蓄率的影响已经显现无遗：1975~2005 年，由于日本老龄人口急速攀升，而黄金收入年龄段的国民数量增速趋缓，以至开始下降，日本的储蓄率由 25% 直线下滑，跌至 5% 以下。根据麦肯锡公司最新研究结果，日本储蓄率将在 2020 年甚至更早，下降为零。可以肯定的是，人口变迁不是导致日本个人储蓄崩溃的唯一原因。当今时代，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日本实行了几十年的经济政策突然失灵，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破坏因素，在不动产和股票市场，先是吹起大大的泡沫，然后又扎破了这个泡沫。日本政府随后采取了极不恰当的政策，于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一个后果就是，持久稳固的轻度通货紧缩降低了利息收益，因而储蓄随之减少。然而，依然可以看到，人口变迁不仅直接造成国民储蓄减少一半以上，而且也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所以，想要维持原有生活水平（有谁不想呢？）的日本家庭用以储蓄的余钱也就越来越少。

从现在到 2020 年，由于老龄人口比例增加，而中年人口比例减少，大多数国家的国民储蓄率都会不断下滑。除非能像过去 10~15 年的美国、爱尔兰等少数国家那样，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持续取得更多突破，否则，低储蓄将会急剧降低普通家庭的财富积累能力。在日本，现在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到 2020 年将超过 50 岁，而日本家庭财富积累又主要依靠个人储蓄，因此专家预测日本的家庭财富必然会不断缩水。在德、法、意等国，大部分国民的家庭财产也就仅能维持现有水平。而世界最富国家的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也都将停滞不前，很多人甚至会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濒临穷困。

在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中，如果长大成年、步入黄金收入年龄段的人口增长略快于新增的年老退休、甚少储蓄的老龄人口，那无异于打扑克时抓到一对大王，虽然未必能赢，但可以保证继续玩下去。如果要大胜，还要多抓

一些好牌——比如，生机勃勃的科研机构不断研发重大新技术；开拓进取的企业文化大力倡导实现新技术的商业化；积极可靠的财政制度为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渠道。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这个国家就可以吸引国外储蓄，弥补国内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本国储蓄不足，现阶段美国就是这样。或者，像美国和爱尔兰一样，成千上万家企业生产出全世界竞相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赚取高额利润，这样也能抵消储蓄不足造成的影响，获得足够的财政金融资源。只要具备上述两个条件之一，即使居于人口劣势，一个国家也可以在牌局之中立于不败；而如果人口结构更加合理，这个国家一定会在游戏场上大获全胜。

这就是过去 20 年来，即使国民储蓄急剧降低（虽然不完全由于人口变迁造成），美国还是越来越富的原因之一。这 20 年间，虽然储蓄率持续走低，美国家庭财富年均增长率却接近 4%，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人用每年有限的积蓄购买的股票持续大幅升值。然而，尽管美国的人口结构和发展前景都要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今后 20 年，美国家庭财富年均增长率仍然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降低一半。即使在美国，为保证大部分国民一如既往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因循成例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实现科技进步的再次飞跃，为生产力水平的再次提高奠定长远基础。

未来 10~15 年，德国、法国和日本可以学习美国过去 20 年的发展经验，努力成为技术革新的发源地，帮助本国企业占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以此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部分阻力。我们将会看到，实现这一目标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深刻而长远的变革，以至于变革之后，这些国家的国民简直会认不出自己的国家。现在看来，这些变革要求已经超出各国政党内改革派的能力范围。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退休人口迎来高峰，他们将期望得到更多支付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国家财政资源，政治人物推进改革也将变得更加艰难。

近年来，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其他途径，缓解人口变迁造成的冲击——比

如，努力说服更多老年人继续工作，延缓退休。由于缺乏延长工作年限的普遍要求，这个办法已经大大超出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政治运作能力。欧洲老年人不想继续工作，不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意愿，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因为国家已经提供了如此慷慨大方的养老保障，以至于他们没有必要继续工作。目前看来，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依然没有着手大幅削减高额福利，以迫使老人继续工作。

以德国为例，政府曾经努力引导更多老年人继续工作，但是解决年轻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具有更高的政治优先性，况且老年人又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极力争取工作机会。因此，德国政府在向那些雇用 55 岁以上工人兼职工作的企业支付特殊津贴的同时，也要求企业雇用年轻失业人员，以弥补兼职工人造成的用工不足。在结构性失业率高达 10% 的经济体系中，上述两项措施所起的作用相互抵消。此前几年，德国政府也曾尝试另一种办法，就是减少享受失业保险的月数，但是，随后就偃旗息鼓了，反而增加了一项大部分人都可以享受的两年期追加福利。德国政府也还试图降低低工资收入群体享受的收入补贴及免费医疗福利，但是这项政策十分拙劣，造成很多人宁愿选择兼职工作，以获取最大利益。到头来，面对允许 55 岁以上老人兼职工作而不影响其退休金的法律规定，这些政策统统败下阵来。那条法律，分明鼓励老年妇女待在家里，让丈夫多纳税，保证都不工作之后，配偶也能享受免费医疗待遇。有了这些政策，再加上大多数人都有宁愿少工作的主观倾向，最终结果就是，55 ~64 岁之间的德国人中，有 60% 根本就不上班。

生育低谷造成了一个经济死结，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 20 年内都难逃其束缚，除非他们愿意接受更大规模的艰难变革，创造大量更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让失业、钟点工与提前退休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迄今为止，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一直不愿意进行任何改革，他们都对本国社会福利制度提供的经济安全引以为豪——为什么不自豪呢？——这样一来，大部分失业人员都会指望慷慨大方的政府帮助，而丧失了寻找新工作的紧迫感。在美

国，失业人员领取政府救济的时限是 6 个月，而欧洲失业人员可以领取救济的时限是 18~24 个月，并且他们在失业期间享受的福利待遇也比美国高得多。现在还没有哪个日本和欧洲国家的首相或总理准备大幅降低失业人员的安全保障水平。

我们很难责备民选领导人缺乏改革本国福利制度的坚定信念。政治家很少会要求选民作出牺牲——至少在没有大的战争的和平时期是这样——除非他们能够说服这些选民，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牺牲马上就能换来更加富裕的生活。这意味着，欧洲和日本不仅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让国民更难承受失业和提前退休的后果，还要采取更加艰难的长远措施，鼓励企业创造更多高薪岗位，提供给那些被迫放弃一部分国家福利保障的人们。如果这些国家不能打破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安排，政治家也就无法作出以上承诺。

随着劳动力和储蓄率不断萎缩，欧洲和日本通过了一些新法案，这些法案对社会发展貌似有利，其实严重阻碍了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今后我们将会看到，欧洲和日本繁杂的市场管制和贸易壁垒体制，造成的后果就是，政府要为在职人员提供人为的经济保障，其财政消耗与为失业人员提供的经济保障不相上下。欧洲和日本终将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企业竞争力降低。对于追踪最新产品、提高经营效率，欧洲和日本企业因为市场管制和贸易壁垒而面临更小的竞争压力。事实上，正是市场竞争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现代经济发展，进而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很多时候，管制措施会直接破坏企业的技术革新，影响新增就业机会，而这恰恰是缓解人口变迁后果的根本途径。在法国和意大利，一个企业打算重组或改变经营方式时，如果没有充分“理由”，就不能合法地重新安排工人岗位——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算不上充分理由。这就为在职人员创造了牢不可破的“铁饭碗”，但是也阻碍了企业创造新岗位。在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法国和意大利的企业必然要与美国和亚洲的企业在国内和

国际市场进行竞争，而美国和亚洲国家的企业可以自由聘用、解雇工人，也可以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岗位，因此法、意两国的“铁饭碗”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实在没有积极意义。这种管制措施导致了千千万万欧洲企业竞争力不断丧失，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摇篮到坟墓”的经济保障制度被欧洲人奉为至宝，每年福利支出都高达数百亿欧元，而这些支出主要依靠企业缴纳的劳工薪资税提供财政支持，因而欧洲企业薪资税负远远高于美国及亚洲企业。就算企业计划采取措施、创造新的工作机会，雇用新员工需要缴纳的高额税也会让他们裹足不前。在德国，薪资税占到劳工成本的 25%，意大利是 32%，法国是 38%；即使在日本，也超过 21%。在美、英两国，这个比例分别是 14% 和 17%，对于企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而言，这才是不轻不重的负担。

过去 20 年，美国企业工作岗位的增长速度是欧洲和日本企业的三四倍，甚至 10 倍，这绝不是偶然的。同一时期，欧洲失业率高达美国的 2 倍，新企业增长速度也远低于美国，这也同样不会令人意外。这是欧洲各国政府向社会承诺，为所有国民提供安全可靠的社会保障造成的直接后果。当初作出承诺时，高峰人口正成为主要劳动力，国外市场和国外竞争对手对本国企业还无关痛痒，这种保障制度耗费的财政成本也可以忍受。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加上人口结构极为不利，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阻碍经济繁荣，最终也会使政府丧失普遍的社会拥护，而这正是这套制度力图保护的目标。未来 10~15 年，在欧洲和日本，由于进入人口低谷，社会福利体系造成的财政负担与经济健康增长之间将会形成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

尽管人口变迁已经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日趋黯淡，但是，中国的发展前景则要好得多。中国高峰人口规模庞大，其相对数量高达发达国家的两倍，截至目前，他们很好地适应了广泛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为成千上万家中国新兴内外资企业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随着经济结构日渐成熟，中国的低谷人口足以满足工业化社会增速逐步放缓的劳动力需求。

在不断降低的婴儿出生率开始侵蚀劳动力人口之前，中国的平稳发展能

持续多长时间？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居于美国（及爱尔兰）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生育率直线降低，在西方之后的 10~20 年，中国也迎来了生育低谷。从现在到 2015 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将会增加近 9 000 万，之后低生育率的影响就开始显现，到 2020 年前后，劳动力规模将会开始萎缩。即使继续向前展望，也看不到转机：今后 15 年，中国儿童数量将会减少 7%，而且下降步伐将不断加快。

中国手上还有一张王牌，可以帮助她经受人口变迁浪潮的冲击。即使劳动力规模开始萎缩，在一段时间内，依靠宏伟的发展计划及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国依然可以保持较强的创造财富、增加收入的能力。即使 2020 年之后，随着数以千万计的从业人员从传统农业和国有企业逐步转移出来，中国也将会出现劳动力过剩。如此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将会导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所说的“失业大战，人们会为本不存在的工作岗位大动干戈”。激烈的择业竞争，又会导致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生产增长。数千万用西方生产技术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会在私营企业完成再就业，这将继续拉动中国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持续增长。

未来 10~15 年，中国人口挑战带来的政治压力要大于经济压力。今天，在中国亿万下岗失业人员及老年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享受政府福利和社会保障。就在中国领导人觉得大部分国民走向持续繁荣的时候，为成功应对伴随如此激烈的人口变迁而来的极大压力，他们需要继续努力。

生育低谷的代价：政府养老体系面临财政危机

人口变迁巨浪会给发达国家带来诸多政治问题，其严重程度将超过人们对糟糕经济增长的失望反应。随着数以百万计的高峰人口年老退休，关于国家养老制度的支付年限与支付能力，在很多国家都会引发激烈争论，并成为

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议题。政治斗争无可避免，因为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高峰退休人口的福利需要，数量减少的低谷人口不得不承担数万亿欧元（日元）财政负担的绝大部分。

要理解这个进退维谷的困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未来 10~15 年各国拥有的潜在工人数量和需要他们供养的退休人口数量加以对比。在今天，德国、意大利及日本的人口结构与拥有数百万退休老人的佛罗里达州十分相似。在这三个国家，20~60 岁年龄段人口与 60 岁以上老人数量之比略高于 2.0。瑞典、法国和英国则稍好些，这一比例介于 2.25~2.5 之间。

这些数字不如官方数据好看，因为欧盟以及日本和欧洲各国政府进行例行分析时，都把“工作人口”年龄段界定为 15~65 岁，尽管发达国家年轻人很少在 20 岁之前参加工作，60 岁以上老人继续全天上班的也不多。把尚未工作的青少年计算在内，又不把提前退休的老年人排除在外，于是他们就可以宣称：应对人口变迁的震荡冲击根本不需要进行艰难变革——直到不得不真正采取变革措施。

起码在近期之内，一些国家的退休制度还不会面临严重问题。爱尔兰目前正处于人口结构的制高点，每个 60 岁以上老人对应将近 4 个工作人口。美国的危急程度也要轻一些，工作人口与退休老人的比率大约是 3.3。在美国和爱尔兰，工作人口占据人口组成的主导地位，这一现实正是过去 10 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高达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 2 倍多，而爱尔兰发展速度又比美国更高的原因之一。

然而，不管在什么地方，人口快速老龄化都已经引发了退休养老制度的重大变化。过去 50 年来，美国工作人口与退休老人数量之比由 16：1 锐减至 3.3：1，为退休福利提供财政支持的薪资税率提高了 4 倍多。在其他国家，政府养老金赖以维持的增值税，时常还要加上一部分所得税，也像薪资税一样大大提高，增幅甚至超过美国。美国现行社会保障税率是 12.4%。拿出自己工资收入的一成多为别人提供安全保障，很多人为此牢骚满腹。不过，他们的负担

已经算是很轻了。意大利人的工资扣税率高达 33%，法国人也要缴纳工资收入的 24%；至于瑞典、英国和德国，这一税率在 19%~22% 之间。结果就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为给老年同胞享受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保险）提供财政支持，绝大部分在职人员需要缴纳的社保税额比自身直接受益的所得税还要高。

薪资税率已经如此高企，以至于等到高峰人口退休之时，再想提高势必非常困难。撇开日本不说，西方国家薪资税率飞涨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之间。此后，人们对于高税率的普遍抗拒首先出现于 70 年代的美国，随后蔓延至其他发达国家。八九十年代，由于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经济发展日趋缓慢，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人们对提高税负的抵制不断加强。现在看来，薪资税、所得税、增值税加起来，税率总和不管是 35%、40%，还是 50%，各国人民都会说，实在够高了。长期以来，欧美及日本的经济学家对于税负到达什么水平，才开始扼杀企业的投资热情、工人延长工作年限的意愿以及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经济能力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诸多国情因素，其中包括税务负担，但又远不止此。未来 10~15 年，不管各国经济发展情况怎样，由于消耗公共养老金（包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工作人口，打算保住权力宝座的政治领导人，都会发现大幅增税异常困难，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欧洲、日本以及美国，人口结构不断恶化，其严重后果又难以处理，而高额税负也遭遇强烈抵制，这势必产生棘手的政治问题。到 2020 年，日本 20~60 岁之间工作人口对 60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小于 1.5，意大利的这个数字将是 1.6。德国、法国和瑞典的数字同样严峻，分别介于 1.8~1.9 之间。英国人稍有喘息之机，到 2020 年，英国工作人口与老年人的比例约为 2.1。美国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可以达到 2.4。发达国家之中，爱尔兰在这方面依然是鹤立鸡群，到 2020 年，每个退休老人还能对应 2.9 个在职工人。

届时，有多少退休老人需要国家供养，有多少工作人口为此支付费用，

这些数字早已笃定，任何政府都无力改变。除非各国能够找到实现经济发展大跃进的妙方，否则，解决人口问题的任何政策选择都无法实现政治家们努力追求的双赢目标。实际情况反倒是，面对成熟完善的公共退休制度，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人口困局中，都不得不顾此失彼，左支右绌：要么降低养老标准，任由高峰退休老人失望不满、愤恨难平；要么增加税务负担，即使这将导致在职人员收入停滞，甚至日渐减少，也未肯稍顾；抑或大力举债、赤字运行，即使损害国家长远发展也在所不惜。

虽然各国面临的政策选择在本质上毫无二致，但是这个问题的危急程度还是取决于每个国家退休养老制度的具体特征。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养老制度慷慨大方，在高峰人口退休之后，这套制度肯定连 10 年都维持不了。而英国和爱尔兰的退休制度更容易长久支撑下去，这主要因为他们提供的福利保障少得多，照此下去，到 2020 年，将有大量退休老人濒于贫困。美国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中游，他们的退休待遇跟欧洲大陆相去甚远，但又比英国和爱尔兰慷慨大方得多。

衡量一国退休制度的慷慨程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所谓的“替换率”(replacement rate)，是指一个人每月退休待遇与其全部工作期间的月均收入之比。对此，各国精算师都有不同计算方式，但是最有用的就是“净替换率”(net replacement rate)，它可以告诉我们，退休之后，每月享受的税后待遇可以替换多少退休之前每月拿到手的税后收入。这是测算下一个 10 年内，退休老人预期养老待遇与政府财政负担的最好办法。

高峰人口一旦退休，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现在承诺的退休待遇势必无法兑现。这是因为福利支出数额太大，面对退休人口剧增与工作人口锐减的激烈冲突，福利待遇将难以为继。除了政治家之外，人人都清楚这个事实。意大利面临的危机最为严重，因为其退休制度的净替换率高达 90%。德国、法国和瑞典情况略好，净替换率在 68%~72% 之间。这是行不通的，除非时空错乱，回到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相信生育高峰和经济繁荣都将永远持续下

去。欧洲大陆之外，人们对现实情况的准确判断已经十分清楚。在日本，退休待遇的净替换率是 59%，而美、英两国大约为 50%。即使这样，英国和日本还在考虑继续削减退休福利呢。最后，发达国家中，还是爱尔兰的净替换率最低，只有 37%。

大大增强 60 岁以上老人继续工作的意愿，同时保证企业也愿意雇用他们，可以成为缓解公共养老危机压力的安全阀。还是由于国情差异，大部分欧洲国家比美国和日本更难应对高峰人口退休问题。如果领取的退休金跟上班收入相差不大，人们不大可能愿意继续上班，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在 55~59 岁年龄段，继续上班的意大利人不超过 40%，而瑞典的这个比例是 81%，日本是 76%，美国是 69%；即使法、德两国，也在 60%~65% 之间。然而，不仅在意大利，而且还有法国、德国，80% 以上刚过 60 岁的老人就不再工作；而在瑞典、日本和美国，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大约还有一半继续上班。至于 65~69 岁之间老人的工作情况，欧洲大陆更是惨不忍睹：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在这个年龄段依然工作的老人比例只有 3%~6%，对比鲜明的是，美、英两国接近 1/4，而日本更是高达 37% 以上——这些国家退休待遇都吝啬得多。这个问题在欧洲国家最为严峻，实在不足为奇，因为面对居高不下的结构性失业困扰，各国政府都不愿意采取切实步骤让老年人继续工作，而宁愿把这些岗位留给失业的年轻人。

如果大量享受公共退休待遇的老年人也有足够的个人养老积蓄，那么削减公共退休福利就会容易一些。但是，如果退休金的期望值跟上班收入差别不大，那也就没什么理由指望人们自己攒钱养老。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家庭储蓄率比美国、英国和日本要高，但并不是为了退休养老。在德国、意大利，个人养老积蓄总额仅相当于 GDP 的 18%~22%，美、英两国是 25%，而法国只有 GDP 的 7%。即使 20%~25% 的欧洲人有个人养老账户，但其财力有限，如果完全依靠个人积蓄，连一年都维持不了。德国的个人养老积蓄平均数额大约是 25 000 美元，意大利是 30 000 美元，而法国只有 10 000 美元，

至于欧洲其他国家，个人养老储蓄直接为零。今后几年，这些国家应对退休金危机的合理途径是削减慷慨大方的退休福利，削减行动拖延越久，解决这个制度问题带来的震荡就越剧烈。不过，由于绝大多数欧洲人没有多少个人养老积蓄，即使最会游说的政治家，也无法说服人们相信，养老制度改革不会让他们的境遇更糟糕。

不管在哪个国家，不是所有的退休人群都有个人养老积蓄。美、英两国，公共退休福利相对有限，因此个人养老储蓄就很多，其总额接近 GDP 总值，不过即使在这两个国家，也只有 1/3~1/2 的国民拥有个人养老积蓄，而这些人恰恰就是经济情况较好的那一部分。英、美两国的巨额个人养老积蓄，是改革退休制度、克服财政困难的有利条件，但是也会引发政治争议。最显而易见的改革办法就是削减高收入群体的退休福利，因为他们的个人养老积蓄可以极大缓解削减公共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任何国家，老人和富人具有更大的选票能量，这种改革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

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可以实现，20 世纪 80 年代，玛格丽特 · 撒切尔首相已经展示了这种可能。按照她的改革方案，英国现行退休制度只提供养老待遇，而不打算提供退休金以发放相当数量的退休之前的工资收入。为此，英国工人要支付额外的个人退休保险，由雇工单位、金融机构以及政府本身负责管理这些账户，而工人可以通过额外养老支出获取税收福利。缩减公共退休支付规模、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个人养老积蓄的做法，发展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就在同一时期，美国、爱尔兰及澳大利亚都加大税收激励，促进个人养老积蓄。

即使采取这种改革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回避人口变迁压力。改革之初，财政危机难以得到切实缓解，因为为鼓励个人养老积蓄，英国用于税收优惠的财政成本就接近公共养老支出的一半，美国、爱尔兰及澳大利亚类似税收削减额度更是达到了公共退休财政支出的 60%。而且，这个改革办法正逐步把英国的退休制度，变成发达国家之中待遇最低的公共养老保障体系。到

2020 年，英国退休人员平均每月享受的基本公共退休福利和个人托管养老待遇之和仅仅相当于退休前月均收入的 1/3。为避免数百万退休老人陷入贫困，未来英国政府很可能不得不提高公共退休待遇标准，而这肯定不是撒切尔首相的改革初衷。主要受美国保守经济学家的影响，撒切尔深信：压缩国家公共退休支出，就可以促进英国人加大个人养老储蓄额度，以此弥补不足。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很短视，不大会为长远打算而增加积蓄，因为人们尽可能提高当前生活标准的动力太强，远大于为了 10 年之后生活更好而省吃俭用的自我约束能力。今天，只有 1/3 的英国人参加了个人养老储蓄，账户总额达到英国 GDP 的 80%，因而这部分人的退休生活将会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另外 2/3 退休老人只能依靠微薄的公共退休金，勉强维持近于贫困的退休生活。

最后看来，英国的改革实质上是把其他欧洲国家直接面临的财政危机，转化为一个若隐若现的社会危机，那就是让大部分高峰退休人口生活在濒于贫困的边缘。由于这场社会危机还会持续好几十年，英国政治家跟欧洲大陆的同行们一样，也得面对选民反对的政治局面。在 2005 年英国大选中，工党和保守党这两大政党提出的公共养老政策主张，都是不会产生实际效果的轻微上调。只有自由民主党这种小党才会承诺，大幅提高公共退休福利和个人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或许自由民主党只是打算碰碰运气而赌上一把，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执政的机会，因此自然不需要考虑提高退休待遇的实际财政支持问题，也不会面对英国企业对强制个人养老计划的强烈反对。无论如何，对大多数英国高峰人口来说，建立足够额度的个人养老积蓄，以防退休之后穷困度日，现在都已为时太晚了。

英国的改革实质上是把其他欧洲国家直接面临的财政危机，转化为一个若隐若现的社会危机，那就是让大部分高峰退休人口生活在濒于贫困的边缘。

但英国的改革前景比欧洲其他国家依然要好，因为从政治上说，提高

福利总要比削减福利来得容易。随着撒切尔的改革政策逐步走向失败，未来10年，提高英国公共养老福利待遇的公众压力就是不可抵挡的。为了提供上调退休福利的财政支持，即使英国工人不愿吞下繁重税负、巨额赤字的苦果，数百万老年选民也一定会扫除政治障碍，促进改革实施。为缓解政治压力，英国还有一个额外的回旋余地：跟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的长远经济前景更好一些。跟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相比，英国经济增长更快一些，并一直保持更低的失业率，因而将来会有更高比例的英国工人上班赚钱，为更高的退休福利提供财政支持，而且在职工人的工资收入也将快速上涨，从而带来更多的国家税收，满足更高的支付需要。

最终，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未来的政治家无法逃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他们的老龄人口比例和承诺的公共养老支出份额都将远远高于美、英两国。欧盟估计，到2020年，法国和意大利公共养老支出将占到本国GDP的15%，而德国的支出比例也将达到12.6%。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重担，相当于现在美国整个联邦退休福利专项预算的2/3~3/4。欧盟的预测其实是低估了各国退休制度的经济成本，因为这个估计是建立在对未来10~15年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速度过于乐观的假设之上的。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进程开始得很早，远在改革措施真真切切降低国民生活水平之前就已实施完成，因而避开了目前依然等在欧洲国家领导人前面的政治陷阱。由于耽搁日久，直到高峰人口行将退休之时，才开始考虑退休制度改革，德、法、意三国总理一旦实施改革计划，就会造成立竿见影的结果：数百万年老选民的养老金马上就会被削减；日益萎缩的劳动人口面临税负增加；最有可能的是，政府债务急剧增长，并长期背负巨额预算赤字，从而破坏国民经济发展前景。

黯淡的经济前景，包含了形成难以解决的政治冲突的所有关键要素。在民主政治制度中，领导人必须对承担他们决策成本的选民负责，大多数人民都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政治家们将会发现，拒绝他们的期望和需求，

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民主政治制度下的这个基本现实，决定了不但大幅削减福利待遇不太可能，就是急剧提高税收也很难实现，至少在退休养老体系真正破产之前是这样。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税负已经占到各国 GDP 的 38%~45%。在欧洲，穷人所缴税额比例要比这个数字小得多，同时由于老年人不用缴纳薪资税，税率也很低，因此，这些国家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选民的税负很重，占到各自收入的一半以上。

欧洲各国政治家及其专家顾问，对这个问题早就了然于胸。他们认识到，养老制度和税收政策改革进行得越早，整个社会每年承受的痛苦就越少。然而，每次提出的哪怕是十分温和的改革计划，都会因为强大的公众阻力而搁浅。以德国为例，2001 年，眼看公共退休福利预算就要入不敷出，政府启动了温和、渐进的改革，控制退休福利增长速度，提高薪资税率。此后不到两年，因为经济增长疲软，面临新的支付危机，德国人干脆寅吃卯粮，又降低了政府养老金的法定储备金额。这同样也是因为德国企业强烈抱怨为工人支付的个人养老金过高。德国政府倒是的确提高了提前退休的最低年龄标准，但只是针对那些有特殊原因的失业人员，随后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提出改革建议。这些改革措施能否奏效，现在依然无从得知，就是能奏效，对于退休制度的长远发展也是影响甚微。

在法国，关于退休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了 20 年。在 1993 年和 2003 年，法国分别进行了两轮轻描淡写的改革。1993 年的改革，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调整了养老金的年度增幅，但是由于力度不够，对日益泛滥的提前退休现象和居高不下的养老金替换率，都没能产生实质影响。2003 年的改革目标是改变提前退休制度，尤其是政府公务员的提前退休。这次改革略微扩大了为老年人退休金提供财政支持的在职中年人的数量，不过，还是因为力度不够而收效甚微。

由于现在实行小幅、渐进改革的窗口已经关上，因而各国不可能在 2015 年或 2020 年取得重大成效，那么，什么样的领导人有能力成功实施更

加痛苦的改革措施呢？现代政治粗暴无情，能够承受政治压力的，往往是那些为了取得并保有权力而不惜付出任何个人代价的人。一个政治家，为彻底解决退休养老问题，大幅削减福利，提高税收，那么，他不仅可能面对政治生涯的迅速终结，他还应该明白，自己的牺牲很可能徒劳无功，因为承诺扭转改革方向的候选人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任者。只有能力超凡的领导人才能成功实施一般政治家无法想象的改革措施。从现在到 2020 年，这种情况或许会在某些国家出现，但是不可能在大部分国家发生。养老危机日益临近，今后生活何去何从，柏林、巴黎、罗马那些不断抗议的大批退休老人和上班一族，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毫无疑问，今后十几年，公共养老制度改革一直会是世界各国的热点议题，而且会有三十几个国家，致力于推行各种形式的强制个人养老积蓄。不过，这种改革将主要发生在那些公共退休养老制度建立不久、量入为出（pay-as-you-go）的国家，主要包括亚洲及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加盟共和国以及中东欧地区的前苏联附庸国。比如，玻利维亚、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及哈萨克斯坦，都借鉴智利模式，建立了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储蓄账户的退休养老制度。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斯洛伐克以及哥斯达黎加，选择了以少量个人储蓄为补充、以公共福利待遇为基础的养老制度。而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和乌拉圭，为工人提供了强制性个人储蓄和有限的国家退休金之间的选择机会。澳大利亚、瑞典、丹麦、中国香港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都在传统的国家养老系统之外，增加了强制性个人养老储蓄账户。

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办法特别有效，因为个人养老储蓄可以帮助建立国内资本储备，在拉美这种普遍存在资本外流问题的地区，更是如此。这些办法还可以为这些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提供业务机会，也为雇主和工会进行博弈提供了政治平台。但是，在发达国家，由于覆盖广泛的公共养老制度已经先行存在，从现在到 2020 年，以强制性个人退休储蓄替代基本公共养老保

障，这是不现实的选择。在欧洲和日本，按照现行政策，为满足退休老人的福利需要，各国政府就将面临十分严重的财政不足，而为兑现向数以百万计的新增退休人员承诺的福利待遇，又得增加几十亿欧元、数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

面对这些问题，欧洲国家未来领导人最有可能做出另一种选择：**大量增发货币，然后大力举债。**公共政策成功实行的成本需要与人民大众多予少取的主观愿望严重抵触之时，民主政府通常对这种选择乐此不疲。在战争时期，这种策略一直就有其用武之地，为支持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军费筹措方式，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战争会带来巨额赤字，但是持续时间一般只有几年，并且经费支出一般是越来越少。然而，这些国家面临的人口变迁压力，很可能将会持续两代人的时间，而且压力只会与时俱增。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欧洲各国政府选择增发货币的方式，解决财政困难，那么欧洲老百姓将会付出巨大代价。假如政府年复一年地持续采用这种办法实现财政自给，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有瑞典、西班牙及其他国家，将会面临一年又一年的严重通货膨胀，由于物价飞涨，普通百姓只好减少消费，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支付政府债务。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抑制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但是私人投资还是会大幅减缓，大量国民储蓄将被用于养老支出。这样，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将会降得更低。最终，全球投资者就会发现欧洲的投资回报不断下降，因而开始抛售欧元。连年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也会严重扭曲欧盟的组织结构，使跨越欧洲的资本市场前景黯淡，而跨越欧洲的资本市场正是帮助欧洲大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成功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条件。

几乎无法避免的是，未来 10 年左右，由此产生的政治问题会变得非常难以解决。欧洲有一个政治分裂的悠久传统，也有过极端群众运动的不愉快经历。经济增长极慢，税收负担奇重，再加上养老制度压力加大，这些因素都会迫使政府削减社会服务。如果说近期经验可资借鉴，那么削减社会服务影响

到的那些人将会走上街头，鸣冤叫屈。有些人会抱怨外国移民，有些人会怪罪上一代或者下一代。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无法预料，但是，极左或极右政治势力回潮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环境将会就此形成。

在整个欧洲，爱尔兰是可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唯一国家。关键就在于，爱尔兰成功拒绝了变成高福利国家，也避免了为老年人的退休福利而拿未来经济发展前景作抵押。在欧洲，爱尔兰的行业管制最少，经济增长最快，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吸引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包括千千万万外国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数量更多的原本就生于爱尔兰、后来又从海外回流的那些人，因此，这只“凯尔特之虎”成功化解了人口变迁危机。一度被许多欧洲人视为“经济残废”和“社会怪物”的爱尔兰，如今成了欧洲发展的最新模范。目前，许多波罗的海及巴尔干半岛国家，对爱尔兰表现出极大兴趣。如果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精英们，能够以爱尔兰为榜样，他们就可以使自己国家免受将要经历的痛苦。

日本的情况与爱尔兰恰好相反，其改革进程半途而废。近一时期，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在发达国家表现最差，日本早于其他任何国家，已经处在了养老危机的紧要关头。与德国、法国、意大利不同，日本有意削减福利、提高税收，以维持退休制度继续运行。然而，这些变革力度不够，无法避免在未来 10~15 年内形成新的危机。

某些独有的政治、文化特征可能使得日本更容易面对 20 世纪 90 年代爆发的公共养老危机。那时，国内人口结构急剧恶化，连续多年经济发展极其缓慢，为退休福利的财政支持敲响了警钟。不过有一样，日本老人对公共退休福利的依赖程度要低于欧美老人。拥有个人养老储蓄账户的日本工人比例比其他国家都要高，这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发展的历史遗赠，那个时候，日本大企业为员工提供全面广泛的福利待遇。日本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也让他们可以更少依靠政府退休金，因为大部分 60 多岁的日本人仍然工作得好好的，他们的工作年限要比大多数欧洲人多出将近 10 年，而

且大多数成年日本人也会对上了年纪的父母尽到养老义务。

待遇标准稳步提高的福利制度，在日本出现的历史，比欧美国家短很多。在别的国家，这种制度已经造成人们对未来福利的权利主张，形成了遥不可及的公众预期。美国发现的第一张社会保险账单距今已有 65 年，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退休制度又比美国早得多，而日本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建立起广泛的退休制度。此外，相当多的日本人对退休制度承诺的待遇和存在的问题漠不关心，因为即使直到今天，这一制度也还不是真正地覆盖无遗。日本的公共退休待遇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一个是人人享受的数额较小部分，另一个是与个人工资挂钩的增补部分。两个部分加起来，为退休工人提供的福利待遇也相当有限。但是，还有大约 20% 的日本老人被完全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就职的小企业没有参加退休保障体系。

日本的政治形态也与欧美人民所熟悉的情况十分不同，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改革更容易实施。日本成立民主政府之后，自民党就一直主导日本政权，即使最近几年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自民党政权也还是岿然不动。对自民党极其糟糕的经济管理能力，日本选民安之若素，这在欧美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一党执政模式，加上社会大众对政党决策的普遍顺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小泉首相可以削减养老福利、提高薪资税率，而同样能干的西方政治家，从克林顿、布什到施罗德、希拉克，却都做不到。

日本建立现代公共养老制度之后，仅仅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福利支出就开始以无法持续的速度增长，养老储备急剧减少，因此小泉首相大胆推行了自英国撒切尔夫人冒险之后，其他民主国家再也无人敢于问津的改革措施：2004 年，小泉说服国会，此后 10 年，日本的薪资税率由 13.6% 提高到 18.3%，增幅超过 1/3，并且削减了 20% 的基本福利待遇，基于日本人平均寿命居世界第一的现实，制定了一揽子视人口结构变化和未来经济发展情况而自动调整的养老待遇政策措施。

就是这些强力措施，也无法规避未来 10 年退休人口对日本的冲击风暴。

从现在到 2020 年，人口变迁将会对日本退休制度的财政支持造成严重伤害，因为日本的劳动力规模将会缩减近 12%，而老龄人口将要增加近 30%。届时，平均只有 1.4 个上班工作、赚钱纳税的成年人，供养 1 个退休老人。即使采取了最近的改革措施，日本的退休体系也无力支付每一年的养老债务。

此外，原本可以保证日本老人免受经济窘困的民族优点，也正显示出难以为继的迹象。日本各大企业，为应对全球化而苦苦争扎，因而大幅削减了员工个人养老储蓄。人口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增长迟缓乏力，日本一度惹人羡慕的个人储蓄率不断走低，这些都慢慢侵蚀着退休老人及其家庭的个人经济资源。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退休家庭数量实际上已经超过处于黄金储蓄阶段的家庭，而且，在未来 10~15 年，这个差距还将持续扩大。10 多年来，由于利率极低，黄金储蓄年龄段的那些人的储蓄比例远远低于其父辈。今天这一代老人，在其 35 岁时，储蓄数额超过工资收入的 1/4，而当今 35 岁年轻人的储蓄额不超过工资收入的 5%，并且时常债务缠身。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日本退休老人的经济状况肯定会不断恶化。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日本经济的辉煌时期，普通日本家庭的户均财产年增 5% 以上。但后来的养老需要已经把高额储蓄撇到一边，经济辉煌时期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过去 15 年，存款利率极低，投资回报率也不超过 1%，实际已经造成一般日本家庭财富的严重缩水。未来 10 年，这种不良趋势还会加剧，如此一来，普通日本家庭财富水平还会继续降低。结果就是，未来 10~15 年，日本老人的生活标准将不断下降，原因在于自身财产缩水，而成年子女又无力资助。

因此，10 年之内，即使老年人口的个人经济资源不断缩减，日本领导人还是不得不再次改革养老制度，要么削减退休福利，要么增加工作人口的税负。不过，与德国、法国、意大利不同，未来的日本首相完全可以很好地推行这些改革措施。由于日本选民具有超常的忍受能力，即使自民党下台，

不管谁来掌权，都可以让国民做出更大牺牲，而不会像大部分西方国家那样，遭遇煽动性争辩与社会抗议。

未来 10 年，围绕退休养老制度，中国面临的挑战完全不同于欧洲和日本，但是，由于其特殊国情，中国的情况同样令人不安。即使老龄人口增长速度比欧洲和日本都快，中国的问题也并非始于人口变迁。从 2005~2020 年，中国 65 岁以上老人数量将会增加一个亿，增幅约为 65%，比欧洲和日本都要高，他们的这一比例分别是 57% 和 30%。但是，由于中国的生育高峰和生育低谷都比西方国家来得晚，即使到 2020 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开始减少，其规模也比老龄人口大得多。届时，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 1.67 亿，但其数量依然低于劳动人口的 20%。相形之下，欧洲和日本由于连续几代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到 2020 年，老年人数量将接近工作人口的 50%。

中国的养老问题之所以截然不同，原因在于，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现在压根儿就不提供全面覆盖的公共养老保障。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早期，近 20 年间，中国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农村为大多数国民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其中包括退休养老与医疗保险。在那个时期，这些待遇十分微薄，也只有少数人能够活到享受这些待遇的年龄。正如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一跃而起那样迅速，大部分人享有的即使十分微薄的福利保障，在中国也已经急速消失，这是因为由于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政策，所有农村及大批国有企业先后解体。中国领导人实施改革毫不犹豫，这些改革措施都经过深思熟虑，是现代化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改革，解放了社会资源，为更加紧迫的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条件。

从那时起，中国领导人始终关注最终如何重建已经打破的退休养老制度，但是，重建一定要有助于经济发展规划。1991 年，中国迈出了第一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表面上看，这次改革旨在建立一个国家养老和个人账户并存的混合制度，但其中心目标是鼓励个人储蓄，以便国有银行有足够存款，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改革的实际

结果是，地方政府承担了发放当地国企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责任，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利用个人储蓄账户提供财政支持。

1997 年，中国全国人大宣布废止 1991 年的改革方案，着手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但其覆盖面仅局限于那些能够促进政府经济发展计划的人员。按照新的制度，有资格享受政府养老福利的，只有大学生、士兵以及大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私营企业雇员和国企职工。根据政策设计，这一制度要覆盖大约一半城镇职工，以及中国全部人口的 1/4。但实际上其覆盖范围十分有限。不在大城市的数千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被排除在外，养老只能依靠自己解决。能享受退休待遇的城市职工，必须承担高额税负，税率高达工资收入的 24%，是美国社会保险扣缴比例的 2 倍，因而千千万万中国职工对此设法规避。目前看来，如实缴纳的纳税人只有那些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员工，因为如果这些企业不能足额缴费，政府就会取消他们的经营许可。据专家估计，归根结底，新的养老保险在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实际覆盖率大约只有 6%。

针对数亿中国农村人口，1997 年的改革办法设立了个人自愿投保计划，每人每月缴纳的费用大约相当于 25 美分，当然所承诺的福利待遇也一样微薄可怜。尽管保费如此之低，但对一个普通中国农民而言，还是十分高昂，因而农民参保率只有 10% 多一点。个人养老储蓄也一样无济于事，因为只有 1% 左右的中国人拥有个人养老账户，这些人主要就是外企及其他企业员工。具体到当前现实情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但无法覆盖大部分国民，即使按照目前规模，财政支付也难以持续。由于养老支出要依靠量入为出的税务收入，而税务收缴又被普遍规避，因此，即使只满足现有国企退休人员的养老需要，都已经超过了养老保险的缴费额度。

今后许多年，步入老年的大部分中国人的养老问题，只能依靠本人及其家庭解决，这与 19 世纪时欧美各国居民的情况十分相似。今天，65 岁以上的中国老人之中，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接近 2/3，而这些老人超过 80 岁

的又占到 80%。不过，中国年轻人的态度正在改变。由于大城市的薪酬高达农村地区的 3 倍，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背井离乡，把年迈父母留在后方。对于 75 岁以上中国老人，大约 3/4 的经济收入仍然来自子女，而对于 60~65 岁的退休老人，这个比例就已经降到了 1/3。由于婴儿出生率已经渐渐低于美国及大部分欧洲国家，未来 10~15 年，对年届退休的中国高峰人口而言，供养他们的孩子数量势必大为减少。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推行了一些试点工程，旨在动员国民提高养老保险储蓄比例，帮助政府摆脱困境。2003 年，在拥有 4 000 万人口的辽宁省，推出了个人养老账户试点项目。这个项目，给居民以实质补贴，给企业以税收优惠，以提高他们参保的积极性，并且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措施，防止规避缴费现象发生。截至目前，项目覆盖率达到 28%，但要实现广泛覆盖的目标，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再加上老龄化速度全球第一，若要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福利待遇，使之免受穷困之苦，势必耗费巨额财政资源，而这与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很难协调一致。到 2020 年，基本养老福利支出就将占到中国 GDP 的 10%。这项支出必须以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为基础，而后者也是维持国家稳定的根本所在。为实现经济的良好发展，中国政府干劲十足，宏伟目标包括：数亿国民接受良好教育；军队建设实现现代化；各类现代化基础设施不断建设、完善——公路与桥梁、机场与港口、卫生设施与通信网络。

即使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打算像西方国家那样，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中国政府目前也还缺乏采集企业和员工准确数据的基本技术手段（至少，在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如此），而这是执行与工作挂钩的税收政策的必然要求。在当今中国，建立一个政府主导、普遍覆盖的退休养老制度，正如 19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或者 20 年代的英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一样艰难。现在，或短期内，中国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没有静止不变的事物，在中国尤其如此。未来 10~15 年，中国将会作出更多努力，为老年人建立新的保障制度。到 2020 年，中国的老龄人口数量将达 1.67 亿，其中绝大部分人经济贫困，少有积蓄。而在一个经济繁荣的社会，人们脱离贫困、舒适生活的主观期望就会空前提高。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领导人会继续寻求西方国家的专家、个人及政府官员的意见、建议。为保证中国的经济及军事现代化继续推进，政府很可能会继续尝试扩大年轻人个人养老账户储蓄额度的政策方案。采用台北设计的退休制度，北京政府也许会很不舒服。不过，管理一个大国，用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家马基雅弗利的话说，“必须做好思想准备，根据幸运之风与各种因素的要求，随时转变方向。”

建立依靠个人账户的养老制度，也需要进行艰难改革。几十年来，中国居民存款都放在几个国有银行，而银行又把这些资金作为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为保证提供吸引储蓄的多种投资途径，中国需要建立现代化的银行及金融业机构。对于这个目标，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集团、UFJ—三菱财团及其他全球性金融巨头都期盼已久，等着填补中国的这个空白。不过，如果说改革目标是几亿中国人年老之后可以自行解决养老问题，那么，政府就必须停止使用国民储蓄投资那些国家控制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比如钢铁、造船及飞机制造等。但是，没有贷款支持，这些国有垄断行业很快就会陷入困境，由此产生一个严重问题：数以千万计的新增失业大军。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最终也难以逃脱人口变迁带来的挑战。从现在到 2020 年，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为 1.67 亿中国老年人建立依靠个人储蓄的养老制度。从最近情况看，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倾向于让大部分中国人自己解决养老问题。如果真的选择这种办法，中国高峰退休人口势必产生严重的政治问题，相形之下，德国、法国、意大利面临的问题实在是相形见绌。

最后，再看看美国。尽管有些政治家定期敲响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警钟，但是从各方面看来，几乎可以说，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未来的社

保体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要容易管理得多。与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的人口变迁更为有利（爱尔兰除外），美国社保制度承诺的养老待遇更低（英国与爱尔兰除外），老年人退休时间更晚（日本除外），经济增长前景更好，支持养老支出的工作人口工资收入增长势头更强（还是爱尔兰除外），而且美国的人均寿命还要短几年。受特定因素鼓励，持有偏见的预测人士测算出，美国的社保体系存在 75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巨额资金缺口。这是刻意忽略自己对于难以计算的发展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无可避免的懵懂无知的结果，而这些因素恰恰会对预测结果产生极大影响。让我们关注一下近在眼前的实际情况：起码在 2018 年之前，为满足每年养老金支出，美国的薪资税收入绰绰有余；到 2020 年，社保资金缺口也不会超过 630 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经济总量预计达到 25 万亿美元。即使到 2030 年，美国社保体系财政赤字也在当年 GDP 的 1% 之内，这还不包括社保基金信托投资的利息收益。如果加上利息收益，社保基金还可以平稳运行 25 年。

养老支出所需的财政支持给美国正常经济活动造成的不良影响，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小得多，因为美国的退休待遇标准要低很多。今天，社保支出占美国经济产值的 4.2%，到 2020 年，预计将提高到 5.3%。目前，英国的基本社会福利增长速度已经低于经济发展速度，除此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公共养老支出占其国内投资与预算总额的比例，相当于美国的 2~3 倍。到 2020 年，养老支出占各国 GDP 的比例分别是瑞典 11%、德国 12%、日本 13%、法国和意大利 15%。在财政收入方面，美国企业承担的社保成本对投资和招工的影响也远低于欧洲和日本企业。目前，为支持国家养老福利支出，美国企业缴纳的税金占其劳工成本的比例是 14.2%，而英国是 17%，日本超过 21%，德国接近 25%，意大利达到 32%，法国更是高达 38%。

由于回旋余地更大，美国人无须承受削减福利、提高税收的痛苦，美国社保问题不大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纷争，而欧洲各国必定因此爆发激烈冲突。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肯尼斯 · 爱普费尔担任美国社会保障署署长，

据他回忆，克林顿总统曾经秘密会晤时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的比尔·托马斯，该委员会拥有对社保基金的监督权，也曾在公开论坛接触著名保守派共和党人，如瑞克·桑托伦等人，目的都是寻求两党在社保改革方面的妥协。由于1997~1998年的弹劾之争，两党关系破裂；2003年，布什总统推行更加保守的方针政策的努力，也没能得到民主党的支持。不过，在社保制度改革问题上，只有减少政党对立，回归中间路线，才会带来成功机会。即使美国下决心消除某些人预期的未来社保资金缺口——这种做法，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方案也都得仔细考虑政治妥协。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削减前10%富裕老人的福利待遇，每年调整一次生活成本标准，真实反映老年人的平均花费，提高应税工资比例上限，由85%调整到90%，如此一来，美国的社保体系就可以长期保持“收支平衡”。

由于老年人一直都期望有生之年能享受社保体系现在承诺的各种待遇，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美国也将面临各种挑战与难题。美国的医疗费用比世界其他国家高得多，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未来15年，巨额医疗成本势必会给美国老人的公共医疗保险带来严重问题。此外，许多年来，美国政府还挤占社保专项资金，挪用于其他政府开支。随着高峰退休人口所需福利待遇成本超出财政收入，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将不得不削减其他开支，或者提高他项税收——在政治上，这些都是无法绕开的大煞风景之举。展望2020年之后的情形，这种压力会更加强大，因为社保体系必须偿还从国库转借的所有富余款项，这种情形差不多要持续两代人的时间。

因此，仅仅为了维持养老体系继续运行，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由于要削减退休福利、提高薪资税率，或者出现破坏经济发展的财政赤字，势必会面临关于这些议题的政治纷争。而在美国，因为削减其他开支、提高其他税率，一样也会出现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预算赤字，同样无法避免痛苦的政治争议。不过，欧洲与美国还是存在着巨大不同，如果说欧洲面临的是政治上的燎原大火，美国出现的顶多只是零星小火。因为削减小型项目的预算支出，

涉及的受惠群体数量有限，比起猛砍数量庞大的弱势老人的福利待遇，或者提高影响所有在职人员的薪资税率，政治可行性要高得多。而且，即使同样出现庞大的财政赤字，由于较之日本和欧洲，美国经济走势更加强劲，海外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自然也会更高。

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也更容易增加税收，因为美国的综合税率只占国民收入的 1/3，而欧洲国家目前已经达到 40%~50%。不过，税收问题将会成为美国近期主要纷争议题，因为今后 15 年，医疗保险所需财政成本的大幅上升将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老年人也会惊奇地面对一个令人讨厌的现实：40% 的美国老人拥有个人养老账户，而这些账户存款基本都是免税的，但在未来 10 年左右，随着陆续提取养老存款，他们到时候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到手的收入都得缴纳所得税。这很可能成为老人们痛恨的政治议题，千千万万退休老人将会要求民选官员停止向他们的生活所需征税。

未来 10 年，当今时代独一无二的人口变迁浪潮，势必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它确实会对世界各国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冲击，影响所及不外乎以下几方面：国民经济和家庭收入增长多少，居民税负能有多高，退休生活是安逸舒适还是缺衣少食。面对挑战，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如何应对——如何成功应对劳工短缺、储蓄下降、投资放缓以及公共养老体系难以为继的巨大压力，如何有效凝聚实施改革的政治共识——将是未来 10 年，各国政治运行面临的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

第三章

03

| 全球化 |

已经不可避免

FUTURECAST

◆ 全球前50强大企业，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大部分国家。由于要在数十个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组织管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对这些公司而言，政治资本和政治技巧同样重要，其作用与智力资本不相上下。拥有这种政治资本，他们就会获得回报：全球各大公司的需求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影响力将不断上升。

◆ 各大公司如今投入最多、关注最多的就是其"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不仅包括体现在新开发的产品与工艺中的知识产权，而且包括企业品牌、数据资料、企业自身组织运行模式以及从事无形资产相关工作的高级员工的培训与任用。

◆ 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真正到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之大、种类之多，让之前任何历史时期都相形见绌。巨额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通，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加剧造成的价格挤压效应，共同压低了全球资本利率，并在发达国家，为房地产与股票市场从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波动创造了条件。

当今时代，讨论的主题不管是工作就业、通货膨胀、流行文化，还是当前出现的其他新生事物，人们都会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笼统表达。也就是说，在更加广阔的语境中，“全球化”这个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种用法，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也绝非毫无根据。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在日常工作、收入所得、投资消费以及产品与服务的使用等方面，前景与环境都会发生更大变化，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

如今，国际贸易总量已经接近全世界所有产品生产总值的 1/3。直接或间接参与全球性制造与消费活动的劳工规模，从 5 亿急剧增长到 7.5 亿，只用了 10 年多一点的时间。规模空前的资金、技术及商业诀窍，从发达国家流向数十个发展中国家，释放出巨大能量，促成了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现代化进程，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民因此受益，逐步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无论在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数以百万计的广大劳工正迎头而上，抓住新的机遇，并能善加利用。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资本，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并显著降低了全球利率水平。尽管快速现代化的推动力强劲增长，全球资本利率不断下降，但是，由于行业竞争更趋激烈，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因此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全球化的每一个特征，往往都需要我们付出新的代价，有些代价甚至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国（以及逊色不少的印度）出场较晚，但是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全世界多种产品的主要制造商。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除了一些高度精密及用户定制的产品，其他工业制造活动已经越来越不成气候。数百万劳工的跨国流动，又不断造成政治紧张和社会冲突，尤其是在欧洲，由于北非及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大批涌入，法、德两国爆发了严重社会动荡，丹麦与荷兰也随之出现排外浪潮。

全球化涉及的生产与消费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世界各大企业的活动特征因而悄然改变。由于全球性资本容易获得，大批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各种形式的智力资本就成为全球各大公司追逐的最为重要的稀缺资源，这由此加大了掌握高超技能的从业人员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据测算，全球前50强大企业，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大部分国家。由于要在数十个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组织管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对这些公司而言，政治资本和政治技巧同样重要，其作用与智力资本不相上下。拥有这种政治资本，他们就会获得回报：全球各大公司的需求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影响力将不断上升。

在资本与劳动力的传统范畴，全球化也一样催生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规模更大的海外采购活动。截至目前，对美国人、欧洲人及日本人而言，因为这种海外采购而真正流失的工作机会还不算多。然而，这种发展将要进入新阶段，在此阶段，大量服务业工作将被分解外包，发达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服务业工人必将因此丢掉当前赖以为生的饭碗。在欧美和日本，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也会间接蚕食这些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创造能力和工资收入的增长潜力。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在抑制各国通货膨胀、拉低利率水平的同时，也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寻找到了新的投资出口，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先繁荣后衰退的经济泡沫。如果把中国的全球化商品生产能力比做一只800磅重的熊猫，那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有利条件，美国始终保持的消费能力就是一头重达2 000磅的棕熊。美国强大的消费力有助于世

界许多国家保持经济增长，为支持这种强力消费，美国现在每年借用别国储蓄的债务规模都要高达数千亿美元，全球资本市场与货币流通市场或许因此扭曲变形，出现拐点。

当代全球化的影响如此广泛深入，动力如此强大无比，以至于任何国家都已经无法趋利避害、有所选择。全球化是我们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最大经济变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在未来 10 年，以至于更长时间，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与国民生活状态，都将受到错综复杂的全球化的深刻影响。

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新发展

在过去 15 年，中国、印度、东欧与前苏联国家以及大部分拉美国家，稳步有序地向外资开放，实现了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这些变化导致此前半个多世纪老死不相往来的几个经济阵营纷纷瓦解，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格局。

统计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在过去 15 年，全世界所有产品中，实现跨国交易的份额稳步提升，由 1990 年的 18% 提高到现在的 30%。2005 年，全球 180 多个经济体的 GDP 总和为 42 万亿美元，而全世界产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总额高达 12 万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国际贸易的最大增幅，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单是美国，2006 年的进口额就高达 2.2 万亿美元，这比全世界除了前五个国家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 GDP 总和还要高。

几千年来，人们之所以购买外国产品，或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生产，或是因为别国生产成本更低。今天，国际贸易涉及服装、食品、家具之类商品，也包括过去几百年国与国之间一直交易的石油、金属等基本矿产品。在古代，希腊人从埃及购买衣服和工具；中世纪时，东非人把宝石卖到中国和印度；18 世纪时，巴黎和伦敦建造画室使用的椅子和柜子由美洲殖民者生产。今天，

美国从印度购买棉花和杏仁，德国与意大利从中国购买机器设备，这些贸易活动与以往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当今时代的国际贸易水平，也并非完全史无前例。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欧洲国家内部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总额已经达到各国 GDP 总和的 20%~25%，不过，在此后 30 年，由于世界大战与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国际贸易水平急剧下降。

即使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今天的全球性经贸交流还是与过去 2 500 年前的国际贸易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并不在于产品在何处制造，而是在于如何制造。如今的全球性经贸交流，不再只是一国向另一国购买或出售制成品和原材料，甚至也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生产企业向别的国家出口商品。今天，在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核心的各大企业，直接或间接地雇用了大部分劳动者，并主要借由超越任何国家疆域边界与法律范围的全球化网络进行经营运作。依靠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先进科技，这些网络得以建立。有了网络，各大企业就可以把从家具、服装到医药、电脑等几乎所有产品，分解为成百上千个零部件，先在数十个国家分头生产，然后统一组装，最终配送、销售到几十个不同市场。借助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可以跟踪、传送、采集、分析这些范围广阔的经营活动信息，这就使得各大公司管理、协调全球性经营活动成为可能。但是，最具颠覆性的因素还是生产过程自身的发展变化，而不是各大企业对由此派生出来的相关信息处理方式的改变。

所有这些经济变化，也是建立在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整个 90 年代政治剧烈变化的基础上。其间，苏联垮台，中国领导人选择了基于市场经济的渐进式现代化战略，而美国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创立了世界贸易组织。由于苏联出人意料地突然解体，欧美模式几乎成为世界各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唯一榜样。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产业政策也饱受质疑，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各国学习欧美模式的信念。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从中东欧到东亚、拉美地区，公众争论的焦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如何拓展自由市场及不加管制的政策所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深受

美国影响的世界贸易组织给出了答案。事实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向国内市场和大量外资开放传统国有经济领域。长期占据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欧美及日本企业，第一次有机会把精密复杂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转移到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发展中国家，而过去几百年来，在国际经贸领域，这些国家主要扮演着输出简单原始商品的角色。

这些变化创造了一系列改变世界的新进展。这种进展的最大、最早影响发生在这个星球上最穷、最大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从世界经济的局外人一举成为全球市场的参与者。在中国，现代化工厂及办公室的从业人员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在 10 年时间，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就超过两倍。由于增长之后的工资水平依然远远低于大多数国家——2004 年，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平均收入是 70 美分，印度是 40 美分，而墨西哥是 2.3 美元，美国更是达到 21 美元——中印两国数以亿计的新增劳工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一样要对远在上海与新德里这两个制造业中心万里之外的那些国家国民的工作和收入产生新的压力。像墨西哥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而不是欧美国家——的产业工人感受到的压力最大，因为他们现在面临中国和印度工人的直接竞争。在过去 10 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平均工资增长幅度高出 2~3 倍，印度高出 1.5~2 倍，这正是原因之一。

在经济发展方面，经常是好事一桩接一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涌现出大量无远弗届的生产系统，这些生产系统一般由遍布各国的成千上万个生产环节共同组成。这种变化加快了相关国家运输与通信系统的发展速度，实现了人员、零件、货物及相关信息在各国内部以及几十个国家之间的便捷流通，而在 10 年之前，这些国家的运输与通信，还是只能依赖尘土飞扬的公路、破败不堪的车辆以及毫无保障的邮政服务。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私家车的雪崩式增长，中国每年新修公路 50 000 公里，其中包括 5 000 公里高速公路。类似地，2006 年早些时候，中国的手机用户即已超过 4 亿，印度也已达到 9 000 万。如今，中国手机用户每月增加 60 万，印度每月增长规模也达到 50 万。

精密复杂的生产工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快速推广，也产生了一些足以改变世界的其他效应。大大小小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位，引进外资生产，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这就促使从中国、印度到墨西哥、孟加拉的各国领导人相信，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本国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要实现国民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以此提供满足西方企业需要、能让外企经理满意的产业工人。比如，20世纪90年代，在匈牙利、墨西哥、圭亚那，公共教育支出翻了一番，泰国和孟加拉国的教育投入也至少增加了50%。在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重视供给的经济体系当中，上述进展加快了外国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引进步伐，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可以继续促进上述进展。当前，世界各大企业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推动许许多多贫穷国家的现代化进展不断深入。

当前，世界各大企业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推动许许多多贫穷国家的现代化进展不断深入。

在捷克、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变化效应最为明显，这些地方都实现了外商投资和国内竞争的完全开放，并且改进了通信、运输、教育及公共卫生等系统，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在埃及、委内瑞拉、马来西亚等国家，政治家反复引用一个说法：正是由于全球100多家欧美及日本特大企业对财富的持续追求，以及依靠它们生存发展的另外数千家大中型企业的经营需要，才最终导致了这些变化。如果说各个企业通过提高竞争力获取利润回报的需要，与它们对财富的渴望一样强烈，那么这个描述就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在这些国家，由于大批工人受过较好教育，掌握了基本技能，受雇于担负经济转型使命的现代化内外资企业，他们（及其家庭）才是受惠最多的群体。过去10~15年，全世界从贫困进入温饱以及从温饱达到小康的人口数量，比有史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

龚洁（音）是一位35岁的中国女士，5年前，她两手空空，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辽宁锦州。虽然费了几年时间，但她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

作，在全球性人力资源转移的背景下，为引进的人才提供适应性服务——给派驻锦州的美国人辅导汉语。如今，她的工资收入，足以保证女儿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也有余力赡养远在老家的年迈母亲。地处长江上游的中国西部城市重庆，虽然与北京、上海相距遥远，但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于乐波（音）曾经是一位穷困不堪的农民，如今成了一个“棒棒”[①]，挑着货物行走在重庆陡峭的马路上，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足以养活一家老小。李志官（音）则登上了更高的社会阶梯，他出身于贫困农家，后来离开家乡，来到重庆附近的工厂，从普通工人干起，如今，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他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目前，在70岁的尹明善创立的力帆汽车厂，就有9 000多名年轻工人，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农村。尹明善在劳改农场度过了20年，1992年他开了一个很小的摩托车修理铺，开始了最早的创业历程。目前看来，亿万中国人经历的切身变化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最重要、最有力的影响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的跨越式进步并不具有普遍性。大部分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依然落后，远未取得上述经济进步。大部分拉美国家也一直徘徊在全球化之外，很多美国人对此更有体会。30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8%~10%，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在5%~7%之间，而拉美国家GDP年增长率却不到2%。这绝不是因为全球化会莫名其妙地特别垂青亚洲。事实上，从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来看，欧美企业拓展海外事业，拉美是比亚洲更为自然的首选地。问题主要在于政治因素，而不在经济方面。外国投资人和外资公司很容易发现：拉美国家领导人长期偏好的国内政策，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债务拖欠以及外商财产被故意侵占等现象时有发生，外商所有权处处受到严格限制，外资公司专利及知识产权被肆意侵犯，这些国家的未来劳动者几乎不具备市场经济需

① 在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人们总会看到这样一群很特殊的人，他们靠着一根扁担、一双肩膀、一把子力气谋生。当地人亲切地叫他们“棒棒”。——编者注

要的任何技能。亚洲国家也会受到经济不稳定的冲击，最著名的就是爆发于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韩国、泰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随后进行改革，加强了制度安排的市场化程度，惠及海外投资人和外资公司。2000年，中国与印度紧随其后，进行改革，改革力度甚至超过前述国家。

当代全球化所到之处，往往呈现勃勃生机，在上一次国际贸易急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现象并不明显。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全球化进程中，欧美跨国公司引进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本国组织生产，然后把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市场及其他发达国家市场。这一次，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达到5%、7%，甚至10%。这并不单单因为欧美及日本的跨国公司建立了更多的海外子公司。这次全球化进程中，产品被分解为细小部件，在遍布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个工厂实地生产。至关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本土企业家建立了自己的生产企业，既可以向为西方公司加工零部件的厂商提供产品和服务，又能满足国民收入提高推动的新兴国内市场的需要。

在泰国以及随后的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涌现出大批新兴小企业，它们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诸如花旗集团、西门子公司之类跨国企业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小企业的出现与壮大，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同盟，它们的未来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休戚与共。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小企业主一样，它们反对走政府垄断的老路，反对敌视外商的政策行为。相反，它们积极争取更为自由的市场环境，要求增加国民教育、基础设施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政府投入。随着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企业主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政治影响力，这将使得全球化成为绝大多数人未来生活的长期特征。

一些国家出现了这些发展变化，但其他国家却没有出现，拉美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拉美大国中，与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相比，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墨西哥和巴西热情地接受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规则。2000年，执行中

间路线的比森特 · 福克斯击败执政 70 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当选总统。2006 年墨西哥大选中，代表企业利益的右翼候选人费利佩 · 卡尔德龙当选总统，他所在的保守的国家行动党也赢得了议会选举。在巴西，严格执行财政纪律的卢拉政府于 2006 年再次当选。这代表了中间派，甚至右翼保守派第一次在拉美大国上台掌权，并能成功连任的发展趋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接受的全球化规则则更少，小企业主阶层力量弱小；在政治方面，一贯是左派执政，长期反美。这种情形最终也在欧洲重演，在法、意等国，全球化带来的放松管制的市场要求遭到普遍抵制。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人口变迁的影响，欧洲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问题，形成了欧洲版反对全球化的政治态势。

全球化背景下的超强企业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飞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改变了全球性大企业的经营特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无论生产，还是消费，都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全球化市场，这个市场涵盖了从移动电话到装备制造、从医药产品到信息服务的所有商品与服务领域。全球化的这一新特点极大地拓展了各大企业的经营活动，提高了经营复杂度，催生了一批新型全球性特大公司。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各大企业的规模之大。随着全球潜在市场急剧扩展，各大公司为这个庞大市场提供服务的经营能力不断提高，一批新型特大企业应运而生。2006 年，全世界国民收入或 GDP 产值，达到或超过 500 亿美元的国家有 60 个，而营业收入超过这个数字的全球性大公司就有 121 家，其中 30 家公司的营业额超过 1 000 亿美元。全球十强企业——沃尔玛、埃克森美孚、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英国石油、通用汽车、丰田汽车、雪佛兰、克莱斯勒汽车、康菲石油以及道达尔公司——2006 年度销售收入总额达到

360 亿美元，超过全世界 4 个经济大国（美国、日本、德国及中国）之外所有国家国民收入的总和。单是美国，2006 年十强企业销售收入之和就达到 19 840 亿美元，高于全球 6 个经济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 GDP 总和。虽然说无论销售收入有多高，这些企业都不拥有国家权力，但是这些巨额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缴纳政府税收，购买其他企业不计其数的产品与服务，因此，如果企业销售额足够大，而国家规模又相当小，那么，以上各方构成的利益同盟就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相当大的政治、社会影响力。

绝大部分特大企业来自最发达的国家，这不足为奇。世界 100 强企业，来自美、日、德、法、英 5 国的就有 71 个。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国内经济规模来说，英、法两国在世界 100 强企业中所占比例尤为突出。然而，在全球市场上，即使美、英、法等国企业，也只是在一部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例如，美国企业在医药产品和软件开发两个领域力量最强，其中，全球最大医药公司，美国占了一半，而全球软件企业前四强都在美国。美国与日本企业共同主导了全世界计算机制造市场，欧洲与日本汽车制造企业瓜分了全球主要汽车市场，欧洲公司的电信产品则在各大国家占有主导优势。

全球化改变了企业的国别属性，但改变方式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10年前，博学的政治家罗伯特 · 赖克一度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他宣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海外事业的急剧增长，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决策，使公司背离了总部所在国及其员工的利益，养肥了一小撮海外股东。这种说法很容易理解，也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但却是无稽之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全球性特大企业雇用的员工，70% 以上就在美国国内，而不在欧洲的偏远村落，也不在那些发展中国家；而欧洲与日本跨国企业的本土员工比例还要高。在股东问题上，赖克也错了。一部分海外企业的利润肯定是要分给股东，但是，就美国跨国企业而言，国内外股东分得的企业利润当中，有 40% 进入了美国的退休养老基金，而这些账户所有者可都是美国普通百姓。

当前，我们也看到，全球化转移了各大企业的战略焦点，总部设在欧美

国家的各大公司表现出更加浓厚的欧美特色。埃克森美孚公司总部之所以没有迁到巴林或列支敦士登，英国制药业巨头阿斯利康公司总部之所以没有迁到印度或波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这些公司的战略关键点，已经从确保获得低廉资本与劳动力转移到更加重要的中心任务，这就是开发并实现更具经济价值的新观念、新思想。有数据显示，各大公司如今投入最多、关注最多的就是其“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不仅包括体现在新开发的产品与工艺中的知识产权，而且包括企业品牌、数据资料、企业自身组织运行模式以及从事无形资产相关工作的高级员工的培训与任用。正是这些无形资产，而不是那些不足 30% 的海外员工的所在国度，决定了一个公司是美国企业，还是欧洲企业；而且，几乎所有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行为活动都是发生在这些企业的母国。

说得更具体点，在欧美及日本各大公司，在股东、执行官、经理人以及开发使用无形资产的关键人士当中，依然是欧美人与日本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他们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会计核算及法定职责，也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的大公司创立于一些小国，即使大部分产品销往国外，这些公司依然保持原创国特色。利乐拉伐是瑞典的包装业巨头，公司大部分经营活动都在国外，而且由于英国不对富豪家族内部财产的转赠与继承征税，公司所有者——罗辛家族，现居英国。然而，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利乐拉伐一直都保持着瑞典特色，虽然经营不在瑞典，但是，在决定企业成功的工程制造、市场营销及配送经营等核心业务方面，利乐拉伐公司的瑞典特征十分鲜明。此外，当不同国家的全球性企业合并时，实力强的一方通常占有主导优势。

全球化导致特大跨国企业的国别色彩越来越淡，一个更加微妙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越来越需要统筹兼顾世界各地的消费品位、商业模式及行业标准。诸如宜家、沃尔玛这些全球大企业，就不得不同时考虑几十个截然不同国家的市场环境和消费偏好。他们不仅给这些国家带去了源自斯堪的纳维

亚半岛与美洲大陆的产品、服务、管理方法及专业技术，也从这些国家带回了经验教训，甚至还有在这些国家成功开发的新型产品。美国公司就是通过观察来自日本的竞争对手在日本及美国的经营方式，而学会“即时库存”(just-in-time inventory）管理的。

全球快餐业领军品牌——麦当劳（尽管麦当劳的房地产经营获利也颇丰），有一半以上的餐馆在美国之外经营，其中，在中国各个城市，麦当劳餐馆数量就超过 700 家。美国人在国外经营的快餐馆里的许多菜单，都极具当地特色——巴西的麦当劳甘蓝、德国的麦当劳啤酒、瑞典的野草莓和香草派、香港的将军汉堡、巴基斯坦的卡福塔肉丸三明治以及韩国的冰冻红豆果子露，不一而足。不过，新英格兰地区很多麦当劳菜单上的龙虾包最早是在加拿大开发出来的，德里三明治是从英国带回来的。也许，过不了多久，洛杉矶的麦当劳餐馆也会像埃及、土耳其及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分店一样，为消费者提供家庭外卖服务。咖啡加甜点模式的“麦咖啡”最早出现在澳大利亚麦当劳分店，如今早已遍布拉美国家，或许很快也会风靡美国西南与西北地区。

同样的国际化趋势也常常影响到各大公司生产经营的其他方面。美国、欧洲及日本制造商在印度、墨西哥等国设立的工厂，在生产安全与环境污染方面的责任意识要弱于本国工厂，但却高于当地企业，因为按照规模经济要求，他们自然会在世界各地都采用一样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如果发展中国家采用比跨国企业母国更加严厉的国家标准，国际化趋势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中国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要比美国严格，因此，在很快就将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中国，通用和福特两大公司要想赢得竞争，就得开发更好的节能技术，生产更加环保的汽车，而这也将回馈美国国内市场。

瑞典是一个小国，尽管国内市场规模狭小，但却造就了一批全球性特大企业。不过，瑞典并非特例。欧洲的另一个杰出代表就是荷兰，全球 500 强企业中，荷兰占了 14 家，涉及银行、油气、保险、航空航天及电子制造等

领域；瑞士紧随其后，入围全球 500 强的企业有 11 家，包括 5 家世界一流金融企业和两家制药企业。加拿大也有 16 家全球 500 强企业，分布在金融、保险、金属、航空航天及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另外，全球 500 强企业有 14 家来自一个亚洲小国——韩国，在韩国政府明智的政策指引下，现代集团成长为世界性的汽车生产商，三星与 LG 领导的韩国电子行业也是生机勃勃。未来 20 年，韩国必定会重复 20 世纪日本非凡发展的历史轨迹，会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尽管今天人均国民收入依然较低。

在全球企业 500 强榜单上，发展中国家依然表现平平，总共只有 56 家入围，仅占 11%。这些国家企业不能成功上榜的障碍不在于缺乏资本和技术，相反这两个要素他们都很充裕，问题在于缺乏足够合格的企业家和经验丰富的经理人，而这是创立并经营极其复杂、不断创新的全球性大公司的关键因素。丰田、宜家、埃克森美孚等全球特大企业，经营范围遍布全球，不仅必须创建、经营并管理好庞大的全球性工厂及办公网络，合理使用几十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且必须管理好全球性分销网络，满足几十个国家不计其数的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与各自偏好。况且，这些市场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变动不居的，有时循序渐进，有时瞬息万变。因此，即使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财富积累不断增加，全球 500 强也只有 24 家中国企业上榜，比加拿大多不了几个，甚至跟小小的荷兰相比，也是相去不远。而且，这些中国企业的经营范围基本还是局限于庞大的国内市场。与此类似，入围全球 500 强的印度企业只有 6 家，少于西班牙和澳大利亚企业数量；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仅有 4 家企业上榜，比小小的比利时和瑞典都少。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的缺乏往往就是这些国家不良政策的反映，这些政策给那些有志于开创新企业或者扩展既有事业的企业家设置了数不清的障碍，阻止他们挑战那些往往由豪门世家控制的老旧企业。其实只要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执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取得韩国那样的经济成就。

如果一国政府坚持执行冥顽不化的保守政策，把外国投资与专业技术拒之门外，那么全球化进程一定会让该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付出沉重代价，在这方面，俄罗斯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俄罗斯采取大量措施，发展市场经济，对绝大部分行业实行私有化，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但是，在其他各个方面，俄罗斯搭建了一个全世界最糟糕透顶的市场竞争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刚刚实现私有化的老旧国企享受体制性优惠，效率极低，死气沉沉，而那些新兴企业，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被置于不利地位。老企业可以获得大量政府特殊补贴，享受减税优惠，甚至可以免除债务。因此，新企业根本无法与他们竞争，外资公司只好撤退：近年来，俄罗斯的外商投资规模仅占 6%，而波兰高达 42%。外资撤退导致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核心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国民生产总值一蹶不振。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但从石油行业获利甚少，因为俄罗斯石油行业的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石油企业的 30%。一度在美国市场上冲锋陷阵的俄罗斯大型钢铁企业，生产力水平下降到美国同行的 28%，仅相当于巴西的 40%。与此类似，俄罗斯房地产建筑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仅能达到美国企业的 10%，仅相当于巴西的 2/3，主要原因就是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不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抵押贷款。因此，90% 的俄罗斯居民住房是用我们能想象出来的效率最低的方式建成的——在拿到上百个政府部门的盖章许可之后，由房主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来。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已经无足轻重：2006 年，俄罗斯的 GDP 是 9 870 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 7.5%、英国的 42%，低于西班牙和巴西的规模，仅比韩国高出 10%。

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企业的经营特征和基本需求，这些企业的雇员对此将会深有体会。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大公司，无不利用其规模优势，追逐自己所需的最基本资源——资本与劳力。但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大型跨国企业而言，劳力与资本很容易获得，成本相对低廉，因此，这些企业的基本经营战略就不再集中于获取这两种资源。取而代之的

是真正稀缺的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对当今大多数全球性企业而言，这是更为关键的基本资源。其中，智力资本包括：专利、品牌、独特经营模式以及专业人员与经理人的经验知识及其互动关系；政治资本包括：有利于自己的法规条例、税收政策、政府补贴，以及保证上述有利条件得以实现的企业母国与主要市场所在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与相互影响。

"观念经济"（idea-based economy）作为一个模糊概念，提出来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全球化使之变为具体现实。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美国企业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已经与实物资产投资不相上下，无形资产不仅包括传统的专利与商标，还包括品牌、数据库资源、企业组织改革方法以及落实这些思想观念的人力资源，而实物资产主要就是设备、土地、厂房等。企业资本重心逐步转向无形资产，这与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和迅速普及进程相吻合，这种转移也将在新产品及新工艺的开发与应用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企业申请专利、注册商标、树立品牌形象、建立企业数据库，甚至改变组织结构、进行高端业务培训，拥有自己的新产品、新工艺，都是十分关键的决胜因素。投资者对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的方式，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这种转移趋势。20 年前，美国 150 强公司实物资产的市值总额，也就是所谓的"账面价值"，占其全部股票价值的 75%。一个公司的价值基本上只是体现在那些可以变卖的工厂、设备、房产等实物上。到 2004 年，美国 150 强企业的账面价值仅占其股票价值总额的 36%。如今，各大公司将近 2/3 的价值，来自各自掌握的知识及其拥有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

能否创立并运用极具价值的新思想，尤其是在最好的既有思想基础上加以发展，一直都是一个国家及其国民能够取得多大经济进步的最关键的决定因素。自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 · 索洛完成其开创性工作以来，所有流派的经济学家都已承认：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而言，经济创新方面的进步及其应用所发挥的影响力，

要大于资本投入的影响力，甚至也要大于国民教育水平及工人生产技能不断提高的影响力。以美国为例，整个 20 世纪，美国企业用于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的经费投入占其所得利润的 30%~40%，这些创新不仅包括新产品、新技术，而且包括新材料、新工艺、新的融资方式、新的营销策略、新的配送手段以及企业自身组织管理的新模式。对于美国总体经济发展，资本市场的贡献率为 10%~15%，而美国工人教育培训的贡献率为 20%~25%。

看看企业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投资规模，以及投资人对思想观念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就会发现，创新活动的经济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大。由于诸多原因，当今时代，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信息技术这项最为核心的经济创新，对大多数人的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不寻常的重要影响。首先，与之前出现的快速普及的电气技术相比，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同样很快，而其价格则以同样异乎寻常的速度降低。计算机运算、存储及传输设备价格急剧降低，大部分软件产品最近也纷纷降价，这也成了全球化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有了廉价的计算机技术，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在发达国家之间快速传播，同样也可以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快速传播。在世界最富的发达国家，精巧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遍布金融业与制造业，这不足为奇。同样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仅迅速成为欧美小镇上小饭馆和维修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印度、尼泊尔、秘鲁等发展中国家，也成为大部分大中型企业的组成部分。2006 年，拉美地区网民人数估计有 1.03 亿，就是在最不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有将近 9 000 万手机用户，网民人数也超过 2 200 万。

在全球化背景下，利用信息技术，世界各大企业不仅可以获得方圆几里之内产生的创新思想，就是远隔重洋，也一样没有问题，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出现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因而轻易掌握了引进、购买、租赁、转借甚至剽窃发达国家最好的生产技术及商业模式的能力，这为发展中国家轻装上阵、快速发展，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如果仅仅依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而不能把这些资源与欧美及日本企业的智力资产相结合，那么，中国的情形

与今日俄罗斯农村地区不会有多大差别。

未来 10~15 年，中国及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要想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就不得不继续吸引、吸收现在及将来由西方公司研发的新思想、新观念。若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接受现代企业的战略底线。首先，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必须逐步采用欧美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矢志继续保持经济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清除现在依然存在的对西方公司的投资限制，还有那些传统规章，尤其是关于员工雇用、选址落户等方面的限制。到 2020 年，至少在以上这些方面，中国、印度及大部分东欧国家应该基本向美国看齐，至少在伦敦、东京及纽约的那些公司总部领导看来，应该是这样。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印度、捷克、巴西等国其实别无选择。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明白，或者很快就会明白，经济快速发展是其合法性的关键所在，而经济发展又有赖于西方公司技术、投资及专业技能的持续输入。支持这种输入的跨国公司同样明白，企业自身发展也同样有赖于创新思想，努力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在全世界成功发展的低成本国家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事业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与急剧变化的发展中国家交往之初，西方公司不得不设法学习、尊重并适应当地的传统及法律。事实证明，在伊斯兰国家，西方公司很难适应，有时干脆就是不可能适应。在这些国家，按照伊斯兰法律，西方公司的经营管理时常无法施行，这也正是大多数严格执行伊斯兰教义的国家至今一直没有跨越全球化门槛的原因之一。不过，大多数非伊斯兰国家对西方公司的经营风格和管理方式都能很快适应，从作息制度、团队协作、知识产权，到牛仔裤、摇滚乐，统统都能接受。但是，当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的问题足够严重，以至于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之时，这些企业的战略底线也会为之让路。也许就在未来很短时间之内，由于致命禽流感的全球传播，各大制药企业将会因此放弃自己药品

的知识产权。同样，全球气候变化也可能迫使各大石油、钢铁、汽车公司放弃精心安排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计划。

在如此之多的国家，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跨国企业需要具备相当的政治资本与政治技巧，就跟他们需要拥有自己的智力资本一样。特大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其经济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力，并非简单表现为某个政客或某个政党屈从于沃尔玛或道达尔的某种要求，尽管这种事情肯定会有。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或一个政府的政局稳定而言，任何单一的外资企业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除了那些最专制的独裁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府，可以承担怠慢那些全球最大公司的代价。跨国经营的各大公司作为一个群体，会有一些特定的共同需求，包括员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劳动培训、方便高效的资本市场、标准化的全球电信服务以及企业利润的较低税率。结果就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不管自视为保守主义，还是改革主义，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求政府角色定位时，都会不约而同地着眼于全球化。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放松管制、加强培训，积聚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些国家，医疗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受教育机会越来越多，电信服务及其他技术标准与全球一致，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法人税也在不断降低。

在时常被引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早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很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便看到了这一点。

辉瑞[①]、诺基亚等全球性特大企业，利用自己的庞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制造、销售其产品，他们的经营能力取决于在数十个国家，掌握遵

① 辉瑞公司，是美国一家拥有 150 多年历史的跨国制药公司。——编者注

守各国不计其数的法律规定、医疗与保险要求、税收及劳工政策等方面的本领。在印度、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如果不与上上下下的官僚合作，根本无法开展经营活动，也不能指望法律制度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裁判，因此，在这些地方，政治关系网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特大企业，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海外市场，成功战胜竞争对手的关键往往在于争取到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特殊补贴。

各大企业资产重心不断移向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这种变化正在改变主导全球市场的各大企业的力量对比。2005 年，全球 150 强企业中，金融与医疗领域企业所占比例是 39%，这些行业雇用了大量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相互激发，创造价值，因此也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管制与特别监管。1984 年这类企业在全球 150 强所占比例是 12%，仅仅过去 21 年时间，这一比例就增加到原来的 3 倍多。即使在制造业领域，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数量也是急剧上升。1984~2005 年，通用电气公司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岗位数量翻了一番还多，比例由 25% 提升到 50% 以上，而其员工总数却不断减少。通用电气之类公司，雇员结构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全球观念经济开始发挥效力——同一时期，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通用电气人均纯收入由 13 000 美元飙升到 54 000 美元。

到 2010 年、2015 年或 2020 年，哪家公司会执全球市场之牛耳，我们无法预知。但是，未来 10~15 年，各个行业盈利水平的相对高下，重要程度的行业差异，我们却可以合理推测。在当今全球经济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大企业当中，石油巨头的前景最为悲观。过去半个多世纪，大型石油、天然气公司一直都是各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者。现在，全球 10 强企业中，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占了 6 家；全球 50 强中，他们占了 11 家。但是，未来 10~15 年，由于气候变化，这个行业将会面对不断强化的政府管制；由于气候变化及油价高企，他们还要面对替代能源的激烈竞争；随着能源争夺逐步成为大多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各国之间将会出现持续紧张局

面，石油企业也就会面临新的政治约束。

未来 10~15 年，可能的赢家包括医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及新兴基因技术企业。随着遍布全球的老龄人口不断增长，医药需求自然会大幅增加；随着许多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出现财政危机，低成本医疗替代产品需求将会上升；在生物技术领域，随着许多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将会产生大量转基因食品需求。芝加哥生殖遗传研究所主任尤瑞 · 佛林斯基预测，10 年之内，利用父母的胚胎干细胞就可以治愈儿童白血病。诺曼 · 博洛格是拉美地区农作物基因改良的领军人物，他预期基因改良的小麦会大幅增产，从而很快缓解印度的粮食紧张。未来 10 年，能够很好地应对能源及环境限制的全球汽车生产厂商也会实现繁荣发展。这是因为在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随着国民收入快速增长，道路建设进展迅速，汽车需求将不断增加。单是中国，到 2020 年，汽车保有量预计就会从现在的 2 500 万辆飙升到 1.4 亿辆。未来 10 年，全球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公司也是前景良好。由于计算机及互联网接入价格的不断降低，而其应用又持续扩展，在所有发达国家，这些技术的覆盖范围，已经从最早采用此类服务的大型公司、富裕群体，普及到小型企业与寻常百姓。未来 10 年，同样的过程肯定也会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重复。不断涌现的廉价手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最近推出的源码开放、仅售 176 美元的笔记本电脑，这些产品都为发展中国家信息及电信服务的普及吹响了号角。

由于信息技术与电信业务已经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在所有行业领域，各国国内市场与全球网络的一体化进程必然进一步加快。至少，在那些能够抓住机会、很好地利用这些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产出回报会持续、强劲增长，这就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利润率会不断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在国内产业与全球产业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除了那些

由于信息技术与电信业务已经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在所有行业领域，各国国内市场与全球网络的一体化进程必然进一步加快。

规模最大的行业巨头，所有其他企业都必须具有更高的专业化水平，这也增加了产业工人必须掌握专门技能的工作压力。像思科公司一样，许多特大跨国企业正在慢慢退出产品的直接生产，而把重心转向设计、管理、调整、运行由其他公司组成的全球网络，正是这些公司负责产品与服务的开发、生产、营销、配送，从汽车、服装生产到信息、金融服务无不如此；也正是通过使用这些产品与服务，普通大众才知道这些公司的存在。

一个特大企业要保持盈利，自然有其规模极限。全球市场规模之大、复杂程度之高超乎想象。单是丰田、沃尔玛这样的企业，其全球网络就涉及诸多开发商、制造商、供货商、分销商，产品与服务的消费群体遍布全球几十个不同国家。在这些企业，经营管理需要层层组织架构，中上层管理者必须努力保持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下属之间的沟通协调。根据最近一项调查，各大企业一半以上的执行官指出，他们每周要花两天时间应付那些不会带来任何收益的电子邮件、语音邮件及各类会议。即使借助高度达发达的信息与电信服务，无穷无尽的繁杂琐事也会让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的战略规划陷入泥潭。

事实上，一些特大企业已经致力于精简自身经营活动，以提高盈利水平，办法就是剥离各种副业，以及无关紧要的分支机构。例如，花旗集团就把人寿保险业务卖给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把物流金融业务卖给了通用电气公司，如此一来，花旗就可以更好地集中经营盈利能力更强的银行业务。短期之内，戴尔模式可能成为很多公司尤其是制造企业的学习榜样。戴尔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利润率最高的计算机制造商（按雇员人均盈利计算），诀窍就是努力干好一件事——要求承包商实施苛刻的标准化工艺流程，提供客户定制的专门产品，自觉抵制向高端产品扩展的巨大诱惑，也无意发展企业咨询等业务。

企业外包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大企业的战略重点，逐步由劳力与资本转向观念与政治，这对那些靠劳动谋生的产业工人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影响。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及日本，失业率很低，大部分产业工人的收入也相当可观。这种现象准确无误地表明，在那个年代，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在同一时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收入停滞不前，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根本就不缺劳动力。两种情形，一个道理。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工人迁移需要耗费资源、作出牺牲，那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力过剩并不能缓解发达国家的劳力紧张。当代全球化则跨越了这些地理障碍。中国、捷克、墨西哥等国工人，只要来到本国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就可以轻松加入欧美及日本雇主的劳动力储备大军，因为这些地方就有欧美及日本公司设立的海外企业。由于工资快速增长的强大吸引力，再加上快捷高效的现代交通网络，国内人口得以大举迁移，在墨西哥、巴西、印度、中国、印尼、孟加拉国、埃及、阿根廷、韩国、俄罗斯等国，已经形成了许许多多人口规模达到 1 000 万、1 500 万甚至 2 000 万的特大城市。在大洋彼岸，发达国家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正对他们备加关注，时刻担心未来 10 年本国企业的外包浪潮会让他们丢掉饭碗。尽管西方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雇用工人，这不太可能触动发达国家大多数产业工人的直接利益，但是他们的担心还是很有道理。

毫无疑问，全球性劳动力储备突然变得十分庞大。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 · 弗里曼计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全世界互通有无的劳动力规模翻了一番：2000 年，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及东欧国家工人数量合计约为 15 亿，这个数字与所有发达国家、拉美国家、北非国家及东南亚国家的工人数量之和大体相当。尽管结论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弗里曼教授的计算结果还是准确的。在中国、印度等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初，这些国家的亿万

农民依然与世界贸易、外商投资、业务外包彼此隔绝。然而，仅仅用了 10 年时间，全球化就有效扩展了全球劳动力的储备规模，使得直接或间接参与生产、对外提供出口商品及服务、与他国同行激烈竞争的工人数量增加了 5~7.5 亿，增幅至少达到 1/3，甚至可能高达 50%。

根据某些政治家和万事通专家的说法，未来 10~20 年，欧美及日本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将会因为企业外迁而丧失工作机会，这些岗位将要转移到中国、印度、中欧国家及孟加拉国等国。2004 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民主党竞选人约翰 · 克里把美国外迁企业称为“卖国公司”。2005 年中期，一位平和理性的作者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如果你只是能够准确描述某项工作，或者可以写出操作规则，那么你不大可能在美国生存下去。因为编个计算机程序，或者培训一个外国人，都能轻松胜任这样的工作。”从理论上说，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外迁或业务外包，也会对不与客户直接接触的工作岗位及国内员工产生影响。但是，实际结果与潜在影响远比理论复杂，其影响结果也更有限。

经济高度发展，市场不断细分，外包自然就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业务方式。而且，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庞大，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外包模式一定会大规模发展。不过，刚开始时，花旗集团、三菱公司以及千千万万家小型企业，先是把薪资管理、法律事务、呼叫中心、IT 服务等过去一直由本企业自己组织的工作转交给其他公司负责，此时，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外包业务还是发生在国内。一项针对美国东北地区 4 000 家中小企业的调查表明，把一系列业务外包给别的美国公司的企业比例达到 83%，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委托别的公司管理员工的养老及医疗保险事务，而把员工培训业务外包出去的企业约有 30%，呼叫中心和 IT 服务实现外包的企业接近 20%。在 IT 服务方面，像 CIBER 这种外包公司，在成本较低的地区建立服务中心，为美国东西海岸许多公司提供远程 IT 服务。外包业务并不限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东方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不仅为美国国内企业提供 IT 服务，也为印度中型公

司提供例行维护服务。据估计，面向美国国内企业的外包占到全部外包业务总量的 87%，与全球化的关系很小。

另外三种外包形式则涉及外国工人。第一种外包形式由来已久，跨国企业直接开设海外分支机构，作为其全球网络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负责生产零部件，或者负责生产制成品，或者负责提供某项服务。到目前为止，与欧洲及日本企业相比，美国企业更多地采用这种外包形式，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劳工法律更加严格，使得企业很难解雇本土员工。此外，美国公司外包业务当中，服务外包占了相当比重：美国进口的所有服务业务中，40% 的服务贸易发生在本土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在信息密集型行业领域，由于涉及更多先进技术，这一比例更高——金融业大约是 60%，在企业经营及专业技术领域，这个比例更是达到 70%。

然而，这种外包涉及的工作岗位数量很少。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3 年美国因为业务外包流失的工作岗位是 13 000 个，2005 年是 52 000 个。这种外包形式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到 2004 年，美国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在册员工总数为 3 000 万，其中，海外员工有 830 万，所占比例为 28%。不过，外国跨国公司也在美国雇用了 510 万本地工人，因此，美国公司输出到海外的工作岗位比其他国家输入到美国的岗位数量多了 320 万个。比如，近几年来，许多欧洲一流医药公司都把研发部门迁到美国，以便更好地适应这个全球最大，并且基本没有价格管制的唯一主要医药市场。320 万的差额相当于美国全部工作岗位总和的 2%，而且，这个数字还是最近几年才增长起来的。2004 年，美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雇员数量增幅是 100 000。在此之前，2003 年海外雇员数量减少了 60 000。如果说 2004 年美国企业增加的 100 000 个海外工作岗位当中，每 1 个都以 1 个国内岗位流失为代价，那么当年因此流失的岗位总数还不到美国本年度所有岗位总和的 1‰。

如今，美国因为业务外包流失的岗位数量比过去要多。1979~1993 年，在所谓的去工业化时期，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工作岗位数量为 230 万，其中相

当一部分转移到墨西哥、中国台湾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全球化飞速推进，美国制造业丧失的岗位数量越来越多，单是2001~2004年，就达到270万个。不过，在那几年，美国海外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量根本就没有增加。数以百万计的欧美及日本制造业工人丢了饭碗，要么因为自己的岗位被先进技术取代，要么就是转向本国其他行业。

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因为**全球化催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型外包模式**。欧美公司（日本企业在这方面实践很少）第一次开始外包呼叫中心、软件开发、分片研发等特定业务，外包商也不再是自己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而是素无瓜葛的各种企业，它们来自印度、爱尔兰、以色列等国，自然还有中国。未来10~15年，这种外包形式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高，势必会对发达国家千千万万产业工人形成真正威胁。

今天，一些受雇于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级员工的工作岗位正在丢失，流向别的国家的其他公司，这是确定无疑的发展趋势。不过，这种业务转移并不是由于目的国工资低廉造成的，因为这些高技能岗位大多是从一个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另一个发达国家。相对于劳动力规模而言，现在这类业务外包的首选国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而是爱尔兰。为了吸引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的软件公司到此安家落户，爱尔兰特意重新制定了税收及管理制度。同时，很多具有军方背景的以色列公司，也正在为大批欧美企业提供研发服务。

与制造业不同，服务外包并不仅仅因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自身现代化，至少目前还不是这样。经过印度各大城市10年来集中关键资源，对年轻学子重点培养，印度已经成为西方企业软件开发与IT服务的外包中心。即便如此，1983~2003年间，美国公司软件开发与IT服务方面的所有岗位当中，被外国企业抢走的也只有100 000个。在发展中国家承接的高技能服务外包领域，英美公司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工程技术外包方面，美国公司提供的岗位数量就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英国公司提供的岗位比例也达到

16%。在日本及欧洲大陆，企业依然很难把工作岗位转移到其他国家。除英国之外，所有欧洲国家输出的工程技术外包岗位总和只占全球总数的 16%，而日本跨国企业的份额更是只有 2%。

近些年来，中国与印度大力推进年轻人的教育事业，以期把千千万万高峰人口培养成医生、会计、分析师及经理人。结果如何呢？教育投入造就了大批掌握特定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渴望工作，而工资期望只有欧美同行的零头。不过，他们大部分人都不会直接抢走欧美员工的饭碗，而是被国内企业大量吸纳，或者向那些在中国、印度等快速发展的国家开辟市场的西方公司提供自己的专业服务。尽管中、印两国都在大力推动年轻人的教育培训，但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很难在几年之内突飞猛进，尤其是很难高质量地大批培养高度复杂的西方公司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工人已经出现短缺现象。此外，据麦肯锡公司专家测算，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在中国、印度及菲律宾，4 年之内，英美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 IT 及工程技术方面的高技能人员将会出现不足。从理论上说，移民可以缓解人才短缺，但是，长期看来，这些发展中国家届时很可能会比法、德两国更加排斥移民。

还是从理论上说，这种外包今后也可以扩展到现在还没有接受此类业务的那些国家，随着中国及印度的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这种可能性更大。比如，1998~2003 年这 5 年时间，印度 IT 企业经理的薪资翻了一番还多。到 2015 年，中、印两国工程师及软件、金融方面专业人士的短缺，将会推动工资上涨，逐步达到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的水平，而捷克、波兰两国的工资水平很可能赶上葡萄牙甚至西班牙。如果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秘鲁、摩洛哥等国政府现在也开始加大教育及培训投入，其中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语言培训，那么，在高技能业务外包方面，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新兴的小规模外包中心。

还是根据麦肯锡公司测算，今后 30 年，美国服务业将会有接近 5% 的工作岗位通过外包转移到别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当今从业人员超过 1.08 亿的美国服务行业，今后每年都会流失 180 000 个工作岗位。

有些时候，美国人，还有欧洲人、日本人，把自己的医疗服务外包到其他国家，利用外国资源节省医疗成本。这种做法，已经不再只是去瑞士做最好的整容手术的那些美国富豪的专利。如今，更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老人跨越国境，到墨西哥、加拿大去看昂贵的牙科，因为美国医疗保险是不管这些疾病的。也有一些美国人到中东、亚洲地区接受器官移植，有些日本中产阶层也会到美国实施试管受孕。目前还没有对这些情形的准确统计，不过，为给那些医疗游客提供私人服务，已经出现针对外国医院的 “认证” 机构，这也足以说明此类需求十分旺盛。美国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下属的国际联合委员会就是这样一家机构，亚洲、欧洲及中东地区的 80 家医疗机构已经获得该公司认证（该公司也向国外医疗机构提供有偿咨询服务，指导这些医疗机构如何获得认证）。安 · 洛姆巴蒂，曾是亚特兰大的一名旅游代理商，她在德国接受白内障手术，结果发现省了 4 000 美元。回国之后，她就在北卡罗来纳州成立了欧洲医疗旅行有限公司，安排那些为了省钱的患者，到德国、比利时及法国接受治疗。类似业务在英国由来已久，一些英国公司早就帮助本国居民到法国、匈牙利、马耳他、印度、拉脱维亚及其他国家接受外科手术，从而使众多英国人避免了接受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安排而必须忍受的漫长等待，也不需要支付英国私人医疗服务的高昂费用。

一些美国企业正在努力削减医疗成本，他们也瞄准了这个方向。比如，北卡罗来纳州的蓝岭纸业公司，就是自己负责提供员工医疗保险待遇，他们把员工送到印度新德里接受手术，从而节省了很多成本。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医疗保险业务经理，负责一项联合团体计划，他就把一家泰国医院作为该项计划首选医疗机构。此外，好几家《财富》500 强企业最近也在研究与海外医院签署批量医疗合同的可行性。

全球化进程绝不会停滞不前。未来 10~15 年，西方国家服务业工人还将受到另一种全新外包形式的冲击。这种服务外包将以分片模式出现，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印度、墨西哥（也许还有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秘鲁、摩洛哥）等国工人，可以分头处理那些大型复杂业务的一小部分，比如审看 X 光片、运行税务程序、分析企业数据等，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全球信息网络轻松实现。用不了几年，在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及企业管理等领域，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就会出现人才短缺。届时，这些国家就可以培养年轻人，负责完成这些工作的某个细小环节。此外，向其他国家提供分片外包业务的美国公司，将远不止现在占据这项业务主导地位的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未来 10 年，数以千计的欧美医院、会计公司、金融机构将会发现，通过信息系统，经过面向各个分散业务环节专门培训的全球各地员工，连成网络，协同工作，是切实可行的。

分片外包伴随着数据处理与呼叫中心技术的出现而出现，发展时间还很短，不过，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制造业外包发展相比，服务业分片外包发展速度要慢一些。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语言障碍，因为转移到低工资国家的大部分服务业工作，都涉及某种信息的沟通交流，这通常需要外包商与委托商（及其客户）使用同一种语言。通用电气、美国快递、英国航空及微软公司的数据处理及呼叫中心外包商不在中国、巴西，而在印度，原因就在于此。英美企业在欧洲、日本的分支公司也是一样。在美国，由于讲西班牙语的客户市场发展很快，墨西哥已经成为美国公司及其欧洲、日本分支机构呼叫中心外包业务的另一个首选地。出于同样原因，德国西门子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与法国电子巨头汤姆逊公司，及其在美国的几十个子公司，纷纷选择在捷克建立呼叫中心。

但是，相对于软件技术的近期进步而言，服务外包的强大推动力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其发展目标应该远远超过建立呼叫中心与数据处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计算机的运算性能、传输速度及存储容量一直都在稳步发展，

然而，软件技术却远远落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这种现象开始改变，由于软件技术进步，各个企业得以把软件编程分解完成。用术语来说，就是软件编程实现了“模块化”。如果没有这项软件技术进步，不管美国公司多么欢迎印度程序员的工资水平，班加罗尔至今都不大可能成为软件开发中心。而且，大约从 2000 年开始，由于金融、会计、医疗及工程设计等领域的软件开发取得重大突破，企业得以分解那些极其复杂的工作任务。比如，在一些重要关头，跨国企业准备接手一家公司，可是估计公司价值、计算税务负担等这类工作都是无比复杂的。借助新的软件技术，这些企业就可以把大型任务分解，交给许许多多专业团队分头实施，通过互联网沟通协调，最终在某个地方完成组装。

相对于软件技术的近期进步而言，服务外包的强大推动力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其发展目标应该远远超过建立呼叫中心与数据处理。

未来 10 年，软件技术进步推动的分片外包业务模式，估计会让发达国家丧失 800 万 ~1 000 万个服务业工作岗位。当然，在第一阶段，这还不至于对欧美及日本的就业机会造成大的破坏。因为随着软件技术不断进步，成千上万家西方企业在把服务业务外包出去的过程中，他们首先会选择当地或本国的外包商。不过，与其他外包模式一样，只要这种外包可以降低企业的医疗与养老保险成本，美国公司就会率先把目光转向国外。

到 2010 年，或者更早一点，英美跨国企业很可能就会开始把庞大的工作任务分解，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公司，此类公司目前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有了相应发展。几年之内，这种外包模式就会进入第三阶段，这也是其主要发展阶段。在印度、墨西哥、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会有千千万万本土企业家跃跃欲试，筹划成立公司，争取西方特大企业的外包订单。发展中国家此类公司一旦纷纷成立，成千上万家英美公司驾轻就熟的、原来由本国企业完成的分片外包业务，将由这些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中间商完成，而且这更能帮助英美公司节省成本。到 2015 年，日本以及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将

会面对出生低谷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因此这些国家的许多企业很可能也会采用这种外包模式。

二三十年之前，精密复杂的制造业同样经历了类似发展过程。但是，这次造成的经济错位及其他变化更加巨大，因为服务业分片外包涉及的市场需求与就业机会要比之前的制造业大得多。在所有发达国家，制造业所占经济比重大约是 20%，而服务业的份额高达制造业的 3 倍。而且，不管是制造企业，还是服务企业，都有大量服务需求。美国人卫生医疗与个人服务支出普遍高于住房与饮食消费，而这两个领域都有大量服务需求。此外，未来 10~15 年，国际服务需求也会不可避免地大幅增长，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同样的消费结构。随着国家发展，收入增加，发展中国家居民支出当中，服务性消费份额必然会不断提高，超过其他消费额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 15 年，国际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达到商品贸易增长速度的 2 倍。随着服务业分片外包模式的继续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必定会持续扩展。随着中国、印度及中欧国家快速发展，这些国家高端商品及专业服务需求也会迅速增加，这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一线希望。当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这些国家，美国及欧洲仍然会有自己的王牌。

由于软件技术取得突破性进步，服务业分片外包成为可能，进而可能会让千千万万美国人丢掉饭碗。但是软件技术进步其实还会产生其他效应，这种效应强度也许更大，不过这与全球化倒是没什么关系。起码就美国而言，制造、金融、零售及其他行业领域的生产回报增长十分明显，完全是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利用了最新信息技术。IT 技术在美国经济活动中，能够一如既往地快速发展、不断普及，这是因为，在技术进步、国外生产成本降低及竞争不断加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计算机硬件设备的实际价格显著降低。现在，同样的推动力也开始在软件领域显露端倪。

今后 5~10 年，随着计算机软件性能更加强大，适用领域更加广泛，国外软件产品扩大市场份额的努力使得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软件产品的实际价

格会大幅降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各类企业的IT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医疗、教育及私人服务领域。与制造业、金融业及零售业相比，过去这些领域一直对IT技术不太热心，信息化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如果IT技术硬件发展历程可以作为可靠借鉴，未来10年，软件价格降低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将会远远大于过去10年。这就意味着利润增加，收入提高，最终将产生更多工作机会——至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娴熟技能、可以自如运用IT技术的人会是这样。

软件技术进步一定会在发达国家迅速普及。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日本及大部分欧洲国家从中获得的收益根本没法与美国及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相比。10多年来，欧洲与日本企业在IT技术方面的投入热情一点也不比美国公司差，但是，他们的资金投入换来的收益却少得多。企业具有通过改变运作方式来发挥IT技术的最大作用，因为技术本身根本不会带来任何经济结果的差异。在日本及大部分欧洲国家，不计其数的法律法规制造了成千上万的政策障碍，为企业增加了额外负担，这恰好造成了他们与美国企业IT技术利用方式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工厂迁址、解聘不称职员工、调整上班时间等方面，而企业如果要通过IT技术投入来榨取更高的生产收益与经营利润，则必须借助以上的措施。

全球化对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的影响

从一开始，当代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就掀起了巨大浪潮，使得欧美及日本公司的技术、投资与特有技能迅速涌入中国，印度虽然力度略小，也是紧随其后。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们使用的形形色色的产品上的产地标签，就是这个浪潮所产生结果的无声证词。现在，中、印两国企业已经可以生产许多精细复杂的高档产品，从半导体设备、笔记本电脑，到视频游戏。同时，

他们也还继续制造几十年来他们一直生产的成千上万种精细程度较低的产品，如钢铁、混凝土、家具、玩具等等。而且，由于引进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技术，两国生产的传统产品的产量与质量都有了极大提高。

很长时间以来，发达国家产业工人已经不再大量生产玩具、钢铁、混凝土。在几十年前，全球化尚未飞速发展，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绝大部分此类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巴西、台湾及韩国。欧美及日本企业继续生产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复杂产品，不过，这些产品许许多多零部件的生产加工，也逐渐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这些地区员工工资与其他成本的稳步上升，又继续向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转移。这给今天各国发展带来了至关重要的不同影响，因为中国、印度现在每年新增的千千万万工作岗位主要不是来自欧美及日本，而是来自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一类发展中国家。

结果只能如此。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报告，美国、法国、日本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分别是 24.63 美元、21.76 美元、23.65 美元，而台湾、韩国、墨西哥的这个数字分别是 6.38 美元、13.56 美元、2.63 美元。在中国和印度，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平均收入分别只有 70 美分和 40 美分。受雇于外资企业的中国、印度工人收入要高一些——与韩国、墨西哥、泰国的外企工人情况一样。不过，在中、印两国设厂经营，与在墨西哥相比，成本差异十分巨大，这也正是中国每年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吸纳数十万工作岗位的主要原因。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过去 15 年，中国商品出口飙升了 1 300%，出口额从 1990 年的 680 亿美元蹿升到 2005 年的 8 370 亿美元，而且现在仍然以每年 20%~25% 的速度继续增长。凭着这样的出口强度，中国已经让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对手相形见绌——中国自己的出口额就比东亚其他国家总和还要高出近 2/3，分别达到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 4 倍、5 倍、8 倍；是墨西哥的 2 倍多、巴西的 5 倍多，并且比拉美国家与加勒比国

家出口总和高了 30% 多。

此外，在中国，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已经被现代技术和商业模式武装起来，与其他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相比，其技术水平与经营方式已经不相上下，甚至还会更好。现在，中国已经可以生产泰国、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出口的绝大部分产品，并且产量更大，成本更低。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程度继续提高，并掀起了新一轮竞争热潮，使得在几十个发展中国家，数十个相关行业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对这些国家、这些行业来说，一个利好消息是，熟练劳工需求量的迅速增长，推动了中国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1997~2003 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翻了一番，而亚洲大部分国家同期工资增长率为 30%（大部分发达国家工资增长率不超过 10%）。不利的一面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要赶上泰国和墨西哥，还需要几年时间。不过，届时仍然要比韩国低出很多。这几年，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市场上还是会受到中国企业的挤压。

这些企业及其员工对来自中国企业强力竞争的感受最为直接，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强大的竞争压力，经由全球资本市场，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行业传递到另一个行业，最终到达欧美及日本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员工。

以下就是上述过程的生动实例。浙江省临海市国海锻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金属锻压件制造商，产品范围逐步扩展到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由于价格低廉，已经击败了墨西哥与泰国制造商；广东省东莞市声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酒店家具设备制造商，并获得了美国科勒洁具上海总部在华南六省的总代理权，其产品档次不断提高，凭借价格优势，击败了马来西亚和埃及的竞争对手。当慕尼黑、西雅图及首尔的客户获得这些信息之后，来自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及埃及等国的制造商，由于相对生产效率较低，在金属配件、酒店设备与衣饰服装等行业领域，就会被排挤出去。在边际效应作用下，上述国家这些行业的资本与技术就会转移到其他产业，要么向下进入农业领

域，要么向上进入电子或更高产业领域。不管哪种情况，由于转移带来的资本与技术膨胀，该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都会有所提高。如果资源流入价值链的低端，结果就是贫穷国家相关产业受到排挤；如果流向高端产品领域，比如墨西哥、泰国的电子制造业，或者马来西亚与埃及的设备制造业，由于额外资本与技术力量涌入，就会给韩国、巴西同行带来新的竞争压力。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由于边际效应影响，这些国家的资本与技术资源也在不断转移，经常进入产业链的高端，比如，韩国的液晶显示器生产商与巴西的汽车制造厂。这一次，受到排挤的可能就是德国的液晶显示器生产商与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了。

中国制造业规模如此巨大，品类如此广泛，以至于商品出口的飞速发展，导致数十个国家、几十个行业面临的压力显著加大，在这个通过全球性资本与市场网络相互关联的世界上，最终处处都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当然，另一方面，这股强大力量加快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速度。但是，这种压力一旦传递到欧美及日本企业，所产生的结果将会截然不同。

源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经过一国又一国的不断传递，最终到达欧美及日本。对这些不同的先进经济体而言，竞争压力加大造成的影响毫无二致：因为竞争激烈，企业提价越来越难。过去几年，成千上万家欧美及日本企业发现，按照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他们可以利用的“价格杠杆”越来越少。失去了价格杠杆，面对不断攀升的经营成本，企业将会怎样？以美国为例，2001 年以来，企业医疗保险成本增加了大约 90%，能源成本翻了一番还多，很多企业的养老成本也是急剧增加。企业成本大幅上升，而面对竞争压力，又不能提价，以抵消额外成本，那么企业只好另谋生路。近几年，为降低经营成本，大部分企业都转而考虑工作岗位与工资水平这两方面因素。

还有一项全球性因素，也在加大对企业及其员工的压榨力度，尽管企业最终会对此表示欢迎：过去 10 年，全球资本供应增长低于劳动力供应增长，结果就是投资者的回报预期不断提高（所有这些因素，其实还是由当今时代

的全球化造成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期望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美国企业盈利水平打破了所有历史纪录——因此，在股票不贬值、投资水平与未来盈利预期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企业没有办法利用高额利润来保护员工的工作岗位与收入水平。

经营成本不断上升，而企业提价能力又受到压制，这迅速改变了先进经济体的两个基本发展动力。首先，改变了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机会增加数量之间的关系。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美国自诩为就业创造发动机，但在全球化的挤压之下，就业创造动力明显减弱，最早的证据就是 2001 年的经济衰退。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实际衰退情况来说，那时减少的岗位数量超过战后衰退期的 6 倍。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之后，用了 4 年时间，才恢复到衰退之前的就业水平，而上一次衰退之后的恢复时间为 18 个月。进入这一轮经济复苏的 5 年来，就业机会的创造速度只有上一次的一半。尽管现在美国就业机会创造速度之慢史无前例，但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唯一的原因就是，**虽然经济不断增长，但是寻求工作的人口数量却在下降。**

同样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人生产力提高与工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也因为全球化的到来而不断弱化。自 2001 年开始，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 3% 以上。这是美国几十年来的最好表现。但是，5 年来，在生产力强劲增长的情况下，美国劳动者的实际平均工资反而下降了，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即使把雇主支付的医疗与养老保险成本大幅上涨这一因素计算进去，美国劳动者过去 5 年综合所得也是增长寥寥。对于这个问题，服务业劳工国际联合会颇具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安蒂 · 斯特恩最近指出：

> 美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去阻挡全球化进程。长远看来，真正问题在于，如何让那些依然留在美国的工作岗位变得收入可观……如果我们找不到答案，那将证明格林斯潘是正确的——美国富人阶层与其他社会群

体的贫富差距范围太广、扩大太快，势必会危及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

这种影响当然不只出现在美国。在日本及大部分欧洲国家，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就业创造能力也是在不断削弱，工资水平不是持续下滑，就是停滞不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可能发生变异，成为一头怪兽。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采用深思熟虑的政策法规，对其加以约束。"今后，各国面临的就业压力与薪酬压力还会继续加大，源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也不会消失。中国出口应该还会继续跨越式增长，而且这种趋势至少会持续到下一次全球经济衰退——这同样也会让欧美及日本丧失工作岗位，降低工资水平。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继续飞速发展，会推动工人工资与其他成本不断攀升，这应该可以缓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的压力。不过，由于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印度制造业当前的工资水平只是中国企业的零头，因此，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将会异军突起。

欧美及日本都不能回避全球化的隐性成本，而是必须设法跨越。这些国家不得不想法缓解本国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之前我们已经看到，降低养老成本是如何艰难，尤其是在今后 5~10 年，西方国家高峰人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是在政治议题层面，企业消解医疗与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是同样困难。对于世界各国大约 20% 的高收入群体而言，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在全球化市场中，凭借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拥有某些讨价还价的资本。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大约 20% 的底层工人来说，这个问题同样无关紧要，因为体力劳动原本就与全球化压力没有多少关系，至少在美国，体力劳动者经常根本就不享受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和养老待遇。但是，如果欧美及日本政府与企业不能筹划解决成本压力这个问题，今后二三十年，这些国家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就将面临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的困境。

资本市场的全球化

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将会成为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需要的关键性稀缺资源，不过，在全球化的当前阶段，企业重点关注的仍然还是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的其他时期，同样也会讨论资金与金融问题，但是方式并不一样。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真正到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之大、种类之多，让之前任何历史时期都相形见绌。巨额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通，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加剧造成的价格挤压效应，共同压低了全球资本利率，并在发达国家，为房地产与股票市场从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波动创造了条件。最终，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彻底颠覆了全球资本的传统流向，数千亿美元由发展中国家涌入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因为具备这些特点，当今全球资本的市场运作就成为当代全球化的开路先锋。

对大多数人民、大多数国家，以及当今世界这个整体而言，资金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数量多少。货币存量的快速增长，使得世界各地资金充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全球资本增长一直高于全世界 GDP 增长，也比世界贸易与全球储蓄增长更快。据估计，今天全球资本规模超过 150 万亿美元，是全世界 GDP 总和的 3 倍多，也比 15 年前全球资本的 3 倍还多。到 2010 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 200 万亿美元，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到 2020 年会再翻一番，超过 400 万亿美元的规模。而且，美元、日元、欧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通速度增长比资本数量增长还要快，仅仅在过去 10 年间，流通速度就提高到之前的 3 倍，2006 年一年流通量超过 5 万亿美元。

全球金融资产增长速度高于 GDP 增长，这一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金融资产的权利主张体现在未来，资本快速增长就是一个信号，它表明世界上掌握大部分资本的富裕企业与富人群体对未来经济发展总体看好——肯定比 20 世纪 80 年代要好，那时全球金融资产增长速度要慢得多，资本总和仅比世界 GDP 总额高出 10%。不过，这种乐观预期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拉

美地区 GDP 之和占全球总额的 4%，而金融资产只占全球总和的 2%，因为在这个地区，拉美国民与海外投资人基本都没有很强的投资意愿。目前大部分拉美国家依然游离于全球化轨道之外。

全球资本规模及国际资本流量达到历史性高点，最终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空前繁荣，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过去 15 年来，西方公司的投资、技术与专业技能大举进入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企业与国民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储蓄与财富。在现代化金融市场上，大部分国民财富又都转换成公司债券、银行存款、企业股票及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证券化”，如此一来，大部分新增财产最后都进入了当地或本国的资本储备池。

在世界各国本地金融资产最终进入全球资本体系这个过程中，信息技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因为当今大部分金融资产都是以二进制字节形式存在，通过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创建、存储、传输。目前，没有哪个行业比银行与金融业的全球化程度更高——比如，花旗集团在 90 个国家开展业务，伦敦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已覆盖 76 个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他们不仅可以连接、管理全球各地的经营活动，而且可以把实物资产变成无形证券，而不再是黄金、纸质凭证等有形载体。这些无形电子证券可以在几个纳秒之内，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而根本不用花费运输成本。因此，尽管这些金融机构在智利、印尼，甚至中国的营业网点并不多，但是圣地亚哥、雅加达的企业、居民为了获取利润回报，可以轻易地把自己创造、积攒的财富投向中国上海或美国圣何塞的企业，也可以借给美国政府使用。最后，这个复杂的全过程以全球化带来的新增财富进入几十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基础体系而告终，这又导致信贷与资金的新增长。

中国、印度及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过，全世界绝大部分金融资产依然掌握在西方金融机构手上。在这个领域，欧美

及日本的主导优势比他们在 GDP 方面的优势还要明显，这些国家金融机构掌控的金融资产达到全球总和的 80% 以上。金融资产的所在地与其所有者并不相同。美国 GDP 占世界总和的 27%，拥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达到 37%，约为 44 万亿美元。不过，有 12% 的美国公司股票、25% 的美国企业债券、44% 的美国政府国债并不在美国人手上。到 2007 年 7 月，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额为 4 080 亿美元，日本是 6 110 亿美元。两国合计，中国与日本政府持有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的外部债权总和的 20% 以上。这是一扇窗户：全球投资人普遍看好美国经济繁荣前景，从中可见一斑。

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主导地位，可以强化这种乐观判断，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美国经济普遍性的卓越表现。2004 年，全球范围内，有 45% 的公司股票交易、43% 的企业债券交易，通过美元结算——由于美元是买卖美国股票与债券的流通货币，上述比例数值就可以告诉我们，哪个国家的债券与股票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大量买卖。这类数据也能说明，全球投资人如何不看好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前景：2004 年，只有 15% 的普通股票交易通过欧元结算，而以日元结算的比例更是只有 9%，尽管欧洲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差无几，日本的经济规模也接近美国的一半。在全球投资人看来，英国的经济前景稍好一些，2004 年约有 8% 的全球股票交易通过英镑结算。

通过各国金融资产增长来源这个窗口，可以观察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动力。美国是全球企业经营活动的中心，金融资产增长主要通过增持普通企业股票实现，主要推动力就是在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买进，等待股价大涨，在股市上赚取高额回报。在日本，股市经过多年下跌与停滞之后，刚刚恢复元气，金融资产增长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公债推动。在欧洲，各国政府还在苦苦寻求刺激私营经济发展的良方，努力维持难以为继的福利制度继续运行，其金融资产增长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的特许经营以及政府公债。在中国，股票与债券市场很不发达，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银行账户的私人储蓄上。在一个缺乏广泛覆盖的医疗保险与公共养老制度的社会，私人

储蓄就成为人们就医看病、退休养老的主要保障。

到 2020 年，美国依然可以保持金融行业的主导地位，尽管优势没有现在这么明显。艾伦 · 格林斯潘曾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表示，今天以至于在他所能预见的未来，“购买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美国国债今后很可能继续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金融资产。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公司股票及债券也会继续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人。财经作者有时会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美国的“政治稳定”，这基本上是美国保守的经济文化的一个委婉说法。无论美国政治是左倾还是右倾，美国企业几乎总是要比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更加自由。过去 75 年来，欧洲国家许多行业实行国有化（很多企业最近又实行私有化），而在美国就没有出现类似情形，与中国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就我们的记忆所及而言，与欧洲人和亚洲人相比，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更加尊重企业，即使企业提供的医疗与养老保险之类公共产品不尽如人意，他们依然信任企业。此外，长期以来，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制度安排，倾向于以财富保持为中心，而美国则更加强调财富创造。企业文化倾向不同，必定导致现实差异：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往往更高，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美国企业家面对的法律法规约束要少得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新兴企业通过不断创新（包括就业机会），创造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迅速成为投资人所需的金融资产。未来 10 年，对全球投资人来说，最重要的很可能就是，美国依然会继续保持低于日本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企业税率，因为美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除外）公共负担的成本增长比日本和欧洲都要慢。

短期之内，全球资本市场的最大变化，将是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资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日本则会相对下降。目前，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为 5 万亿美元，不到日本的 1/3，也不及欧洲的 1/7、美国的 1/9。但是，除了美国，中国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增长最快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居民储蓄。如今，中国国有银行基本上仍然只是一个中转机构，负责把储户存款“发放给”地方政府和那些国有企业。简单说来，中国银行与欧美银行没

有多少相同之处，欧美银行以合理的客观标准为基础，为私营企业与消费者创建贷款信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仍然缺乏构建现代金融市场所需的绝大多数独立的公营及私营机构与规章制度，而这正是把一个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转变为纸质（数字）凭证，实现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易的基础。在年轻的中国股市上，很多上市公司（所谓的“红筹股”）能够上市，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资本市场标准，能够提供透明的财务报表，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政治优势。经营股票交易的中国证券公司，也不能像西方证券公司那样受到规则约束，自然也就无法建立市场信心。对全球资本市场而言，也许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依然缺乏自由兑换的货币流通机制。

几乎可以肯定，未来 10 年，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发生变化，尽管那会是一个渐进而痛苦的过程。在中国，已经有 100 多家西方银行开设分行，当然主要是为外资企业服务。不过，最近中国已经允许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及美洲银行持股中国国有银行，这些西方银行将为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业务模式。允许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中国也会面临挑战：没有了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持，很多现存国有企业很快就会陷入困境，由此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类似地，在人民币升值方面，中国也已经迈出了一小步。这个方面的挑战在于，在货币流通真正实现自由兑换与通过廉价出口保持经济增长这一基本战略之间如何协调一致。外国投资人一旦获悉可以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拿回本国，一定会蜂拥而至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外资涌入就会拉动人民币升值，进而抬高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结果就是大量中国企业将会破产倒闭，这又会导致大批工人失业。面对出口疲软，中国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像其他主要国家那样，发展消费推动型经济。这就要求中国恢复覆盖广泛的医疗保险与退休养老制度，因为只有有了这些保障，大部分中国人才不会宁愿存钱而不消费。

至少还需要 10 年时间，中国政府才能建立一个现代金融体系——10 年也只是欧美完成这一过程所用时间的零头。如果中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到 2020 年，中国金融资产规模将达到世界第二，也将成为全球第二重要的金融市场。

未来 10~15 年，不管中国能否实现这个跨越，全球资本规模及其流量都会继续增加，达到现有水平的 2 倍，甚至 3 倍。或直接，或间接，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会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工商业就业机会，改变数以亿计的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前景。不过，给发达国家人民生活与就业造成的影响，要微妙、复杂得多。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全球资本规模大幅增长，使得对各个国家、各个企业而言，资本不再稀缺。全球化飞速发展以来，第一重要的后果就是，利率水平达到历史最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结果，与过去 45 年来的任何历史阶段相比，2000 年以来，全球八大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利率水平都是最低，不管是绝对利率，还是考虑到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利率，都是如此。即使是那些国民储蓄率很低、外债负债率很高的国家，也一样保持了极低的利率水平，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美国与英国。这种现象的唯一先例出现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是上一次全球化的飞速发展阶段，其时，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利率水平非常之低。

第二重要的后果就是，全球资本市场力量日益加强，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过中央银行。近年来，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都发现，他们作出的调高短期率的决定，对长期利率影响甚微。而长期利率会影响绝大多数借贷行为，最终作用于经济活动。比如，从 2004 年 6 月到 2006 年 6 月，美联储 17 次上调短期利率，利率水平从 1.25% 提高到 5.25%。然而，2004 年 6 月与 2006 年 6 月，AAA 级公司债券的利率都是 6%，2006 年 6 月常规抵押贷款利率也仅比 2004 年 6 月高了 0.4%。在联邦政府采取“从紧”政策的头一年，长期利率实际是降低了；当联邦政策开始改变时，长期利率才又逐步恢复到原来水平。

至少在这个案例当中，**就应对全球化而言，金融市场比中央银行更加**

灵活机智。按照中央银行的传统规则，像最近这样，资本、信贷与消费同时快速增长，急剧的通货膨胀通常就会接踵而至。但是，全球化改变了这套规则。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全球化飞速发展以来，几乎世界各地的通货膨胀率都在急剧降低。1995~2005 年，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不断走低，每年只有 2%~3%。与此类似，亚洲国家（日本除外，那个时期日本一直通货紧缩）的物价上涨幅度为每年 3%~6%，只有前一个 10 年涨幅的一半。拉美地区的物价上涨速度也下降了一半，他们也享受到相对（于他们自己）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每年物价上涨幅度为 10%~20%。英格兰银行资深成员迪恩 · 朱利叶斯博士，以广阔的视野观察了这个问题，得出结论："国际竞争的不断强化，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还有就是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就是当前推动全球通货膨胀率走向低水平的推动力。"关于全球化能对降低通货膨胀率产生多大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怀疑态度，毕竟，监测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是该组织的一项业务目标，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使命的重要程度正在降低。然而，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说："毫无疑问，全球化造成了通货膨胀率某种程度的降低。"

市场竞争加剧，使得企业即使成本上升，也很难提高价格，这并不是通货膨胀脚步放慢的唯一原因。几乎同样重要的是，由于西方资本、技术与专业技能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大型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急剧提高，压低了本地通货膨胀水平，而且，随着廉价商品潮水般出口到发达国家，欧美与日本的通胀压力也随之缓解。最后，爆发于 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本身就是全球化带来的现象——已经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吸取了教训：冒险选择可能导致高通胀的经济政策，将会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但全球化不会终结通货膨胀。最明显的事实就是，石油与其他重要商品价格一路飞涨，导致全世界物价上涨。但是，假定目前这种低利率、低通胀的趋势保持不变，未来 10~15 年，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及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

家，国民的借贷与消费规模一定会高于现在的想象。2005 年，《经济学人》杂志面向 1 656 名顶级企业执行官做了一项调查，他们估计今后全球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要超过 GDP 增长速度 60%，从现在的每年大约 27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62 万亿美元。在欧美国家，富人今天消费的高档服装、电子产品及个人服务，届时人人都能享受得到，而且也会走进世界其他地区亿万寻常百姓家。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将会飞速增长。到 2020 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私人乘用车保有量将超过美国，预计达到 1.3 亿辆；同时，印度的消费规模也将和法国相当。在世界各地，企业会很容易获得低息贷款，不过，企业投资一定会集中在盈利希望最大的地区。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要求，充分利用全球化发展机遇的那些国家，将会吸引绝大部分企业投资，这也正是接受《经济学人》调查的执行官们，预计 2005~2020 年间，美国、中国及印度的企业发展势头要远远超过欧洲与拉美地区的原因所在。

在经济生活中，任何行为都有成本。**国际游资制造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经历新一轮痛苦的下跌过程，最终将会破裂。**过去 10 年，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大幅上升，增长速度超过“二战”以来任何时期。1997~2005 年，意大利房价上涨 69%，美国是 73%，法国是 84%，瑞典是 87%，澳大利亚是 114%，西班牙是 145%，英国是 154%，爱尔兰是 192%（仅有的例外发生在经济增长最差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与德国）。到 2006 年，大部分过热市场上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至少也是不断缩水，澳大利亚与英国就是如此。2007 年，美国的房产牛市也是踌躇不前。短期之内，一些国家的房地产业主也许会重蹈日本的可怕覆辙：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房产价格狂涨，到 90 年代泡沫破裂，均价下降 40%。

资产泡沫并不限于房地产市场。1997~2004 年，各国股市涨跌波动剧烈，波动幅度超过“二战”以来任何时期——英国股市平均每年波动幅度超过 16%，澳大利亚是 18%，美国是 20%，法国、意大利与德国的年均震荡

幅度更是达到了 24%~27%。股市的反复无常，在新兴市场表现得更加显著，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股市年均震荡幅度分别达到 81% 与 92%。股市本身也会因全球化而改变，变化结果就是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5 年之内，跨国资本流动很可能达到每年 10 万亿美元的规模，证券交易对传统“专业经纪人”的需求也会逐渐消失。以往，当纽约股市或其他主要市场上没有买家之时，这些精挑细选的经纪人就会横空干预。在未来，世界各国也许仍然会保留自己的证券市场，但是，实力强大的纽约股市与伦敦股市很难与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或欧洲大陆及亚洲股市有所区别，上市标准将日益国际化，世界各地的证券买卖几乎都要通过光纤连接的计算机网络完成。

几乎可以肯定，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进程还会不断加速，通货膨胀（石油价格除外）很可能继续保持较低水平，市场的繁荣与衰退将会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精明、幸运的投资人可以致富，但对于大部分持股人与房产主的最好忠告是：尽最大努力挺过市场衰退的艰难时期。

全球资本市场的失衡

全球资本市场必定有其固有规则，但是，谁都不喜欢总是按照这些规则行事。中国欢迎外商投资，但是不欢迎外国投资者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转移回自己国家。不过，违反规则最严重的恰恰就是美国这个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最大经济体。世纪交替以来，美国每年消费数万亿美元的外国进口商品，带动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繁荣增长。为了满足巨额进口与国内投资的支付需要，美国充分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年复一年，借用了全世界大部分过剩储蓄。**如果资本市场的固有规则最终在美国身上发挥作用，那么，当前的全球经济繁荣就会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

当然，即使美国，也无法单独破坏规则。过去 5 年多来，尽管美国国内储蓄很少，但是经济实现持续强劲增长，而且消费水平远高于生产水平，每年消费额达到 6 000 亿 ~8 000 亿美元，这种情形的实现办法就是大量进口。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人，要想让他们超额消费，其实并不困难——不断增大预算赤字，维持低水平利率，保证银行贷款轻松获得，允许数千万业主在市值 3 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泡沫中随意变现，这些都是个中诀窍。2001 年以来，美国人每年的消费支出要比收入高出 4%~5%，美国政府支出也要高于财政收入 2%~4%。美国经济规模是中国的 5 倍，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总和还高，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中，美国下定决心通过刺激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欧洲、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当前出口需求大部分来自美国。有了美国人的参与，尽管消费能力远低于生产能力，亚洲国家、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那些石油输出国就能够保持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的持续增长，并将剩余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问题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率如此之低，拿什么支付消费支出、预算赤字及本国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要？钱就在世界市场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与各石油输出国，一直以来消费能力远低于生产能力，因而其储蓄水平远远超过本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需要。目前看来，问题的答案就是，美国一年又一年地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向人们出售政府债券及不动产，以此支付进口，并为预算赤字及国内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经营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独一无二而又弱不禁风的互利共生局面。

这种制度安排改写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系。几十年来，都是资本从富国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在那里获得快速发展与高额回报的机会最多。如今，新兴国家与石油输出国解决了全球最富国家 2/3 的资金缺口，其余部分由另一些发达国家提供。这种制度安排也在本质上改变了美国的所有权结构。到 2006 年底，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达到 15.1 万亿美元，占到美国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总值的 20%~25%。而且，外国所有权人都可以把

自己在美国的资产每年产生的利息、分红、资本盈利与房租收入汇回本国。由于美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额为 12.5 万亿美元，2.6 万亿美元差额每年产生的回报——约为 1 400 亿美元——就是美国保持庞大的外国债权人规模的年度成本。

没有哪个家庭或团体可以通过无限期地变卖自身财产，来维持消费、填补资金缺口，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正因如此，主导全球资本市场的许多外国金融巨头与中央银行，由于持有大量美国债券与美元资产，正在承担巨大风险。正如所有投资人一样，他们知道，投资多元化是一个基本常识。他们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资产已经随着美国经济低迷而被质押进去。他们也知道，一些国家面临外债急剧增长困境之时，为减轻债务负担，大肆增加货币供应，任由货币急速贬值的历史先例，比比皆是。如果美国也开始加印钞票，美元就会贬值，进而降低外国所有权人所持美国资产之于本国货币的相对价值。

如果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与债务国，不是美国，而是其他任何国家，那么，外国央行与全球投资人早就停止其巨额借款与投资行为了。但是，一般而言，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还是更愿意投资美国资产，因为作为唯一的政治、经济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好。美元仍然是全世界储备货币，因此外国央行还是愿意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以防将来发生信心危机，危及本国流通稳定。

如果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与债务国，不是美国，而是其他任何国家，那么，外国央行与全球投资人早就停止其巨额借款与投资行为了。

即便如此，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由于自愿为美国巨额流通赤字提供资金支持，每年都会付出巨大代价。相对而言，美国国债带来的收益回报已经开始变得微不足道。2006 年 3 月，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 · 萨默斯告诉印度储备银行，如果印度储备银行把过剩储备投资到相对安全的私营金融机构，产生的收益回报将会高于每年用于医疗的花费——而中国、泰国、俄罗斯，甚至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的当前过剩美元储备都要高于印度。说到

底，向美国提供财政支持的各个国家，如果能把过剩储蓄更多地投入到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哪怕只是投资到全球各大证券市场，其年度收益将会增加数千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外国援助的总和。

资金流动的不平衡不会无限期继续下去，因为发展到最后，对卷入其中的每个人而言，这都将失去经济意义。危机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出现：在某个点位，外国私人投资者抛售美元资产（2004 年，外国私人持有美元的规模已经停止增长），即使主要国家央行高价购买也无济于事；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减缓，过剩储蓄不断减少；日本及亚洲新兴经济体最终恢复国内投资，减少过剩储蓄；油价大跌，中东各国储蓄减少；抑或因为贸易赤字日趋巨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己触发危机。

即使上述危机都不会出现，全球化也已经给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埋好了陷阱。下个月，下一年，或者再晚点，一国甚至多国央行就会开始为不断缩水的美元资产担忧。一旦有人作出调整，其他人马上就会群起效法，以减少损失，全球金融市场马上就会为美国多年来的储蓄不足、消费过度付出巨大代价。如果失去每月 500 亿 ~700 亿美元的外资输入，仅靠美国自身的有限储蓄，美国根本无法满足财政赤字与企业投资的资金需要。对此，美国财政部及美国企业为了寻求投资，唯一选择就是提供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以此安抚外国投资人的焦虑不安。如果你是要借钱，高回报就变成了高利率。缓解资本危机需要大幅提高利率，而利率急剧提高又会减缓美国经济增长，也会让美国股票及债券价格一蹶不振。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危机不会到此为止。随着资本市场衰退，美国股票与债券市场行情也会大跌，于是外国投资者加入抛售队伍，恶性循环由此开始。在最坏情况下——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投资人一旦对美国证券市场丧失信心，就会不约而同地陷入集体恐慌。美国股市与美元行情将一落千丈，而美国利率将一路飙升，以吸引人们继续购买美国公债，美国经济由此陷入泥潭。由于欧洲与亚洲对美国出口锐减，全球经济增长将急剧减缓。

这绝不是凭空杜撰的荒诞情节。2004 年，类似情形已经有所显现。那时，外国私人投资者基本停止增购美国股票及债券，于是美元需求降低，全球资本市场按照他们的意愿运作：美元对欧元汇率降低，欧洲对美国出口减缓，大部分欧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业创造能力减弱，美国利率水平开始走高。中国、日本与沙特政府决定救市之后，此次危机才逐步缓解。中国和日本决定保持本国货币的较低汇率，以便依靠出口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沙特阿拉伯参与其中，是因为绝大部分石油贸易都以美元标价。三国政府进入资本市场，利用本国储备，买入了数千亿美元，很快又将它们变成美国国债。如果危机真正爆发，凭中、日、沙三国的人民币、日元、里亚尔储备，无法力挽狂澜。

事实上，由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不仅中国、日本及多数欧洲国家把自身经济发展质押给美国的消费需求，而且在政治上，美国也把自己质押给外国政府的投资决策。人人都知道，外国政府抛售美元资产，会给美国带来多大的伤害。对美国而言，这个常识已经赋予美国主要外国债权人新的政治力量。如果美国没有意识到中国减持美国资产的巨大风险，那么，针对中国普遍存在的侵犯美国软件版权与医药专利现象，或许美国政府还会向北京施压。不过，至少是在最近美日之间发生的贸易纠纷当中，这一利害关系已经清楚地影响了美国政策。事情发生在 2005 年，小布什总统给小泉首相打电话，就日本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向他施压。那天下午，日本财政大臣告诉新闻媒体，日本银行将会考虑外汇持有量的“重新平衡”。结果，第二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就悄悄收起了对牛肉进口问题的满腹牢骚。这跟半个世纪前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情形如出一辙：英法两国那时都要依靠美国购买英镑与法郎资产，以支持经济发展，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成功迫使英法两国支持以色列。今天，美国主要资本输入国使用这个法宝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影响力，极有可能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遭遇麻烦，因为随着原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及其他石油输出大国持有的美元规

模急剧膨胀。由于沙特美元持有量增多，美国借贷规模扩大，不可避免地，它对美国政策的潜在影响力将会加大。

然而，不管美元危机是否发生，当前出现的规模如此巨大的全球资本失衡很可能将会成为最后一次。由于全球资本流通增长速度超过美国财政赤字与全球储蓄增速，到 2015 年甚至更早，即使继续违反全球资本市场的规则约束，美国及其资本输入国也都将面资本匮乏的困境。10 年之内，甚至更短时间，美元的涨跌将会与其他流通货币十分相似。因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巨额财政赤字，美国人民继续过度消费，美国必将承受货币贬值之痛。由于美元贬值，美国进口商品就会涨价，通货膨胀与利率水平都会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其他力量都在压低这两项指标。由于美国高峰人口大批退休，政府支出肯定会继续加大，全球资本市场可能将会迫使美国提高国民储蓄水平，办法也许就是增加税收，虽然今天无法想象其政治可行性。至少在美国，增税不无可能，因为美国与欧洲多数国家对比强烈，税率仍然很低，税负轻微增加不会危害经济发展，也不会招致普遍反抗。

全球资本市场的强大威力，一样也使其他国家面临艰难选择。如果美国最终减少对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消费依赖，那么中国、欧洲及日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身消费，保持就业机会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在哪个国家，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中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收入快速增长。但是，要想说服亿万中国人民多消费而不是多储蓄，又得实现医疗保险与退休养老覆盖范围的极大扩展。在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人口结构的恶化，国际竞争的加强，已经导致国民收入停滞不前，说服人民扩大消费也是同样困难。由于退休养老与医疗保险体系面临的巨额财政负担，减税不可能成为政策选项。事实上，面对如此压力，有些国家很可能会被迫削减福利，而真正危机一旦爆发，甚至还要增加税收。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与日本人民未来可以支配的所剩收入甚至比现在还要少。

由于全球资本市场迫使美国减少对欧洲与日本出口商品的消费额度，欧

洲与日本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要么甘心忍受经济发展的连年停滞，要么后退几十年，废除横加在宝贵的劳动力市场之上的种种限制，彻底放松行业管制。在这些国家，上述问题终归要演变成为政治议题，其解决将取决于各国有无跨越大力进行政治改革这个鸿沟的强烈意愿。近期所有相关迹象表明，日本经济发展最为可能的结果就是，还要经历一个举步维艰的漫长时期，因为十几年来，日本都是依赖出口度过经济停滞的难关，而不是废除旨在保护千千万万“夫妻店”和中小企业的管制政策，自然也就没能重整发达国家当中效率最低的日本服务行业。最近大部分迹象表明，许多欧洲小国——瑞典、芬兰、瑞士、西班牙，也许还有其他几个国家——比那些主要国家，能够更好地执行大力改革路线。芬兰只需继续推进现行政策即可。不过，鉴于意大利面临的问题规模之大，加上国内一盘散沙的政治形势，意大利经济看起来势必走向经济衰退。德法两国定期进行小打小闹的改革，一旦遭遇企业、工会及公众舆论的强力反对，往往就会丧失改革勇气。一位才能卓越的新领导人再加上各个政党的重新整合，才能使德法两国发生真正变化——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数千万德法国民很可能还将沿着经济缓慢衰退的道路继续前行。在欧洲大国当中，只有英国最近表现出对于大力改革的宽容，尝试推行改革措施。英国政党与美国政党一样，已经展现出自我改造的现代化趋势。撒切尔的保守党与布莱尔的工党，就像里根的共和党与克林顿的民主党，面对许多国内现实问题，对一度珍视的管制政策与不合时宜的社会保障进行了改革。英国政府已经采取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对过去的国营行业与公共养老制度实行的改革，应该足以保证英国将比欧洲大陆各国更好地应付经济不振。不过，英国要想真正回归经济繁荣，就要有另一个撒切尔或者布莱尔，带领英国人更大程度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全球化，路漫漫

全球化蕴涵着巨大力量，但是在世界各国，其发展进程绝不是整齐划一的，哪个地方能够有力把握这个进程，哪个地方的发展进步就会卓尔不群。当前，市场已经或接近实现全球化，但是，世界仍然围绕主权国家运行，各国政府拥有设立市场条款的权力，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要受其影响。我们将会看到，有些时候，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能相当成功地抵制全球化核心所在的市场力量，尽管他们自己往往要为此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全球化遭遇大规模抵抗，看起来非常合理，因为全球化强化了市场力量，在全球化市场上，技能有限、能力较低的大部分工人难以获得什么好处，甚至就连一般水平的普通工人也是一样。由于人口变迁浪潮席卷全球，大部分工人同时承受着人口变迁造成的新压力，很多地方出现针对全球化的广泛抵制也就自然而然。在美国、欧洲与日本——还有韩国、泰国、巴西及墨西哥一类国家——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在汽车、电子、农业等领域，政府可能会重新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同样地，至少在一个时期之内，很可能是由美元危机引起的金融灾难将会降临，由此导致各国政府对于海外投资与资本流通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措施。服务业分片外包，导致大量工作机会流向海外，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很可能因此将对外包服务的本国公司开征新税、实施管制，哪怕他们只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贸易。

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也还包括给如此之多的国家、如此之多的人民，带来了如此之多的新增财富，以至于可以预期，至少在近期之内，全球化进程还是会平稳可靠地向前推进。20 世纪，曾经出现的情形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经济大萧条期间，强大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交汇合流，打断了上一次全球化进程的制度建设。上一次全球化进程在当今时代的历史重演，至少在今后几十年内，表现将完全不同。那些最热情的全球化捍卫者对全球化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即便如此，短期之内，全球化也无法消弭冲突与战争。

不过，美国这个无与匹敌的唯一超级强权地位的继续上升，再加上大多数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政治努力，应该可以阻止发生遍及某个大洲或者世界范围内，会把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卷入其中的大规模冲突。尽管局部经济衰退时有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出现，但是过去 60 多年来，世界上一直没有出现全球性经济萧条。全球化既可以缓和，也可以强化正常的经济衰退，结果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实际条件。而且，在全球化某种机理的作用下，导致经济衰退的力量常常会在国家之间传递。不过，当债券市场一落千丈之时，当今各国政府一般都会有充分认识，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使行情回转，或者至少帮助实体经济逐步走强。如果一个国家做好了履行这些任务的准备——令人欣慰的是，当今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全球化最终就会促使该国实体经济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健全。因此可以说，**全球化让另一个全球性大萧条离我们越来越远。**

全球化及其带来社会、经济巨大进步的核心承诺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潜伏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变数，也就是那些今后可能出现的超出全球化范畴的可怕情形，它们具有引起极度混乱的世界性效应。核武恐怖，尤其是发生在中美两国的核武恐怖，如果出现，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减少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并且在更长时间内，剥夺人们享有的政治、经济自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 2020 年的世界前景做过展望，他们警告说，“欧美城市遭受恐怖袭击，成千上万人民失去生命”，势必导致政府严厉控制“资本、商品、人员及技术流动，进而造成经济停滞”。类似地，如果沙特阿拉伯政权瓦解，特别是政权落入伊斯兰激进分子手中，世界经济必将因此长期下滑。1918~1919 年西班牙流感大爆发，使得世界贸易与国际旅行一度中断几年时间，如果全球范围内再次爆发致命瘟疫，结果也是一样。谢天谢地，这些可怕情形离我们依然遥远。而

全球化及其带来社会、经济巨大进步的核心承诺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潜伏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变数，也就是那些今后可能出现的超出全球化范畴的可怕情形，它们具有引起极度混乱的世界性效应。

且，同样不可预知的其他变数——比如，新兴廉价清洁能源技术——可以加速、深化全球化进程。**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假定未来不是绝对不可预知，那么至少在今后二三十年之内，市场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技术全球化还会继续保持各自的发展趋势，结果就是全球化的基本进程还会一路推进。**

第四章

04

中国与美国

全球化的两极

FUTURECAST

◆ 无论中国企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具备在发达国家市场的广泛竞争力，到2010年或2020年，中国已经取得的对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只能是更加牢固，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份额必定会继续提高。

◆ 中国的劳动力规模世界第一，不过中国真正的劳动力优势在于工人工资水平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其技能毫不逊色。此外，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很高，私营企业盈利的留存比例也很高，以至于总体储蓄率高达40%，这就奠定了大规模改进公共设施的财政基础，也为领导人决心保护或慢慢退出国有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中国对美国这个最大市场的大量出口也一样有赖于高额储蓄的有力支持。

◆ 中国威权政治力量强大，又在绝大多数制造业领域对外商投资和海外技术彻底开放，两相结合，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而且增长最快）的出口产品制造工厂之一。既是自觉选择，又是政治必需，印度力图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现代化，因而选择了渐进式、内在型发展道路，这是19世纪的典型发展模式。这一路线选择部分反映了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治妥协数不胜数，为避免快速现代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所有重要团体的争执不遗余力，从而减缓或阻止了经济进步。

◆ 较之中国制造业，印度的现代化知识型产业部门无法推动经济全面进步，因为他们规模太小，而且与其他经济部门没有多少联系。而在中国，未来10年，外商直接投资还会大量流入，这就使得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的优势将不断扩大。

以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力量之强、规模之大，他们将会主导未来10~15年全球化的路线走向，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也会受其影响。二三十年之内，全球化进程中将会出现东西两极，就像地球有南北两极一样。明确地说，东极就是中国：全世界最主要的制造工厂，全球资本市场上私人储蓄的最大来源，几年之后世界各地各种产品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起码10年之内，美国作为全球化西极的地位相当稳固。美国现在是，而且还将继续是，各种新产品，尤其是采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各种产品的全球最大发源地。美国也将成为与尖端技术密切相关的先进企业模式和金融服务的主要来源，这是人人参与全球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要素。美国仍然会保持世界资本市场的中心地位，也是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国家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最大买家。

全球化对这两大经济体发展道路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甚至还要大于中美两国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比如，如果未来没有什么无法预见的国际冲突严重阻碍全球贸易与国际投资，那么，国际贸易与投资将会以远高于全球生产增长的速度继续快速发展——正如过去20多年的发展情况一样。中美两国将会主导大部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事实上，2005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制造商。如果中国能够再经过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 10 年强劲增长，中国的国际制造业份额将会超越美国。乍一看，中美两国的相对关系与 1880~1900 年间英美两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在此期间，美国的全球制造业份额从不足 15% 提高到近 24%，而英国则由 23% 下降到 18.5%。但是，中国的崛起并不预示着美国的衰落。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产品市场份额的扩大主要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方面，十分引人瞩目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产品份额一直稳定不变——2003 年接近 23%，而一个世纪以前是 24% 差一点——原因是正巧赶上相当一部分产能迁往海外。另外，在高科技制造与先进服务两个方面，全球需求都在增长，而美国在这两个领域的市场份额一直都在稳步提升。

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的崛起与当今时代中国的崛起之间还有一个关键区别。19 世纪后期，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墙巍然耸立，美国的发展基本上完全依靠国内经济增长。而在今天的中国，外资企业贡献了一半以上的全球性生产能力，其中包括大部分科技含量甚高的高端产品。大多数中国本土制造商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在食品、服装、玩具及其他低附加值产品生产方面，如今中国已经成功占领其他国家的消费市场。大家普遍反映，年轻的中国经理人与 MBA 们正在快速学习在本国经营的西方公司最先进的实践经验，努力进行自我调整，以满足新一代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要求。再经过未来 10 年时间的资金投入与生产实践，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汽车、电子及机械制造行业，就可以与同样在中国或其他低工资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设厂生产的西方同行一决高下。奇瑞汽车公司已经开始生产与通用－大宇公司的产品相类似的产品，相似程度之高已经让通用这个汽车巨头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而且奇瑞汽车已经进入中东市场，售价低到只有 2 000 美元。奇瑞打算以另外几款车型进军美国市场——乔治 · 索罗斯一直都是奇瑞汽车美国分销体系的投资人——不过，奇瑞汽车能否占领美国市场，至今不得而知。不管奇瑞汽车的发展结果怎么样，到 2020 年，外国制造商要想在中

国扩大市场份额将会很不容易，在本国市场上大部分产品领域，中国本土制造商都能成功挑战外国公司。无论中国企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具备在发达国家市场的广泛竞争力，到 2010 年或 2020 年，中国已经取得的对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只能是更加牢固，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份额必定会继续提高。

虽然如此，其他领域的全球化要求将会适度减弱中国的经济优势。比如，即使对一个规模更小的简单经济体而言，中国现行金融制度都是严重过时、亟需改革的。足令中国自豪的巨额个人储蓄，大部分流入国有银行——除此之外，基本上也没有别的银行可供选择——然后又被当做贷款，迅速流入现存的经营粗放、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这些国企雇用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这种原始落后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无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大部分海外投资都是通过国外金融机构提供的转账业务进入中国。如果中国打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经济继续增长，实现进一步发展，那么这套金融制度就走不了多远。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金融体系，提供融资渠道，使庞大的私人储蓄能够成为最具发展前景的中国经济的资金来源。未来 10 年，中国应该放松对国有银行的控制，允许西方金融机构控股经营，此外几乎别无选择。不可避免地，这将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及千千万万国企员工得到的金融支持将大为减少。

未来 10 年，随着全球化继续推进，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预期将逐步提高，中国领导层很可能也要面对建立覆盖广泛的养老与医疗保障的普遍需求。

未来 10 年，随着全球化继续推进，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预期将逐步提高，中国领导层很可能也要面对建立覆盖广泛的养老与医疗保障的普遍需求。对中国领导层而言，这就意味着，要么任由社会不稳定因素继续发展（已经成为严重问题），要么抽调用于促进未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投入到新建的养老及医疗保险体系，他们

必须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更有甚者，对那些即将成为中国产品的重要市场或资源与投资主要来源的国家而言，全球化也将迫使中国更大程度地卷入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亚洲、中东及美国，尤其如此，或许这也正是对中国之外的每一个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卷入程度的不断加深，将使得相关各国领导人在处理诸如知识产权问题、中国政府偏袒本土企业等敏感事务方面，自由度与行动力第一次受到某些限制，而这将可能在中国与美国这个最重要的投资者、债务人及贸易伙伴之间造成紧张。

未来 10~15 年，全球化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经济进程。在全球化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美国一贯自诩的就业机会创造能力以及高工资水平已经开始衰减，处于经济活动中心地位的广大工人所受影响尤其明显。全球化拓展了高科技产业的潜在市场，刺激了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数以千万计的美国工人而言，新兴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不断传播，加大了新增就业机会与提高工资收入的压力。信息技术尤其适合取代那些重复性、例行性的脑力劳动——公司文秘、库存管理、银行柜员及其他各种工作——现有研究显示：过去 15 年来，在经济景气之时，这类工作需求增长缓慢，而在经济不景气时，这类岗位流失很快。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非孤例。所有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同样的缓慢变迁，给各国工人带来冲击。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大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不是思考其产生的原因，而是通过增加公共福利来缓解其消极影响。但是，即使全球化与新技术带来的压力莫名其妙地消失，大部分发达国家也会面对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幽影，使其增加公共福利的策略在 10 年之内势必难以为继。许多国家规模日趋庞大的老年人需要的养老与医疗保险成本急剧上升，而劳动力规模却又慢慢萎缩，这种情况终将证明给失业群体增加福利待遇的做法无法持续下去。

在应对这种压力方面，美国的形势会好一些，因为美国现行养老与失业福利待遇比其他发达国家低得多，而且至少就下一代人而言，人口结构也有利得多。但是，美国的经济不均衡状况会因为全球化而更趋恶化，这个问题

在美国一开始就比欧洲与日本严重。长期以来，经济不均衡本身一直没有成为美国的政治爆发点，而在欧洲却时常因此爆发冲突。过去美国选民很少会反对富人更富现象，但是 2006 年国会选举结果表明，他们也不会安然忍受工资收入年复一年地停滞不前。如果美国两大政党不能成功应对大多数国民收入增长停滞的压力——比如，大部分工人获得培训以适应新技术要求的机会少之又少；医疗服务与能源供应价格上升，企业经营成本压力加大——这种力量很可能就会催生以保障经济安全为中心的政治新议程。这些议程一旦付诸实施，采取的措施很可能包括工资保险与贸易保护，而这将最终削弱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些现有优势。

未来 10 年，美国将会面临诸多问题，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化压力的继续作用下，美国现行与工作挂勾的医疗保险制度势必会逐渐走向瓦解，直至不享受医疗保障的工人数量达到顶点，发动争取普遍医疗保障的全面政治抗争。医疗保险成本压力主要来自医疗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因为这些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越来越昂贵，更糟糕的是，步入老年、对高新医疗技术满怀渴望，甚至疯狂期待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为了实现普遍保障的目标，不管美国政治家们制定什么切实周详的计划，采取什么成本控制措施，费用都是极其高昂的；这就意味着政府肯定要不断加税，结果就是降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也要低于欧洲与日本同行，因为美国能源税率一直较低，美国企业的能源成本相对低廉。中国、印度、中欧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逐年的高速增长，都会产生拉升石油价格的压力，从而导致美国企业国内经营竞争压力不断加大。最终，美国极低的国民储蓄率，再加上由此导致的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将会造成之前提到的美元危机，这将使得一段时间内美国经济停滞不前，世界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会深受影响。

尽管面临这些问题，甚至以后不可避免地还会出现更多问题，美国依然具有强大的经济优势，足以巩固其未来 10~15 年内在发达国家当中的卓越地

位。与欧洲和日本不同，美国的劳动力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能够吸引并接受数百万外国移民。在各大发达国家当中，美国的劳动力规模一枝独秀，自身结构日益全球化，现在已经包括数百万出生于欧洲及亚洲的受过良好教育、掌握较高技能的移民。谷歌公司两大创始人之一赛吉·布林就出生于莫斯科，1979 年随父母移居美国，最终成为几千名海外出生、获得巨大成功的技术型企业家中的一员。此外，随着中国在大部分基础制造领域的优势地位不断加强，各发达经济体对本地企业创新能力及员工在高技术工厂高效工作能力的依赖程度持续提高，美国在这个领域的优势会更加突出。原因之一就是，尽管有不计其数的研究文献表明美国人的教育程度不足，但是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还是要比其他国家高一些，美国普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比欧洲与日本多出 2~3 年。

正是由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一直以来，美国工人与美国企业的平均生产回报与盈利水平都要高于欧洲和日本。凭借这种优势，美国成为吸引全球资本的巨大磁场，而且未来 10 年，仍然没有预期这一优势将会减弱的明显理由。美国贸易伙伴构成的全球化程度也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往来的密集程度远远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度占其全部海外投资的比重更大，而德国、法国、意大利及英国的跨国公司还是继续主要投资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大型企业的平均数字化程度也要高于欧洲和日本的各大公司，因此，他们的全球网络也就更为发达、更加高效。

最后，美国的政治条件也会形成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另外优势，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优势看起来是稳定可靠的。随着继任者在 2008 年大选中胜出，欧洲及大部分亚洲国家出现的对布什政府的普遍不友好情况应该会消退，美国将又可以利用唯一超级强权的独特地位，在许多国家市场上，为美国企业及其特定利益获取特殊回报。即使在就业与工资压力之下，国内政治不断左倾，美国也会继续采取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保守的政策，在管

制与税收方面，尤其如此。几乎可以肯定的经济结果就是，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更高效率。这些差异已经导致欧洲社会更趋均衡、更加慈善，而且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下去；但是，这些差异同样也会导致美国经济的相对优势会比今天更加明显。

中国：勃勃生机

就仅仅在一代人的历史跨度内，全球化如何帮助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真正迸发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来说，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最佳实例：除了需要具备庞大的人力与金融资源，显然还需要持之以恒的举国努力，实施自身变革，以适应全球化的各种要求，同时还要具备威权体制，使广大国民愿意承担转型期间带来的艰难困苦。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发展极具活力的国家，但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过去 15 年，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两倍还多（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最近 5 年的增幅就超过 55%。未来 10~15 年，中国经济规模及其全球影响力还会继续扩大。然而，到 2020 年，中国仍然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的激进战略也会带来巨大压力，制约经济进步的高度与广度。

就在 20 年前，中国还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边缘角色，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优势建立在劳动力与资本这两个基本经济要素的基础上。中国的劳动力规模世界第一，不过中国真正的劳动力优势在于工人工资水平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其技能毫不逊色。此外，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很高，私营企业盈利的留存比例也很高，以至于总体储蓄率高达 40%，这就奠定了大规模改进公共设施的财政基础，也为领导人决心保护或慢慢退出国有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中国对美国这个最大市场的大量出口也一样有赖于高额储蓄的有力支持。

对中国经济的非凡成就而言，最为重要的资本不是来自国内储蓄，而是来自世界一流的西方公司。就在二三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引进西方投资，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经验，那时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利用低薪劳工规模庞大、社会治安普遍良好、国内市场前景广阔、设备进口绝不欠账、特殊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大量实施等有利条件，成功吸引了大约 8 500 亿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资，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现代制造业领域。如今，只有美国和英国接受的海外直接投资比中国多，自 20 世纪以来，他们接受的海外投资规模不断积累，日趋庞大。单是 2002~2005 年时间，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就吸引了大约 3 330 亿美元新增海外直接投资——与美国同期吸引外资数量相当，高于德国、法国与日本的总和。20 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如今，在中国的外资制造企业所占份额与在欧盟份额已经相当，高于美国。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之一，这就是中国何以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过去 20 多年来，所有这些海外投资使得中国具备了经济发展速度超越任何其他国家的能力。除了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每年的生产总额已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几年之内，中国的 GDP 就会超过德国，根本不用等到下一个 10 年结束，日本也一样会被超过。20 年前，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会买中国工厂的产品，后来不知道从打开哪个市场开始，中国一跃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如今，位于中国的企业生产的产品行销世界各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德国，而领先于日本。以下数字足以说明问题：20 年前，中国出口额不到 350 亿美元，主要是向朝鲜和苏联出口简单产品及日用品；到 2006 年，中国产品几乎可以出口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出口总额达到 9 810 亿美元，除了前 10 位的国家，高于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总和。

类似于美国，而不同于其他各国，**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建立在其庞大的经济规

模和极快的增长速度的基础上，通过出口、资本及其吸引的海外投资传递出去。对亚洲大部分地区而言，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许多方面，经济影响力超过美国。中国有 2/3 的海外直接投资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贸易也是当地出口最重要的推动因素，进口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引进零部件，在中国完成组装。

环顾全球，**中国如今差不多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关键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在另一个半球，中国仅次于美国，已经成为欧盟、加拿大及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地除了临近的加拿大，就是中国；中国也是排名第四的美国出口目的地。

尽管贸易能力十分强大，但是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经济情况根本不同，就是与那些发展中大国相比，也是如此。中国 2006 年商品与服务产值达到 2.7 万亿美元，经济规模无疑十分庞大。但是，考虑到 13 亿人口这个因素，中国人仍然十分贫穷：按照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世界排名不在前 10 位，也不在前 50 位，而是排在第 128 位，落后于斯威士兰、萨尔瓦多和汤加。即使按照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购买力平价”，即相对于生活成本而对各国居民收入加以调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 107 位，落后于纳米比亚、伯利兹、乌克兰等国。再考虑到中国家庭微薄收入的 30% 以上用于储蓄，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更低。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只是略好于 10 年之前，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亿万人民的平均水平。也有几百万中国家庭，因为户主掌握较高技能，在沿海城市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能够过上中国版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这个比例不会高于全国人口的 1%。在广阔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像其他大国的情况一样，成为残酷无情的经济不均衡的输家。

中国的经济成功主要依赖全球化实现，这与所有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路线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日本、欧洲各国以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建设都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主要依靠自身发展，历时许许多多个十年才告完成。在

整个 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即使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额日趋庞大，但是由于经常受到高额关税壁垒的阻隔，投资只能困守本国，新兴技术也多局限于其所发源的某个行业，很难参与海外竞争。根据各国独有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行为习惯、传统规范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同特点，美国、德国、日本，甚至韩国，都是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寻找到最适合本国的工商业发展路线。经过大规模的反复试验——这是市场发挥作用的通常方式——各国逐步整合了本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与设施，包括公路网络、卫生体系与法定权利、司法执行等内容，以此帮助建立企业融资所需要的资本市场，发展产业工人形成生产力所需要的教育体系，提供整个社会有效运行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无论哪个国家，实现这些目标都花了很长时间，有的甚至长达几个世纪，因为直至找到满足本国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办法之前，谁也不知道现成答案。在上述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各国创造的发展经验与国民财富在国民经济的不同部门之间、在居民构成的不同阶层之间的传播扩散十分缓慢，因此，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伴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步崛起而完成的。

唯独中国的飞速进步不能归功于这种正常而缓慢的经济发展，而应该归功于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政治决策。在这个方面，严格说来，中国的最大优势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中国一直保持威权体制，领导层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决策能力，也能得到社会的普遍拥护，这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是难以想象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威权体制，为中国提供了大国之中绝无仅有的政治能力与社会纪律，不管现代化进程将会影响亿万百姓的正常生活，还是会产生能量强大的利益集团，中国都可以推动现代化进程一路猛进。

1978 年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化迈出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此前，中国与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痛苦争执，本身也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中走出。随着中美关系重新走向缓和，邓小平宣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放松粮价控制、

允许农民创办小型企业开始。日本研究当代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国分良成指出，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向市场机制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领导人战略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目标就是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途径就是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增强国家实力。从一开始，中国试探性地引进市场机制，根本就是一项政治决策。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遵循这个模式。最早采取的改革措施没有转向，原因就是中国农业逐步实现了从土地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进化发展的转变，或者因为由承包人组成的中产阶层正在广大穷乡僻壤萌芽、形成。这是高层决策的结果，为的是提高农村生产力，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小型乡镇企业，为国有企业提供有力补充。随着中国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约有 1 亿农民失去土地，10 年之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又转移到生产力水平更高的其他经济领域。任何其他国家此前经历的类似进程，都是通过经济正常发展的自然推动而实现的，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才告完成。

十多年后，苏联解体，一系列更加激进的政令得以发布，中国经济的核心力量发生深刻变化。为给私营企业开辟国内新兴市场，中国开始从服装、家具、玩具、家电等政治重要性较低的行业领域撤出国有资本。中国甚至采取了更具革命性的措施，向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开放这些行业，第一次允许老百姓从乡村迁移到城镇，为外资企业的劳工需求提供了大批生力军。借助上述法令的力量——以及凭着很快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美好前景，吸引西方跨国公司急切进入中国，占领一席之地——中国并不只是简单地把自己发展成为西方公司不可抵挡的巨大诱惑。根据中国的要求，最初转移到中国的西方技术只能出现在合资企业，以此掌控发展进程，从而迫使那些全世界最富有、最老练的西方公司成为中国新一代经理人与企业家的培训基地。在经济正常发展过程中，这是另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发展阶段。

如果没有当代全球化，这种战略的实施及其导致的结果都是无法想象

的。中国的巨大进步差不多全部来自美国、欧洲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资本、技术和企业经验的输入。结果就是，今日中国几乎任何现代化的先进事物，不是为外国所有，就是以外国为模板。中国经济大幅增长，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获得解放，为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及其他几个先进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器官捐赠者——主要企业的投资经营提供了劳动力配置机会；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以外国企业为榜样，兴办本土现代企业，或者改造传统中国企业。即使这样，很多中国人迄今或者栖身于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或者供职于勉强糊口的小型企业，依然过着穷困不堪的生活。

中国的经济进步，除了具有选择性、依赖其他国家的特点之外，本身还是一个政治成就。中国做出开放决定，大规模引进外资，为外企提供数以千万计的低薪工人，大胆开放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开放程度超过任何发展中大国。但是，中国承担的现实风险也十分巨大，因为中国选择的这一战略的实施，造就了高度发展的制造业，促进了许许多多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其他地区远远落后，社会、经济设施也无法跟上发展步伐。从效果上说，中国部分地区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由此造成的失衡与畸形非常严重。未来 10 年，中国领导人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畸形发展现象，那么这个问题必将危及中国的后续发展，甚至还会影响其引以为豪的经济、社会纪律约束。

中国制造业能力高达发展，经济发展因此呈现勃勃生机，**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强大的制造业经济与落后的农业经济及农业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中国的发展进步主要依靠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实现，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因素处于经济真空之中，与维持经济微妙平衡（经济学家所谓的“均势”）的其他因素之间没有强有力的天然联系。这不仅把中国制造业的勃勃生机质押在海外制造商手上，因为他们说不定哪天就会迁移到印度或孟加拉国，而且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由于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平衡，中国发展综合性国民经济变得更加困难，而这恰恰又是一个大国保

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经济体之中，随着制造业的日益发达，制造业所依赖的其他经济部门——产业工人、经理人；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其他企业；分销渠道及金融机构——也会一道发展，日趋精细，特别是可以对相互之间的需求做出及时响应。在美、德等国核心产业自然而缓慢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为制造企业加工零部件、提供配套服务的第二企业梯队，而且还有一个为所有梯队当中收入日增的工人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第三企业梯队出现。

在中国，转移而来的制造业十分发达，而其他行业却要落后几十年，使得第一梯队与其他梯队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一点也不亚于日本与纳米比亚或意大利与海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比如，中国先进的制造工厂所需的精细零部件大部分仍然来自海外，主要来源地就是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国本土企业及其工人每年都会沿着产业价值链向上攀升，但是，要想达到韩国的精细程度，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到美国和德国的程度了。

IBM 进入中国之初，就面临着这种差距造成的许多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IBM 在中国设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生产个人电脑，阿文德尔 · 萨德哈尔是合资企业的负责人。他回忆道："当我们打开第一批从中国运来的货箱时，发现整个包装箱内满是灰尘。" 由于公路运输一路颠簸，铁路交通陈腐落后，在省际长途运输过程中反复装卸，大部分货物遭受损坏；由于港口拥挤不堪，出口货品必须在潮湿恶劣的集装箱中等待数周才能上船外运。直到今天，这类问题依然困扰着在中国经营的现代化企业。例如，2000 年，太平洋自行车公司把设在墨西哥和美国的最后几条自行车生产线转移到中国，结果他们发现，新的合作伙伴根本不会使用公司的中央跟踪系统。太平洋自行车公司最终出钱买断股份，让中国合资方退出。但是直到 2005 年，他们仍然发现，从接到订单到向客户交货的间隔时间在中国需要 270 天，而在美国与墨西哥原本只要 60 天。

直到今天，很多中国本土制造企业发展水平还是明显落后。戴维 · 黑

尔是美国敏源国际有限公司的总裁，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主要业务是为美国中型制造企业寻找塑料、金属及电子产品的中国外包商。他与62家中国企业建立了业务联系，但是之前他不得不考察筛选600多家中国企业，才找到这10%可以接受任务的合格企业。“对于那90%的被考察企业，我们只能说‘没戏’，因为他们没有设备，不懂操作流程，质量控制也无法达到基本标准。”由于部分中国企业的经理和主管是凭借政治关系谋得职位，通常采用的通过经济激励提高技术水平与经营方法的做法对他们很难奏效。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现存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经营表现，而这些企业目前仍然主导着汽车、化工、钢铁等主要行业。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经营方式严重落后于时代。

另一个严重不平衡在于，大部分中国人买得起、大部分中国企业用得上的产品需求，与先进的制造业生产的产品供应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结果就是，在制造业这个中国核心产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当中，将近一半必须出口国外。因为国内市场存在畸形供需关系，中国的发展战略极易受到正常的全球商业周期的影响。过去十多年，全世界已经设法避免了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正是在此期间，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级经济体——但是经济衰退不可能无限期避免。看起来，中国好像也还没有做好未来应变的准备。著名的中国经济评论员刘逖强把源自美国的全球经济衰退看做中国政治地位上升的机遇，他说：“对我们而言，好消息就是一旦这个国家（美国）陷入麻烦，美国就没有精力跟中国过不去……这将为我国提供……‘战略机遇期’，以便我们集中全部精力促进经济发展，平稳跨过人均收入介于1 000~3 000美元之间的湍流区。”

刘先生不过是在漆黑之夜吹吹口哨，给自己壮胆而已。全球经济衰退一旦出现，中国经济增长将会遭受严重打击，因为出口与外资这两个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关键都会急剧缩减。如果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停滞，收入下降，全国人民争取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的要求达到高潮，真正问题将是刘先生提

到的“湍流区”是否会成为中国领导人的梦魇。全球经济衰退触发的任何游行示威与不同意见都可能危及中国的政治稳定，政局动荡的后果将是政治控制不断加强，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因此延缓，甚至停滞。

世界级的制造业平台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中国企业和居民既用不上也买不起，由此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缺陷：中国不得不把相当比例的巨额国内储蓄用于支持外国消费需求，以便向他们出口中国产品，对于不可或缺的美国市场，尤其如此。在这个问题上，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早已提出警告，中国的刘教授如是回应：“美国经济有赖于日本、中国及其他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它们向美国国库提供资金支持，以此保持美国的低利率水平。利率水平低，美国消费者才能积极购买进口商品。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知道，这种情形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也都知道，美国只需降低美元汇率，全球资本市场最终将会迫使美国的巨额贸易回落，改变进出口不平衡状况。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资本市场也会拉高中国流通货币的相对价值，导致中国商品在世界各地的出口竞争力减弱。对一个半数产品需要出口的国家来说，由于货币升值，出口商品在所有市场上，尤其是在最大的美国市场上，价格不断提高，这实在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外商投资将会锐减，本土企业将会倒闭，失业人数也将大幅攀升。即使没有世界经济的全面衰退，这种情况也会减弱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甚至可能影响现代化的后续进程。

中国国内消费支出疲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贸出口，这反映了中国普通家庭储蓄率奇高，而高储蓄率又反过来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独特地位，那就是大部分国民享受不到医疗与养老保障。在一个平均寿命已经超过 70 岁的社会，人人都会考虑到患病求医的不时之需，人人也难逃老迈年高的自然规律。由于无论治病还是养老，都不能指望政府帮忙，大部分中国居民只好尽力储蓄，以备需用。中国并不是缺少医疗与养老覆盖的唯一国家。但是，在这些国家当中，中国却是唯一一个现代制造工业持续发展，

而部分国民却因为贫穷及缺乏医疗与养老保障买不起工业产品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打算扩大基本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大部分国民还会继续把相当比例的收入所得作为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本国产品。而且，大部分个人储蓄都存进了国有银行，银行又把钱贷给成百上千家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因此，大幅提高基本社会福利保障范围，不仅需要从公共事业中转移数千亿美元的财政支出，进而减缓现代化进程，而且还会迫使国有企业走向困境，数以百万计的国企工人因此失业。由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贫困人口眼看着那些居住在大城市的同胞们生活日益富足，难免失望不满，再加上新近下岗的失业大军无处谋生，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将会为未来 10 年左右时间内出现广泛社会动荡埋下种子。这些事件的连锁效应十分令人担忧，中国官员偶尔也会公开提到此类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吴敬琏最近警告，由于“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拉大到危险程度，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因而出现“发生经济、社会危机的可能”。这种担忧有现实基础：“文化大革命”时期，暴力不断，社会一片混乱，大部分中国成年人，尤其是领导人，应该对此记忆犹新。

未来 10 年，缩小制造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巨大差距，将是中国的一项明智政策。不过，由于中国其他方面的经济社会制度落后，实现这个目标将是困难重重。比如，一大批雄心勃勃的中国人有意自己创业，但是没有一个现代银行体系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跨行转账极不方便，债券市场支离破碎、资金短缺，企业上市标准严苛，绝大部分资金掌握在各大国有银行手中。这就是尽管中国国民储蓄率居全球最高，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永久性的信贷困难将会继续严重制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原因所在。

中国也还缺乏其他许多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无法形成真正的全国统一市场。没有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资本也很难轻松实现省际转移，而且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由于中国部分公路线路与铁路网络严重过时、不成样子，原料、零件及成品运输周期漫长，而且常常在路上受到损坏。即

使运输途中货物安然无恙，各地大小城市往往也会阻止外地产品进入，以保护本地企业。另外，尽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年轻人离乡进城，但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这些农村青年和雄心勃勃的其他农民，所有农村人口都被农村土地承包法规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因为根据法规，不在农村居住超过一定期限，就会失去土地使用权——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土地使用权是他们养老度日的最好保障。

中国也无法通过其他严重破坏环境的发展方式保持自身发展进步。比如，由于6亿多中国居民的日常饮水遭到污染，酸雨覆盖区域至少超过1/3国土面积。据世界银行估计，即使在今天，中国每年因为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涉及卫生健康、工作时间、庄稼收成、农田土壤、基础设施等许多方面，污染损失相当于GDP的8%。与发达国家不同，净化中国环境并不是制订并实施严格的环境标准那么简单，这种直接办法在中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而且中国也已经这么做了。比如，尽管北京、上海等城市塞车严重，但是中国现行汽车排放标准与欧洲相当，比美国还要严格。但是，中国绝大部分严重污染都与现代化战略计划密切相关，污染主要来自能源利用效率很低的重工业企业以及吸引了数千万农村青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各大城市，而且中国能源消耗高度依赖储量丰富、成本低廉的有烟煤。同时，为了保证粮食自给，中国农业生产也大量使用化肥。中国环境污染严重问题的关键就是空气和水质，要想让空气和水质达到现代化标准，势必极大地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

除了中国，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面对诸多不足与缺陷，至少今后二三十年之内，仅仅能够保持微弱的经济增长就已经十分不错了。但是，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低薪劳动力规模世界第一。国民储蓄意愿超乎寻常，工业发展劲头十足，这将继续创造丰富的金融资源，以支持数以千计的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也足以保证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资金需要，并为金融重点由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小心翼翼地转移创

造条件。中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与一心一意的领导集体，使得快速实现全局性变革成为可能，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高。变革就会带来经济持续繁荣，而美好前景足以让中国人维持社会纪律，拥护政府。正是由于存在这些远景，差不多每一个跨国公司都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毅然决然、竭尽所能，到中国追逐财富。

对中国来说，未来 10~15 年将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能双双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局面。中国的制造能力还将继续发展。2004 年，全世界 75% 的玩具、58% 的服装、29% 的移动电话都是中国制造。到 2020 年，数以千万计的外国人将会开上中国制造的汽车，操作中国制造的机器，使用中国制造的电脑及电器。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将会超越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迫使他们要么在某个专门领域实现现代化，要么自甘落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将会在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回荡，最终抵达欧洲、日本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继续影响这些国家的就业增长与工资回报。

中国将要取得的上述所有成就，并不会导致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陷入贫困。未来 10 年以至更长时间，中国本土企业精密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能力还是赶不上欧美与日本企业。就在这个时期，处于经济高端、掌握高级技能的中国城市职员数量将会快速增加，由此带动国内需求持续扩大，使中国因而成为西方企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场。在高端消费品市场，中国精英阶层的消费偏好与西方富人如出一辙。《中国日报》最近对 600 名中国百万富翁做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他们最喜欢的汽车是劳斯莱斯、梅赛德斯 - 奔驰以及宝马，最喜欢的手表是卡地亚和劳力士，最喜欢的酒类品牌是芝华士与唐 · 裴利农，拍卖首选佳士得，理财钟情汇丰银行。中国现在约有 200 万 ~300 万中产家庭，每年收入达到 12 500 美元——考虑到中国的生活成本，这个水平大约相当于年收入为 35 000 美元的美国家庭。到 2020 年，达到这个标准的中国城市中产家庭数量将是 3 000 万 ~4 500 万。届时，他们将会形

成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购买能力接近今天全部日本家庭之和。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中产家庭成员一般比较年轻，消费潜力将十分巨大。再过10年，中国市场对美国和欧洲的重要程度，将丝毫不亚于今天美国市场对欧洲和中国的重要程度。

中国现行发展规划并不足以保证其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年均增长9%的长期纪录。中国通过动员国内劳工、引进海外投资，实现了经济的惊人增长，完成了巨大跨越。但是，即使在制造业领域，这一战略也没能帮助中国企业找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自有办法，而且由于现代司法与经济机制缺位，其他大部分经济部门依然落后。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即使抛开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击，也不考虑严重政治动荡导致的可能打击，这种办法几乎注定会造成经济增长趋缓。

中国领导人把经济快速增长作为维护政权合法性、争取普遍拥护的根本，而经济增长一旦停滞，这个根本就会动摇。中国发展过程中，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居民和国企工人失去生计——最关键的是，每年都有数百万年轻人达到工作年龄。最近有专家对这些数字加以研究，结果发现，未来10年，“中国需要创造3亿个就业机会，以吸纳或重新安置农村失地农民与国企下岗职工，并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工作机会”。经济强劲增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而中国现行发展规划无法保证强劲增长无限期持续下去。

美国：踌躇满志

美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另一个国家，其地位与中国一样稳固。最根本的就是，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彻底、最深入的发达经济体。然而，这一地位也反映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形成的社会态度

与行为习惯的基本结束。从 20 世纪初叶直到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美国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十分鲜明。欧洲各国经济规模太小，无法生产各自需要的所有产品，再加上他们相互毗邻，相互之间贸易往来便很容易实现，而且成本较低。而美国因为远隔大洋，与大部分市场都相距遥远，因此只能在疆域范围内发展庞大的国内市场。将近一个世纪时间内，美国基本依靠自己的自然资源与技术、人力条件生产出了企业与国民所需所要的各种产品，规模一直稳居全球各大经济体之首。例如，在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进出口总额仅占其 GDP 的 10%。同一时期，法国与意大利的外贸总额占其 GDP 的比例为 28%，而英国更是高达 42%。

美国的国际贸易参与程度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更为富足，国内消费能力更高。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人均收入高于欧洲主要国家平均水平 40%~50%，因此美国内需旺盛，足以保证大部分人获得就业机会。而大部分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富裕，他们收入较低，还要缴纳高额税收，为慷慨大方的政府福利提供财政支持，因而内需太弱，无法实现人人有工作的就业目标。因此，那时欧洲各国政府就跟现在一样，不得不依靠拓展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增加出口份额，来保障就业岗位。欧洲各国外贸依存度高于美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为了促进少数几个“战略”领域的出口能力，实施了广泛的政府管制，从而造成经济的专业化程度很高，而生产力水平较低。

欧洲，以及后来的日本（及中国），都发现美国是他们实施出口战略的积极合作伙伴。从冷战初期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把经济准入当做地缘政治的法宝，就像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一样，对那些与自己结盟反对苏联的国家，提供单边削减关税的贸易优惠。这种“门户开放”的贸易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虽然在主导政策的政治人物心目当中未必如此。贸易保护主义一直被欧洲与日本奉行了几十年，与躲在保护主义的高墙背后不同，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了品类齐全的廉价进口商品，美国企业因此得以集中力量发展欧

日企业无法企及的高端产品。

如今，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仍然只有其他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2006 年，美国进出口总额占其 GDP 的 28%，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 56% 的一半。

即便如此，美国也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与德、法、英、日等国相比，未来 10~15 年，美国的这一地位还会更加突出。这个判断与认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就是所谓的“胆小鼠辈”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一观点认为美国的对外贸易根本不行，而且正在走向衰退。这一观点根本就是大错特错，这种意见甚至在美国官员当中也有市场，他们的这种反应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前景。我们不妨看看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一个最显著、最重要的鲜明对比：2004 年，超过 44% 的美国出口商品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与相互融合，而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达到美国进口总额的 50% 以上。相形之下，欧盟 15 国虽然占了世界经济剩余部分的大头，但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 15%，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只占其进口总额的 20%。相反，欧盟接近 3/4 的出口份额进入其他欧盟国家，也有超过 2/3 的进口来自欧盟内部。

美国进出口总额占其 GDP 的比重低于欧盟，原因不仅在于偶然因素，而且在于美国企业拥有庞大的海外分支网络，可以直接在海外市场生产销售。虽然说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给美国（及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风险，但是这个结果源自美国旺盛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不去分析经济数据的评论家们担忧不已的所谓美国竞争力减退造成的。

未来 10 年，如果增长最快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展，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表现良好。除了不断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美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领域的参与程度也在持续提高。从 1995~2003 年，约有 28% 的美国直接海外投资投向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接近德国的 2 倍、法国的 3 倍、英国的 4 倍。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比例与美国相当。

几年之内，中国就将成为对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具有关键意义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差异更加明显。2003 年，中国吸收了美国全球直接海外投资的 3%，达到美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总和的 11% 以上。当然，数额不是十分巨大，但是已经超过任何欧洲国家在中国直接投资的 10~20 倍，而且美国投资额还在快速提高。即使按照全球直接投资比例衡量，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份额也是德、法、英等国企业的 2~4 倍。未来 10 年，随着中国及其他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不断发展、日趋成熟，在这些国家市场上立足最稳、地盘最大的西方公司将会占据最有利的位置，以开拓快速成长的市场，获得最大回报。

考虑到 40 年前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微弱地位，美国现在对全球化的全盘接受实在是极不寻常的成就。显然，美国各大企业已经成功适应了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能源价格出人意料地急剧飙升，美国生产力水平随之下降，于是许多经理人将目光转向亚洲与拉美地区，开辟新市场，寻求降低其他成本的有效途径。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许多此类市场快速发展，经济规模不断增长，更多的美国企业纷至沓来，他们不仅在这些国家生产成本低廉的产品，而且就在这些市场上进行销售。欧洲主要经济体及各大企业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过程，而且一开始他们就具有更为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也更加熟悉，然而，他们在这些快速增长、持续发展的市场上一直保持了很低的参与程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有许许多多种解释。美国人可以更自如地应对全球化，是因为美国的人口结构与文化传统更加多元，而且，至少在最近这些年，**面对日益增长的种族多样性，美国人通常的处理方式比欧洲人更加冷静**。除了迅速、彻底的适应全球化，美国企业的选择余地也许要小得多，因为美国的管制措施与贸易保护相对较弱，由此导致国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适应新形势，美国企业面临的障碍也少得多，因为他们无须对付法、德等国种类繁多的管制政策与法律法规，正是这些政策措施，严格限制了法、德

等国企业按照自己意愿实行重组、解聘员工的灵活性。或许，美国企业只是简单地沿着美国军事及地缘政治力量的路线发展前进。不管应该怎样才能准确地解释这个现象，反正美国经济一直都在按照某种方式发展变化，而这种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创造了真正优势，并且优势还在进一步增强。这是美国之幸，因为没有什么政府计划的实施，也没有哪个政治人物的许诺，可以阻止，甚至显著减缓全球化进程。

要想准确说出谁会从这些优势之中获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根据近几年盈利纪录判断，美国的全球性企业显然是这些优势的获益者。企业高额盈利同样惠及广大股东，股东范围涵盖了近半数美国人，这是因为养老项目及私人退休账户持有超过 40% 的美国公司股票。这些年，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水平也是大幅提升——高于欧洲及日本大多数工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很多人来说，生产力水平提升并没有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显著增加。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大量廉价商品，使大部分美国人工资收入的购买力有所增加，这多少算是一点安慰。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大量进口廉价商品，在沃尔玛等折扣率很高的商场购物，一个普通消费者每年可以节省好几百美元。另外，当前工资问题并非来自全球化本身，而是主要来自全球化带来的更加激烈的竞争压力与快速增长的医疗与能源成本之间的冲突，尽管资本回报率还在不断提高——这些问题在欧洲和日本也同样尖锐，虽然他们还没有适应全球化的要求。

其他衡量指标也一样表明，与其他大的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经济具有领先优势。保证有工作意愿的人充分就业，就是检验经济发展健康程度与活力强弱的传统标准。即使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遇到一些新问题，就业率仍然是美国的优势之一。过去 10 年，美国工人求职不得的平均比例是 5%，比英国低了大约 1/5，比德国低了 2/5，仅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半。只有日本一直保持着低于美国的失业率。美国人一旦失业，他们通常都能很快找到新的工作。过去 10 年，能在 6 个月内找到新工作的美国失业工人大约有 80%，

相形之下，瑞典的这个比例是 65%，英国是 60%，日本与爱尔兰是 50%，而德国和法国只有 1/3。美国在职工人每年工作时间也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除外）——分别比英国、意大利与爱尔兰、德国与法国多了 10%、15%、25%。工作时间短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是，**工作时间短也正是欧洲工资收入较少、人均产出较低的原因之一。**

当今时代，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言，开发、运用先进信息技术的能力，与保证就业的能力几乎一样重要。而这也是美国极具竞争力的一个领域。过去 10 年，计算机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商务活动及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除了美国，其他都是一些小国（或地区）——瑞典、芬兰、丹麦、新加坡、香港、韩国、百慕大群岛及澳大利亚——他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实现这个目标。尽管美国幅员十分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门类数以千计、行业经营千差万别，而且也没有制定促进信息技术发展、传播的国家政策，但是，到 2004 年，每百名美国居民平均拥有的计算机数量超过 76 台，使用互联网的国民比例达到 63%。没有哪一个规模庞大、门类众多的经济体能够接近美国的这些指标。日本每百人计算机拥有量接近美国，但是网民比例只有 50%；英国的网民普及率跟美国差不多，但计算机拥有量差距很大。在这两个方面，德国、法国、意大利都落后于英国和日本，与美国自然更是相去甚远。

在信息技术领域，欧洲与日本正在紧追慢赶，但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他们还是落后美国 20 年，这就意味着未来 10~15 年内，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领先优势很有可能继续扩大。美国在这方面的有利形势持续扩大，部分反映了经济学家所说的“综合性先行者优势”或者说是受益于率先开发诸多新技术。美国的研发网络、企业文化及商业环境并不具备生产全球性重要产品的最强优势——例如，日本就是全球最强大的汽车制造国——但是，美国特别擅长开发、传播新技术。美国发明家与 IT 企业早期形成的领导地位，创造了关键知识储备、业务流程规范以及重要关系网络，这些领先优势又轻易扩

展到了大多数产业部门与市场角落。于是，美国发明家与美国企业不仅能赶上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大多数首轮技术创新，而且可以在后续各代技术进步过程中一直保持领先，因为美国拥有更多的智力、文化及组织资本，能够以较低成本完成这些工作。

有些技术进展的实现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经济学家称之为“路径依赖”[①]。最早开发这些技术的美国人不见得就比英国、德国、日本或印度的同行聪明，但是，当20世纪80年代IBM公司正在物色计算机操作系统开发人员的时候，互联网尚未正式成型，该领域所有聪明的欧洲与亚洲年轻人都被隔绝在大洋彼岸。而在今天，所有的IT开发人员不管身处何方，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悉这个绝佳机会。不过，在美国的工作机会与潜在回报通常还是会多一些，因为美国IT行业规模庞大得多，而且工资税率一般也低于其他国家。为什么美国有1/3理学博士学位、3/5工学博士学位授予外国学生，为什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拥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将近一半是生于国外，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约有40%的硅谷新兴公司是由印度发明家与企业家创立，为什么来自欧洲与亚洲成千上万的年轻技术人员选择在美国工作，如上所述，美国独有的吸引力可以合理解释这些现象。几年之内，欧洲与亚洲的开发人员将会取得人人称奇的突破性成就，但是，美国在IT创新方面的综合优势地位还是将十分稳固。

美国的这种优势并不限于IT行业。社会科学家通常根据研发投入所占GDP比重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研发情况。但是，在全球创新竞赛中，更为重要的是投资周期的长短，以及研发结果的商业化程度。在这方面，美国还是表现出广泛优势。例如，2003年美国的研发支出接近3 000亿美元，而欧洲各国的总和为2 100亿美元，日本只有1 000亿美元，中国更是不到800亿美元——并且2003年各国研发投入的差距比1990年、1995年都要大。这

① 路径依赖，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编者注

正是美国发明家与美国企业在生物科技与纳米技术这些很有前途的领域拥有早期领先优势的原因之一，这些领域涵盖转基因食品（大部分欧洲国家对此持抵制态度）、个性化医疗、重度污染水过滤、先进太阳能技术等。在这些领域，美国的早期领先优势最终也可能无关紧要，因为谁也说不准哪种新兴技术一定会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与商业价值。不过，今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某项技术带来滚滚财源，那么这种情形最有可能出现在美国，因为美国年度研发投入、跟踪最近技术突破的科研院所与新兴公司数量都比其他国家多得多，而且每年还有 200 多亿美元的私人长线风险投资，随时准备投向尚未成熟的新兴技术。

如果说美国在高端技术方面的实力如此强大，那么在这些领域为什么还会出现巨额贸易赤字呢？难道真像公共评论员克莱德 · 普雷斯托维茨最近警告的那样，“美国正在拱手让出技术领先优势地位”？普雷斯托维茨与其他一些人得出结论，为了保持美国在高端技术领域的竞争力，需要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向高端技术的开发与使用提供政府支持。不过，数据显示并非美国正在丧失技术优势，而是美国的技术型企业已经彻底实现了全球化。美国高科技领域的贸易赤字，半数由美国技术型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对美出口造成，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结果更加明白。此外，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报告：过去 20 年，在高科技产品制造领域，美国企业的全球领先优势实际上获得了极大提升。不到 20 年前，欧洲、日本与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都是 25% 多一点，但是到 2003 年，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接近 40%，而欧洲下降到 18%，日本更是只剩下 10%。

研发领域发生的变化也是一样，因为欧美之外国家研发投入的增长很多都是来自当地的美国企业。例如，英特尔就在以色列、印度和俄罗斯设立了跟位于加利福尼亚一样的高级研发机构，IBM 也在瑞士、以色列、日本及中国建立了与位于纽约和圣何塞相当的研究实验室。当然，最重要的研发任务

还是由发达国家规模庞大、精细复杂的研发机构完成。西方跨国公司在几个发展中国家迅速加强研发活动——2005 年，《财富》500 强企业有 1/5 在印度开展研发活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集中于已有产品在本地及区域性市场上的适应性研发。

未来 10~15 年，美国很可能还会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而且全球化还将进一步加强这种领先优势的重要意义。例如，随着中国、印度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美国的硬件、软件及互联网公司将会在中、印两国占尽先机。2004 年，印度每百人平均只有 1 台计算机，网民比例仅为 3%，而中国每百人计算机拥有量为 4 台，国民上网比例也不过 7% 多一点。到 2020 年，中国的数字化程度与无线技术普及水平至少相当于今天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水平，而印度同样也会实现实实在在的跨越。届时，美国公司将会为他们提供最新一代技术——尽管很多产品与技术可能来自其海外分支机构——以及相伴而生的 IT 服务。

这些技术包括从供应链管理到产品开发与营销的各个领域，本身就是支持全球化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未来 10~15 年，随着各种产品全球性市场需求的继续增长，那些广泛融合、成功利用 IT 技术的制造、零售及金融服务企业，在满足这类需求方面，就会处于最佳位置。与其他发达大国的跨国公司相比，在这些方面，美国的全球性企业眼下又一次具备了自己的独到优势。

然而，美国在高端技术方面的最大优势并不在于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而在于美国人对这些技术的利用方式。与大多数人来自经济学常识的判断截然不同，美国与欧洲一连串的研究表明，一个公司乃至一个国家，在 IT 技术上投入的多少对其生产力水平几乎没有影响。过去 10 年，欧洲企业 IT 方面的相对投入与美国企业不相上下。但是，美国大量应用 IT 技术产业的生产力水平每年提高 3%~4%，而在欧洲根本就没有变化，甚至还有轻微下滑。

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企业的管理方式不同，而且看起来这种管理差异已经

导致了技术利用方式的不同。例如，美国企业的员工薪酬与职位提升更多地取决于工作绩效，这就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有力的激励，鼓励经理与工人从自己掌握的 IT 技术中追求更大的产出效益。相形之下，欧洲与日本各大公司仍然一如既往地把员工的薪酬与升职建立在工作年限与工会条例的基础上。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制度还有其他一些僵化刻板之处，导致企业难以从 IT 投入之中获得很多收益。比如，这些国家的劳工法律与社会惯例严重制约了企业用工自由，对大多数工人，企业无法解聘他们或重新安排岗位，因此，这些企业的国内生产经营重组计划时常遇到障碍，无法获得 IT 投入的效益。所以，一家法国或意大利公司可以投资开发一套最先进的会计软件或自动电话系统，但是他们最终将会发现，根本无法让现在的会计或话务员走人，哪怕是给他们重新安排岗位都不行。

企业引进新技术时，员工的教育程度也会影响他们自身的适应能力。这里有一组会让很多美国人大吃一惊的数据：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美国成年人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时间超过 12 年，而意大利成年人只有 7 年，法国不到 9 年，英国、日本及德国也都不到 10 年。完成中等教育之后，继续接受教育、培训的美国年轻人的比例也比其他国家高出很多——美国为 69%，欧洲主要国家与日本的这个比例是 45%~48%。

几年前，法国政府力图对劳工保护政策进行温和调整，但法国青年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工作稳定，由此爆发严重骚乱。尽管如此，未来 10 年，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某些差异可能还是会逐步减小。过去 15 年，欧洲青年大学入学比例急速攀升，而且这种势头还在持续，大学录取比例直追美国。欧洲与日本很多大公司，在全球市场参与程度很高，其生产力水平与任何美国企业相比都毫不逊色，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美国企业领袖一定都还记得，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积极学习索尼与丰田生产制造过程中节俭、优质的基本原则。此外，那些借助 IT 推动、经营最为成功的美国公司的最佳实践经验也在快速传播。沃尔玛是全球盈利水平最高的零售企业，信息技术密

集程度也最高。2005 年沃尔玛收购了英国第二大零售连锁企业 ASDA，而英国第一大零售企业 Tesco 随之就迅速借鉴、吸收了沃尔玛的很多经营模式。

不过，整体看来，美国跨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仍然要比欧洲及日本企业高，其经营也更为成功。例如，研究人员测算了英国各种类型工厂的生产力水平，结果发现，美国跨国企业经营的工厂的生产效率不仅要比普通英国工厂高出 40%，而且也比英国跨国企业在自己国家经营的工厂高出 10%。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跨国企业从每 1 美元 IT 投资中获得了更多收益。

事实上，过去 10 多年来，美国与欧洲及日本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距一直都在稳步扩大，在这个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形成了美国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经济优势：美国国内竞争更加激烈，因为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员工而言，美国的管制政策与保护措施都很少，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服务业，更是如此。在零售、批发、金融、商务及个人服务领域，日本与欧洲大国依然维护管制壁垒，因此，数以百万计的效率低下的小企业主导了这些国家的相关行业，他们基本没有实施任何变革的动机。而在美国经济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残酷的竞争，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急速推进、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竞争更加激烈。这也迫使那些追求繁荣昌盛的上进人士，随时准备变革，努力利用最新科技与商务实践，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以及随时追踪最先进的产品、流程及商务模式。由于美国企业及其员工习惯于应对激烈竞争的压力，未来 10~15 年，在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海外市场上，他们可以更好地武装起来，成功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为什么不是俄罗斯或印度？

未来 20 年，数十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肯定会因为全球化的推动而加速前进。1870~1970 年间，日本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取得了独一无二的非凡成就；韩国将会成为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国家，而且在几年之内韩国就会实现这个目标。波兰与捷克也会像过去 20 年的爱尔兰一样，取得巨大进步。不过，我们的焦点瞄准的是那些具有某种全球性经济影响力的国家——限于美国、欧洲主要国家、日本与中国的这样一个精心挑选的圈子。

有些分析家会为应把俄罗斯和印度归入这个圈子提出充分理由。就在不到 20 年之前，俄罗斯还是世界强权的中心，整日叫嚣埋葬西方世界，经济影响力遍及中东欧、印度及中东部分地区。未来 10~15 年，在全球政治领域，俄罗斯无疑还是一个重要力量，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提到。但是，今天，俄罗斯 GDP 仅仅高于墨西哥，而低于西班牙和巴西——人均收入落在诸如利比亚、波兰、博茨瓦纳等国之后——如今俄罗斯经济处在世界边缘地位，而且未来很多年内都可能继续维持这种地位。当然，肯定会有一些俄罗斯形势正在好转的迹象出现。过去 5 年，俄罗斯失业率一直很低，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7%；从 2006 年 7 月开始卢布也可以自由兑换。据新德里防务问题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的国际问题专家尼维迪塔 · 达斯 · 昆度预测，20 年内，俄罗斯将会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俄罗斯工资水平很低，这有助于提高其在世界各地的产品竞争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据此得出结论：至少 10 年之内，俄罗斯经济都可以健康增长——但是，必须以莫斯科决心进行重大结构改革为前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警告反映了俄罗斯经济的关键缺点，这些缺点极有可能使得俄罗斯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继续处于边缘化地位。在一个急速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不能从别国吸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快速实现巨大进步，而吸收别国经验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俄罗斯迄今一直没有创造出大量吸引外资的国内条件。比如，200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发现，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只有 15 美元，与前苏联卫星国相比，仅相当于捷克人均水平的 13%、匈牙利的 7%。

从 2002 年到现在，依然没有大的改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俄罗斯吸引外资前景分析报告的副标题就是“在困境中奋斗”。在普京政府处理尤科斯石油帝国之后，由于面对持续不止的腐败行为依然无能为力，除了采矿业，流入各个行业的资本一直很少。2000 年以来，俄罗斯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超过吸引的外资规模，很像前景暗淡的拉美国家经历的资本外逃。关于俄罗斯的发展前景，邻国的芬兰银行最近做了一个极其详细复杂的分析报告，结论是：如果没有内外资大规模的资本投入，这个昔日超级大国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会向拉美国家看齐。

俄罗斯一些规划者虽然默认外资不足带来的问题，但是他们把能源涨价看做未来本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俄罗斯经济部最近预测，如果平均每桶 75 美元的油价维持 10 年以上，将会创造足够资源，帮助实现俄罗斯基础设施现代化，大大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尤其可以促进石油行业自身的现代化程度，进而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然而，尽管俄罗斯的石油储量仅次于中东、加拿大和委内瑞拉，俄罗斯石油行业的经济前景并不被看好。与世界各地的石油企业相比，俄罗斯石油公司赚取的利润很低，因为俄罗斯政府为了补贴农民和军队，把石油价格压得很低。普京政府治下，俄罗斯石油行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石油价格人为压低与劳工成本不断高企的联合挤压之下，整个行业的资金投入很难扩大，现代化程度也无法提高。俄罗斯的新井钻探与管线铺设实质上已经停止，回收利用技术也是严重落后，所用标准钻头使用寿命只有得克萨斯石油企业同类设备的 1/5。能够带来新的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的西方各大石油公司都在回避俄罗斯，因为在这样一个极不稳定的环境中，如果贸然进入，他们只会成为主要的风险承担者，况且那些掌控俄罗斯石油矿藏的政客和寡头也不会同意他们进入。

苏联后期那些一度强大的其他行业，也因为俄罗斯投资水平低下而大伤元气。1990 年，俄罗斯还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全部苏

联加盟共和国的钢铁产量之和居世界第一），而且主要为军队供货的俄国三大钢铁联合体的生产效率也接近美国最好钢铁企业的水平。但是，随着苏联解体，钢铁需求急转直下，尽管钢铁企业的营业收入（与政府补贴）急剧减少，莫斯科还是引导三大钢铁巨头及另外 33 家效率很低、规模较小的钢厂继续惨淡经营。到 1998 年，俄罗斯钢铁行业的生产力水平直线下降到只有美国的 28%。

对未来 10~15 年俄罗斯的经济前景而言，主要行业的急剧衰落造成了十分危急的影响，因为俄罗斯需要大量的财政收入和投资支出，以应对独一无二而又非常可怕的人口问题。今天，在所有发达国家及主要发展中国家当中，俄罗斯的人口平均寿命最低，婴儿出生率最低，而人口死亡率却又最高。俄罗斯人均医疗支出竟然低于巴拿马、突尼斯这些国家，据报告，半数以上的俄罗斯儿童遭受慢性病的折磨，今天普通俄罗斯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比北部非洲及中东地区居民还要差。按目前这种趋势发展，到 2020 年，俄罗斯人口平均寿命将会低于印度和孟加拉国，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将令人警醒。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专家叶夫根尼 · 安德烈耶夫预测，由于出生率奇低，病死率很高，今后 15 年，俄罗斯工作人口数量将会减少 14%~25%。问题还不止于此：安德烈耶夫预测，同一时期俄罗斯儿童数量减少比例将达到 20%~25%。

俄罗斯的低出生率、高死亡率造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畸形现象，那就是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出现了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俄罗斯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创造财政收入的工作人口日益减少之时，政府反而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满足规模日趋庞大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需要——并且，俄罗斯是以比欧洲各国穷得多的家底来面对这个问题。未来 10~15 年，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老人退休之后，只能在令人恐怖的贫困之中惨淡度日。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并根本改善其他群体的生活境况，俄罗斯唯一可做的就是大幅提高未来工人及用工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这就需要在教育、医疗及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幅增加公共投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敦促俄罗斯实行的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所在——以及内外资企业的巨额私人投资。

今天俄罗斯教育投入占其 GDP 的比例只有 3.1%，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1/4，甚至低于印度、肯尼亚、刚果等国。俄罗斯当前的医疗支出也好不到哪里，仅占 GDP 的 5.4%，低于厄立特里亚、柬埔寨、洪都拉斯。正如俄罗斯经济部所承认的，扩大上述投入最为可靠的来源就是昂贵的石油。然而，如果俄罗斯石油部门不能尽快扭转日益恶化的行业劣势，石油也是靠不住的。在这个问题方面，前景也是一片黯淡。通过处理尤科斯石油公司问题，普京总统已经清楚表明：俄罗斯石油寡头必须服从他的路线方针，即使承担任何风险也要在所不惜。对于实施改革，提高俄罗斯石油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普京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尤其当改革意味着军队与农民必须承担高油价，或是必须放弃对西方石油企业的控制之时，更是没有改革意愿。即使长远看来，普京政府也不会实施更加艰难的改革措施，以吸引充裕的外资进入其他领域。现在以至可以预见的未来，正如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伯特 · 沃尔特最近指出的那样，**惨淡的人口结构与极低的投资水平交相作用，将会“给俄罗斯经济增长投下长长的阴影”。**

宣称印度将成长为经济强国的观点更为常见，而且西方评论家时常把中国与印度相提并论，将中、印看做全世界两个最大的新兴国家。以美元衡量，印度的 GDP 规模小于俄罗斯（或巴西），因此这些论点通常建立在其他测算手段上。购买力平价就是这样一种测算方法，这种方法考虑到不同国家生活成本的差异因素，于是印度排名大幅提高至第四位，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第二种测算标准就是考虑印度最近在某些先进领域取得的成功，最显著的就是软件开发与普通药品制造行业。在这些特定行业领域，印度具备与领导全球的欧美知识型经济体同台竞争的能力。不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尽

管印度之大无可辩驳，软件产品与常规医药行销全球，但受基础条件与发展道路所限，10~15 年内，印度无法成为全球经济强国。

印度极度贫穷，这是一个首要信号，表明印度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助推器的道路还很漫长。根据各国生活成本调整之后，印度人均收入排在全世界 118 位，落后于尼加拉瓜、亚美尼亚、厄瓜多尔、圭亚那等国，比中国人均收入低了 53%。更能说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全球经济雄心的是国际贸易额，而印度却是对外贸易额在 GDP 所占比重最小的国家之一。2000~2003 年，印度出口额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0.7%，与波兰大致相当，比中国台湾、比利时等小规模经济体低了 60%~70%，还不到中国出口总额的 15%。原因之一就是 60% 的印度人口仍然从事农业，而俄罗斯农业人口比例是 14%，即使中国农业人口比例也不到 50%。而且，不管工资多么低廉，印度几乎所有行业的生产力水平都极其低下，远远没有达到使印度成为全球贸易重要力量的水平。规模极其庞大的印度农业人口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美国农民的 1%。另有 20% 的印度人口依靠小本经营谋生——摆地摊、干裁缝等——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只有发达国家同类人员的 7%。最后 20% 的印度人口供职于制造和服务领域的大企业，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也只有美国同行的 15%。印度仍然是一个十分落后的经济体，几十年来远离全球经济影响，与中国 20 年前的情形非常相似。

那些紧盯工资水平只有中国一半、规模同样庞大的印度劳动力的饱学之士们，忽略了中、印两国现代化战略的根本差异。中国威权政治力量强大，又在绝大多数制造业领域对外商投资和海外技术彻底开放，两相结合，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而且增长最快）的出口产品制造工厂之一。既是自觉选择，又是政治必需，印度力图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现代化，因而选择了渐进式、内在型发展道路，这是 19 世纪的典型发展模式。这一路线选择部分反映了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治妥协数不胜数，为避免快速现代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所有重要团体的争执不遗余力，从而减缓或阻止了经济

进步。再往后几代人的时间里，中国或印度能否为其国民带来经济繁荣，我们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未来 10~15 年，印度选择的发展战略不可能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强国。

结果就是，印度市场对外部世界的开发程度低得多，国外技术与经验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经济增长依赖国内消费，而不是投资与出口。在大部分重工业与零售业这类关键经济领域，印度长期禁止外商直接投资。2004 年，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为 2 330 亿美元，其中，中国吸收了 606 亿美元，占 26%，而印度吸引的直接投资只有 53 亿美元，仅占 2.3%。尽管按照 GDP 排名，印度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不过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还不及波兰，仅比马来西亚多一些。况且，2004 年印度外商投资规模已经创了纪录。长远看来，印度外商直接投资额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中所占比例不会超过 2%——这个比例要比葡萄牙低 1/3，而葡萄牙的经济规模只有印度的 1/4；倒是会比越南高出 1/4，不过越南的经济规模只有印度的 1/15。

即使在那些已经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大多数外资企业也会把现代化工厂及各种组织机构设在其他国家，因为印度的基础设施破败不堪，政府管制令人窒息，这使得外资企业很难在印度次大陆获得利润。比如，100 人以上的企业要解雇员工，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印度法律还规定，8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必须由小企业生产，这些企业厂房与设备的资产总额不超过 200 000 美元——还不够买一台现代化机床。而且，许多企业即使打算建造新的厂房，也没有办法实施，因为印度 90% 以上的土地产权都存在法律纠纷。混乱不堪的土地登记制度也扼杀了印度建筑行业的发展，因为银行不会贷款给个人，让他在产权不明的土地上建造工厂、住宅或办公楼。即使外资企业在印度设厂经营，陈旧落后的国营铁路——数千万印度贫民的立命之所，年久失修的公路网络，以及同样混乱不堪的国营港口与机场，也无法保证任何出口

货物的可靠运输。

原则上，印度可以解除管制政策，改革地权登记制度，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印度政治结构断裂，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但是中央政府与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愿意及早实现这些目标，不过，这得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即使这些改革得以完成，被许多观察家看做印度实现快速进步的唯一最大障碍也不会有所改变，那就是毫无希望、陈旧不堪、供应不足的印度电力系统。2005 年，《经济学人》对印度的电力设施做过调查。调查报告指出："停电是印度的一种生活方式，至少在那些运气足够好、把停电当做临时中断的异常状态而不是正常情况的地区，确是这样……在印度很多地方，每天只能供电几个小时，根本无法保证工业需要，而且电网质量很差，浪涌电流烧坏机器设备的现象司空见惯。"

印度绝大多数发电厂与输变电站仍然为中央及地方政府所有，不过，印度落后世界其他地区半个多世纪的电力网络，并不仅仅是拜几十年来效率低下的公有制所赐。中国的电力系统也是政府垄断，但是，在电力领域，中国已经向欧美厂商开放进口以下设备：热力及清洁煤炭发电设备，燃气、水力及风力发电涡轮机，大容量抽水蓄能机组，高级核电设备，瓦斯脱硫设备，以及中高压电容器。中国也会定期出现电力短缺，但是过去 10 年中国发电量增长了 125%，现在中国发电量仅次于美国，超过印度发电量的 4 倍。一个原因就是，印度垄断的电力系统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兴趣引进现代化发电厂及相关设备。在中国建立新型发电厂的西方公司对印度一直敬而远之——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外是印度与安然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2001 年，这个时运不济的合资发电厂随着安然破产而宣告失败。大部分土地无法得到明确的权属保证，进口设备需要支付高额关税，印度法律规定要向农民及其他优惠团体提供免费电力，这种时候，西方公司怎么会投资印度电力呢？合计起来，印度大约有 40% 的电力输出不是免费送人，就是被人盗用。这种情况不仅扼杀了在电网依然没有覆盖的广大地区设厂发电的正常投资动机，而且迫使

印度工商企业为全印度大部分能源消耗埋单，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是，印度企业的能源密集程度是全世界最低的。如果不采取重要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再加上印度全国电力需求增长速度达到电力供应增速的两倍，未来 10 年，印度电力短缺及其他能源问题只会更加恶化。

印度的问题并不在于未来 10~15 年能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在于能否维持足够快的经济增长，取得必要进步，最终成为一个全面繁荣、彻底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印度显然具有经济活力，但是如果想要跟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发展步伐，印度还得认真考虑全球化的影响，继续增强经济活力。

印度的问题并不在于未来 10-15 年能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在于能否维持足够快的经济增长，取得必要进步，最终成为一个全面繁荣、彻底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

先从资本问题开始。印度近期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什么希望，因而不得不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发展经济。在这个问题上，发展前景并非简单明了。印度国内储蓄率超过 20%，虽然不及中国的一半，但是以全球标准衡量，也还相当可观。当前政府赤字所占国内储蓄的比例也很小，当然如果政府打算切实改善道路、桥梁、电网、饮水及卫生系统，这个比例将会改变——为实现经济增长，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国民储蓄与未来投资的更大问题在于，在印度家庭储蓄当中，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股票、债券、银行存款等形式的财产比例相对较低。取而代之的是，印度家庭更愿意购置土地、房产、牲畜，尤其是黄金。印度家庭财产的半数以上是金银珠宝，印度因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消费国。结果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近指出的那样：“相对于其经济规模，在印度金融系统流通的资金总量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除非这种状况发生变化，否则印度国内投资强劲增长的前景将十分渺茫，无法弥补外资流量的不足，最终形成印度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双双不足的两大消极因素，相形之下，这正是中国实现快速进步的两大积极因素。

虽然印度银行系统掌握的存款相对较少，但是银行制度要较先进，私营

贷款发放更多地关注借贷企业的真正经济前景。不过，印度储备银行[①] 特别要求国内银行发放给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必须达到 45%，这就大大减弱了印度银行的制度优势。这些法规遵从了圣雄甘地对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的尊崇，但是却也保护了效率低下的“夫妻店”，这些小企业提供了半数印度非农工作岗位——例如，服装行业 70% 的工人都是单打独斗的裁缝——大型国内企业的融资能力毫无必要地受到限制，而大企业才是能够更快速、更广泛地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依靠力量。

当然，印度也在发展变化，近几年政府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鼓励更多外资进入，减少贸易壁垒，削减企业税负，放松工业许可和流通控制。大部分成就应该归功于现任国家领导人曼莫汉 · 辛格总理，他是改革背后的总设计师，也是主要推动力。不过，与日本那位矢志改革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十分类似，辛格的改革效力受制于他所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内部的顽强抵制力量。现在供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 · 巴格沃蒂把辛格描述为一个“在特殊利益集团划定的地雷区行走”之人。就其本人来说，辛格最近满怀急切而又不无疑虑地指出：“在诸如如何获得土地、用水、电力等许许多多问题上，我们已经耗费了太多时间做出基本决策……我们认识到，在发展竞赛进程中，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跨越的大量机会。全球化也迫使我们行动起来，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

20 世纪上半叶，汽车产业极大地推动了美、英、德等国的工业发展，后来又在瑞典、日本、韩国扮演了类似角色，因而印度现代化努力的实力与弱点，从其汽车产业可见一斑。几十年来，除了那些富豪，印度老百姓买车只有两种车型选择，而且都是国有企业产品。1983 年，印度终于同意日本铃木与印度汽车制造商 Murati 成立唯一一家合资企业。传言合资企业的成立是由于印度前总理英迪拉 · 甘地之子拉吉夫的推动，他想涉足汽车行业。

① 即印度中央银行。——译者注

不管传言是真是假，反正有了铃木的现代化生产技术与工艺方法后，Murati汽车的市场占有率飞速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80%。然而，尽管合资企业大获成功，直到90年代后期，再也没有其他外国汽车企业获准进入印度。1998年，印度终于取消了汽车制造的政府许可制度。2000年之后，美国与日本许多汽车制造商在印度设立了少量生产工厂。但是，由于设备进口关税高昂，外资企业税率甚高，基础设施糟糕透顶，印度依然不在大部分全球性汽车制造商的扩展计划之内。结果，发达国家——以及中国——汽车行业特色鲜明的激烈竞争，一到印度就大为减弱。由于高达44%的进口关税把外国汽车企业的竞争排除在外，Murati仍然以超过60%的销售份额主导印度汽车市场。中国两大私营汽车制造商奇瑞与吉利，如今已经造出售价仅有2 000美元的汽车，行销海外市场，而Murati仍然只是面向印度国内市场的汽车厂商。

在丰田、克莱斯勒的引领下，一些外国汽车制造商已经把印度作为某些零部件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印度汽车零部件出口年均增长达到25%。不过，以2006年28亿美元的出口额，在全球汽车零部件出口总额中，印度所占比例依然不到1.5%，远远落后于巴西、墨西哥等其他低工资汽车零部件制造中心。与瑞典十分类似，印度各大学十分重视工程专业，欧洲、日本的一些汽车制造商最近也在印度设立了设计与工程中心。不过，在这个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行业，印度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吸引欧美国家大部分注意力的是印度经济的某个侧面，一些印度企业在知识产业领域取得了成功，而在这些领域，尤其是在软件、医药、娱乐行业，发达国家一直将其作为自己的独占领地。这些成功的知识型企业吸引了富有创造才华的年轻人才和掌握专门技能的熟练工人，规模相当庞大。对任何一个有志于实现现代的国家而言，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工人都是至为重要的资源。但是，这些人代表的只是印度年轻人的一小部分，几十年来印度忽视了其他绝大部分人的基本教育，这对经济发展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比如，根据

联合国排名，印度国民识字率在 177 个国家中排在 146 位，比刚果、卢旺达、老挝还要落后不少。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根本没有文盲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量国民无法阅读，不具备基本计算能力，那么该国实现经济全面现代化的进展只能是极其缓慢。要想让普通印度人具备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基本能力，至少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尽管每年有 250 万大学生从近 6 000 家印度高等教育机构毕业，但是大部分印度大学生的技能水平远低于欧美学生，甚至也不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学毕业生水平。最近对欧美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经理所做的一项调查指出，只有 25% 的印度工科毕业生满足他们的用人标准，符合要求的文科与理科毕业生比例更是只有 10%——印度的这两项指标都远低于中欧国家。每年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的印度青年数量高于法、德两国，基本与美国持平，不过他们的平均知识与技能水平还是低得多。

尽管如此，印度高校每年还是能够培养出 5 万 ~10 万名足以与世界各国学生媲美的大学毕业生，科学与数学专业尤为突出。他们就是印度现代化建设、软件开发、医药制造行业的宝贵财富，为这些行业提供了高技能劳动力。但是，推动整个行业具备世界竞争力的这些公司并不能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印度发展进步的强大推力，而是应该像归功于自由市场的中立判断一样，归功于他们创立之时的偶然条件，也就是说他们的成功具有路径依赖特性（研究微软公司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其市场统治地位归因于路径依赖）。

印度制药业的发展之路始于该国独特的专利制度，直到最近这个制度还是保护制药方法，而不是保护医药配方。由于西方医药企业基本上有意绕开印度市场——印度实行严格的药价控制，随时准备为国内企业仿制国外研发的药物颁发许可，这让西方公司望而生畏——以 Ranbaxy 和 Sun Pharma 为代表的几家雄心勃勃的印度公司，开始研发已经在别国获得专利的新药的替代制造流程。无视外国医药专利，直接拿来创建本国医药产业，印度并非始

作俑者。19 世纪晚期，瑞士就是这么干的，并因而得以制造阿司匹林，直到 1978 年，瑞士才引入医药产品专利制度。但是，印度是利用这个办法，创建具有世界水平医药行业的唯一发展中国家。如今，西方医药的印度版产品满足了印度 70% 的国内需求，而且有 60% 的印度医药产品出口国外，主要销往其他发展中国家。

印度制药业尽管取得了全球性成功，但对其他经济活动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就业岗位方面，印度医药企业雇员总数约为 500 000，而全国劳动力接近 4 亿。印度医药行业也没产生什么“外溢效应”——当一个行业发展出来的技术与经验被其他行业采用时，这种效果就会出现——而外溢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原因就是只有竞争才能造成外溢，而印度大部分行业都被小企业统治，这些小企业又受到严格的管制政策保护，免受竞争压力。此外，未来 10~15 年，印度大型医药企业很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2005 年 1 月，印度正式接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规则，这是美国为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设定的入世条件，长期以来印度免费搭乘欧美制药商研发便车的日子宣告结束。由于印度旧的专利制度极不鼓励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该国世界级医药厂商研发投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微乎其微。辛格政府决定最终解除医药领域管制政策，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印度大型医药企业要想继续在游戏场上玩下去，就不得不与美国和德国的医药制造商成立合资企业。

印度的软件及 IT 服务企业构成了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部门。这个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也不比医药行业多——只占印度雇员总数的 0.1%——2005 年该行业的总收入为 285 亿美元，超过 GDP 的 3.5%。除了美国与爱尔兰，印度的这个比例高于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而且，印度软件与 IT 服务出口达到了 152 亿美元的规模，占印度出口总额的 20% 还多。据麦肯锡一项最新研究结果估计，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印度软件及 IT 服务企业的年度营业收入将会接近 900 亿美元，占到 GDP 的 7.5%；每年出口额将高达 500 亿美元，其全球市场份额将达到 35%。

与制药企业十分类似，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应该部分归功于偶然事件。1986 年，正当美国软件厂商激烈争夺国内市场之时，印度做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国家规划，要求全国银行采用基于 Unix 操作平台的标准系统。这项法案引发了在该平台上设计软件的激烈竞争，几年之内，如今在新德里和班加罗尔家喻户晓的许多新程序套件——Infosys, Wipro, Softek, TCS 等——最终成为成本低廉的会计软件包，很好地运行在 Unix 这个全新平台上。1991 年，美国政府引导软件企业按照美国工资标准支付外国员工薪酬，处于萌芽阶段的印度软件业迎来了又一个大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甲骨文、微软及其他美国软件公司都预计，一旦先进的电信技术畅达全球，他们将更进一步把一些软件开发工作外包给印度公司，因为印度有数以千计的讲英语的年轻人对编程技术十分娴熟。“千年虫”问题为软件外包提供了更大动力，而且这一战略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市场成功，其中包括 Ramco 公司的马歇尔规划、来自 Infosys 的 Banco 2000 以及 TCS 开发的 EX 项目。

印度软件行业产生的外溢效应也比医药行业明显。最为显著的就是，编程岗位需求的快速增长，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印度学生选择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从而为快速发展的 IT 服务行业提供了必要劳动力。但是，印度经济活动中其他方面的现实因素阻碍了软件行业发挥潜能、帮助推动更加广泛的现代化的进程。盗版的猖獗，阻碍了初露头角的印度软件天才开发下一代 Windows 与 Norton 应用软件，就其总体分量而言，印度编程技术也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而且，在 IT 产业力量强大的其他国家，包括爱尔兰、以色列，以至美国，强大的经济冲劲并不是来自 IT 新技术的开发，而是来自 IT 技术在其他行业领域自然而然的应用与传播。印度大型工商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那些政府已经最终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大举进入的领域，这尤为明显。但是，在印度规模庞大、简单原始的农业部门，根本不见 IT 应用的踪影。另外，由于超小企业主导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加上采用新技术可能导致裁员或职位重新安排的企业行为受到劳工管制政策的

严格制约，IT 技术在零售、服装、建设及私人服务等重要行业的推广进程停滞不前。反而是美国成了印度 IT 行业外溢效应的直接受益者。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人们常说——尽管消息来源不易考证——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硅谷创业企业 40% 的创始人与顶级执行官都是印度人，而且印度以往经受的顶级程序员与软件企业家向美国（及英国）的人才流失今天还在继续。

印度另外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部门就是电影业。在西方人所谓的“宝莱坞”，电影与视频节目产量仅次于美国。许多影视产品都是在海得拉巴近郊制作完成，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影视生产联合体，占地 2 000 英亩，设有 500 多个音响室，构成了拉莫吉电影城。不管什么时候，大约都会有 20 部外国电影、40 部印度电影在那里分期制作。

今天的印度电影业很像 20 世纪 30 年代签约巨星制度正处巅峰的好莱坞，由极具英雄色彩的人物统治，1994 年的世界小姐艾西瓦娅 · 雷和恶名昭彰的坏孩子萨尔曼 · 汗（Salman Khan）就是代表人物。1997~2006 年，雷小姐出演了 36 部电影，其中包括 6 个英语角色，这个星光灿烂的女演员正在成为印度第一电影明星。近几年，她先后成为戛纳电影节第一位印度评委，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陈列纪念的第一名印度女性，赢得欧莱雅全球代言合同的第一个印度佳丽，也是获得《时代》杂志“世界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提名的唯一印度演员。汗先生则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而又同样成功的公众形象。尽管宝莱坞媒体把汗先生与雷小姐（及其他名气稍逊的女演员）相提并论，但他的英雄形象总是与触犯法律有关，其违法行为包括猎杀濒危物种印度羚（印度神话中月亮神的坐骑）；酒后超速驾驶，在孟买人行道上撞死熟睡中的三个人；传言他还与印度黑社会有染。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衡量，汗先生都是一个活跃分子，过去 10 年，他出演了 50 部电影，赢得了数千万忠实影迷。

在这样一个由欧美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行业，宝莱坞的异常成功可以归功于印度经济生活的三个因素。首先，印度 GDP 增长更加依赖传统消

费，而不是投资与出口，而且印度消费价格极低——普通电影票只卖 20 美分——国内消费需求巨大。印度每年卖出 40 亿张电影票，占到整个亚洲的 3/4。其次，印度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大多数企业家对此头疼不已，这也成为他们投资电影业的一个偶然因素，这在拉莫吉电影城表现得尤为集中。最后，与欧美国家一样，电影制作正是为那些才能卓越、雄心勃勃的风云人物量身定做的一桩生意。在印度，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十分重要，而且在占据经济结构主导地位的所有印度小企业，经营伦理规范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引领印度电影业发展的不同凡响的行业领袖是切鲁库瑞 · 拉玛 · 拉奥，他集塞缪尔 · 戈尔德温、威廉 · 伦道夫 · 赫斯特、唐纳德 · 特朗普于一身，不仅创建了拉莫吉电影城，是真正的传媒大亨，过去 30 多年，他还创立了印度报纸、电视、电影的行业标准，其商业帝国经营范围现在已经拓展到宾馆、银行、食品、广告等产业领域。

尽管印度电影业取得如此成功，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国内行业，鲜有出口，也没有多少全球影响。虽然拉莫吉的影片制作成本远比欧美电影工厂便宜，但是推动全球娱乐业发展的主要还是其他无形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影星、作家，以及对全世界流行口味莫可名状的迎合能力。与在世界范围内经营、服务于全球观众的娱乐业巨头相比，印度电影业不过偏安一隅，而且这种情形很可能还要继续保持下去。宝莱坞的年度收入还不到 20 亿美元，相形之下，时代华纳、迪斯尼、维旺迪环球等娱乐业巨擘每一家的年收入都在 300 亿 ~450 亿美元之间，美国电影每年收入也超过 500 亿美元。为拓展全球电影事业，印度女星艾西瓦娅 · 雷最终供职于维旺迪。

印度软件与制药企业的经营触角倒是遍布全球，印度在这两个行业领域的全球地位与中国制造业的地位类似。不过，中印之间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未来 10~15 年印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希望十分渺茫。较之中国制造业，印度的现代化知识型产业部门无法推动经济全面进步，因为他们规模太小，而且与其他经济部门没有多少联系。而在中国，未来 10 年，外

商直接投资还会大量流入，这就使得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的优势将不断扩大。对印度而言，软件开发与医药制造成本较低，可以保证他们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角色，但是其业务类型主要是为西方 IT 企业与医药公司提供外包服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批准在印度建设许多制药厂，向美国市场供货，而且美国批准设立的海外制药厂大多落户印度。否则，印度软件公司和制药企业就不得不与全世界最先进、研发密集度最高的西方企业直接竞争，而在未来 10~15 年内，Infosys 取代微软或甲骨文，Raxbury 压倒辉瑞或阿斯利康，都是相当渺茫的。

尽管短期内印度不会成为另一个中国，不过印度具有实现经济稳定进步的潜力。过去 4 年来，印度行政许可与产品控制的陈腐管制制度缓慢瓦解，官僚体系对创办企业的牢固控制趋于放松。电信与电力部门最近也开始实施改革，不断引进先进设备，这都有助于提高未来 10 年的生产力水平。辛格的自由主义政策所到之处，结果无不令人鼓舞。例如，几年之内，ABB、霍尼韦尔、西门子都已经在印度设厂，生产电气、电子零件及产品；LG 已经把手机生产迁到印度；德固赛、罗门哈斯也已在印度生产化工产品。10 年前，西方跨国企业在印度还没有一席之地，如今在印度市场上，他们在早餐供应与洗衣机销售领域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49%，在电视机、汽车领域的市场份额分别是 51%、27%。辛格总理及其矢志改革的同盟者可以以软件业与制药业为例，让人们理解，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府管制一旦解除，用工限制一旦放松，相关行业马上就会繁荣发展。

人口结构也是印度实现快速进步的一个有利因素。印度高峰人口现在刚刚成年，到 2020 年，将会有 2/3 印度人口处于工作年龄。就像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印度可以收获人口红利——如果印度能像中国台湾与韩国一样，保证教育投入，废除保护“夫妻店”之类小企业免受竞争压力的管制政策。印度著名经济学家杰格迪什 · 谢斯最近提出更加激进的建议：学习美国私有化模式，激励创新，实现货币与美元自由兑换，

向外商投资与外国产品完全开放市场，大力改善基础设施。不过，正如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主任马瑞 · 海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印度不能采用“恰当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制度与政策”，印度的人口结构“只会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依然把印度评为世界上限制最多的经济体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获得者阿马蒂亚 · 森最近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的路线方针，使印度结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坏方面——“没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收获成果，也没能发挥利润激励的杠杆作用，开创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局面”。如果不改变现行方针路线，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印度仍然举足轻重，但是，主要会是以中国、“亚洲四小龙”及发达国家各种产品的消费市场这样的身份出现。今天，大约有 120 万年收入达到 10 00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 50 000 美元）的印度家庭消费使用西方品牌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不断涌现的印度中产阶级。目前，大约有 4 000 万印度家庭的年收入在 4 000~10 000 美元之间——按购买力测算，相当于 20 000~50 000 美元之间——到 2010 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 6500 万，再到 2020 年，更是会达到 8 000 万 ~9 000 万美元。他们将会形成庞大的选民同盟，支持降低印度对外国产品征收的抑制性关税。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未来谈判要求，这是无法避免的——印度就将成为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全球第三大市场，而其中大部分产品都在印度之外生产。

全球化的威力异常强大，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地方，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全球化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全球化使得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进口先进产品与设备，而且能够引进先进产业技术及最新管理经验，进而生产出行销全球各大市场的各种产品。唯其如此，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大批国民第一次用上了现代技术与商业模式，进而由此摆脱贫困。对发

达国家而言，全球化使得各大企业的生产环节得以在全球布局，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具有经济合理性即可。而且，许多服务企业很快也会如此。各国政府与国民渴望得到新兴、先进的产品、流程与技术，跨国公司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发达经济体的各国居民获得了购买不计其数的廉价商品与服务的好处，而其雇主则获得了生产力提升的好处，最终实现员工收入增长，由此激励他们进取向上。

> 全球化使得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进口先进产品与设备，而且能够引进先进产业技术及最新管理经验，进而生产出行销全球各大市场的各种产品。

在所有这些发展变化当中，技术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目前仍然还是一个配角。任何一个企业的全球网络都是以先进的电信技术与信息技术为骨架，这些技术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进步最为重要的引进要素。虽然说任何人只要掌握必要技能就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托马斯 · 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著名论断具有理论可能性，但是并非使用这些技术的每个人都能创造一样的效力。首先，离开现代企业组织，这些技术就毫无用处。其次，**就全球所有国家而言，现实世界并不是平的，因为国与国之间能够真正利用全球化的能力差异如此巨大。**

> 任何一个的企业全球网络都是以先进的电信技术与信息技术为骨架，这些技术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进步最为重要的引进要素。

当今时代，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大。尽管许多国家的相对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与中国旗鼓相当，不过，中国拥抱全球化的政治决心一直很大，在彻底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大教育及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方面，尤其如此。而且，迄今为止，中国人民一直都愿意承担现代化突飞猛进的巨大社会成本。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进步，成果有目共睹。但是，对于未来 10~15 年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将要面临的障碍，一直少有人提及。

类似地，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全球化进程

中，美国一开始就具有一些特定优势，尤其表现在新技术的开发与传播以及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基本技能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更加激烈的竞争驱使下，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市场上的新机遇，美国企业能够更好、更广地加以利用。奇怪的是，尽管大多数人明显感受到美国面临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就业机会增长放缓的现实困难，可是对于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个问题，欧美媒体及美国政治议题都关注不多。

第五章 05

欧洲和日本

经济日趋衰退

FUTURECAST

◆ 日本与大部分欧洲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国家的企业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商业文化的基本导向出了问题，这种导向与全球化赋予发达经济体的角色要求不相吻合。

◆ 一个国家迅速而广泛地采用并适应别国创新成果的能力十分重要，其经济意义丝毫不亚于自身实现技术突破的能力。总而言之，全球化要求发达国家企业，必须能够采用最为先进成熟的管理方法、信息技术及互联网工具，有效建立并科学管理连通一切的全球网络。在上述大部分领域，欧洲与日本都是萎靡不振，甚至一败涂地，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 虽然德国、法国、日本全都未能成功适应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也是一样——但爱尔兰与韩国却能成功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一跃进入世界经济的最上层。无论是规模还是广度，这两个国家都不足以产生全球效应，但是，当希腊、匈牙利、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物色当今时代新的经济楷模之时，他们更可能想到的是爱尔兰与韩国，而不是那些现代经济发展很不成功的大国。

日本与欧洲三个大国的经济实力正在缓慢衰退，这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持续兴旺同样重要。在这 4 个国家（地区），一度十分强大的经济力量与社会结构迄今一直未能适应全球化的根本变化。由于一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上述发展变化自然成为世界历史演进的主要素材。

这种变化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过去英、德、法三国或单独或共同领导了工业化进程，并且统治全球商业与生产 200 多年，他们之间的国际战争以及国内政治都能引起世界反响，一如今天的美国。近至 1940 年，欧洲三强生产总量接近全球总和的 20%，与 1913 年相比仅有略微下降，略多于美国同年产量，而日本也以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军事强权与经济强国傲然于世。即使 20 年之后，美国与苏联完全统治了全球政治，德国与日本这两个战败国也还是成了战后经济恢复及进步的典范，他们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敬畏，被人们称之为“奇迹”；而战后的英、法两国也创造了社会福利保障的全球新标准。最重要的是，欧洲两代领导人经过逐步努力，使得欧洲大陆不仅仅具有地理意义。当时的欧洲共同体与后来的欧洲联盟都有不同寻常的勃勃雄心，旨在创建一套国际伦理与文明的全球新标准，力图恢复各成员国卓尔不群的

政治、经济地位。看起来，对于军事失败，日本比德国和意大利更加耿耿于怀，因而日本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致力于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尽管他们成就巨大，尽管他们期望甚高，但是过去 15 年来，日本与欧洲主要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方面，却落在了其他国家的后面。而且在政治领域，也是一样。到 2006 年，欧洲三强 GDP 之和仅占全球总额的 10%，还不到美国同年生产总值的一半；而日本面临发达国家当中最坏的经济颓势，依然还在苦苦挣扎。尤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的是，未来 10 年，无法指望其中哪一个国家突然出现好转。而且，他们也不能说，中、美两国成功发展仅仅是因为具有适应这个时代要求的独到优势。爱尔兰与韩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确立自己的立足之地——如果不考虑规模大小，都可以像中、美两国那样取得成功。

1990~2005 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法、德、英三国生产总值增长了 34%——年均增长率只有 2%——而日本经济增长率更是只有这个毫不起眼的数字的一半。而同样在这 15 年，美国经济增长了 58%，年均增长率达到 3.5%，比欧洲主要国家高了 70%，比日本更是高了 150%。日本与欧洲主要国家的人均收入介于 29 200~32 700 美元之间，而美国人均收入则达到了 42 000 美元，因此可以说美国经济情况明显好于日本与欧洲。现在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比英国人高 28%，比德国人、日本人高 36%，比法国人高 40%，而且自 1990 年以来，这个差距一直都在扩大。如果没有大的变化，到 2020 年，欧洲与日本普通百姓只能依靠大约仅有美国人一半的收入生活。

抛开对美国经济必胜信念的众口一词不说——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德国、80 年代的日本以及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英国的自我评价没有什么区别——过去 10 年，美国的经济表现显然还算不错——尽管也说不上异常卓越。相对来说，日本及许多欧洲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主要是因为它们本国经济的糟糕表现。英国的情况略好于法国，德国的情况远逊于英国，但一直还是好于日本。不过，这些国家最近的经济发展纪录不仅比不上美国，而

且也比不上它们自己前 10 年的经济表现。

要紧的并不是刚刚过去这个 10 年的糟糕表现，也不是之前那个 10 年的较好发展，而是未来 10~15 年内，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极有可能还是一样糟糕，甚至更加恶化。前后相加，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糟糕情形就会持续 30 年左右，那么到 2020 年，这些经济体势必真正陷入严重衰退。

欧洲的歧途

对于欧洲面临的经济困难，通常的解释总是先从他们的福利制度入手。例如，近 20 年来，德国、法国及意大利的失业率一直高出美国 50%~100%。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过分慷慨的失业福利，这让欧洲失业人员对于寻觅新职十分挑剔；此外，还要加上高得离谱的最低工资与工资税率，再就是雇主解雇员工面临诸多法律障碍，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招聘新人。上述所有问题的确存在，不过很可能只是这些国家更大的经济问题的一小部分。放宽视野，就会注意到，过去这 20 年，美国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来自新兴企业。如今，日本与大多数欧洲国家新企业创办比例很低——据麦肯锡研究报告，不及美国的一半——这个因素起码与保护工人的所有政策一样重要。在这些国家，并不缺乏雄心勃勃的年轻创业者。但是，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结果惯常悲叹的那样，任何人要在德国、法国或英国创办新企业，都得面对官僚主义的重重障碍；更大的困难在于寻找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而企业一旦创立，他们还不得不直面享受慷慨的政府补贴与保护的国外对手的激烈竞争。比如，麦肯锡咨询人员就发现，在法国登记一定规模的企业财产需要 200 天，而在瑞典只需 2 天。若要开工建设一个工厂，在法、德、意等国可能需要等上数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获得批准。

这个原因依然没有揭开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神秘面纱，因为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同样的障碍对于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影响并没有多少不同。况且，日本一直都不存在高失业率这个因素。事实证明，较之各国潜在劳动力当中真正有意工作以及实际参加工作的人口比例差异，高失业率——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失败的明证——没有那么重要。关于这个比例，经济学家一般称之为“劳动力参与率”，各国都有自己的计算方式。有鉴于此，为便于比较，美国劳工统计局对各国数据重新进行了统一计算。结果发现，欧洲与日本处于工作年龄的所有人口当中，能够成为劳动力的比例根本就低于美国。处于工作年龄的所有国民当中，有工作及想工作的英国人大约占63%，日本人是60%，法国人是56%，德国人是58%，而意大利人还不到50%——这与美国人66%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那些劳工保护计划导致可用劳动力资源不断枯竭，再加上事与愿违的不合理政策实际上鼓励了提前退休，欧洲人中有工作能力而实际拥有工作或想要工作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不过，更重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文化方面，因为各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差异主要来自女性人口的工作比例。参加工作或有意工作的美国妇女接近60%，英国的这一比例接近56%，而日本、法国、德国的相应比例都不超过50%，意大利更是令人吃惊地低到38%。左翼专家经常说，这是儿童公共看护服务不充分的结果；右翼专家往往指出，原因在于双职工家庭承担的税负太高；中间派则抱怨，孩子留在学校的时间太短。与德、法、英、意等国一样，所有这些因素在美国同样存在，甚至美国的情形还要严重。在经济方面，日本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妇女与男人相比，工作机会的平等程度要低于英、美两国。在这两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的妇女比例出现大幅变化，那个时候，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生产力收益少之又少，家庭收入不断缩水，因而大批家庭主妇外出工作。德、法、意、日等国普通家庭一样感受到相同的经济压力，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类似反应，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在妇女工作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差异至今仍然充分反映

在各国文化方面。

对于大部分财富是由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创造的经济体而言，公开鼓励拥有丰富经验的员工提早退休，或者默认打击妇女参加工作积极性的事实存在，都是代价沉重的错误做法。如果任由这种错误持续下去（看来可能性很大），今后几年，其对欧洲与日本经济发展的侵蚀还要加剧，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除了人力与技术资源，发达经济体几乎没有什么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

在全球化背景下，除了人力与技术资源，发达经济体几乎没有什么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同样重要的还有，在职人员实际工作的努力程度及工作成效。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主要经济体又有不同。首先，今天德国、法国、意大利及英国普通人的工作时间比过去缩短了不少，更是远低于美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工人每年平均工作 1 800 小时，折合每周工作时间为 37.5 小时（假定每年有 4 周休假时间）。与此相比，英国人的工作时间少了 8%，意大利人少了 13%，德国人和法国人大约少了 25%。这就是说，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总计不到 30 小时。而如果与每周平均工作 50 小时的韩国人相比，美国人和日本人简直就是懒鬼，因为韩国人的工作时间又比他们多出 1/3，更比法国人和德国人多出 2/3。稍后我们就会看到，这就是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从 1960 年的不足 600 美元猛增到今天的 18 000 美元的原因之一。

最关键的是，日本与许多欧洲国家（不过并非全部）国民每工作 1 小时的产出也比不上美国。这就是“生产力”衡量的指标，生产力的国别差异十分显著，而且也非常重要。日本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当中，日本人的工作时间一点也不短，失业率几乎比谁都低，选择继续工作的老龄人口比例比大部分国家都高，但是，日本上述大部分优势都被其在所有发达经济体当中最差的生产力水平（还有妇女低就业率）给抵消了。日本工人每

小时创造的产品与服务的平均产值为34.40美元，比美国工人低了40%还多。法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法国工人每小时的平均产值与美国工人相当——每小时创造的GDP价值约为49美元——但是苦于失业率奇高，工作时间较短（比利时、挪威、卢森堡等国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产值还要高，但是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很小，有自己的特殊环境，不足为训）。在劳动力参与率和工作时间两个方面，德国一点也不比法国强，最重要的是，德国人每小时创造的产值比法国低了8%。与德国和法国相比，英国人的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力参与率也较高，但是每小时人均产值比美国低了18%。

由于存在上述国别差异，这些国家国民较高的失业率与较低的工作意愿综合作用，再加上有工作的国民工作时间短，每小时创造的产值少，这就意味着如今欧洲人与日本人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美国人，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美国，实在是不足为奇。

在未来10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如果日本、德国、法国，还有情况稍好的英国，有心避免面对更为艰难的时光，他们的上策就是大力提高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鼓励更多妇女外出工作，还是说服老年人继续上班，都意味着年轻国民与技能较差的群体失业率将居高不下。而且，在这些方面，无论各国如何操作，工作人口太少、工作时间太短的问题都会因为残酷的人口结构而更加恶化。数以百万计的高峰人口进入退休年龄，劳动力规模因而不断萎缩，这个问题已经在日本出现，很快也会遍及大部分欧洲国家，而且这种情形至少还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

例如，德国与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如果能够搞清楚，1992~2006年间，为什么两国制造业生产力增长幅度比美国低了60%，他们自然就会施加影响，改变笼罩在头上的经济衰退趋势。关于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标准答案。对于许多国家生产力发展受到束缚这个问题，全球咨询企业麦肯锡公司给许多外国客户提供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管制，这些国家的小作坊生产受到特别保护。**在日本及许多欧洲国家，的确如此。由于城市采用分区制，在郊区建立工厂

或购物广场十分困难，在市区建设大型仓库也不容易；劳工管制则阻碍了零售商店夜间营业，制造工厂也因此难以安排倒班生产。针对跨国企业执行官的国际调查往往表明，在加重企业管制负担方面，法国、英国、德国（一般都是这个顺序）一直都是罪魁祸首。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东京、马赛、波恩、利物浦数以千计的家庭式杂货店、服装铺等小铺面之所以能够开业经营，主要就是因为在各种管制措施保护下，他们可以免受来自高效率的大型零售商的竞争压力。

不过，在美国各大城市，同样也有数以千计的“夫妻店”，它们大部分都是由新移民经营。与沃尔玛相比，绝大部分此类小店经营粗放，效率低下。不管怎么样，过去 15 年来，德国、法国、英国的管制制度已经定型，由此导致生产力差距不断拉大。

至于另外一些经常被人提及的原因，也难以更好地解释欧洲经济不振的全部问题。大西洋两岸的保守派通常都会把法人税当做攻击靶子，然而近几年来，欧洲的法人税率已经大幅降低，以至于美国的法人税率差不多成了全球最高的。而且，自 1990 年以来，法、德、日三国尽管经济增长缓慢，但是企业投资所占 GDP 比例都高于美国。令人沮丧的是，日本与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十分严重——而且原因很难归结——远非简单地调整税率、减少管制就能有效改变的。

对此，最佳推测如下：日本与大部分欧洲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国家的企业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商业文化的基本导向出了问题，这种导向与全球化赋予发达经济体的角色要求不相吻合。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定位十分明确：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标准化的全球贸易中各种商品的重要生产工厂，产品范围涵盖从 T 恤衫、塑料帽到汽车、计算机等各个领域。这些成就的取得，大部分都是过去 20 年来，跨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管理人员，直至最终把整个现代企业组织转移过去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出口增长令人震惊，以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只有加速推进本

国制造业的现代化进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发展变化给发达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可以面向全球消费者，在少数几个高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从而继续保持经济成功——例如，爱尔兰的对外软件开发、芬兰的手机技术以及瑞典的蜂窝电子技术与高级包装技术。大型发达经济体就会面临额外的发展障碍。在高端制造行业，他们要面对韩国、巴西等国的竞争压力；在高端服务与产品领域，他们也会遭遇成功发展的发达小国的竞争，这些大国因而不得不更大规模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否则，必然面临经济衰退。首先，这些大国的大型企业必须抓住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机遇，实现全球采购、全球营销，因此，这些国家的进口、出口及海外直接投资都要扩展到全球经济的各个角落。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企业家、科学家及出奇制胜的先行者，不得不一如既往地继续从事那些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完成的工作——始终跟踪并广泛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流程，以实现各部门、各行业的全面创新——各种产品的生产销售因而不得不采用新的融资、配送及营销方式，大小企业的组织管理也必须采用新的方式方法。**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种文化，都不能垄断创新**——例如，移动通信的技术突破就出现在北欧，现代大型生产企业组织管理的最佳实践经验则主要源自日本。不过，在当今时代，往往是一方创新，人人受惠，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托通达全球的信息技术，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任何企业都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别人创造的新事物、新方法。

在当今时代，往往是一方创新，人人受惠，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托通达全球的信息技术，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任何企业都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别人创造的新事物、新方法。

事实上，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迅速而广泛地采用并适应别国创新成果的能力十分重要，其经济意义丝毫不亚于自身实现技术突破的能力。总而言之，全球化要求发达国家企业，必须能够采用最为先进成熟的管理方法、信息技术及互联网工具，有效建立并科学管理连通一切的全球网络。在上述大部分

领域，欧洲与日本都是萎靡不振，甚至一败涂地，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先看看以下基本事实：欧洲主要经济体还没有真正实现全球化，这些国家绝大部分贸易与投资都是集中在欧洲内部以及与美国之间，而置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于不顾。2005 年，法、德、英三国外贸出口总额中，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的比例为 71%~82%，出口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仅有 14%~18%。更有甚者，法、德、英三国仅有 17%~21% 的进口贸易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这个出口大户的所有进口，而且还要加上石油进口。既不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也很少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欧洲三大国顽固地保持着这种状态，因而牺牲了全球化带来的大部分效率提升。

对于世界经济如此之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视而不见，其代价是哪个国家也负担不起的。长期以来，德国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球医药品出口市场上，德国所占份额从 17% 下降到仅有 10%，机械出口从 20% 下降到 16%，即使汽车出口，也从 18% 下降到了不足 17%。过去 5 年，德国的高科技出口有所恢复，但在其他领域都是急剧下降。1995~2003 年，英国的医药出口份额从接近 12% 下降到 9% 略多，而在计算机与通信设备领域，英国丧失的份额还要多。日本的数据更可怕，计算机出口的全球份额从 14% 下滑到仅有 8%，通信设备从近 17% 跌落到 10%。

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很好地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同样的度量指标可能就是下面这个样子：之前曾经提到，美国约有 44% 的出口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额超过进口总额的 50%——在进出口两个方面，美国的这个比例都达到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三大国的 2~3 倍。在这个问题上，日本表现很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占其出口总和的 49%，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额达到进口总额的 63%。对日本而言，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例高，主要是因为过去 10 年间，日本各大制造商把大部分产能转移到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因此他们要向遍布亚洲的各个工

厂大量出口中间产品，然后再从这些国家进口制成品。美国的全球性企业也是一样。例如，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一半来自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高度集中于亚洲，而美国的海外经营网络则要广泛得多，遍及拉美、非洲以及处于转型期的中东欧地区，另外还有亚洲。

欧洲各国为极大地忽略发展中国家——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他们以前的殖民地——付出了代价，其表现不仅在于德、法、英三国消费者无法获得许多全世界最便宜的合格产品，而且还在于，这些国家的企业无法得到廉价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同样重要的是，就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居民最终有能力购买并且渴望购买发达国家的产品之时，欧洲各国已经离开了这些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

如果考虑英、法、德三国企业海外经营地点的选择，或是与当地公司商务关系的建立，欧洲经济孤芳自赏的特性更加明显。对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海外直接投资的去向加以衡量。在这个方面，法国好像具有一种对发展中国家的病态恐惧：2004 年，法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当中，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不足 5%，其中中国占了 1%，而 94% 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向了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德国与英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广度略好一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为 8%~9%，中国占到 1%~2%——留在欧洲及美国的比例达到 85%。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由于近水楼台之便，能给德国与法国企业提供有利条件——工资水平及其他成本都低得多——相形之下，墨西哥之于美国，中国之于日本，一样也能提供这些便利，因而上述对比尤其惹人注目。

看起来，只有美国与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格局才真正具有全球性。美、日两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份额都是 27%，相当于欧洲三大国同一比例的 3~5 倍。

如果其他国家各大企业纷纷从世界上价格最低、发展最快的国家进口货物，并在那里设厂生产，进而学会在那里经营、销售，规模达到本国生产同

种产品企业的 2 倍、3 倍以至许多倍，那么这些国家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显著降低。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与美国相比，德、法、英三国经济增长何以慢了这么多，国民收入何以低了这么多，生产力水平差距为何这么大，这些国家对于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基本态度就是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在汽车制造、移动通信及节能生产这三个领域，欧洲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并不亚于美国的竞争对手。例如，欧洲一家航空公司最近就把开票及托收业务移往印度，由此节省了 4 000 万欧元经营成本，并增加了 6 400 万欧元的之前一直不付费的发货收入。但是，在推动大型经济体发展进步的数不胜数的其他领域，不管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上，还是在国内市场上，德、法、英三国企业所占份额一直都在稳步流失，不仅被美国企业挤占，而且也被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韩国、中国台湾甚至巴西的企业蚕食。因此，仅仅从 1990 年开始，欧洲制造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就从 18.5% 锐减到 14% 多一点，而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则从 21% 提高到 23%。

日本经济衰退之路

过去几十年，日本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但是，作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日本也具有截然不同、独一无二的弱点。日本的跨国贸易与投资结构表明，日本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全球化。日本的弱点在于，本国经济自外于世界大部分地区，几乎就跟印度一样心无旁骛。这种情形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日本为了把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屏蔽在外，设立了保护主义的铜墙铁壁。在这些保护政策背后，精心安排的政府补贴帮助日本国内汽车与化工行业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出口大户（但不包括同样接受补贴的航空与医药行业）。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其时，油价冲击动摇了经济发展，于是日本政府调整了补

贴、管制与保护（还有私营银行信贷扶持）的对象，把扶持重点从实力强大的出口企业转向惨淡经营的行业部门。这就是日本经济当今这种二级结构的真正发端，一方面，在少数几个领域，实力强大、不断创新的日本企业经营范围遍及全球，另一方面，数以百计的国内弱势行业受到特别保护，从食品加工、纺织制造到商业零售、金融服务，无不如此，日本经济由此出现两极分化。

同样重要的是，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几乎任何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资都还继续遭到日本法律的禁止。1980 年，权力强大的日本大藏省[①] 废除了少量禁令，不过都无关痛痒；到 1992 年，又废除了一些，还是不能引人注意。直到 1998 年，大批此类限制法规终于宣告终结，但是其所导致的后果已经十分严重：近 10 年之后，日本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占其 GDP 的比例分别只是美国、德国、英国的 1/7、1/20、1/30。直到现在，日本在这个方面还是严重失衡，外资企业在日本经济中所占比重仅相当于土耳其的 1/5（由于在日本直接经营面临重重障碍，外国人只好购买日本公司股票，外资持股比例达到 22%）。

而且，很多重要限制依然存在。例如，外国公司对日本企业的大部分并购行为仍然被日本法律所禁止。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在任何其他国家，半数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都是通过企业并购实现的。比如，在新开辟的海外市场上，美国沃尔玛和日本三菱的典型做法都是收购当地企业，按照自己的模式对其进行改造，从而实现发展壮大。但是，日本法律仍然能够有效禁止外国公司通过所持股票收购日本企业，如此以来，恶意收购固然没有可能，而外国企业不使用所持股票的善意投标照样也会被董事会拒绝，日本各大公司董事会之间的“交叉持股”或互兼董事现象十分普遍。企业集团各个公司之间相互持股，以阻止外人进入，这是日本企业十分常见的实践模式。因此，

① 即日本的财政部。——译者注

即使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和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大量企业廉价出售，发生在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跨国兼并也仅占全球总数的 2%。

已经设法进入日本市场的外资企业经营情况良好，这对其他公司是一个极大鼓励。例如，外国制造商在日本分支企业的生产力水平高出日本同行 60%，而在服务行业，这种差距更是达到 80%。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在法国和美国，一般外国公司分支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法国和美国的本土企业不相上下。因此，日本出现的这种差距应该会为外国企业带来极大优势，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与其竞争的效率低下的日本本土企业享受着巨额补贴和管制保护。所以，在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大部分法律限制解除之前，2005 年（有数据可考的最近年份）流入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跌落到了 1996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欧洲一样，日本这种拒绝接受全球经济现实的方式极具破坏性。德、法、英三国是把自身局限于相对增长缓慢的市场，以及劳工与原料成本高昂的其他发达国家；而日本则是割断了本土企业与全球各个行业领域领头企业的联系。凭借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美国企业，甚至整个美国经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然而，日本却大量错失这些创新成果带来的宝贵机会。成千上万家效率低下的小企业享受着巨额补贴，又没有来自其他先进国家企业的竞争压力，两相作用之下，日本企业开发自有技术与实践模式或者采用外国技术及经验的内在需要荡然无存。结果就是，日本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生产效率最低的发达经济体。而且，尽管日本也有全球性投资与贸易布局，但是，1990 年以来，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从 19% 下降到 13%，萎缩幅度甚至超过欧洲国家。

在这种趋势之下，也有几家日本公司还是能够逆流而上，尤其是那些不得不应对外国竞争压力的出口企业。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丰田公司，丰田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随时准备取代通用，成为全球第一（2006 年 2 月，就在通用关闭位于新泽西州林登市汽车工厂的同一天，丰田

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开了一家新厂。当时通用主席里克·瓦格纳强调："我们已经领先了73年，我们仍有可能再领先73年。"他要么是虚与委蛇，要么就是孤陋寡闻）。欧洲三大国一样不乏例外，各自都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著名企业——比如，能源巨头就有德国的意昂、法国的道达尔、英国的英国石油；保险业领袖有德国的安联、法国的安盛；电器制造巨擘有德国的西门子；零售业巨人有法国的家乐福；金融服务王牌有英国的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在这些业绩辉煌的公司背后，上述国家的绝大多数企业面临严峻挑战，他们很难采用并适应创新成果，**而创新恰恰是全球化对所有企业的现实要求。**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哪个国家为创新投入的相关资源最多。自从1990年以来，日本研发投入所占GDP比例高于美国，而美国又高于欧洲三国，差距主要来自国防领域的研发投入。

关于美国生产力收益的研究结果为追踪研发投入的实际去向提供了最佳线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部分对此有所思考的美国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已经形成共识。首先，这与信息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出人意料的是，从信息技术中获益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投入多少，而是取决于如何使用这些技术。

这就是欧洲与日本要为管制政策与政府补贴付出沉重代价的关键所在。对基础农业与核心产业的所有补贴可以保证他们获得合理回报，然而，分区管制与价格控制只会阻碍形成新的竞争。因此，尽管法、德、英三国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一点也不比美国（及瑞典）公司少，然而各种补贴与管制保护使得他们面临的市场压力大大减弱，而在美国，正是市场压力迫使各企业不断改变经营方式，从而保证技术投资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跟美国同行一样，欧洲与日本企业经理人同样明白应该实施何种变革——如果他们不明白，随时都有大批国际咨询顾问准备向他们建言献策。但是，对绝大部分人而言，企业为适应新技术而进行的变革总是困难重重、

令人不快的——部门、岗位、产品、流程，要么裁撤，要么重组；掌握新技能的人才不断引进；不会使用新工具的员工被迫走人。在补贴与管制的卵翼之下，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从事着自己熟悉的工作，因此，他们自然不愿意承受实施艰难变革带来的麻烦与痛苦。

如果说以上例子还不够，不妨再看看德、法两国企业。有些时候，为了适应市场要求，他们也想实施变革，但是马上就会发现变革计划违反法律：在这两个国家，除了那些规模最小的雇主，任何企业都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解雇员工，为了更好地利用新技术而实施的企业重组根本就不是合法理由。银行打算新上一套账目控制系统，零售企业计划安装自动话务系统，他们当然可以按计划实施，但是，企业不能让原来人工操作这些业务的员工走人，很多情况下，甚至连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都不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所做的分析结论，除了汽车与机械行业，德国经济几乎就没有从新兴信息技术当中获得什么好处。

在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由于存在各种管制与补贴，再加上薪资税率很高，创办新企业十分困难，因而抑制了生产力发展。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因为在既有知名企业主导市场的情况下，新企业要想引人注意，自然更倾向于采用新技术，更愿意采取新的商业模式。新企业经营成功之时，就会给原有企业带来压力，迫使他们要么效法新企业，要么另外开辟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传统书店受到管制保护与政府补贴，网上书店亚马逊（Amazon.com）将难以占领市场，巴诺[①]迄今也将仍然只是一家传统书店而已。

在适应新的生产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要求方面，法国、德国、英国与日本工人面临更多更难。一个尚未获得普遍公认的原因就是，日本与欧洲工人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美国工人。日本与欧洲三大国年度教育投入所占 GDP 比例低于美国 15%~25%，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家庭的私人教

① 美国目前最大的连锁书店。——译者注

育支出更高，主要表现为供给孩子念完大学；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人与日本人的上学年限低于美国人。研究结果充分表明，对于新的生产技术与工作方式，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灵活性更高、适应力更强。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世界银行报告，德国与日本现有 25 岁以上人口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时间不到 10 年，英国人的这个数字是 9 年多一点，而法国人只有 8 年多。这些国家的国民受教育程度都严重落后于美国，美国 25 岁以上人口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时间为 12 年，比德国与日本高出 20%，比英国高出 1/3，更是惊人地高于法国 50%。在这个方面，接近美国水平的国家只有瑞典和韩国。而且，这种差距还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而高校毕业生大概算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新技术应用群体。法、德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比例为 23%~24%，英国是 28%——对比鲜明的是，有 38% 的美国成年人大学毕业。在这个指标上，只有日本以 37% 的比例，与美国接近。

根据上述报告，在数学、自然科学与阅读的标准化测试中，美国学生得分低于其他许多国家学生。事实上，与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学生相比，美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的各科成绩都不错。除英国之外，美国高中生的阅读能力得分高于七国集团其他国家学生。然而，结果也表明，美国学生的数学与自然科学水平落后于许多国家学生，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表现明显。在 15、16 岁的学生组，七国集团当中，有 3 个国家学生的数学成绩、4 个国家学生的自然科学成绩超过美国学生。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美国 15、16 岁少年当中在校学生的比例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就把其他国家许多成绩较差的孩子排除在样本之外。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距离遥远、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竞争压力急剧加大，对大多数人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竞争能力就越强，生产力水平也就越高。跟任何人一样，欧洲人与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但是，正如补贴和管制使得许许多多欧洲及日本企业与世隔绝一样，在这些国家为工人精心设计的正式、非正式的保护政策遮蔽之下，工人们很难感受到未来

道路越走越窄的残酷现实压力。

欧洲与日本的前途

与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一样，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各个发达经济体当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多半是由那个时代规定的。为应对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他们选择提高利率，勇敢面对随之而来的经济严重下滑。为应对恼人的油价冲击，他们降低汽车油耗，调高燃油税率，以此改进能源利用效率。为应对生产力水平的意外下滑，他们削减营业税，促进投资增长。为此，广大选民怨声载道，政治领袖纷纷落马。但是，通过这些努力，各主要国家基本控制了本国经济发展进程，成功实现了自我调整，而没有造成社会运行的严重混乱。

今天的全球化更难对付，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这一次更不容易主宰自己的经济命运。历史机遇转瞬即逝，他们早已错过了自我调整的最佳机会，以至于未来 10 年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的可能选择相当有限。而且，要想成功适应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这些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需要进行非同寻常的巨大变革。

但是这种变革不大可能发生，因而欧洲各大经济体的发展前景相当黯淡。先看基本问题，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改变，那么他们只会更加将自己局限于在全世界增长最慢的市场上进行买卖，既包括欧洲市场，也包括美国市场。由于存在诸多国内问题，欧洲国家改变投资习惯的代价十分高昂。美国每 1 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在国内产生 1.14 美元的收益，收益主要来自业务外包的成本节省，以及下岗工人再就业获得的新岗位。但是，法、德两国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很弱，每 1 欧元的海外投资分别只能给法、德两个经济体带来 0.86

欧元和 0.74 欧元的收益。另外，在中国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佳投资机会已经被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最有远见的少数欧洲企业抢走，大部分欧洲国家面对的只能是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

欧洲制造业工人的发展前景看起来更为严酷，他们的前途取决于对美国的产品出口。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德、法、英三国制造企业的产品结构与美国企业雷同，而美国同行的全球化程度更高。因此，他们的美国竞争对手吸引了更多成本低廉的海外劳工、原料、产品，并且集中了世界各地最好的思想创意与科学技术。欧洲制造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不断萎缩，已经有些年头。未来 10 年，不仅是在各国企业激烈竞争的第三方市场上，就是在无比庞大的美国市场上，甚至最终在欧洲本土市场上，欧洲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很可能还会继续下滑。

再看看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提出的各种要求——**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并且能够采纳、适应其他国家的创新成果**——未来 10 年，如果日本与欧洲三大国不能认真解决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发展势必异常艰难。棘手的是，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废除大批保护工人的政策，而在经济增长连年放缓的时期，工人对于这些政策的依附程度越发提高。类似地，若要帮助欧洲企业创造大量新增工作岗位——唯有这样，因企业重组而下岗的那些人员才可能继续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意味着必须降低最低工资标准，也许还要降低薪资税率，而且肯定还得降低失业福利水平。当前，大部分欧洲工人的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各国政府财政收入入不敷出，上述变革在这种时候实施将愈加困难。

尼古拉斯 · 萨科齐最近当选为法国总统，他属于保守的改革派，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当选是未来几年能给法国带来经济景气的最能鼓舞人心的消息。萨科齐远非赞同英美那种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自由主义者。几年前，法国电力与铁路巨头阿尔斯通公司陷入困境，在领导对该公司的政府救助时，时任预算部长的萨科齐反对印度钢铁企业收购阿尔斯通。竞选总

统期间，萨科齐时常呼吁“经济爱国主义”，坚持主张对重要行业的政府支持。然而，自从 2007 年 5 月上任以来，萨科齐表现出了真正突破过去主张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大力精简官僚机构的烦琐程序，大张旗鼓地改革退休养老制度，激励国民延长工作时间，改革最低工资标准，实行税收改革，紧急修正制约解雇工人的保护性法律法规。

对许多法国工人来说，萨科齐的改革计划难免粗暴，但是，面对全球化的现实要求，这些改革可以改善法国经济。然而，迄今为止的结果说明，总统的承诺已经超出了其政治能力范围。过去，在短期之内，萨科齐已经成功削减了税率最高的所得税与遗产税。萨科齐还提出了削减薪资税以刺激新增就业机会、利用抵押贷款利息抵扣税负以鼓励住宅建设的计划，这些计划涉及范围更广、重要程度更高，但是这些计划目前根本就没有启动。通过减免超时工作税收，以有效延长 35 小时工作周的计划也是陷入停顿。而且，与实力强大的法国工会实现联合的初期努力——宏伟计划包括：削减某些政府退休金，提高退休年龄，放缓现在每小时 12 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未来增长速度，降低雇主解雇工人的难度——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形也许会有变化，不过最近的结果已经说明，正如小泉纯一郎领导下的日本，法国更欢迎的只是一个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改革进程。

看起来，萨科齐提出的削减薪资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投资的计划大大超出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接受能力——高峰人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薪资税资助的医疗与养老支出急剧攀升，而承担税负的工作人口又开始不断缩减，在这种时候，减税计划尤其难以实施。不幸的是，欧洲国家针对全球化的自我调整拖延得如此之久，以至于现在又得叠加因为人口变迁而必须进行调整的额外压力。即使德、法、意、日各国经济发展已经很好地切合了全球化的要求，在这些国家，惨淡的人口结构也会形成”二战”以来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最大压力。

对于若隐若现的养老成本问题，欧洲各国政府已经研究了 30 年。而早

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英国就开始了养老改革。事实上，撒切尔的改革措施对养老福利的削减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如今高达 20% 的退休老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果不实行反向改革，提高政府养老标准——这种改革可能性不断提高——到 2020 年，就会有近 1/3 的英国退休老人陷入贫困。法国和德国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养老制度依然十分慷慨，以至于今后 15 年内势必难以为继。2003 年，法国遭受了改革之痛。当时计划实施的改革措施十分温和，即使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到 2020 年养老支出的财政缺口仍然不低于法国 GDP 的 4%。哪怕是这样的改革，也还是在上百个城市引发了 200 万人的公众抗议。萨科齐计划稳步提高 60 岁的现行退休年龄标准，废止允许特定职业与国企员工提前退休的特别规定，这已经招致工会的强力反击，而工会的支持是实施改革计划所不可或缺的。2001 年，德国也启动了部分养老制度改革措施，据最新估算，改革的结果是，从现在开始，每三年时间，养老成本增加额就相当于 GDP 的 1%。

未来 10 年，欧洲改革家面临的两难困境就是，全球化压低了各国生产力收益，同时由于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化要求，这些国家的竞争力不断减弱，这就会反过来缓慢但必然地降低国民生活水平。由于欧洲国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还会逐渐降低，人们只能更加依赖与众不同的解聘保护、慷慨大方的失业福利、高标准的最低工资，这也正是欧洲之为欧洲的特色所在。而且，在德、法、英、日各国广阔的服务业领域，行动迟缓的国内主流企业则也只能紧紧依附于政府补贴与管制保护。

人们期望欧盟创建一个美国那样庞大、稳定的单一市场，以此缓解上述困境。在这个单一市场中，没有关税，没有配额，所有商品通行无阻；跨国资本不受管制，自由流通；各国居民不受限制，自由迁徙。欧盟的困局在于各成员国并不想要这样一个自由市场联合体。比如，2000 年欧盟成员国采纳了“里斯本战略”，旨在把欧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最有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体”。7 年之后，这些建议几乎无一落实。针对 4 项主要产业

研发投入占了欧洲研发投入总和 2/3 的现状，“里斯本战略”号召加大其他产业的研发投入，然而至今这没有什么变化。该战略还敦促实施专利制度改革，以降低其成本，呼吁实现欧洲国营电信与电力企业的全面私有化，敦促成员国终止对无比庞大的“欧洲冠军企业”的政府补贴，以鼓励开创新企业，结果都没有什么实质变化。最后，“里斯本战略”号召降低税收，许多国家的法人税倒是已经调低，然而总体税负却根本没有下降。

就欧盟的各项宣言来看，核心成员国家好像更倾向于类似“欧洲堡垒”的战略——建设一个抵制全球化压力的欧盟——而不是向世界经济开放门户。因此，德国就会“以公平为名”要求欧盟 10 个新成员把税率提高到德国水平，比利时实际上也要求波兰政府继续加税。出于同样的原因，瑞典也被要求提高农业补贴，捷克也不得不采取更加苛刻的劳工市场管制政策。最近，法、德两国已经停止消除欧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服务贸易壁垒的行动，这仍然是出于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他们担心成本低廉的东欧企业挤垮受到精心保护而又效率低下的本国企业。

很难不让人怀疑欧盟已经不再自信——主要基于 2006 年法国与荷兰否决了欧盟宪法这一事实，尽管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没有否决欧盟宪法。英国、波兰、法国、瑞典及荷兰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政治力量不断上升，而且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政府都已经采取步骤，禁止其他欧盟国家企业接管本国企业。法国是欧盟的诞生地，然而 2007 年总统竞选期间，对于欧盟的那种“你别踩着我”的态度反而成为罕有的政治共识。社会党候选人塞格琳 · 罗雅尔许诺制定新的产业政策，签署“社会条约”，以加强对在欧盟各国工作的法国工人的保护，同时呼吁高筑欧洲各国的关税壁垒；而萨科齐则抱怨欧元损害了法国竞争力，并且声言要求欧洲中央银行保持中立。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外，欧盟最近还要面对接纳中东欧国家加入而引起的爆炸性社会压力。欧盟东扩，不仅使得德、法、意等国面向数以百万计的低薪工人开放劳工市场，而且导致穆斯林移民越来越多，由此即使在最有包容性的欧洲国家也引发了

丑恶的排外反应，事态发展最终将导致欧盟内部国家之间恢复边界限制。

最新预测指出，至少未来 10 年之内，加入欧盟将无助于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2010~2020 年，法国预期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 1.5%——一个惨不忍睹的数字——德国的前景也好不到哪里。德国一家著名智库的研究结果更为悲观，他们预计德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 1%。德意志银行的专家观点要乐观一些，他们预测，如果能够进行像样的一系列改革，德国与法国每年经济增长分别可以达到 1.9% 和 2.3%。不过，银行专家也警告，如果不进行改革，不引进大批移民，未来 10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就会跌落到只有 0.5%，这将埋下社会炸弹。在所有这些惨淡愁云笼罩之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让 - 菲利普 · 科蒂斯给出了典型的欧式安慰："说到底……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远比粗鄙的人均 GDP 统计数字来得珍贵。"

英国的经济前景是一个亮点。20 年来，经过撒切尔与布莱尔的不懈改革，英国政府规模缩减，税务负担与失业率降低，管制政策趋于放松，政府补贴压缩，劳动力参与率高于德、法、意三国。尽管高达 1/4 的英国成年人文化技能欠缺，但是英国年轻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与德国相当，而高于法国。英国企业对员工的人均投入虽然不及法国和美国，但是高于德国。专家预测，未来 10 年英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大约高出德国 0.5 个百分点，起码不会次于法国的经济前景。

日本的情形并非如此，抵制改革在日本简直就是一种公共美德。在西方看来，日本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民主国家，人们竟然能够容忍十多年的经济停滞，而不去抗议；政治与政策改革也不过是装点门面。很多日本人把问题归罪于据说谁也无法预见、谁都不需负责的异常事件——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经济泡沫的破灭，其时房地产和股市崩盘，数千家企业贷款变成呆账。经济泡沫不会自发产生、自行破灭，它是特定的税收及货币政策、政府补贴、行业管制与企业制度安排的直接而明确的结果，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而且，尽管日本的一党政治与社会规范使得日本选民难以要求政治、经济精英承担责任，但是泡沫破灭应该推动日本在几年之内启动改革进程。美国早已成功摆脱了最近几次股市崩盘和银行出现严重问题带来的困扰。日本遭受的打击肯定也没有 1997~1998 年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受到的冲击严重。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由于韩国改革家勇担责任，锐意改革，几年之内韩国就再度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看起来，坚定果断的经济改革超出了日本的能力范围——起码，这种改革迄今还没有发生。正是由于没有进行改革，过去 15 年来，日本经济出现了 5 次停滞与衰退。整个过程当中，在改革严重过时的日本公共与私营经济制度方面，一连几任日本首相都没有多少作为。即使魅力十足的小泉纯一郎上台掌权，除了一些力度最小的改革计划，其他改革措施也都被小泉所在的执政党否决了，而小泉的继任者又是了无生气的党务官员，倒是适合在无所作为的 90 年代平稳度日。迄今为止，日本的大部分补贴、保护、管制政策基本没变；维系数千家低效企业生存的交叉持股制度一如既往；国家金融体系仍然很不发达，银行系统作用大大弱化之后，几乎没有 IPO 或商业票据工具作为替代融资渠道。除了当今以超级成功的丰田汽车为首的少数几个出口巨头，日本经济的生产力水平持续萎靡不振。

在改善外国直接投资环境方面，日本也一直没什么进步，这本来是引人令人鼓舞的竞争力的最佳方式，而竞争力恰恰又是全球化一贯强调的现实要求。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十分有限，日本的这个经济盲点还是非常顽固。小泉首相的妇女问题首席顾问坂东真理子把她的国家描述为“性别平等方面的发展中国家”，这绝非夸大其词：同样长的工作时间，日本妇女收入只有男性的一半；尽管日本劳动力萎缩速度居世界第一，然而只有不到 1/3 的日本公司宣称他们的管理与技术岗位会考虑招聘女士。在公共养老领域，日本倒是进行了真正改革——虽然在这个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宣称有近 40% 的国民设法规避薪资税的国家，提高薪资税率相对容易。

一个人坠入深井而无法爬出之时，脱离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坐等别人救援。一提起当代日本，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广受世界欢迎的新器件、新设备的商业化生产——复印机、彩电、录像机、随身听——或者更好一些，真正实现的技术突破。日本综合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任指出，随着大批制造业移往海外，日本的未来在于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及纳米技术。本田、索尼与三菱都有关于机器人的重点研发项目，他们对太阳能电池技术也有相当大的兴趣。不过，正如《经济学人》最近指出的那样，近 20 年来，“日本企业在软件开发、互联网、生物技术及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分量十分有限”，没有出现能与微软、谷歌、亚马逊，甚至苹果公司匹敌的日本企业。

在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的经济劣势经久难改，这些力量比某些重大技术突破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还要强大。

在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的经济劣势经久难改，这些力量比某些重大技术突破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还要强大。庆应大学研究日本全球地位的专家国分良成发现，大部分日本人依然把全球化视为威胁，而不是机遇。这种态度强化了日本对那些按照全球化要求必须改变的制度安排的政治、经济依附程度。由于劳动人口每年减少 1%，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努力时断时续，未来 10~15 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预期每年只有 1% 多一点，偶尔出现的强劲增长（就像最近这样）与周期性的缓慢发展将会交替发生。在这条发展道路上，由于利率下调，储蓄比例迅速下降，家庭实际财产不断缩水，数以百万计的日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每况愈下。照此下去——很难想象日本如何找到更好的发展道路——到 2020 年，日本经济陷入衰落将确定无疑，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势必日渐式微。

虽然德国、法国、日本全都未能成功适应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也是一样——但爱尔兰与韩国却能成功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一跃进入世界经济的最上层。无论是规模还是广度，这两个国家都不足以产生全球效

应，但是，当希腊、匈牙利、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物色当今时代新的经济楷模之时，他们更可能想到的是爱尔兰与韩国，而不是那些现代经济发展很不成功的大国。

凯尔特之虎

韩国是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小国，而爱尔兰则是过去 20 年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小国。爱尔兰的成功已经吸引了中东欧各国政府与研究机构代表团定期造访，纷纷来此取经。原因显而易见——过去 15 年来，新兴“凯尔特之虎”一直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1990~1995 年，爱尔兰年均经济增长接近 5%，1995~2000 年，发展加速，年均增长达到 10%。即使在 2000~2005 年，爱尔兰的实际年均增长也接近 6%，约为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 2 倍，是欧元区国家增速的 3 倍多，接近德国增长速度的 4 倍。20 年时间，爱尔兰 GDP 总值提高了 2 倍，2003 年（有可比数据的最近年份）其雇员人均 GDP 全球最高。爱尔兰也摆脱了欧式失业困扰：1993 年以来，尽管国内劳动人口增加了 60% 以上，失业率反而从极具欧洲特色的近 15% 下降到欧洲和北美国家的最低水平。《经济学人》这样总结爱尔兰近年取得的巨大成就：

> 15 年前，人们普遍认为爱尔兰经济发展很不成功……然而，几年之内，爱尔兰就一跃成为……经济增长足以媲美东亚地区的发达国家典范，而其失业率与通胀率之低惹人羡慕，同时税负极低，公债很少。

几乎可以说，每个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提高。2000~2005 年，爱尔兰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近 20%，数倍于美国的增长速度，更是高达法、德两国增长速度的 20 多倍。到 2005 年，爱尔兰人均收入高达 40 150 美元，

超过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人均水平，接近瑞典和美国的收入水平。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爱尔兰不同寻常的独到特色为保证的。爱尔兰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商投资，外资赚取的利润同样被计入爱尔兰国民收入当中，尽管其中一大部分回流到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的母公司。即使从国内收入当中扣除外流的巨额外资利润（技术上，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即 GNP 来代替标准的 GDP），爱尔兰的人均收入几乎还是高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不过，要是再考虑到生活成本差异这一因素，爱尔兰对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更为明显。不管采用哪种测算指标，爱尔兰都会进入全世界十大富国行列。

爱尔兰能够实现飞速进步，应该归功于所选择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融合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线与最近 10 年中国的方针政策。类似于“亚洲四小龙”，经过几十年的大幅社会投入，爱尔兰从本国高峰人口身上收获了经济回报。高峰一代日渐长大之时，爱尔兰政府就持续加大高等教育扶持力度，大举修建公共基础设施，并针对外商投资实行税务减免，专门采取激励措施，以此创建企业友好型社会环境，以便众多企业日后能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此前几十年间，爱尔兰一直固守保护主义传统，公共投入十分匮乏，在这样一个国家，新的发展路线是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登场亮相的——政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当年的现行政策。1959 年，爱尔兰财政部长托马斯 · 肯 · 惠特克指示进行政策检讨，检讨结果出人意料：惠特克提出大幅削减关税，将公共支出的优先目标从欧洲式的工人保护转向产业、教育及道路投入，扫除税收障碍，改革管制政策，大力吸引外资企业。最近有一个分析报告，把惠特克称为“现代爱尔兰的设计师”，这个说法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

爱尔兰能够实现飞速进步，应该归功于所选择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融合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线与最近 10 年中国的方针政策。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其后 10 年，爱尔兰竟然采纳了惠特克的建议，废止了对外商拥有爱尔兰企业的所有权限制，停止征收出口企业外贸盈利的法

人税，单方面降低进口关税，与英国谈判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宣布有意加入现今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直到 1973 年，法国最终不再反对英国加入之时，爱尔兰才被欧共体接纳。然而，即使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大量讲英语的低薪工人——还有减税新政策——开始吸引欧美企业进入，爱尔兰年度经济增长率就已跃升到 4% 以上。到 1970 年，已经有 350 多家外资企业在爱尔兰设立分支机构。因此，爱尔兰最终加入欧共体之后，迅速成为美、英两国工业企业向欧洲转移的低成本目的地。由于”二战”期间爱尔兰保持中立，无法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导致其在欧共体内部相对贫穷，这使得爱尔兰不得不集中财力，重点保证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民教育的资金投入。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过，爱尔兰的新经济战略要真正形成合力，还得假以时日。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经济发展高度依靠传统农业，农产品大多出口到英国，而且尽管大量人口移民国外，国内失业率还是一直居高不下。1965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爱尔兰发展前景的分析报告特别强调了教育问题，爱尔兰政府因此于 1967 年免除了中学学费，并免费运送所有孩子上学。教育程度随之开始提高，到 70 年代中期，就业、人口与国民收入全部开始增长，增长速度是半个世纪之前爱尔兰独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爱尔兰大幅提高公共投入，这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政策所见略同；爱尔兰抛弃保护主义，欢迎外企进入，则表现出对后来中国采取的成功政策的先见之明。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爱尔兰就下决心成为欧洲市场的生产平台，集中精力发展需要高技能、高工资劳动力的高科技产业，特别致力于计算机、医药品与医疗设备的生产。到 1975 年，美国两大大型计算机制造商阿姆达尔公司和

爱尔兰大幅提高公共投入，这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政策所见略同；爱尔兰抛弃保护主义，欢迎外企进入，则表现出对后来中国采取的成功政策的先见之明。

王安电脑公司、医疗设备制造商巴克斯医疗器材公司、医药制造商默沙东（Merck Sharp）和沃纳－兰伯特全都在爱尔兰建立了新工厂，450 多家外资企业为爱尔兰贡献了 2/3 的工业产出。随着引进的外资企业不断增加，爱尔兰继续扩大公共教育投入，从而储备了大批高技能劳动力。1965~1980 年，中等及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学生数量翻了一番，之后 20 年，高等院校在校人数又翻了一番。

爱尔兰因为大力投资公共事业，赢得了广泛赞誉；受过较好教育的高峰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之时，经济发展创造的大量新增高技能就业机会正在虚位以待，哈佛大学著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戴维 · 布卢姆与戴维 · 坎宁称之为人口红利。布卢姆与坎宁研究发现，要想实现持续进步，人口高峰之后必然出现人口低谷，如此一来，国民就业率才能缓慢提高。20 世纪 80 年代，避孕措施最终合法化，人们不再钟情于大家庭；经济发展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使得大批妇女外出工作，于是爱尔兰生育率开始降低。据布卢姆与坎宁计算，人口因素为爱尔兰贡献了 1/3 的经济增长——略低于东亚地区。欧洲大国及日本同样获得了人口增长的好处——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之为“奇迹”——但是，因为没有针对全球化的后续改革跟进，这种好处没能持续下去。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爱尔兰的发展进程差点陷入停顿，直到再次采纳专家建议才又重新开始。在 70 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冲击之下，爱尔兰工人日益增长的工资收入不断缩水，政府财政预算再次出现巨额赤字，政府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到 80 年代前期，通胀与失业回潮，经济增长随之戛然而止。1985 年，爱尔兰财政赤字接近 GDP 的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爱尔兰将要迎来财政崩溃，货币危机在所难免。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更为急切的是个人反应，爱尔兰研究人员与新闻记者注意到，很多精英人士为了个人前途而远走他国，有爱尔兰哈佛大学之称的圣三一大学毕业生，甚至有个别毕业班全体选择出国。整个 80 年代，总计约有 200 000

万爱尔兰人移居国外，接近全部人口的 6%。

值得赞扬的是，爱尔兰认真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警告，迅速压缩财政赤字。1986 年，爱尔兰医疗及教育财政支出减少 6%，国防开支减少 7%，道路与住房投入减少 11%，农业开销减少 18%。第二年，爱尔兰共和党上台，对财政预算的削减幅度更大，并且在大型企业、工会与农民之间成功达成协议，为应对直接税收入减少，一致同意严格限制工资增长。3 年之内，爱尔兰政府预算所占 GDP 比例就从 55% 下降到 41%，降幅超过 1/4。

爱尔兰的真正好运在于，正当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步履踉跄之时，爱尔兰乘机采取了占据欧洲经济格局有利地位的成功战略。

然而，爱尔兰的真正好运在于，正当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步履踉跄之时，爱尔兰乘机采取了占据欧洲经济格局有利地位的成功战略。一连数年，爱尔兰政府尽其所能，努力吸引美、英两国的软硬件 IT 企业进军国内。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与克林顿当政的华盛顿十分类似，爱尔兰的财政预算从巨额赤字转变为小有盈余，电信行业完成私有化，对港口、铁路、公路设施升级改造的财政投入达到 GDP 的 5%——2 倍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公共卫生与饮水工程以及一贯重视的国民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持续增加。1985 年以来，爱尔兰公共教育支出增长了 150%，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95 年爱尔兰一度取消大学学费。虽然爱尔兰教育投入所占 GDP 比例仍然低于许多欧洲国家，但是爱尔兰青少年入学率却高于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此外，25~34 岁的爱尔兰青年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约为 37%，而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为 27%（美国是 40%）。

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 IT 产业蓬勃发展之时，爱尔兰凭借有利条件，得以广泛参与。到 2004 年，爱尔兰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高达 2 300 亿美元，与意大利相当，而意大利的经济规模是爱尔兰的 8 倍。如今，相对于爱尔兰的 GDP，爱尔兰的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分别为德国、法国、

英国的 10 倍、5 倍、4 倍。弹丸小国爱尔兰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约为中国的 1/3，而中国可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经济规模将近爱尔兰的 12 倍。

爱尔兰致力于发展国民教育，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由此创造了全球化环境下协同合作的专门模式。随着海外企业大举迁入，千千万万爱尔兰工人得以接触尖端技术与操作实践，这又使得他们能够进一步提高技能。直接转移进来的海外企业通常集中在信息技术、医药制造及医疗设备领域。如今，世界 10 强 IT 企业当中已经有 7 家公司——IBM、英特尔、惠普、戴尔、甲骨文、Lotus 及微软——在爱尔兰建立生产部门。世界 15 家主要医药公司中的 13 家也已经在爱尔兰进行生产活动，其中包括惠氏、先灵葆雅、默沙东、辉瑞、诺华、爱力根及葛兰素史克，而且，就在都柏林郊外，全世界最大的生物技术大学园区最近已经建成。在医疗设备领域，世界 25 强当中也有 15 家企业进入爱尔兰。结果就是，除芬兰之外，先进技术在爱尔兰制造业中发挥的作用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大——爱尔兰高科技企业所占比例为 20%，与美国的 26% 相差不多，而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只有 8%。在上述三个高科技领域的外资企业中爱尔兰雇员总数为 85 000 人，占爱尔兰制造业工人总数的 1/3。

就在几年之前，爱尔兰向外输出的主要还是常规食品和青年才俊。如今，爱尔兰有近 85% 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国外，其中大部分都是 1 200 多家外资企业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例如，英特尔、戴尔与微软三个公司在爱尔兰的出口产值就高达其出口总额的 20%。按人均计算，爱尔兰现在的出口量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的 7 倍、6 倍、4 倍。

令人瞩目的是，沿着同样的发展道路，爱尔兰的现代化也扩展到一些高端服务领域。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税收激励措施得力，电信设施投入充足，这在吸引大批先进技术落户爱尔兰的同时，金融服务领域的大量直接投资也纷至沓来。过去 10 年，尽管没怎么引起《华尔街日报》和《泰晤士报》的注意，爱尔兰已经悄然成为全球金融格局中十分重要的一员。现在，爱尔

兰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 1/3 以上都集中在都柏林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全球金融业的 20 强、全球银行业的 50 强，目前已有半数落户该中心。凭借高达 5 000 亿美元、2 倍于本国 GDP 的国际资金规模，爱尔兰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真正集散中心，这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及香港中国银行的交易人看来，或许有些奇怪。

爱尔兰的法人税率为 12.5%，出口则直接实行零税率，英美保守派人士坚持认为，正是低税率推动了爱尔兰的发展变化。尽管他们对低税率的作用不无夸大，不过无论对哪个国家而言，只要能够满足公共支出的需要，低税率总是要比高税率好。爱尔兰总税负为其 GDP 的 28%，远低于欧盟 15 国 40% 的平均水平。劳工成本当中，爱尔兰的税收比重比所有欧洲发达经济体都要低出大约 10 个百分点。对于爱尔兰的发展进步，来自欧盟的资金扶持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爱尔兰相当一部分基础设施与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得益于欧盟援助。不过，如果不是爱尔兰对外开放市场竞争与海外投资，低税率必定收效甚微；同样，如果爱尔兰没有合理明智地使用欧盟补贴，这些补贴也只能是徒劳无功。

而且，今天看来，这些因素已经不再是爱尔兰的独有特点，因为很多国家的法人税率都已经大幅下调；一段时间以来，爱尔兰也不再具有享受欧盟补贴的资格。许许多多来自世界上最先进的各大公司的生产技术与商业模式已经牢牢嵌入爱尔兰的制造工业及商业服务领域，这是当今发展进步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此外，作为遍布世界的全球合作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巨额投资将爱尔兰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中最为成功的一面联系起来。结果就是，按照全球商务咨询企业科尔尼公司的判断标准，**凭借欧洲最好的商业环境，爱尔兰已经成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

未来 10~15 年，爱尔兰能否继续保持其优势地位，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积极方面，爱尔兰选择的发展战略还在继续产生全欧洲最高的生产力回报，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及日本所受困扰不同，爱尔兰也不会出现劳动力

短缺。原因不仅在于爱尔兰的生育率高于欧洲其他国家，而且在于爱尔兰的发展前景已经产生了吸引移民的强大磁力。类似于美国，1995 年以来，爱尔兰新增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来自移民；爱尔兰居民构成当中，海外移民比例接近 10%。与贫穷的穆斯林移民浪潮迅速涌入法国、德国、丹麦、荷兰等国不同，爱尔兰吸引的移民都是西方人，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教育，渴望接受同化。这些移民当中，来自英国的占了半数，其余部分，不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回流，就是来自波兰、立陶宛等欧盟新成员国的新移民。

对于笼罩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上空的公共养老危机，爱尔兰也会避免。从现在以至到下一代人，爱尔兰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在欧盟国家都是最低的。而且，由于不久之前还是一个穷国，爱尔兰的养老待遇从来就不高。尽管最近经济发展异常繁荣，爱尔兰还是于 1999 年通过法案，削减了未来福利，并且每年拿出 1% 的 GDP 作为国家养老储备基金，这在发达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未来 10 年，全球化也会给爱尔兰带来艰难的新挑战。爱尔兰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上，而吸引外资的因素包括受过较好教育的低薪劳动力、力度可观的税收优惠、面向欧盟国家的免税贸易。这一战略仍然还在发挥作用：1995~2002 年，美国在爱尔兰的平均年度投资回报率为 20%，2 倍于其他欧盟国家；2005 年，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投资额仍然高于在中国的投资。但是，经过 20 多年国民经济与生产收益的强劲增长，爱尔兰的工资优势已经消失殆尽，而且随着欧盟东扩，爱尔兰作为欧洲市场门户的独特地位，正面临着新近加入欧盟的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的激烈竞争。

未来 10 年，爱尔兰面临的考验——不同环境下的中国一样也会面临——将是如何摆脱对外商投资的高度依赖，培育发展更多国内企业，在高级制造业与服务业领域真正形成竞争力。过去 10 年，有几家爱尔兰公司已

经走向世界市场，比较知名的有：水泥及建材制造商 CRH，这是唯一入围全球 500 强的爱尔兰企业；食品调料制造商凯利集团；国际连锁酒店朱瑞斯道尔。不过，爱尔兰值得夸耀的生产及出口收益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外资企业。为重点解决这个问题，爱尔兰政府于 2000 年创建了爱尔兰科学基金会，并设立技术前瞻基金，着重促进、扶持的国内研发领域包括：改良农业的 DNA 技术，并行处理系统技术，纳米级组装技术。即便如此，爱尔兰用于研发的公共支出在 GDP 中所占比例仍然是欧盟发达国家当中最低的。

未来 10 年，几乎可以肯定，爱尔兰经济的飞速增长将会放缓，回落到与美国相近的水平。这种结果显而易见：在微软公司资助下，爱尔兰最著名的经济学权威之一保罗 · 坦西最近领导完成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爱尔兰生产力发展进程具有“二元经济特点”，即本土企业依然大幅落后。未来 10 年，爱尔兰面临的巨大挑战还在于，如何把先进技术与操作方式应用到服务业领域，这是大多数爱尔兰工人的职业所依。如果不能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大多数爱尔兰人就不得不从创造凯尔特奇迹的幻想回到现实中来。

韩国：自力更生的典范

爱尔兰的经济发展纪录令人叹服，但是，不到半个世纪时间，韩国就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经济体，这是经济发展史上更加非凡的伟大成就。韩国的发展进步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变迁历程，因为大部分成就是在一连几任野蛮残忍的军事独裁者主导下完成的。正如一位美国评论人士所说，统治韩国的一直都是“不断发展的专制政权”，在这种独裁统治之下，韩国从白手起家，造就了世界一流的出口产业，培养了教育程度居发展中国家之首的劳动力。凭借这些宝贵财富，韩国平稳度过了痛苦不堪的金融危机，并且对全球化做好了相当不错的准备。尽管曾经得到美国

的大量财政援助，不过与爱尔兰和中国不同，韩国基本是在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提下，取得这些成就的。

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还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地方之一。1910~1945 年，日本占领期间，开发建设的铁路、码头、工厂、矿山及水电站全都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鸭绿江沿岸。而且，到 1945 年，已经有 1/3 的日本工业基地位于朝鲜半岛北部。后来成为韩国的南方数省则只能满足于成为日本的粮仓，况且由于内战主要是在南方进行，南朝鲜仅有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与生产工厂也都毁于战火。

到停战 7 年之后的 1960 年，韩国 GDP 仅为 23 亿美元，人均收入只有 79 美元，位居全世界收入最低国家行列。即使按 2006 年的美元价格折算，1960 年的韩国人均收入也只有 534 美元，排在世界第 148 位，落后于肯尼亚。事实上，2005 年韩国人均收入为 16 800 美元，比 1960 年增长了 30 倍，排在全球第 36 位；韩国 GDP 更是达到接近 8 000 亿美元的规模，排在世界第 10 位，比 1960 年增长了 50 倍。至于曾经繁荣的朝鲜，2005 年 GDP 规模为 300 亿美元，不及韩国的 4%，人均收入只有 1 700 美元，仅相当于南方同胞的 10%。

尽管数万美军一直在韩国长期驻守，韩国的非凡进步还是更应该归功于对中国与日本发展方略的学习借鉴，还有就是本国精英善于抓住的偶然发展机会。中国对韩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从 1953 年停战到 80 年代后期的关键岁月里，韩国领导人就像在军事运动中发布命令一样，颁发了大量有关经济发展的法令。事实上，朴正熙总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下达命令，重印了韩文版《孙子兵法》，把市场竞争当做军事战争，以夺取市场份额的主导地位论英雄。就在那个时期，错综复杂的韩国家族财阀合纵连横，不断壮大，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这是韩国政府的刻意安排，目的当然不是维护家族财富王朝——大部分豪族都已经在殖民统治与内战期间凋零殆尽——而是因为与管理成千上万家小企业相比，政府更容易控制少数几个大公司。

1953~1987 年间，每一届韩国政府无不始于军事政变，终于军事政变。然而，当代韩国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就是，历届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致力于经济改革，大部分韩国人的生活由此得以改善。1948~1960 年在位的李承晚，关闭了国民大会，整肃甚至处死了大部分政敌与潜在对手，禁止一切独立政治活动。但他同时也普及小学与中学教育，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朴正熙从李承晚手中夺得政权之后，一样整肃对手，国民大会还是毫无权力；朴正熙还创建了内务警察力量与私人政党，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力量还统治着公众生活。但是，朴正熙同样加紧推进工业化进程，他以一项独一无二的灵活计划开始：以贪污罪逮捕了数百名企业领导人，对这些人课以巨额罚金，却要求他们以投资某些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形式缴纳罚金，并把很大比例的股份“捐赠”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新计划顺利推进，朴正熙创建了一套对企业优惠的贷款、税收及行政制度，这些企业因此发展成为家族财团，成功推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

当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沃尔特 · 罗斯托说服肯尼迪总统，让他相信韩国可以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亚洲的最佳样板时，朴正熙的发展计划随之赢得了美国的赞赏。更为重要的是，罗斯托还说服肯尼迪，在国防、教育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维持对韩国的援助。1953~1965 年间，美国对韩援助总额高达 120 亿美元，接近整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总和。从 1972 年朴正熙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开始，到 1979 年遭暗杀身亡为止，朴正熙一直确保家族财团始终拥有所需资本，以便推行发展重工业与高科技产业的计划，这些企业后来大都成为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大型公司。

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遵循了同样的发展模式。朴正熙死后，全斗焕夺得政权，刚一上台，他就匆忙宣布实行戒严令，大肆逮捕、处决政治活动人士，其他所有人的政治活动也遭到禁止，许多大学被迫关闭。他的残忍行径不止于此：1980 年 5 月，由于数十年来首次出现经济衰退，韩国古城光州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全斗焕手下士兵开枪杀死了数千名抗议者，这

就是有名的“光州大屠杀”。全斗焕将军后来自己提名，当上总统，随后整肃了 8 000 多名政府官员和企业领袖——而且与其前任一样，全斗焕之后转向经济改革，强化工业财阀，发展国内企业，满足不断涌现的新兴消费阶层的消费需求。

韩国民主转型始于 1987 年 6 月，其时，全斗焕力图把总统职位交给卢泰愚将军，大规模抗议活动随之再次爆发。这一次，全斗焕决定举行该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选举，卢泰愚将军侥幸当选。就像叶利钦之于戈尔巴乔夫，新当选的卢总统成功说服了自己的政治对手、最著名的全斗焕批评者金泳三加入联合政府。后来，金泳三在 1992 年击败同样持不同政见的政治伙伴金大中，当选为该国第一位非军人出身的总统。

在韩国漫长的专制统治中，独裁的经济改革者所采用的基本战略——对三星、现代等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国营银行定向发放巨额贷款，实施专门税务减免，提供大量政府订单，以及实行其他一些行政优惠政策，以此促使特定行业迅速腾飞——主要来自日本。但是，为了保护国内幼稚行业免受外国竞争压力，日本剥夺了国内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的自由，只能购买国产商品，对于这一重要政策，韩国统治者没有采用。经济学家把这种政策称为“进口替代”，对此，不仅日本广为采用，而且 19 世纪后半叶的美国，以及 20 世纪后半叶的印度都执行不渝。然而，韩国独裁统治者敏锐地认识到，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实在太穷，无法形成足够强大的经济需求，难以保障受到保护的国内产业发展壮大。因此，从 60 年代开始，韩国就开放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及机械设备，保证处于萌芽阶段的韩国企业制造出口产品的生产需要，这在战后发展中国家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种“出口第一”的发展计划中，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市场可言。朴正熙及其继任者会为每家公司制定专门的出口目标，而这些公司享受的贷款、减税及其他政府优惠待遇统统要与出口目标直接挂钩。甚至韩国人购买专为出口生产的商品，也被规定为非法行为，这些商品包括留声机、彩电、便携

电话及貂皮大衣等。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韩国国内市场最终发展壮大之后，朴正熙又在重工业制造领域采取了同样的进口保护措施，以扶持家族财团新创立的重工企业。很快，在钢铁、汽车、电子、造船、冶金、重工机械等重工业领域，新兴制造企业的贷款额就占到韩国所有银行贷款总量的 60%，75% 以上的制造业投资投向这些企业。

这些政策成效明显，相关企业迅速成为韩国第二代出口大户。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韩国出口额占到快速增长的 GDP 的 1/4，而到 80 年代，平均比例更是攀升到 1/3（日本于 1965 年同韩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韩国出口商品绝大部分流向美国与日本）。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出口洪流略微放缓，不过，2000 年以后，出口再度回升，一直接近 GDP40% 的水平。韩国最近涌现的出口大潮，推动力量不仅来自政府贷款与国家优惠政策，而且来自对韩国产品的全球需求及韩国企业在大部分市场的丰富经验和良好关系。过去几十年间，为了实现国家制定的出口目标，三星、现代、LG 等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关系，积累了丰富经验。

因此，与爱尔兰和中国不同，韩国并没有邀请全世界最先进的公司企业到国内投资设厂，以此引进现代工业基础。恰恰相反，在大部分工业领域，卢泰愚和全斗焕都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甚至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外国企业在韩国仍然无法取得土地、房屋的所有权。他们的政策是，以国营银行吸收韩国国民高额私人储蓄，然后向日益壮大的企业财团发放贷款，帮助他们购买外国技术。受经济快速增长吸引，西方及日本银行也向韩国企业提供了大量贷款。在国内与国外贷款的共同支持下，韩国成为全世界投资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即使在贫穷落后的 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也能达到 GDP 的 18%——大致相当于过去 40 年来美国企业的总体投资比例。到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企业投资率跃升到 GDP 的 27%，此后一直继续增长，到 80 年代接近 30%，90 年代更是高达 36%。

自 1970 年以来，韩国企业合计投资所占 GDP 比例高于任何一个重要经

济体——每年约比墨西哥和巴西高 10 个百分点，比欧盟国家高 8 个百分点，比中国和泰国高 2 个百分点。1995~2004 年，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韩国的总体投资率仍然与中国不相上下。

因此，无论是距离遥远还是近在眼前，一旦有新的机会出现——例如，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或者参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东建设热潮——韩国企业都有充裕的投资资本可供使用，从而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机会，这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可谓独一无二。几十年来，韩国的大部分资金流向大型企业集团，由此促生了非常多的全球性成功企业——今天全球企业 500 强中，14 家韩国公司榜上有名，这个数字高于西班牙、瑞典、意大利、印度等国入围企业数量，两倍于新加坡、泰国及中国台湾的上榜企业数量之和。

韩国能够实现非凡进步，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应该归结于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及人民年均教育投入所占 GDP 比例达到 10%，高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一连几任独裁总统所具有的远见卓识无疑发挥了最大作用，不过，相当一部分功劳也应该归功于韩国父母亲，他们担负了一半教育支出。今天在韩国，约有 40% 的高中生、80% 的大学生在私立学校上学，这个比例居全球之冠。

最终结果就是，韩国成为世界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有 28% 的韩国男工受过大学教育，这个比例高于法国、德国及英国（韩国女工当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同样高于德国，但是落后于法国和英国）。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提高。2005 年，韩国高中生大学入学率超过 80%，这个比例高居世界之首。

全球化背景下，韩国教育投入的回报率大幅提高，因为正如全球化迫使韩国企业退出如今已经被中国等低工资国家主导的低附加值产业领域一样，韩国一流企业也可以把受过特别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吸引到发达国家主导的高端产品市场。三星公司今天为什么能够战胜索尼、东芝、飞利浦；现代汽车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遭遇挫折之后，如今规模为什么还会超过沃尔沃、雷诺、马自达，盈利水平能够高于福特、大众、菲亚特，韩国国民异常良好的教育水平就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韩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如此之高，以至于韩国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发展中国家。据经济学家测算，今天韩国的财富平均程度位居全球第 11 位——远远领先于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仅次于瑞典、挪威、丹麦、冰岛、日本、德国、奥地利、卢森堡、荷兰与波黑。尽管独裁统治旷日持久，军事政变时有发生，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是国家一直保持稳定，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得益于韩国老百姓经济水平的稳步提高。

经济环境发生改变，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因应？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同样也为法国、德国及日本提供了重要范例。过去二三十年来，韩国两次面临严重经济问题。每次出现问题，韩国政府与商界精英都是艰难地咽下苦果，然后选择启动痛苦的改革进程。20 世纪 80 年代，石油危机波及全球，全球经济放缓，而且在朴正熙身遭暗杀之后，韩国国内大规模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军事统治全面恢复，所有这些使得韩国经济增长画上句号。韩国政府把责任归咎于规模大、势力强的企业财团。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一直享受着国家贷款、政府补贴、税务减免的优惠政策，这些企业财团的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单是前 10 家企业的产值就能占到全国 GDP 的一半。这些企业因为还得执行政府下达的出口指令，同时也变得效率低下，债台高筑。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在“光州大屠杀”事件中初露峥嵘的全斗焕将军实施了一系列广泛彻底、明智、合理的经济改革。他不仅把一些大型企业财团分拆成许多小企业，而且开始逐步停止向这些企业发放多种直接补贴，通过削减出口补贴、废止限制国内消费的法律法规，迫使韩国企业更加致力于开拓国内市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全斗焕颁布法令，要求地方银行的大部分贷款，国家级大型银行 35% 的贷款，必须发放给中小企业。10 年之内，中小企业就占据了韩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提供了 2/3 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鉴于 IT 技术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全斗焕的继任者卢泰愚做出了另一项命运攸关的政策转变，就是对外商直接投资重新实施严格限制——这项政策的实施比印度早了不少——同时鼓励韩国企业开发自己的先进技术。有几家企业财团已经成为成功的创新者，最著名的就是三星公司。1983 年，三星首先开发出了 64KDRAM 芯片，几年之后，三星又率先推行一项战略计划（IBM 公司稍后采纳这一战略），在半导体芯片、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产品方面，为其客户提高广泛的 IT 服务。现在，在新的政策扶持下，现代公司已经开始研制氢动力、电池动力、乙醇动力驱动的概念车，这都比其西方竞争对手提前不少。2000 年，韩国研发投入为 GDP 的 2.4%，除了 8 个国家之外，高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研发投入比例。今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在使用韩国的先进技术，诸如精密激光焊接技术、高速运动手机用户广播接收技术、汽车燃料替代技术、足够笔记本电脑运行一个月的燃料电池技术及烧伤患者皮肤培养与移植技术。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数百万韩国人的生计来源与经济保障随之倾覆。从对这次危机的应对处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强大能力。危机爆发后，一年之内，韩国 GDP 锐减 7%，外汇市场上货币贬值过半，30 家最大的企业财团当中，有 15 家宣告破产，10 家国有银行也难逃倒闭厄运，失业率也从不足 3% 一举提高了 2 倍，高达近 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提供 570 亿美元援助资金，韩国流通货币与金融体系随之趋于稳定，外国投资者这才重新返回。不过，美国的艾伦 · 格林斯潘与罗伯特 · 鲁宾为这一援助设置了严格的条件：放弃产业规划，终止各大企业、各大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幕后勾结，采用美国模式，开放对外贸易，取消市场管制，实现金融透明。说来也巧，美国应对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与韩国企业财团遭受的广泛批评恰好引了起金大中的强烈共鸣，而这个长期以来的异见人士刚刚当选韩国总统，于是他抓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加援助条件的有利时机，顺势宣布了自己的“大型企业结构调整方案”，旨在打破企业财

团大规模抱团的传统，迫使他们在国内市场上与西方公司展开竞争。

两年之内，半数主要企业财团应声消失，韩国经济随后出现强劲反弹，1999 年与 2000 年经济增长分别达到 9.5% 和 8.5%。由于货币贬值，数百家韩国企业被低价贱卖，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到 2005 年，首尔证券交易市场上已经有 40% 的上市公司及 14 家国有银行中的 8 家银行为外商所有，或为外资控股。

按照格林斯潘的规划方案，渡过难关的企业财团不得不脱胎换骨。三星就把 10 个大的业务部门卖给外国公司，其中包括建筑设备业务（售予沃尔沃）和汽车业务（售予雷诺）。瘦身之后，三星电子随即焕发生机，产品研发投入不断加大。改造成效非常良好：今天，三星已经成为 DRAM 芯片、闪存设备、光存储设备及液晶显示器的世界第一大生产商；三星航天部门正在研发空间站；三星建筑部门正在迪拜建设世界最高建筑；1 300 名研发人员创造的专利技术使得三星成为美国十大专利授予对象之一。现代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韩国第一大财团，危机爆发后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规划，卖掉外围业务部门，将其余所有业务重组为 5 个企业集团，经营范围遍及全球市场。不过，大宇集团却利用企业恐慌情绪，接收了 14 家公司，作为已有的 275 家分支机构的额外补充，因而导致企业债务急剧增加。大宇的疯狂收购行动以失败告终：1999 年后期，大宇集团宣告破产，创始人金宇中会长负罪潜逃国外[①]。

以普遍的衡量标准来判断，近期之内，韩国经济发展将态势良好。不过，这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自 2000 年以来，韩国年均经济增长超过 4.5%，生产力每年提高 4.3%，大大好于爱尔兰和美国，相当于德国、法国、日本及英国的 2~3 倍。随着企业财团相继衰落和金大中改革政策不断推进，韩国劳动力市场也沿着美国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用工灵活性得以提高，

① 2005 年，金宇中结束流亡返回韩国，随即被捕。2006 年，他被判 10 年徒刑。——编者注

大批韩国人工作安全程度大大降低。尽管现在有 45% 的在职人员属于没有长期合同或者不是全职工作的“非正式”员工，韩国的失业率还是一直保持在 4% 以下。但是，未来 10~15 年，韩国人势必也要与流入国内的外国人争夺最好的工作岗位，这些外国人可能来自美国、日本、欧洲及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韩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全体国民平均水平的 4 倍，因此他们遭受的外来人才竞争冲击尤其严重。毫不奇怪的是，现在也有数以千计的韩国人移居欧美，其中就包括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学及技术研发方面的人才流失。

在未来，韩国需要把受过最好教育的劳动者留在国内，并尽可能吸引外国人到韩国工作，因为韩国也将面临足以减缓发展速度的人口压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韩国人口变迁也遵循了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发展模式，不过，因为国情特殊，韩国的生育低谷更加严重。首先，由于高等教育投入巨大，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千千万万就业机会吸引了韩国妇女外出工作，女性生育压力因而大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此基础上，朴正熙政府于 1962 年采取了免费避孕政策，全斗焕政府还从 1983 年开始，取消了已有三个孩子的孕妇的孕期保险待遇。结果就是生育率的实质降低，平均每名韩国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超过 4.5 个，一路下滑到 80 年代的 2.8 个，90 年代的 1.6 个，直至今天的不足 1.2 个。

人口变化的结果势必使得韩国经济发展道路日趋狭窄。据联合国预测，2010~2015 年，处于工作年龄的韩国人口将会达到顶峰，数量大约在 3 300 万左右，此后将会以每年 1% 的速度逐步减少。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到 2020 年，韩国工作人口将会下降到 3 150 万，到 2030 年，更是少到不足 2 800 万。与此同时，韩国老年人口数量将急剧攀升，将由 2005 年的大约 660 万飞升到 2020 年的 1 140 万，增幅超过 70%——而且，还会持续增长，到 2030 年将要超过 1 500 万。人口变迁也会给韩国老年人带来严重问题。1988 年，韩国才开始实施国家养老制度，而且养老待遇通常只有各大企业财团的员工才能享受。在这方面，韩国与中国十分相似。由于农村公社和许多国营

企业纷纷解体，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网络分崩离析。而在韩国，由于政府政策与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击，多数企业财团破产倒闭，养老（及医疗保险）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即便如此，由于劳动人口不断萎缩，老龄人口快速增长，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 2020 年，韩国的公共养老体系还是将难以为继。随着老年人及准老年人数量急剧增加，韩国肯定也会面临扩大养老覆盖范围的需求压力——在这个国家，即使处于军事统治的重压之下，数万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的情形也是司空见惯。

随着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少，老龄人口日益增多，保持经济增长——及筹措扩大养老覆盖范围所需的财政收入——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要么提高实际工作的人口比例，要么提高在职人员的生产力水平。在韩国，第一种方法要比在多数欧洲国家更有可能。比如，许多韩国大企业已经行动起来，逐步废止强制员工 50 岁退休的做法。不过，最大的潜在劳动力还是妇女：今天，只有 56% 的韩国妇女上班工作，这个比例远低于全部工业化国家 69% 的平均水平。未来几年，由于韩国劳动力供应日益紧张，已经适应这种压力的韩国企业，有望改变对待女性雇员的态度。

相比而言，很难想象韩国如何通过提高现有高等教育入学率来提升生产力水平。然而，韩国企业可以在 IT 产业与汽车产业之外，扩大研发范围，因为韩国目前有将近 80% 的研发经费投入到了这两个领域。不过，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最大机会在于服务业，如银行、零售、商务服务、医疗保健等，这些行业的生产力水平只有韩国制造业的一半。爱尔兰与中国的近期发展经验表明，提高落后行业生产力水平的一个直接方式就是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力度，大力引进生产效率高得多的外资企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吸引外资进入，韩国政府设立了许多“特区”，落户特区的外资企业就像以前的企业财团一样享受政府补

爱尔兰与中国的近期发展经验表明，提高落后行业生产力水平的一个直接方式就是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力度，大力引进生产效率高得多的外资企业。

贴：7 年免征所得税与法人税；永久免征进口税与消费税；对高科技制造及服务企业，免收政府租金；免费提供员工医疗保险和教育培训。不过，迄今为止这项政策还没有发挥作用。2000~2005 年，每年进入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不及 GDP 的 1%，处于全球最低水平。

未来 10 年，进入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望大幅增长，理由非常充分。许多外资企业之所以一直没有进入韩国，是因为韩国目前的劳工成本接近或达到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的 2 倍，而且韩国还以好战难缠的劳工工会著称。不过，随着大部分企业财团或者破产倒闭或者大幅裁员，大批临时工转移出来，形成了不在工会的劳工大军。假以时日，感觉就会与现实合拍，外商直接投资就会随之增加。外资规模扩大，尤其是服务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力度加大，不仅可以为现在不工作的那些妇女及老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且会把国内服务企业直接暴露于全世界效率最高的外国服务公司最佳实践经验面前。激烈竞争压力之下，一些国内企业就会采纳外国公司的先进经验。

韩国也可以为外资企业提供全世界发展程度最高的信息网络环境。2005 年，80% 的韩国家庭拥有电脑，这个比例大大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及德国，更是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出一个数量级。就在同一年，有 2/3 的韩国国民使用互联网，超过 26% 的韩国家庭实现宽带接入，这个比例还是高于美国及几个欧洲大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公司而言，韩国为他们提供了已经可以熟练使用计算机、能够准确了解互联网的劳动力和消费者，还有方便接入各大公司全球网络的基础设施。

最后，由于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出口——每年出口额占到 GDP 的 40%——韩国经济自然就会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强大力量进退与共，国内经济增长也就质押给本国产品的主要消费国，特别是美国。美国经济一旦衰退，特别是出现足以波及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韩国经济增长很快就会陷入停顿。不过，尽管经济低迷来来去去，但是总能看到韩国未来的希望迹象，这就是无论全球经济端出什么菜碟，韩国都是来者通吃，而且总能实现进步。

当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取得不同寻常的成功之时，他们就会成为渴望同样成功的那些个人、企业、国家的模范。今天，世界上有美国、中国、爱尔兰与韩国 4 个经济模范。头号经济模范就是美国，它是经济成功的大国典范，它集中展示了管制较少的自由市场、大力投入的国民教育、完善发达的基础设施、雄心勃勃的创业精神、内需驱动的发展模式以及大胆进取的全球化战略所带来的好处。美国之所以成为模范，也是建立在根基牢固的民主政治、相对有限的社会福利、较少实施的管制保护及对较大贫富差距的理性宽容的基础上。美国最可能成为当前的印度及今后的德国、法国、巴西和墨西哥的学习榜样。中国则提供了取得经济成功的一个截然不同的指导方针——工资低廉，资源便宜，大规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高度管制与轻度管制市场并存，国民消费率很低，私人储蓄率奇高，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入规模巨大，教育投入不甚平等，严格限制社会福利，很少采取保护措施。对其他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有赖于威权政治体制，以及对贫富不均的普遍容忍。对非洲国家、亚洲部分国家及今后的俄罗斯来说，中国模式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世界上还有另外两个模范。爱尔兰是一个小国模范，其成功得益于以下因素：实行旨在吸引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及补贴政策，大力投入国民教育与基础设施，社会福利与保护措施相对有限，一切围绕中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经济结果。由于爱尔兰的成功发展与欧盟的经济准入密切相关，因而爱尔兰正在成为中东欧地区经济转型国家的模范。最后，韩国为小型经济体指明了另一条发展道路，这就是：国民教育与医疗保健方面的大幅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面向核心产业的巨额初期补贴，逐步降低进口壁垒，有意引进外企竞争，社会保护与产业补贴逐步淡出，大力扶持创业精神。与爱尔兰不同，韩国最初发展依靠的是独裁政治，不过韩国一直具有实现民主转型的希望。对某些独裁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的亚洲与非洲国家来说，韩国可以成为很好的模范。

最后，很多国家将不会采用上述四种发展模式的任何一种，而且在当今时代，这些国家不大可能实现快速发展，也不大可能出现繁荣景象。大部分中东国家与一部分拉美国家很可能将面临这样的发展进程。然而，所有这些发展变化当中，最令人震惊的大概就是，**欧洲主要国家和日本不再成为可供其他国家效法的经济模范。**

第六章 06

| 美国强权下的地缘政治新格局 |

群雄面面观

FUTURECAST

◆ 美国的经济实力并不仅仅表现为全球最大的经济规模，也不仅仅在于高居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美国从经济方面获得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实力，这首先是建立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能施加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之上。

◆ 在开发新技术及其他有价值的知识财产方面，尤其是在推动世界经济深刻变革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软件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领域，美国具有不同寻常的非凡能力，从中美国也会获得相应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 即便中国企业已经成为美国公司创建的全球供货及分销网络的一部分，也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中美两国的社会价值将会趋于一致。说得明白些，伴随着中国快速现代化而来的，并不是因为中国打算变成美国或瑞典，从而出现天翻地覆的经济、文化断裂，中国只想保持一贯的中国，全球化背景下，尤其如此。

人们对美国独步全球的军事实力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很容易忽视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意义。不同寻常之处并不在于美国的军事、政治、经济能力所能达到的极大限度，而是在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足以抗衡美国的实力，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正如该领域的卓越理论家斯蒂芬 · 沃尔特所说，“事实上，在实力影响所及的任何一个重要方面”，这都造成了“有利于美国的史无前例的力量失衡”。在 17、18 世纪，法国拥有令人敬畏的军事、文化实力，英国与西班牙也是一样，而且英国更为富裕。19 世纪下半叶，英国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经济体，但其经济规模并没有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到 19 世纪末，美国经济就超过了英国。起码在经济方面，直到 20 世纪最后 10 年，贯穿整个 20 世纪前 90 年的，都是十分典型的群雄相争局面。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德国、美国与日本都拥有不相上下的经济、军事、政治及文化影响力，“二战”之后的 45 年间，美国的势力所及也并没有对苏联形成绝对压倒的优势。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拥有超乎历史常规的独特地位，没有实力相近的竞争对手，在国际事务方面，100 多年来形成的势力均衡的地缘政治格局随之终结，至少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内，地

缘政治新格局的形成将会受其根本影响。随着全球化对国际互动关系的影响日渐加大，美国将会充分依赖经济发展来维持其非凡地位。显然，美国的经济实力并不仅仅表现为全球最大的经济规模，也不仅仅在于高居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美国从经济方面获得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实力，这首先是建立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能施加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之上。前文已经提到，美国企业与美国消费者从其他国家大量购买产品与服务，贸易规模史无前例——2006 年，进口贸易额高达 22 000 亿美元，超过除 5 个国家之外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总量，比全球其他国家全部产值之和还要高 6%。这在地缘政治方面十分重要，因为其他国家数千万国民的工作、收入是否有保证，都直接取决于美国经济是否可以保持足够增长。结果就是，当今其他国家权势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美国保持一致，这又反过来制约本国政府采取与美国对立的政策措施的能力。例如，巴西和泰国分别于 2005 年及 2007 年制定政策，宣布美国制造的抗艾滋病药物专利无效——在各国内部，这是一项非法但普遍的活动，他们以此削减公共医疗成本支出，此外，他们也可以仿造药物，出口他国。当遭到本国业界精英反对之后，巴西和泰国政府双双取消了这一政策（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恼怒不已的制药商最新折扣的甜头）。

在开发新技术及其他有价值的知识财产方面，尤其是在推动世界经济深刻变革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软件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领域，美国具有不同寻常的非凡能力，从中美国也会获得相应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几十年前由美国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制造业领域，目前正由别的国家引领产品生产与技术进步，这些行业包括钢铁、汽车、消费类电子产品及其他许多产业部门。北欧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许许多多最具创新能力的 IT 企业的大本营，在无线通信技术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但是，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哪一家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中国企业能够与微软、谷歌、亚马逊、甲骨文、戴尔或安进公司匹敌；在商业模式方面，也找不到沃尔玛和高盛公司的对手。

这种能力提升了美国的全球地位，这倒不是因为美国企业从出口贸易中所得利润不断增加，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与美国渐趋一致。无论这些国家喜欢与否，由于美国企业无远弗届的强大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越来越相似。互联网运行的基础软件系统就是按照典型的美国模式——由基本不受政府管制的企业家——开发出来的，并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开放、分散自治的信息系统。结果就是，不管互联网出现在哪里，它在本质上都是“美国式”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美国公司主导了互联网的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所到之处，美式机会应运而生：互联网使所有信息自由传播，一些企业因而掌握了新兴的信息获取方式，从而得以采用新型运作模式，生产新型产品，开展新式服务。对于世界各地千千万万因此成功的一代新秀而言，他们的个人成就与美国持续发展的科技成就并行不悖，因此美国将会从中获得地缘政治的巨大好处。

美国从本国经济的卓越优势中获得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不过，美国地缘政治的核心力量还是在于，当今世界上，信奉美国经济发展道路与企业运行模式的国家如此之多。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很多国家实行了几十年的其他经济模式基本上被弃置脑后。苏联经济模式瓦解，中国令人吃惊地转向市场经济，世界经济发展由此进入新纪元。而在欧洲，各大经济体要么一蹶不振，要么停滞不前，日本经济连续 10 年增长乏力之后，经济私有与政府主导相混合的经济模式也是吸引力不断减小。尽管欧洲与日本的领导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但是，在经济发展与企业运作方面，美国模式对政府所要扮演的角色有其基本限制，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出令人信服的、可以与美国模式媲美的替代模式，而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就像原子结构一样客观、正确，而是说，当前大部分国家普遍首选美国模式，原因在于美国模式与当今时代的全球化要求相吻合。长期以来，欧洲和日本的发展道路——更不用说前苏联、东欧和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相比，为个人带来

了更为均衡的经济地位，提供了更加安全的经济保障。但是，近 20 年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欧洲与日本模式推动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能力一落千丈——当国民不得不面对越来越穷的发展情景时，即使财富再平均、保障再可靠，吸引力也会大幅减弱。简单说来，当今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仅要依靠政府在教育、医疗及其他现代化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大步迈进，而且也有赖于政府从贸易保护与产业管制政策中抽身而退，因为这些政策足以减缓甚至阻碍这个时代技术、资本及管理经验的大规模转移。全球化推进过程中，美式规则不断普及，并被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推波助澜，而这些国际组织几乎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其中主要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还有以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巴黎俱乐部（该组织致力于解决各国之间无法及时偿付的官方外债）。

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安全，而就美国经济的独特优势而言，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就是，为了维持唯一超级军事强权这一地位，美国经济可以无限期地提供财政支持。2006 年，美国国防支出为 5 700 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军费总和。军费开支严重不对称，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实上，美国军费支出当中，用于研发新的防御系统的费用——2007 年约为 730 亿美元——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全部军费都要高。

庞大的军费支出为美国买来了卓尔不群的军事优势，1 000 多年以来，美国是第一个没有实力接近的匹敌对手的超级军事强权。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陆军、空军、海军，也能保卫自己不受别国侵犯；如果给以充分的准备时间，一些国家也能派出自己的陆、海、空三军部队，到周边区域的其他国家参战。但是，只有美国拥有真正的深蓝海军，有能力在世界各大洋巡游作战。美军所到之处，武器装备也比他国部队领先很多，包括中国、英国及俄国在内。美国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阻止其他国家在境外开展军事行动，正如萨达姆 · 侯赛因的失败教训所揭示的那样。

美国令人敬畏的军事优势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得以强化。美国拥有

长达数千英里的海岸线，因此成为唯一一个与三军力量值得一提的任何国家都不相邻的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的领海与领空也都在美国的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大部分战争都是发端于相邻国家的某种冲突，比如说，即使在今天，**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由于相互接壤，他们也很难联合起来，共同制衡美国的军事优势。**

美国拥有不对称的军事实力，这是几代人执行特定政策的直接结果。过去 50 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发展极具威慑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在军事力量的建设与维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因而形成了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不管其他国家有什么作为，美国都会努力确保自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不过，之所以没有实力接近的匹敌力量，形成相对平衡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不仅仅是苏联最终走向致命失败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几百年来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占有军事统治地位的其他国家——最主要的就是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决定，在过去 50 年里，不再进行军事竞争。相反，欧洲主要国家及日本都把防卫安全寄托于美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旦苏联与中国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他们都让美国去努力制止。这些昔日列强基本上只是维持徒有其表的军事力量，象征意义往往大于实际能力，历史学家保罗 · 肯尼迪称之为美国的“中空联盟”，他说：“美国承担了 98% 的战争义务，英国承担了 2%，而日本则缩头缩脑，不见踪影。”这是一个对所有国家都适合的格局安排，因为这与美苏两国的坚定共识完美吻合，那就是由他们两国主导全球事务的时代已经到来。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并没有设法维持两极体系——何苦维持呢？——而是迅速行动，大力吸收原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加入北约联盟。而且，由于足以抗衡美国的苏联不复存在，欧洲与日本继续削弱自身军事能力——同时，尽管没有了苏联威胁，美国还是保持防卫力量不断升级，也会继续发动新的战争。现在，美国在 100 多个国家，驻扎着数十万严阵以待的美军部队——这还不算伊拉克——同时也为 130 多个国家提供军事训练。有专家指出，所有

欧盟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在 60 天之内将 6 万装备精良的部队投放战场，更无法保障这些部队在战场上连续作战一年时间。

对此，欧洲外交与国防政策领域的精英们已经发出警告，只是迄今没有结果。将近 10 年之前，贝塔斯曼基金会召集欧洲高级专家，发起成立了维纳斯山社团，旨在检验欧洲安全防卫政策，2007 年 6 月，该社团发布了最新也是最清醒的分析报告。他们承认，“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可以被称做真正的军事强国”，进而得出结论：“欧盟现在没有形成，或者一直就没有出现一项行之有效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现在是彻底终结困扰欧洲团结一致的内部结构的时候了”。他们的结论一针见血、准确无误：“如果不能改变内部结构，欧洲人就会失去现在拥有的影响未来发展的各种能力。”

冷战时代，如果德、法、英、日 4 国都能积极参与，以美国为领导核心，成为实力强大的同盟伙伴，那么以往的世界格局就会迥然不同，而且未来也会表现出极大差异。在西方世界与苏联进行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即使欧洲三大国与日本没有全力参与，他们也完全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如果采用这样的发展路线，欧洲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就会大受影响，因为主要国防开支都要靠国内筹集。平心而论，为了对抗苏联，欧洲主要国家选择了让美国承担责任的政策，这使得他们得以集中力量发展并维护那个社会福利、劳工保护及行业管制的庞大网络，而面对全球化的新要求，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这个网络如今却又是那么格格不入。

美国的军事实力并非毫无制约。很多国家都拥有可以打到华盛顿、纽约或洛杉矶的核导弹，起码在极端情况下，这会制约美国的军事选项（英国也有这种能力，不过无须考虑）。更为重要的是，伊拉克战争已经表明，单一军事超级大国打败一国政府是如此容易，而占领一个大国又是何等艰难。此外，基地组织发动的“9 · 11”袭击也表明，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催生了新的攻击方式，这种攻击成为对抗美国军事实力的有效杠杆。

全球化的影响

新型地缘政治关系与全球化进程互相交汇，并表现为三种不同寻常的作用方式。第一，如果不是因为全球化，在几代人的时间之内，中国都将只是一个相当有限的地缘政治力量。现在则相反，通过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经济优势不断提升，因而在未来 10~15 年内，中国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第二，至少在未来 10 年内，全球化都会使得能源供应与恐怖主义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从近处着眼。不过，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全球地缘政治领域的第三个问题，与能源供应、中国影响及恐怖主义相比，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全球化能否从根本上消除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而把地缘政治导向只在已经纳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与依旧游离于全球化之外的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小规模冲突？

通过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国际联系空前紧密，各国之间因而永远不再爆发战争，人们并不是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也不是第一次抱有这种希望。起码早在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愿意相信，在他们那个时代，由于科学进步、理性发展，通过商贸往来这个手段，一定可以毫不动摇地保证世界和平。显然，他们错了。**科学与理性只是让拿破仑的南征北战，以及 1812 年爆发的美英之战，杀伤力更加强大。**19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同样没能带来世界和平。相反，在国际市场上，列强激烈纷争，再加上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总之，世界主要国家一直都为了实现国家富强而不懈努力，这在历史上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且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努力也都会与寻求军事强权的动力密切相关。在同一个地区，一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激烈争夺军事力量的优势地位，他们几乎总是会互相打起来。

当今时代，全球化将会带来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这个聪明的观点是出身哈佛的五角大楼热心分析人士托马斯 · 巴内特提出来的。与其

他人都不一样，巴内特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卷入经济全球化的那些国家与自外于全球化俱乐部的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这是地缘政治的根本决定因素——俱乐部中的所有国家都会设法融洽相处。这并不仅仅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当代翻版。根据巴内特描绘的情形，由于核武器扩散，主要国家之间的常规战争也可以彻底避免，而在那些与全球经济隔绝的国家，其领导人将会发现，唯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我们这个时代，卷入经济全球化的那些国家与自外于全球化俱乐部的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这是地缘政治的根本决定因素——俱乐部中的所有国家都会设法融洽相处。

这一观点的乐观部分起码需要许多令人信服的论据。很明显，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是无法想象的。美国与苏联之间，不止一次处于核战争的危险边缘，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也是一样。而且，过去几十年来，在任何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关于核战争问题，政府领导人最为倚重的军事与外交政策方面的绝大部分资深顾问一直都在苦苦思索。现在看来，在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北京、新德里、卡拉奇、特拉维夫、平壤，以及很快就会加入进来的德黑兰，那些资深顾问的所作所为都是十分正确的。况且，即使贸易联系十分密切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非经济方面，彼此之间依然存在许多严重冲突——不妨想想激烈的能源争夺，以及可怕的领土野心。因此，华盛顿、北京、莫斯科及许多国家首都的军事决策者都已经想好了与另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冲突场景和作战计划：如果战争爆发，一定会采用非核手段交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由于印度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巴基斯坦还在全球化之外，因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与上述论点没有多少关系。

当今时代，全球化背景下，虽然国际互动空前增多，但是与对抗和战争密切相关的各国的国家主义倾向并没有因此缓解。中美两国今天之所以信奉全球化，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提供了一条途径，可以让相关国家在世界

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国家更趋强大。谦卑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典型特征，世界各国习惯于夜郎自大。今天的中国和美国——还有以往的欧洲列强和日本——并不仅仅把自己看做全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自比于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强国，这就是经典的民族主义。即便中国企业已经成为美国公司创建的全球供货及分销网络的一部分，也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中美两国的社会价值将会趋于一致。说得明白些，伴随着中国快速现代化而来的，并不是因为中国打算变成美国或瑞典，从而出现天翻地覆的经济、文化断裂，中国只想保持一贯的中国，全球化背景下，尤其如此。

中美两国今天之所以信奉全球化，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提供了一条途径，可以让相关国家在世界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国家更趋强大。

虽然如此，巴内特及其信仰者还是正确的，未来 10~15 年，国际冲突最可能发生在（全球化俱乐部之外的）穷国之间，或者表现为，针对敌对集团或国家，美国这个单一超级大国，尽其所能联合一切盟国，一道发动有意报复或先发制人式的军事打击。不过，地缘政治新格局的显著特征不会是全球化形成的巨大分野，而是贫穷国家日渐走向崩溃的传统现象，以及单一超级大国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责任的全新情形。

为什么即使在未来 10~15 年之内，全球化也无法避免重大战争，还有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异常可怕的原因。开始是渐渐地，但最终是在突然之间，这个世界就进入了核扩散的新时代，那些被排斥在“全球化轨道之外”的弱国纷纷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门路。过去几十年来，只有繁荣发展的大国才有能力建造核武器，但随着巴基斯坦和朝鲜的核武化，这个时代已经戛然而止。

在核扩散问题上，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恐怖——的发展变化，一直就是核武器技术不受控制地大规模扩散，以至于那些弱国最终也能获得核技术，进而开发制造核武器，发挥其军事杠杆作用。巴基斯坦、朝鲜以及嫌疑极大的伊朗，很快就会成为警醒世人的案例。此外，在整个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已经明确表达了建设核武力量的兴趣，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已经拥有用

于核研究的反应堆，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约旦）也纷纷希望在 10 年之内跟进。

这些国家可以利用反应堆生产钚元素，但只要各国政府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严格控制，监督其核活动，这种风险就会得到控制。朝鲜与巴基斯坦的情况表明，一旦这些国家决定获得核武器，种种控制措施并非防止核扩散的可靠屏障，这是令人警醒的。核武力量不断传播，这并不新鲜，几十年前，艾森豪威尔倡导的“原子弹换和平”，就已经促使核武器加剧扩散。现在出现的新情况是，扩散速度不断加快，不管穷富，那些政权不稳的国家都在寻求掌握核技术，而核技术同时也在不断进步，**一度十分复杂的核武器定制部件已经变成标准工业产品。**

未来 10 年，将会有更多国家寻求核武器。最可能触发核武器急剧扩散的将是政治学家们所说的“连锁反应”，例如，伊朗不断进行核试验，就会引发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加快核武器的研发与试验步伐，这两个国家徘徊于核门槛之外已经有些时日了。这种连锁反应也曾一度出现，以中国拥有核武器为借口印度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而印度的核试验又同样导致巴基斯坦研发自己的核技术。只要有一个国家率先开始，连锁反应就将不可避免。

未来 10~15 年，要想避免区域性世界末日的到来，新近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确立美国与苏联之间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那种相互威慑的战略关系，而且还得有足够好的运气。很明显，未来 10 年，核扩散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中东地区，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对此都表现出浓厚兴趣。如果伊朗最终拥有核武器，而又不能举止规矩，那么美国、俄国及中国都不大可能阻止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走向核武化，同时也无法阻止以色列做出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反应。与强国相比，弱国在冲突中更有可能相互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因为对手的核武器数量十分有限，使用核武器实施首轮打击就成为一个更具诱惑力的选项。几乎可以肯定，未来 10 年，如何避免中东地区核武爆发带来

的全球灾难性后果，将是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甚至欧洲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超级强权

过去 15 年来，在全世界任何地区，都是美国一国独自拥有强大权势，承担着相应责任。未来 15 年，在地缘政治方面，不管伊拉克战争结果如何，美国独步天下这个至关重要的唯一因素依然不会改变。极少数富豪尽管腰缠万贯，但是在生活当中，他们好像总是担心还要支付下一张账单似的，与此相仿，超级强权的行为方式，几乎总是建立在其独特地位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异常强大的权势。在任何一个地区，无论美国采用什么步骤，实施什么行为，都没有实力相近的力量能够制衡、阻碍或者正式挑战美国的这种能力，因而从现在到 2020 年，以至更长时间内，美国的关切与行动都将遍及全球。

在这个问题上，克林顿总统与布什总统所见略同。在军力调用方面，虽然克林顿比布什动用军队的规模小得多，密度低得多（尽管也有很多零星的部队调动），但是克林顿执行地缘政治路线的全球性与积极性一点也不输于小布什。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国向台湾海峡派出航母舰队，同时也利用美国市场准入这个条件，要求中国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开放国内竞争及外商投资。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冻结了朝鲜的钚元素生产；通过北约和欧盟，结束了巴尔干地区的连年战乱与政权更迭；把俄罗斯纳入八国集团，吸收华约组织国家加入北约；解除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的核武装；约束了萨达姆 · 侯赛因的个人野心；利用新的贸易制度安排，促使墨西哥结束了一党统治；恢复了海地的民主进程；保护了西方资本市场免受亚洲及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冲击；在爱尔兰问题、印巴冲突及土耳其和希腊的争议方面，成功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在中东问题上，尽管不是十分成功，但也发

挥了相当的调停作用。努力追杀本·拉登，同样也是克林顿政府的一个明确目标。

克林顿及其前任老布什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外交政策，这与小布什及其幕僚奉行的很不一样，由此导致并不相同的地缘政治战略方针。但是，放眼全世界，上述差异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强权这一事实，也不会改变这个无可避免的逻辑规则。

当其他国家都无力阻止美国继续推行自己选择的政策时，这种政策就有可能遭遇失败，或者说政策导向可能会出现严重错误，以至于即使政策成功执行，最终也会损害自身利益（及其他国家利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人们都会认为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彻底失败，而且这一政策的错误导向也一直都是致命性的。至少，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超级强权可以轻易推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并不意味着必然能够成功占领这个国家。**这种结果不仅会影响未来的美国总统及其幕僚的战略判断，而且也会对其他国家或集团的战略决策造成影响。为了对抗超级强权的传统军事优势，伊拉克反对武装采用了超乎常规的战略战术，其结果也将导致这种做法的不断扩散。由于美国自诩的“网络中心战”被证明无法有效对付路边炸弹，未来美国军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作战，势必再次遭遇这种战术。然而，未来10年，即使在中东地区，并不愉快的伊拉克冒险经历丝毫也不会减弱美国的参与积极性。事实上，美国在该地区——如同在拉美、亚洲、欧洲一样——的积极干预主义已经融入美国的全球利益，也成为单一超级强权地缘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

最新发布的来自五角大楼与美国国家情报评估部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表明，全面开放、积极参与的全球性角色刚好就是美国顶级军事、情报战略制定者眼里的未来美国定位。事实上，与冷战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在言辞方面，看上去也是只有俄罗斯及其他几个小国——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偶尔会有意挑战美国，而在大部分领域，

这些国家也都随时准备与美国打交道。然而，在那些就世界局势向美国总统建言献策的所有专家看来，美国采取全球性的积极干预政策也是迫不得已，这种看法是基于对美国利益敌对分子的破坏“能力”与美国具备的反制能力所做的考虑。美国的关注范围遍及全球，这是与恐怖集团势力影响波及整个世界——据说如今已经在 80 个国家活动——相伴而生的，因为他们可以在全世界对美国的利益与财产造成损害。五角大楼对此说得十分明白：“美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忙于应付一场持久战，为的就是打击极端暴力分子，他们以恐怖主义做武器，企图破坏我们的自由生活方式。”

这些战略分析家们密切关注的美国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未来 10 年防务政策的最终目标，远远高于“击溃恐怖网络”和“保卫祖国家园”。比如，沙特阿拉伯就有中断美国石油供应的能力，中国也可以凭借不断提升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影响，迫使邻国关闭美国军事基地。再往下说，朝鲜也有能力向其他“无赖国家”出售尖端武器和导弹技术，俄罗斯也可以中断输送到很多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与电力供应。美国高级防务与情报战略分析人士采用的思维方式就是从全世界着眼，在“影响其他国家的战略抉择”方面，美国可以随意行使超级强权，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政策选择，包括认为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为了准备动用武力，五角大楼也在重组军事力量，“摒弃冷战时期死守军事要塞这一陈腐过时的静态防御思维，把重点放在迅速抵达全球任何一个出事地点的反应能力上面……确保能够同时应对多场战争。”

最新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采用了拓扑技术来组织表述美国面临的全部威胁，面对这些威胁，在可以遇见的未来，要求美国必须具备广泛运用军事力量的能力。第一，美国面临传统威胁，这些威胁来自具备“公认的军事实力，在军备竞赛与军事冲突中，采用常规手段”的那些国家。尽管今天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抗衡美国，总结报告还是展望了一代人之后的可能情形，到那个时候，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真正的军事对手，为此他们呼吁发展新一代战略导弹与防御系统。在采用新型尖端技术应对常规战

争的现行计划之后，五角大楼也展望了未来发生传统武装冲突的前景——美国这个超级强权可能决定对另一个敌对国家（类似于伊拉克）开战，也可能是美国卷入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爆发的传统战争（几乎每个国家的不远之处都有美军驻扎）。在美国防务规划制定者的考虑当中，爆发战争可能性最大的国家就是非洲石油输出国，此外还有印度与巴基斯坦，以及某些来自前苏联的独立国家。

第二类威胁就是美国防务规划制定者所谓的“为了对抗强大对手的传统优势，那些采用非常规方法的国家带来的不规则挑战”。这类威胁包括美国境外的恐怖主义，伊拉克式的反对武装。还有就是仅仅把这类威胁列为第二，由此可见美国发展相应“能力”，确保打赢下一场此类战争的军事决心不够坚决。在那些战略分析者看来，还会出现类似情况，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只要能够说明他们所谓的第三类威胁就好，这就是“涉及劫持、占领及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灾难性挑战”。美国的伊拉克政策遭遇的失败，尽管已经对布什总统及其政党的声誉造成政治伤害，但是并没有改变未来美国总统面临的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显著威胁。在美国国内，很少有人——在欧洲可能也不会有很多人——会反对将来对敌对国家发动先发制人式的军事打击，只要能够成功阻止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行。现实问题在于，阻止这些国家获取核武器的动机与行动究竟如何，更不用说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了。因此，为了反制这类威胁，美国的行动目标有必要集中于阻止其他国家实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五角大楼现在强调，他们的迫切需要不仅在于“针对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核武器的先进检测技术”，而且在于“持续监控能力、情报搜集能力、全球机动能力及快速打击能力的更新与提高”。

如果有谁对美国军事战略家的全球性路线依然有所怀疑，那么他们提出的第四类威胁一定会让他疑惑顿消：“对手发展某些技术，利用技术突破消除美国在关键领域的军事优势，从而带来破坏性挑战”。这类威胁类似于

“9 · 11”袭击，但是需要利用极端高科技，因此必须调用一个国家的资源才能实施。他们在这里考虑的其实是，尽管中国和俄罗斯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花费数万亿美元军费，才能匹敌美国各个方面的军事能力，但是中俄两国及其他几个国家完全可以集中发展某些突破性技术，以此使得超级强权的某些关键能力失去作用。比如，上海和圣彼得堡的科学家可以开发纳米技术，让坦克与飞机瘫痪；也可以制造软件病毒，搞乱美国的金融系统；或者更厉害，编写战争程序，穿过美国水利大坝与核设施的安全屏障，打开水闸一泻千里，启动核反应堆，使之融毁。五角大楼同样也对太空武器和定向能武器忧心不已，因为这类武器可以彻底破坏美国军事系统。

历数上述种种威胁之后，五角大楼就要求增加军事研发的年度预算份额。未来 10 年，美国年度防务研发预算将会超过 1 000 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被用于更好地发展五角大楼罗列的上述各种能力：持久可靠的监视能力、情报搜集能力，全球机动能力、快速打击能力，稳定可靠的非常规作战能力、对暴力叛乱与武装暴动的镇压能力、针对涉及基因工程的生物恐怖活动的医学反制能力，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核武器的尖端探测技术能力，更加先进的核威慑能力，覆盖更广的无人监视能力以及新一代远程打击系统的作战能力。

在五角大楼及白宫的计划报告中，提到这些威胁时，除了强调军事研发投入，他们也很愿意公开描述每个领域大幅增加的特种部队：新增 3 500 名心理作战人员，采购更加先进的“掠食者”及“全球鹰”无人驾驶飞机，发展三叉戟潜艇能够携带的新一代常规弹道导弹，开发不携带核弹头但可以摧毁敌方军事力量的新一代陆基导弹。

根据上述报告的描述，美军把未来战略规划与装备采购的重心放在应对恐怖主义的同时，也瞄准了未来来自中国的种种威胁，这是因为，据说在“高端不对称军事能力、电子战争及网络战争、反太空作战、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高级综合防空系统、新一代鱼雷技术、先进潜艇技术、现代化陆基与海

基精准战略核打击能力及大范围无人驾驶侦查飞机技术”等方面，中国正在加大研发投入。2007 年早些时候，中国摧毁了一颗自己的气象卫星，由此引发五角大楼好一阵狂乱，因为由 100 多颗军事监察与军事通信卫星组成的美国太空力量，在反卫星武器的有效打击之下，将会陷入瘫痪。

对于全球性超级强权而言，相关利益无处不在，未来面临的威胁也不限于恐怖主义、网络攻击以及来自中国的军力挑战。一些问题的出现频率日益提高，人们新近意识到的威胁不断上升，由于美国对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予以足够关注，由此产生许多新的安全问题。例如，对于非洲地区的艾滋病问题，布什政府密切关注，其推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这种流行病的社会侵蚀效应，可能会使某些非洲伊斯兰国家成为恐怖主义的天堂，或者危及非洲的石油输出。美国是唯一一个把世界划分为几个军事“司令部”的国家，新近成立了非洲司令部，这也正是原因之一。非洲司令部与太平洋司令部（亚洲）、欧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中东）、南方司令部（拉美）及北方司令部（为协调本土防务而于 2002 年设立）平起平坐。

把非军事问题作为新的安全威胁对待的做法始于气候变化，未来 10 年，这一趋势势必大大加强。2006 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一些科学家刚刚平息国内关于气候变化风险的政治争论，2007 年，一些退役陆军将军与海军上将等高级军官又引发了相关了争论。他们认为，哪怕是轻微的气候变化，都有可能强化恐怖分子的破坏手段，进而带来可怕的暴雨、饥荒、缺水及疾病流行等灾难，因此，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在此之前，采取强力措施，应对全球变暖。美国驻欧洲海军前司令约瑟夫 · 洛佩斯上将提出了如下理由：“由于气候变化，世界上一些地区已经成为极端主义的肥沃土壤……这就创造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反恐战争的规模势必极大扩展。”

美国独霸

未来 10 年，为了维持在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主导权，美国将会采取什么步骤，其他各国政府又将如何反应，这是决定今后地缘政治形态的两个因素。几乎可以肯定，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建言献策的顾问们将是信奉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经过长期观察，他们早就发现，**当一个国家远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的时候，其他国家就会变得极其不安。**正如哈佛大学沃尔特教授所说，“对于力量不平衡的强大权势，各国的反应就是反对具有支配地位的那个国家，以此寻求力量平衡。”个中原因很容易领会：一个任何国家都无法制约的强权国家，很可能会打碎其他国家许许多多的坛坛罐罐，即使这个国家原本无意如此。1970 年，美军在柬埔寨追击越南北部武装时，根本就没打算动摇柬埔寨的政局稳定，更不可能想到最终会为红色高棉铺平了发展道路，这与布什政府没有料到入侵伊拉克会引起伊拉克宗派内战，更没想到会让伊朗军队乘机做大一样。但是，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价值观念的差异也会推动各国设法制衡超级强权的影响力，特别是当超级强权的外来价值观强行进入，而相关国家并不欢迎的时候，这种反应尤其明显。很多沙特人痛恨美国人带来的风俗习惯，结果之一就是，沙特阿拉伯为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分子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

五角大楼与那些现实主义者观点一致：“我们处于世界事务的领袖地位，这将继续导致其他国家感到不安，他们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怨恨，甚至可能抵抗美国。”这也是许多外国官员公开发表的生动说辞。例如，几年前，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费舍尔就提出警告，“超级强权的国家利益成了军事行动的判断标准，这样的国际秩序确实是不行的”；费舍尔当时的法国同行韦德里纳也提出：“法国整个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让未来世界由多极组成，而不是仅仅只有一极。”

事实上，尽管中国与俄国显示出奉行这种公理的迹象，但是欧洲及大多

数亚洲国家都不会这么做。除了公开抱怨，德、法、英、日等国一点也没有真正努力，以求地缘政治力量更加平衡；而且未来几年，他们很可能仍然不会那么做。对于不受约束的美国政策导致的后果，尽管欧洲国家和日本也都感到担忧，不过他们依然还会保持超然态度，因为这些政策并不会给他们的自身利益造成直接威胁。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对于过去几十年出现的重大冲突，几乎都没有投入多少钱财与关注，因而在全球事务上，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发挥制衡作用。即使自己后院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欧盟都没能发挥领导作用，而是等着美国带头处理科索沃与波斯尼亚问题。

事实上，欧洲看起来也并不热衷于此。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最近举行的大选中，没有一个主要候选人主张欧洲应该扮演重要的全球性角色。唯一的例外就是，在美国领导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多有贡献；另外还有，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英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个问题上，现任英国首相戈登 · 布朗及其继任者不大可能效法前首相托尼 · 布莱尔。在未来 10 年的某个时候，假如欧洲领导人决心恢复欧洲在世界事务上的重要地位，那么他们就得具有英雄般的说服动员能力。公众意见调查显示，绝大部分欧洲人都不认为承担全球责任是值得恢复的历史传统。由于德国、法国、意大利及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越来越疲于应付供养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的成本压力，尤其是在全球化还会继续延缓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上述态度只能是更加坚决。

在老布什与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与欧洲及日本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抵触。一个原因就是，两位总统在行使美国强权时，时机与地点的选择都是在联合国或北约组织的框架下完成的，而且这些政策都是对冲突行为做出的反应。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波斯尼亚战争的经验表明，只要在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存在一种势力平衡的关系，美国就可以自如地凸显其军事威力。在军事领域之外，美国也成功化解了其他国家的制衡冲动，办法就是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直接性问题上，容许国际机构与美国不一致。在世界贸易

组织之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清晰：欧盟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时常赢得针对美国的贸易诉讼，甚至会迫使美国国会修改影响贸易的有关特定补贴法规。

至于俄罗斯，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未来 10~15 年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俄罗斯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因为它有在各种事件中发挥影响的愿望。但是，俄罗斯不会成为地缘政治的真正强权，因为它不再拥有操纵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所需的军事、经济及政治资源，更不用说对付超级大国了。早在 17 多年以前，叶利钦上台掌权时，俄罗斯目前的国际地位基本上就已经确立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军费支出削减幅度高达 90%，军事人员减少一半，叶利钦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到 1999 年，数万俄罗斯军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 5 000 多名伊斯兰好战分子组成的乌合之众打回车臣——这可比 1990 年及 2003 年美军收拾萨达姆部队用的时间还要长。此外，一度令人恐惧的俄罗斯战略武装系统如今也是严重过时，严重恶化到不堪依靠的危险境地。一位美国专家对俄罗斯的现有常规武装力量不屑一顾，将其形容为“穷困潦倒、难当重任、死气沉沉、行动迟缓”。尽管这种说法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现有问题，不过，俄罗斯陆海空三军现在所进行的训练十分有限，武器装备非常糟糕，以至于真正打仗时，作战能力也许不会高于意大利军队与日本军队。在苏联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所及的地区，当年苏联振臂一呼，世界性联盟随即形成；他们展望的世界远景，也会吸引许许多多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大批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就纷纷转投北约怀抱。

在全球经济舞台上，俄罗斯现在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其重建其雄厚财力的经济前景十分黯淡，也难以恢复昔日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全球油价高企，推动俄罗斯经济连续增长，2006 年 GDP 达到 9 870 亿美元，但是仍然不及巴西和加拿大，仅相当于美国 GDP 的 7.5%。即使考虑到国别生活成本差异，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也还是低于意大利，仅略高于巴西。即便俄罗斯今天打算重建其军力，也支付不起所需军费。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同样没有能力重振军力，因为它的经济发展

曲线很可能会不断下行。普京政府随意剥夺合法权利、蛮横没收私人财产的行为，打击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性，而贫穷落后的俄罗斯又恰恰十分需要外商投资，以便实现至关重要的能源部门的现代化，以及建设发展新兴产业。2005 年，整个俄罗斯联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 1 320 亿美元——低于新加坡、墨西哥、巴西、比利时的外商投资水平，还不到中国的 1/4。在未来国内局势稳定方面，俄罗斯也难以让外商恢复信心。俄罗斯不仅当前面临车臣及北高加索其他穆斯林地区的挑战，必须随时应对他们的独立活动，而且在今后几年，还将陷入与其他前苏联国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之中，其中包括：关于摩尔多瓦境内德涅斯特沿岸地区的争议（俄罗斯仍然在此驻有少量军队）尚未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从阿塞拜疆分离出去的努力持续不断，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西亚与南奥赛梯地区的分离运动此起彼伏。

就算俄罗斯有钱也有意重振昔日军威，恢复庞大同盟，它还得面对全世界恶化速度最快的人口结构：用不了多久，俄罗斯就会直接面临在地缘政治方面举足轻重的人口人力短缺。20 多年来，俄罗斯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一路缩短，而且过去 10 年，这一趋势不断加速。俄罗斯男人的平均寿命如今已经不到 60 岁，这就意味着，埃及、危地马拉以及越南的男性人口平均寿命都要高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出生率也是非常低，不过，死亡率奇高，2000 年以来，每年新生人口都比死亡人口少了 100 万。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俄罗斯政府放弃了承担国民医疗义务。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最近年度统计，2003 年俄罗斯人均医疗支出不足 187 美元——与之相比，哥斯达黎加高出 50%，波兰 2 倍于此，美国人均医疗支出为 5 705 美元，高出令人震惊的 30 倍左右。还有比高死亡率更严重的，最近进行的健康普查表明，一半以上的俄罗斯儿童正在遭受几种慢性病的困扰。

据俄罗斯科学院预测，到 2020 年，俄罗斯人口将比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少 5 000 万——略高于墨西哥——人口平均寿命也会落后于印度及孟加拉国。在这期间，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将会减少近 15%，儿童数量预计减少

20%。至于俄罗斯的军事雄心，由于婴儿出生率极低，15~24 岁年龄段男青年的死亡率奇高（3 倍于美国），综合作用之下，俄军预备役人口数量减少幅度将近一半。在这些条件制约下，问题就不是俄罗斯是否想要恢复昔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是很可能会导致的大规模动荡不安。

尽管俄罗斯军事、经济及人口实力处于边缘地位，但在未来 10 年的地缘政治竞技场上，俄罗斯手中还有两张牌可打。第一张就是，国境线长度居世界第一，有关朝鲜、中国、阿塞拜疆、伊朗及里海地区的任何冲突必然也会涉及俄罗斯。第二张牌更为重要，在能源供应方面，俄罗斯是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现在，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也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第二大石油产出国，其煤炭生产世界排名第七。未来 10~15 年，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不会明显削弱，因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一，煤炭储量居世界第二，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八。事实上，只要俄罗斯加大投入，实现石油生产的现代化，并采取有效步骤，鼓励西方石油公司扩大在俄罗斯的投资规模（普京处理尤科斯公司之后，西方石油公司不再看好投资俄罗斯），未来 10 年，在全球能源市场上，俄罗斯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今天向德国提供 1/3 以上的天然气及 2/5 的石油供应，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 2020 年，俄罗斯将会成为欧洲石油与天然气的主要供应来源。一个原因就是，正在修建的一条主要管道，将连通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布尔加斯和希腊港口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因此俄罗斯石油可以直接输送到欧盟国家。俄罗斯电网同样也为许多欧洲地区提供电力供应，特别是中东欧地区那些以前的卫星国。此外，俄罗斯最近开工修建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长达 2 600 公里的石油管道，这将使得俄罗斯成为日本的主要石油供应者之一。

俄罗斯的石油及天然气武器将会给它带来真正影响力，但是在成为地缘政治强权方面，这些武器不会有多少真正作用。它可以利用能源供应，胁迫前苏联加盟国家，尤其是现在还在俄罗斯联邦之内的国家，做出政治让步；

它也能够利用长期合同，确保欧洲及亚洲国家做出经济及贸易让步。但是，它无法以能源资源为战略手段，制衡甚至影响美国的各项政策，即使在涉及诸如其邻国伊朗这样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对俄罗斯而言，比欧洲和日本更加不是滋味，但是，它还是不得不换种方式，眼看着美国在自己曾经主导的地区追逐其全球利益。

中国的思维

中国与美国被视做地缘政治上的潜在伙伴，或者是潜在对手。然而，考虑到中美之间政治制度的巨大鸿沟、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迅速提升的军事实力，未来 10~15 年，美国几乎不可能跟中国走得太近，把中国当做真正同盟，这与美国对待欧洲和日本的方式截然不同。对中国来说，未来 10~15 年，积极参与美国主宰的地缘政治的势头看起来将会不断增强，其所关切的问题也会持续增多，在亚洲地区，尤其会是这样。这个时期，中国制衡美国全球政策的实际能力也将不断加强，不过，即便是在本地区，中国遏制美国行动的能力依然有限。

中国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正式基础，这是由周恩来于 1953 年制定的，30 年后被写入中国宪法。五项基本原则的前三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五项原则也表明一个国家力争强大，确保不再被其他国家主宰的决心，尤其是后面两条原则呼吁实现“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在这一框架之下，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同寻常，外交努力的限度深受政府坚持的内政优先这个原则的影响，他们把尽可能快地实现现代化、尽可能快地推动经济增长作为优先目标。尽快实现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抵御潜在敌人，保卫自己国家的一项必要条件。对中国而言，除此之外，现代化战略还有赖

于跟带来巨额直接投资的那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其经济增长同样有赖于跟大宗进口中国出口产品的那些国家发展良好关系。

中国领导人好像总是紧盯着经济增长、现代化建设以及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外交政策不放，因为显然他们相信，这是最终能够保证继续获得人民拥护的依靠所在。考虑到过去几十年来，一代以上的中国人失去了太多东西，这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首先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数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没了工作，家庭被毁。然后又是急剧推进的社会转型，很多中国人信仰沦丧，一系列激烈的农业改革，也让亿万中国农村家庭付出了沉重代价。紧接着，大量的国有企业纷纷倒闭或者改制，每年都有 1 000 万 ~2 000 万国企职工生计受到影响。由于农村公社解散，许多国企倒闭，大部分中国人失去了公共养老和卫生医疗保障。

《经济学人》杂志编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面临严重的不稳定吗？”他们的答案是：“长期看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这个结论可能言过其实，不过，中国领导人对社会稳定高度关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他们来说，执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现代化进程的外交政策是十分紧迫的。单是这重关联，就足以使得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成为胡锦涛主席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思路”。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每年购买 30% 的中国出口产品（仅沃尔玛，每年采购额就超过 150 亿美元），况且美国还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商品，这也间接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全球需求。美国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海外投资，或者直接投资中国，或者作用于其他经济体，间接惠及中国。

在中国自己设定的发展道路上，美国扮演着中心角色，这有助于解释每当美国国会，或者更坏情况下，白宫时不时地举起贸易大棒的时候，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就会紧张不已。如果美国呼吁削减对华贸易额度，在中国听起来就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发出威胁，而在那些愤世嫉俗、满腹狐疑的官员看来，这简直就是超级强权企图破坏中国稳定的一个阴谋。为了阻止美国发出这类

呼声，中国领导层最近加强努力，大力增加对美国的进口贸易，过去 10 年，美国对华出口增加了 300%。除非中美关系因为其他问题破裂，否则，未来中国将会继续为美国当前的预算赤字提供财政支持，继续扩大对美贸易进口，对美国企业开放新的领域，尤其是金融、商务及医疗等服务领域。屈从来自美国的压力，按照美国的希望让本国流通货币贬值，这是中国不会做的事情，因为这将导致出口减缓，而且也是放弃本国相关主权的表现。

未来 10~15 年，中美关系何以能够继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议题，国家主权及实力也是一方面原因。在主权问题上，中国当前严重关切台湾、西藏及新疆，中国领导人将其看做纯粹的内政，并且认为美国强硬派可能会利用这些问题分裂中国。近年来，中美关系最坏阶段出现在 1996 年，那一年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举行海空实弹演习，克林顿政府对此做出反应，派遣航空母舰进入台湾海峡。这一事件给北京留下了深刻印象。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 · 贝德最近写道："中国军事计划有一个压倒性的目标——在台湾海峡用兵，阻止台湾正式独立。"

对中国来说，如何容忍担负全球责任、每个地区都是其影响范围的单一超级强权，将是更大的主权问题。英国、日本、德国、法国以及俄罗斯一样也得忍受这一现实，不过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角色趋于衰落已经有些时日了。而中国的实力正在上升，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看来，中国的战略规划大纲就是扩大经济、军事资源，制衡甚或遏制美国追逐自身利益的能力，起码先在亚洲地区实现这个目标。

对于一些全球性问题，中国已经开始在地区层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帮助劝说朝鲜放弃核计划，为阿富汗重建提供援助，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审查伊朗核计划议案。关于中国的地区性雄心，一些著名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已经开始发表强力文章。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说，中国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大陆性强国，不得不与大批周边国家打交道，其中包括印度、蒙古、巴基斯坦、俄罗斯及日本，还有就是中亚国家。

王缉思也曾写道，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不会给任何一个“地区伙伴”带来威胁，而是会为反抗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提供保障。

最近几年，中国解决了同几个中亚国家及俄罗斯之间长期存在的边界纠纷，也与印度正式展开边界会谈。对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也努力使自己跟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美国平起平坐。过去 10 年，中国与新加坡、韩国、泰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分别增长了 350%、700%、835%，与印度、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之间，增长更是超过 1 000%。所有这些贸易伙伴对中国都维持出超。

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已经悄然展开。尽管以中国今天的军力，可能还不足以一举拿下与日本存在争议的岛屿或与印度存在争议的领土，但到 2020 年，在亚洲地区，除俄罗斯之外，中国将会成为可以俯视任何国家的军事强国。在此期间，美国的亚洲战略就是尽可能强、尽可能久地有效延缓中国的地区影响。美国与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经过漫长时间才最终落实，就是这一战略的内在意图，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几年美国对待其他亚洲国家的典型模式。为了压缩中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个亚太地区，美国正忙于打造一张军事基地大网——基地遍布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外交政策》杂志把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和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称做美国最重要的两个全球军事基地）。美军所有这些前沿部署，也可以发挥压制俄罗斯与伊朗野心的“双重作用”。

在亚洲主要国家当中，中国不大可能找到任何一个对抗美国的真正同盟——尤其是日本、韩国、俄罗斯，都不可能。由于彼此临近与石油供应等原因，克里姆林宫对中国挑战的担忧，更胜过中国对美国挑战的担忧。除了日本和英国，韩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与美国的联系比任何国家都要紧密。尽管日本广泛参与中国经济，但是中日关系冰冻已久。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参与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中国

都会出现公众反日示威游行，甚至通过其他方式攻击日资机构的活动也会出现。在一些更加重要的场合，中国与日本也会展开直接竞争，其中包括对来自西伯利亚的石油与天然气引进权及东海油气田钻探权的争夺，中国也一贯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与此同时，日本还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中国也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未来 10 年，单是这层关系就将使得保持和平成为双方政府自然而然的优先选择。这肯定也是日本商界的观点。正如日本连锁零售巨头永旺集团总裁冈田元也不久前所说："人们曾经对中国威胁议论纷纷，不过我相信，中国人民会让我们更加富裕。"

随着中国提升军备，日本的战略规划及其与美国的防卫联系都会大大加强，这也是十分明确的。过去几年来，日本国防规划方针一直强调两点，一点就是以美日联盟为中心，另一点就是看起来针对中国军力提升的装备更新、采购计划，其中包括新型运输机、"应对入侵外岛"的战斗机和驱逐舰、侦测并跟踪来犯弹道导弹的新系统（后者也以朝鲜为目标）以及获得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新协定。日本紧抱美国的决心足够强大，尽管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遭到广泛的公开批评，2003 年末至 2006 年中期间，东京还是派出 1 100 人的自卫队，支援美军作战。

然而，中国领导人或许也可以确信，一段时间之内，日本仍然会维持无核化。首先，只要日本还好好地待在美国的防卫范围之内，拥有核武器就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个超级强权不会支持。虽然说日本公众反对重振军备的力度不如以前大了，但是诸如日本防卫大学战略专家神谷万丈等人还是认为，日本的原子弹一旦爆破，就会引起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的不信任，同时也会推动韩国与台湾紧随其后。即便是京都大学中西辉政这样与众不同的分析人士，尽管一直批评美国的"全球性、单边化"世界政策，认为日本应该考虑拥有核武器，他也还是同意，中国军力提升增大了美国作为日本天然同盟的价值。

在中国地缘政治发展路线及中美关系走向问题上，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就是，未来 10 年中国本身的政治演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 · 奈对此一直都持乐观态度，他提出，中国经济十分依赖外国市场，国内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这两个因素已经开始约束威权政治制度，中国利益与美国利益更加趋于一致。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可以向美国说“不”——对于伊拉克战争，德国和法国就是如此。不过，向单一超级强权说不常常并不能影响其行为，即便是在涉及自己邻国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到下一代人的时候，中国可能会有必要的经济、军事资源，可以向美国说“不”，并且能以实力为后盾，令人信服地支持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更有可能。但是未来 10 年内，这种情形不太可能出现。

谁能制约强权

稍后我们将会讨论未来 10 年两个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能源与恐怖主义。当前美国最大的全球军事行动就是武力推翻萨达姆政府，随后占领伊拉克，在此我们通过分析这一事件，得出关于地缘政治基本格局的结论，以此结束上述讨论。

未来 10 年，伊拉克传奇将会如何展开，没有人知道；当你阅读至此的时候，形势可能与 2007 年中期本书写作时的情形大相径庭，发展变化的方式没人能够预知。然而，伊拉克业已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发展方式，已经为我们洞察未来 10 年地缘政治的关键特征提供了参照。

先从显而易见的事实开始：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强权完全根据自己的决定，基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发动一场在经济、政治方面极大地牵涉所有重要国家的重大战争。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美国遭到了 4 个地缘政治大

国——法国、德国、俄国、中国——的反对，仅仅得到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支持，而真正提供物质支持的更是只有 1 个国家。列强实力均衡的地缘政治格局终结之后，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改变美国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美国把从联合国取得的授权自行解释为对其军事行动的正式同意，宣称美国有权利——实际也就是强权——自行开展后续行动，而无须其他任何国家的批准。美国开展重大军事行动，真正需要的唯一支持其实是国内的政治赞成，人们普遍认为，走联合国的程序正是布什政府争取国内支持的主要目的。

因为一个超级强权无需征询他国意见就可以做出此类决定，所以它也就用不着再去诉诸传统的开战原因——诸如明显的侵略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人道主义灾难（塞尔维亚）及盟国遭受攻击（越南战争及第一次海湾战争）等。相反，美国提出了发动先发制人式的战争，进而改变一国政权的超级强权新信条。按照这种信条，差不多在每一个人看来，因为“丧失理性”的敌人手中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先发制人式的战争就是极其正当的——尽管 20 世纪 50 年代的苏联同样奉行这一信条。美国从来没有正式考虑过对苏联单方面发动一场先发制人式的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需要美国具有极大的军事优势，能够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完成，而且也还不会卷入其他国家。2007 年 6 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党内提名初选电视辩论期间，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式的战争显然成了未来美国领导人世界政策观点的一个重要部分，几位辩论者说，为了结束伊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他们将会考虑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核武打击。

即使伊拉克战争结果十分糟糕，未来各届美国政府都不会重蹈覆辙，那也不会影响这个超级强权根据自己决定发动战争的能力，同样也不会消除某些国家面临的遭受先发制人式攻击的潜在威胁。那些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国家也没能让美国付出足够的政治代价，从而迫使它在发动下一场战争时，必须获得他们的支持。未来的美国总统在考虑是否发动另一场攸关美国根本利益的先发制人式战争的时候，决定性问题依然还是战争的

成功前景与国内的政治支持程度，而不是其他国家是否支持这一政策。

这种决策很可能还要涉及中东地区。虽然说美国利益遍布全球，每个地区都有美国的积极参与，但是，**对美国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利益还是在中东及亚洲地区。**亚洲必然会受到超级强权的高度关注，因为亚洲有中国，中国对于美国经济以至整个世界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中国也是具有有效挑战美国的能力与倾向的唯一大国。未来 10~15 年，中东地区将是美国地缘政治持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石油都在这里，每个主要经济体都要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不幸的是，绝大部分石油都埋藏在中东国家的沙漠之下，这些国家的专制政权又是十分脆弱，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近在咫尺，而巴以冲突本身就是地区紧张与局势不稳的根源之一。作为唯一的超级强权，美国默默地充当了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担保人，维持着该地区许多君主专制国家的稳定，其中也包括以色列过去 50 年来的安全稳定。未来 10 年，这一切都不会改变。最后还有，中东地区也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首要温床，并向恐怖集团提供支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恐怖集团还将继续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不成功，这同样也不会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立足根基，相反，这一根基最终还会更趋牢固。不管是谁当选总统，未来 10~15 年，美国都将以咄咄逼人之势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及其地区冲突，包括发动另一场重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可能。即便是美国最终发现无法把伊拉克作为永久军事基地，美国在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及土耳其也都建有军事基地，而且该地区其他地方也还有美国的秘密基地。

伊拉克的传奇故事同样表明，真正能够约束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强权的唯一力量来自美国人民：他们可以迫使美国政府做出其他国家要求不了的行动，也就是说可以改变事件发展进程。一开始就反对政府的伊拉克政策的美国人显然是少数。只是在转而反对这项政策的美国人明显居多之后，政府政策才开始改变，他们反对的并不是政府想要实现的目标，而是在实现目标的

过程中遭到的失败。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的很多行为，美国人都会原谅，但是他们不会原谅失败。

伊拉克战争也提供了一把检验美国这个超级强权在地缘政治方面真正实力的重要标尺。现在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能够迅速而又令人信服地打败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仅凭一己之力，美国无法实现其所追求的民主政权的顺利更替。它可以击溃外国政府的大批部队，但是难以改变该国的社会动力。关于伊拉克政策，是根本目标太过远大，还是仅仅计划不周、实施不力，一场旷日持久的政策辩论已经在美国开始进行。外交政策与安全防务方面的专业人士如何解答这个问题——还要考虑美国公众是否认可——将会对美国在维持唯一的超级强权期间如何处理地缘政治问题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专家都会同意的一点就是，在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一旦推翻旧政府，美国不大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维持该国稳定。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 · 多宾斯明白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主张以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模式作为处理伊拉克问题的正确典范，由美国率领北约联军，通过相关邻国的协作配合，成功平息伊拉克境内令人痛苦不堪的种族冲突。不过，科索沃与塞尔维亚都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先例，因为如果想用这种模式有效解决伊拉克问题，就需要动用 50 万国际部队，还要取得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及叙利亚等邻国的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伊拉克研究小组”的分析报告同样表达了类似观点。这个小组体现了华盛顿老一辈高层人士的世界政策观点，小组成员包括 2 名前国务卿、1 名前联邦法院大法官、1 名前国防部长、1 名前白宫办公厅主任、2 名前参议员、1 名前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及 1 名声名显赫的华盛顿政治活动人士。他们的关键意见如下：

美国应该立即发起新一轮外交攻势，以达成关于伊拉克及该地区稳

> 定局势的国际共识。外交努力应该把避免伊拉克陷入混乱利益所关的所有国家包括进来，其中包括伊拉克的所有邻国。为使伊拉克更安全，实现民族和解，所有邻国与本地区内外的关键国家应该形成一个联合阵营，少了其中任何一方，伊拉克[及美国]都不可能单独实现上述目标。

在这件事上，如果没有伊朗与叙利亚的合作，伊拉克叛乱显然不会结束，因为他们为什叶派民兵提供补给和支持。更一般地说，不管什么地方的国家陷入骚乱，其邻国都该参与应对（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因为邻国骚乱难免影响到自己。因此，伊拉克研究小组分析结果出笼6个月之后，白宫就于2007年中期打开了与伊朗会谈的大门，同时也就伊拉克问题加强了与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接触。

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能够预测伊拉克的最终结果及其对中东稳定产生的种种影响，因此遗留的其他种种问题，同样无从知道。未来的美国总统、国会及别国政府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也不确定。此外，今天依然未知的某些事件、某些人物在未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策中也可能会打破现有平衡。但是可以明确的是，美国拥有强大的能力，同时也面临实际限制；中东地区在美国地缘政治领域中居于中心地位；未来的美国政府继续单独制定政策时，可能倾向于寻求全球支持。

第七章 07

即将到来的医疗、能源与全球环境危机

FUTURECAST

◆ 过去5~10年间，推动医疗技术进步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贯彻落实，这就使得研发者免于遭受绝大部分直接竞争压力，因而导致大部分地区医疗价格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

◆ 中国面临的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医疗危机。在中国，中心问题并不是最新药物、设备及治疗流程的高昂成本，而是为恢复10余亿国民基本医疗待遇而不得不面临的昂贵挑战。

◆ 未来10年，中国将要面对自己独一无二的医疗危机。历史上中国曾经建立起全面覆盖的基本医疗体系，后来该体系又分崩离析，作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国家，中国现在面临的前景是，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为十几亿人口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医疗保障系统。这就得把大量资源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工程，转移到医疗系统上来。

有些时候，将会动摇或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生活状态的严重问题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因为催生这些问题的因素既根深蒂固，又显而易见。未来 10~15 年，医疗与能源成本的急速上升，在所有主要国家都将产生极大的社会与经济压力，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各国如何成功化解种种压力，不仅会对数十亿居民的医疗卫生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且也会对各国经济的全面增长造成深远影响。再加上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所有这些加速上涨的成本压力势必继续阻碍发达国家的就业与工资增长，世界各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未来前景也必将受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大多数国家将面临的医疗危机将同时陷入老龄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他们享受的医疗技术成本同样快速增长的双重压力。当然，年轻人的医疗开销同样也在不断增长。不过，未来 10 年以至更长时间内，高峰人口将要步入 60~70 岁年龄段，他们的哥哥姐姐将步入 70~80 岁年龄段，有些老人的父母也还健在，将会达到八九十岁高龄。进入这些年龄段，医疗花费动辄就是 15 000 美元，甚至 150 000 美元，而不是区区 200 美元，或 1 000 美元。

医疗危机发生在当今时代，这不单纯是人口结构问题的反应，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影响。新型医疗器械、设备、药物的潜在市场已经实现全球化，这

就推动医疗技术研发规模加大（成本同时上升），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越来越多的昂贵的医疗技术不断涌现。当位于旧金山郊外的吉列德科技公司和韩国 LG 生命科学计划投资 12 亿美元，开展很有前途的生物科技研究时——这不过是今天开发生物治疗技术的普通成本支出——这项技术将来的预期经营收入，不仅来自欧美国家的潜在患者，而且也包括许多亚洲、拉美及其他所有支付得起所需费用的各个国家病人的医疗开销。许多新兴医疗技术的市场扩展十分迅速，原因不仅在于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除此之外，全球化导致世界更多地区经济日趋繁荣，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日趋富裕，哪怕极小的医疗进步，都会受到高度追捧。过去 5~10 年间，推动医疗技术进步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贯彻落实，这就使得研发者免于遭受绝大部分直接竞争压力，因而导致大部分地区医疗价格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

昂贵的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的种类如此之多，需要接受治疗的人口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到 2020 年如何支付巨额医疗开销，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做好准备。在一些国家，由于国民和政府都无力支付他们追求的医疗待遇，这个问题因而将会演变成政治、社会危机。医疗卫生不同于市场上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因为一个人如果买不起一辆宝马新车，那他完全可以选择买辆福特二手车，或者干脆依靠公共交通作为替代，但是一旦有病需要进行化疗或透析，却没有什么真正可靠的替代疗法。因此，尽管价格奇高，人们还是极不情愿削减自己的医疗待遇——特别是在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各国政府一贯在表面上保证人人都能获得各种治疗。随着老龄人口规模日益扩大，昂贵的新型医疗技术层出不穷，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财政制度安排都将崩溃。由于必须协调需要接受治疗的群体与为其提供财政支持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双方都会在政治竞技场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

随着老龄人口规模日益扩大，昂贵的新型医疗技术层出不穷，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财政制度安排都将崩溃。

求，同时也难免遭受挫折。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在日本及大部分欧洲国家，昂贵的医疗需求高歌猛进的同时，纳税支持医疗开销的工作人口数量却在不断萎缩——而且，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全球化不断推进，又很可能拉低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在法国和德国，由于医疗支出比例已经很高，总体税负高达45%~50%，他们在医疗方面的处境尤其艰难。相形之下，日本和英国的医疗支出比例要小很多，税率也更低，但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全球最高，经济发展却又十分疲软；英国社会医疗服务体系也面临着广泛的公众压力，需要大幅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尽管美国的人口结构更为有利，但是医疗成本上涨同样也给美国带来了问题，因为与其他国家国民相比，美国人已经习惯于把比例高得多的国民收入花在医疗方面。美国人利用最新医疗技术的决心同样也很强烈，而许多新型技术也是在美国开发出来的。此外，下一任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很可能也会为快速增多的那些因为天价医疗花费而一贫如洗的美国人提供保险覆盖。最为重要的是，美国事实上是唯一很少进行医疗价格管制的国家，美国人的医疗预算也面向全球开销。在上述所有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几年之内，美国人均医疗支出就将达到 10 000 美元。为了满足爆炸性增长的医疗开销需要，税负势必加重，工作人口的工资水平也会因此降低，随后就会引发政治冲突。

所有发达国家以前也都应对过医疗卫生系统的财政问题，但是以前的所有问题与未来 10 年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截然不同。未来，在日本、美国以及所有欧洲国家，国民的税务负担、保险收费及自付费用都将提高，而医疗质量将会缓慢下降，某些最新医疗技术的使用也会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

中国面临的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医疗危机。在中国，中心问题并不是最新药物、设备及治疗流程的高昂成本，而是为恢复 10 余亿国民基本医疗待遇而不得不面临的昂贵挑战。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年比一年繁荣的国家，大约只有 1/3 的国民能够享受公共医疗保险待遇。

未来 10 年，能源成本也会不断上涨，由此给许多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也不亚于医疗问题。能源问题涉及面之广、紧迫性之高，源自经济与政治方面几个发展变化的交相作用与激烈碰撞，还有就是无情的自然之力。前两个原因都是标准的经济因素——一个就是，为快速实现现代化，中国及其他致力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全球性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另一个则是，为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的可靠供应，所费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了发达国家以前的发展轨迹，因而得以比那些国家发展更快捷，增长更迅速。在这些国家快速发展进程的推动下，石油价格已经从 20~30 美元一桶，攀升到过去几年的 50~80 美元一桶，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未来 10~15 年，可能迎来能源价格急剧上涨的几个时期，更可能的是，石油价格将会达到每桶 90 美元、100 美元，甚至更高。

在石油供求关系变化之外，“石油政治”形势也变得更加尔虞我诈。石油供应越发集中于政治脆弱的中东地区、非洲国家以及俄罗斯——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随着未来美国从伊拉克脱身而出，地区强权伊朗将对邻国沙特阿拉伯施加额外压力，该地区的政局稳定将比过去几十年间的任何时期都更成问题。能源问题也会通过其他方式，使得未来 10 年的地缘政治关系更加复杂。中国对中东、非洲、拉美及中亚地区石油生产国的投资网络日益扩展，跟这些国家之间的合资企业持续增多，不断签订长期供油合同，这就使得中国更加处于与俄罗斯、日本及美国利益不一致的境地。欧洲对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俄国因而将会继续利用这一点榨取地缘政治优势。美国这个超级强权将会努力监视这些活动，设法遏制中国的勃勃雄心，打退俄罗斯的争霸野心，维持中东地区稳定，使之成为全世界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来源。

所有这些能源消耗对全球气候造成的严重环境效应可能很快就会达到爆发点，全世界对这一问题的关切程度不断提高，这是能源问题面临的新因素。

这种关切将会推动全球能源价格更加高涨，因为缓解环境问题的首要措施就是减少高含碳量发电方式的投资比例。例如，旨在减少燃煤火电厂投资力度的未来管制措施已经前景明朗，因此在今后 5 年，由于火电厂投资减少，欧洲电力价格必将走高。在积极方面，这种关切同时也会推动人们对利用风能、太阳能及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兴趣，据估计，2005 年全世界新型发电厂的投资比例已经达到 30%。

随着发达国家对使用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的实际管制措施不断落实，人们势必要为能源消耗承担高得多的成本支出，未来 10 年，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欧洲、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一致共识：如果任由当前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趋势继续发展，那么最终势必会对世界各地的气候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尽管如此，各国提出的解决办法还是五花八门，既有从上到下的管制措施，也有开征排碳税的税收政策，还有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的制度安排。

随着发达国家对使用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的实际管制措施不断落实，人们势必要为能源消耗承担高得多的成本支出，未来 10 年，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各国医疗开销比较

不同国家在医疗方面的开销需求大不相同。毫不奇怪，中国在医疗方面的开销远远低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政府医疗投入不足 GDP 的 2%，国民自行负担部分却高达 GDP 的 2.5%。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计算，美国的医疗支出都是世界最高的——据 2006 年最新统计，美国人均医疗支出为 6 700 美元，医疗开销比例达到 GDP 的 16%，而法国和德国为 10%~11%，日本和英国约为 8%。这样一来，日本和英国的医疗投入比例明显接近中国，而不是美国。

没人知道上述差异会给各国人民，尤其是发达国家居民实际享受的医疗质量造成多大区别。2004 年，联邦基金发布了一项关于英国、美国、加拿

大、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等国医疗问题的长期研究报告。报告表明，美国人均医疗消费相当于英国的 2 倍，美国乳腺癌和子宫癌患者的存活率的确高于英国——不过，英国其他几种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却高于美国，其中包括直肠癌、儿童白血病及非何杰金淋巴瘤，此外，英国肾脏及肝脏移植手术的存活率也高于美国。但是，研究报告并没有说明，英国器官移植存活率高于美国，究竟是因为英国的医疗质量好，还是因为美国患者的病情重。

英美之间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英国人在医疗方面遭遇的财政障碍要少很多。这是因为英国社会医疗服务体系担负了全国医疗总支出的 85%，德国、法国和日本也差不了很多，政府负担的医疗开销比例都在 75%~81% 之间。归根到底，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国民是通过纳税来为彼此支付医疗开销的，他们个人的医疗支出之所以会低于美国那么多，这是理解其中原因的一个线索：在艰难的政治现实中，为了维持公共医疗系统正常运行，纳税人也只能忍受温和的偶尔加税，因此欧洲与日本都实行医疗价格控制政策，也对接受海外医疗服务加以限制。

美国则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政府只负担全部国民医疗支出的 45%，这种待遇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和退休人员（及政府雇员），而大部分企业都要为员工提供个人医疗保险。这一制度运行效率不高，国民自身负担较重，而且耗费高额管理成本，美国人对此也是多有抱怨。但是，英国和德国负责公共医疗的庞大官僚体系同样效率十分低下，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论哪种情况，“效率低”的最根本原因是大部分医疗问题的内在不确定性。美国人医疗支出如此之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方面：欧洲人和日本人可以迫使政治人物寻找出路，在不大幅增加税负的前提下，提供较好的医疗保障；而美国人同样也不愿意增加个人医疗成本，或者降低工资水平，只是除了换个待遇更好的工作，他们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美国人医疗开销如此之大，以至于仅仅用来支持老龄人口与低收入群体医疗待遇的人均税收就高于德国、日本和英国，而这 3 个国家拥有的都是覆

盖全民的医疗体系。除了纳税，美国人还得缴纳个人医疗保险费用，另外还要加上自掏腰包的现金支付，合计起来，这就已经高于英国和日本全部人均医疗开销之和。美国人对此能够甘心忍受，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日本人及大部分欧洲人，况且除了忍受，他们对此也难有什么作为。

尽管如此，欧洲和日本的医疗开销也是一直都在急剧增长，因为价格控制并不能阻止人口老龄化的前进步伐，也无法让面向老年疾病的医学技术进步停滞不前。2000~2004 年，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人均医疗开销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5%、7%、9%。英国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年均增幅为 8%。

问题这才刚刚开始。随着高峰人口届龄退休，2010~2020 年期间，法国、德国、日本 60 岁以上老人比例分别将会达到 23%~27%、27%~29%、30%~34%。英国稍微好些，60 岁以上老人比例为 23%~25%，而美国则为 18%~22%。

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个问题，因为年纪越大，医疗花费也就越多，一生之中最后岁月的疾病治疗往往是最贵的。在美国，年龄从 65~69 岁增长到 75~79 岁，个人医疗开支就会跃升 70%；80 岁之后，又要增加 35%。如果政府对医疗价格加以控制，医疗支出增长虽然不会如此剧烈，但是依然十分可观。日本人从 65~69 岁到 75~79 岁，个人医疗开销增长 62%，德国为 39%，英国为 37%。2010~2020 年期间，日本 75 岁以上老人比例将会达到 15%，德国为 12%，法国为 10%。在这方面，还是英国和美国的人口结构前景要好一些，到 2020 年，75 岁以上老人约占英国人口的 8%，美国则是 6.4%。

医疗成本上涨幅度如此之大，原因在于老年人太容易罹患心脏病、癌症及其他重病，而这些病症的治疗费用已经变得十分高昂。例如，死于冠心病的美国人中，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超过 80%。在所有发达国家，死于癌症的病人也是高度集中于老人群体，其中，65 岁以上老人比例超过 70%，而因癌症而死的患者最常见的年龄段就是 75~84 岁。

逐渐步入老年的高峰人口及其父母一代将要占据未来医疗支出的大头，而事实上，过去25年来，医疗开销已经增长了26倍，从1970年的750亿美元猛增到2006年的2.1万亿美元，即使在高峰人口处于二三十岁，通常都很健康的前提下，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医疗开销年均增长也都高达4%~5%。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成本上涨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技术创新，也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经济日益强大。昂贵的新药吸引的政治关注最多，不过，推动医疗成本持续上涨的最大力量还是新的治疗流程的不断涌现，诸如主动脉成形术、关节置换、器官移植、关节镜手术等外科技术手段不断出现；核磁共振成像、CT扫描、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等新型医疗设备层出不穷；实施此类疗程、使用上述设备需要占用的医生时间及医院护理服务越来越多。2006年，美国人均处方药消费额为2 140亿美元，而他们同时也支付了4 210亿美元的医师费，6 520亿美元的医院护理费。

大部分新的医疗手段和治疗技术都是物有所值。长期以来，在发达国家，心脏病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致命疾病。但是自1980年以来，美国心脏病患者死亡率降低了将近一半，原因主要在于医学创新。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每年死于心脏病的千人比约为3.5‰。那个时候，心脏病首次发作而不致命的患者通常会到心脏科接受利多卡因治疗，以缓解心跳不规则症状；也可能服用凝血药物β-阻滞剂，以降低血压；有些时候，也会采用动脉搭桥手术。到80年代中期，主动脉成形术取代了许多搭桥手术，β-阻滞剂也已成为高血压患者的长期维持药物。到20世纪90年代，防止血液栓塞形成的新药不断上市，血管延展及血管再生治疗技术先后出现，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也投入临床使用。接受手术的心脏病患者数量随之急剧飙升，从1980年的大约10%激增到1998年的50%以上，心脏病总体治疗费用也上升了50%，而美国死于心脏病的千人比则下降到1.9‰。

上述疾病以及最近仍然被认为无法治愈的那些疾病——艾滋病、肾病、多种癌症等等——治疗成本大幅上涨，原因不仅仅在于新药物、新设备造价

昂贵，也不仅仅在于需要支付使用这些设备和技术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与提供服务的费用。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度过生命的危急关头，然后进入昂贵的长期疗程，就像白血病患者需要接受透析治疗一样，越来越多的患者需要长期接受二级治疗，也有越来越多活下来的患者，最终又成为需要接受昂贵的高科技治疗的病人。

在密切关注医疗开销的人士当中，几乎人人都认为，上述因素就是世界各地医疗支出大幅上涨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造价昂贵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2005 年，美国医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及医疗设备企业的研发投入高达 650 亿美元，此外，美国政府则支出了 400 亿美元，各大学及基金组织也投入了 100 亿美元——所有这些经费都用于研发未来 10 年可能投入使用的治疗方法及医疗设备。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研究内容就是新技术如何推高医疗成本，其中涉及 200 多万美国心房颤动病患者采用新疗法的发展过程。10 年前，这种病通常都不需治疗。但是，在几年前科学家确定该病可能导致中风，甚至出现严重心脏坏死之后，产业界和理论研究者很快就开发出一种称为导管消融的新疗法。外科医生使用一条线状长导管，在终端附带一个微型设备，穿过患者纹理，进入心脏，并永久驻留在心肌，以中和出问题的心肌产生的异常心电脉冲。采用这种治疗方案，费用为 25 000~50 000 美元，因为需要使用非常专业的一次性设备，而该设备的造价就高达 5 000 美元，一次手术也需要心外科医生及其团队耗费 4 个小时，中间还要使用医院医疗设施。截至 2007 年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没有批准这项治疗技术，但是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心脏病学会都支持开展这项手术，而且各家医院外科医生已经为数以千计的患者施行了这种手术，并直接以其他心脏病治疗名义，从商业保险与公共保险账户报销手术费用。

几乎可以肯定，这项技术将会获得正式批准，一旦批准，其需求量势必大幅增加。打算提供这项手术业务的各家医院和心脏病专科门诊，除了购买

导管及其附属设备，还得购置大批昂贵的医疗设备，其中包括高科技诊断设备、计算机成像设备及机器人导向系统。据业界专家估算，未来 10 年，单是相关设备这一项就将产生 15 亿 ~50 亿美元的销售额，施行手术的人工、医院及其他相关费用更是会高达数倍。如果患者接受手术之后，能够避免出现中风和心脏坏死，当然也会省下长期治疗花费——前提是这种手术只施予那些服用 1 000 美元的药物无法奏效的心脏病患者。然而，由于开展导管消融手术可以创造高额营业收入，各家医院和相关医生都没什么积极性去区别对待不同患者，而大部分病人往往又都愿意听从医生的建议。

在美国医疗体系当中，并没有一个可以限制治疗方案、制定医疗价格的中央权威部门，不过，美国制度的确也有一些间接的、内在的约束。由于缺乏医疗保险支持，许多治疗方案遭到有效阻止，这个比例约是 15%。私营商业医疗保险以及联邦政府公共保险也都实行形式较为松散的价格控制，支付给医院、医生、药房的费用通常都会低于其零售价格。商业医疗保险在美国覆盖率达到 60%，他们也会拒付自己认为“尚处实验阶段”或超出正常范围的治疗费用。大约 10% 的情况下，商业保险会拒绝支付病人治疗费用，原因经常是“事先存在这种疾病”。这种实践方法凸显了医疗待遇的不公平性，而当私营商业保险追逐利润的根本动力与飞速增长的医疗价格给他们获取更高收益带来的强大阻力激烈碰撞之时，不公平现象的出现也就无可避免了。不过，与英、日、德、法等国医疗制度确立的原则及实践相比，美国的实践方法对医疗价格的影响相对有限，大部分美国人接受高科技治疗的门槛较低。

美国医疗开销如此之高，另一个原因就是，其他国家的部分医疗成本悄然转移到了美国。对于新开发的医疗设备、医药产品及其他治疗技术，美国基本上坚持采用不进行价格控制的政策，而大部分产品及技术同样也在欧洲和日本使用，由于这些国家实行价格控制，美国开发企业被迫在这些地方接受较低的售价。比如，同样的处方药，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售价就比美国

低了 43%~50%。由于生产企业在制定产品价格时，必须考虑金融市场确立的全面回报指标，欧洲与日本的价格控制政策自然就抬高了美国国内市场的售价。

另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些成本低廉的治疗技术应用不足，而另一些不够便宜的治疗技术却又过度使用。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对于冠心病左主干病变患者效果很好，但是并不适用于冠心病单支血管病变患者——尽管很多人也都接受了这种手术。降胆固醇药物对于心脏病患者十分有效，但是并不适用于数以百万计的也在服用这种药物的其他疾病患者。美国最大的医生继续教育机构负责人艾伦 · 洛特韦恩博士是一名心脏病专家，据他估计，现有的血管重建手术有一半并没有必要进行。更有甚者，有些新兴治疗技术，成本高昂，成效有限。5 年前，治疗结肠癌有两种首选药物，每个疗程花费 500 美元，患者平均存活时间为 8 个月；现在治疗结肠癌一般采用化疗技术，花费 300 000~50 000 美元，患者存活时间为 13~20 个月。如何给医院和医生支付费用，也会影响他们对昂贵治疗方案的选用：与其他方面条件完全一样的患者相比，能够提供服务费的患者被安排接受心电图检查的可能性高出 50%，安排接受胸透检查的可能性高出 40%。

凯泽基金会估计，按照现行政策路线发展，到 2015 年，美国医疗支出将会高达 4 万亿美元，人均开销为 12 200 美元，而到 2020 年，更将高达 5.7 万亿美元。美国也可以效法其他国家，实行价格控制，削减医疗支出，或者让私营商业保险继续发挥作用，或者新建一套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每个人未来能够获得的医疗待遇提高甚少：人们可以利用的医疗技术的高科技含量将会逐步减少，起码对那些支付不起高额费用的群体而言，就是这样。患者初次接受治疗，将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治疗方案，私营保险机构与政府部门能够批准的普通用途的造价昂贵的新技术、新药物、新疗法将会减少，其开发进程最终也会逐步放缓。

法国、德国及美国即将面临的医疗危机

美国医疗价格相对较高，不过，未来 10 年，所有发达国家都将面临同样的医疗危机。特别是在法国、德国和美国，危机为其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医疗制度极为相似。首先，这 3 个国家的医疗制度都赋予了国民自行管理自身医疗事务的广泛自主权。在法德两国，人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诊医生，正如大部分美国人一样，但也有显著的例外：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群体，进了急诊室或慈善门诊，只能接受任何接诊医生。在这 3 个国家，找医生看病相当容易，法国人和德国人每年看医生的平均次数为 8~9 次，美国人每年平均也有 5 次。这 3 个国家的大部分医疗项目都是基于收费服务，在美国和法国，是病人先付费，然后再报销，而在德国，则是直接由政府支付费用。

尽管组织方式不尽相同，这 3 个国家的医疗制度都包括公共保险和私营保险两种情况。在法国，不管国民年龄大小、收入高低，政府支付大部分医疗服务、用药及设备的费用的 70%~80%，而且几乎所有法国人也都有私营商业保险，负责支付另外 20%~30% 的费用。在德国，公共保险与私营保险的分野以收入为基础：年收入达到 60 000 美元的群体，差不多全部医疗（包括“自然康复”、针刺治疗、同种疗法、牙齿修补、国外水疗及其他一些美容项目）开销都由政府支付。德国前 15% 高收入群体也可以享受公共医疗待遇，不过约有 2/3 的富人选择了私营商业保险。最后再看看美国，美国政府为老龄人口和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保障，这部分人口约占国民总数的 1/4，其余人口当中，有 80% 的国民通过工作岗位享受私营商业保险。剩下还有大约 15% 的美国人处于两不靠的境地——他们年龄不够大，又不是特别穷，因而没有资格享受政府医疗保险待遇；工作单位又不提供私营商业保险，而且薪酬太低，自己也买不起保险。然而，美国与法德两国医疗制度之间还是存在足以影响医疗成本的本质区别，在法德两国制度下，政府有权决定哪些药品、哪些医疗服务可以报销，并且能够为其制定价格。这种管理制度不仅

可以对大部分药品及医疗项目的价格加以控制，而且还能控制医生的工资水平：法国医生的工资收入大致相当于法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德国医生挣得还要少，而美国医生的收入则高达美国人均收入的 5 倍。

这 3 个国家都疲于应付医疗成本上涨压力。血管再造、器官移植、第三四轮化疗等数以千计的昂贵治疗技术在欧洲国家的普及程度稍微低一些，因而在巴黎和柏林的医疗成本会比纽约和迈阿密低。但是，这 3 个国家都热烈欢迎现代化的医疗手段，把大部分选择决定权留给了医生和病人，并对他们的需求几乎没有什么约束。结果就是，美国投入的医疗开支占其经济总量的比例全球最高，法国与德国也分列全世界第三位、第五位。此外，2000 年以来，美国医疗支出年均增长 7%~8% 的同时，法德两国的年增长率也高达 5%。再加上法德两国面临的快速老龄化问题，照目前趋势发展，到 2020 年，这 3 个国家的医疗支出势必翻番，甚至还要高。

几乎可以肯定，这 3 个国家将会采用与过去 10 年相同的方式来应对医疗成本上升问题，不过，各国人民享受的医疗质量将会受到累积影响。法德两国政府及美国公共与私营医疗保险机构构筑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削减支付给医院、医生及医药公司的报销费用。在法国以及美国老龄人群当中，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成效极其有限，因为在这两个国家，私营商业保险作为有效补充，弥补了绝大部分差额。这种方法还受到另外一些限制，而且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法德两国医生都加入了工会，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6 年成功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医疗收费，提高工资水平。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办法难免也会降低医疗质量，起码也会延缓医学进步，因为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限制使用最贵的医药产品、治疗方法及医疗服务，而这些通常都是最新开发出来的医学成果，代表最先进的医学水平。如果要大量节省医疗开销，就不得不盯住那些问题最为严重的人群：在法国，10% 的病人消耗了全部医疗支出的 3/4，在任何拥有先进的卫生医疗系统的国家，这个比例都差不多。

抵御医疗成本上升的第二道防线就是让患者接受某种治疗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2003 年，德国免费医疗的悠久传统宣告结束，引入患者共同付费的制度安排：每看一次医生，每开一次处方，每在医院或康复机构住一天，病人都应自行负担 5~10 欧元。德国病人自费比例仍然明显低于法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病人自费比例为 20%~30%。在法国，高额自付费用转移到了辅助性商业保险支付范围内，自然这种保险收费一直都在上涨。美国人自掏腰包的比例最高，增长速度最快：2004 年，拥有私营商业医疗保险账户的美国人的人均自费额为 255 美元，自费支出最多的前 10% 人群的平均支付额度为 1 500 美元，如果加上没有医疗保险的群体，人均自费额将近 600 美元。但是，削减医疗开销这个办法会受到一个大的限制，那就是其对人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因为病人自付费用急剧提高之后，人民享受的医疗服务就会减少。即便如此，这种办法仍然没有触及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根本原因，因为大部分医疗成本来自重病患者的医疗支出，而自行支付部分医疗费用并不能阻止他们选择高价治疗。

面对快速上涨的医疗成本，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增加税收，提高医疗保险收费标准。2007 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计划，准备把国民对政府医疗系统的“贡献率”提高 0.5 个百分点，征税标准达到劳动者工资收入的 7.1%，企业缴付的薪资税率为 8%，两项合计，大多数工薪家庭缴税比例约为 15%。德国也计划提高工资及养老金收入的征税率，以缓解医疗支出长期面临赤字的巨大压力。法国政府则以对所有收入征收 5.25% 税额的政策，取代了以前 6.8% 的员工薪资税——社会民主党一直呼吁实现跟德国一样的改革——另外还有 11% 的雇主薪资税。在美国，增幅最大的就是通过工作单位缴付的私营医疗保险费用，2000~2006 年，这项费用增加了 87%，而总体医疗开销增长幅度为 18%。2006 年，美国四口之家的平均医疗保险费用支出为 11 500 美元，其中由劳动者直接支付的费用为 3 000 美元。

与其他办法类似，削减医疗支出的最终成效也将十分有限。未来 10~15

年，由于所有主要国家的人口结构都会迅速老龄化，而且老龄人口所需要的医疗开销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各国通过增加税收、提高保险费用的途径，依然无法筹集足够的医疗经费。很可能在压缩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提高个人自费额度的措施有效实施之前，这种策略就已经日暮途穷，因为各国税率和保险费用早已居高不下。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总体税率已经高达 45%~50% 的情况下，只是为了优先满足退休人员不断上升的医疗成本需要，欧洲工人还会忍受多高的税务负担？美国四口之家通过工作单位缴付的平均保险费用已经高达 11 500 美元，在这个基础上，还能高到哪儿去呢？

还有几个相对容易的途径，可以削减各国医疗体系的成本支出。几乎可以肯定，德国也将会采用其他国家已经实行的制度，如要求病人必须得到初诊医生的同意，才能看专家门诊。法国人平均使用的昂贵药物相当于美国人及大部分欧洲人的 2 倍，他们也会逐步采取措施，鼓励使用更多的普通药物。美国政府也会采用标准化的对账及支付流程，迫使医生、医院及保险机构削减管理成本，最终也可能采取措施，让医疗保险全面覆盖至今尚不享受保险待遇的群体。即使如此，无论是实施这些变革，还是采取其他任何办法，留下的都将是日益扩大的经费缺口。不管还会出现其他什么情形，到 2020 年，大部分人民接受当代价格最昂贵、技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的机会都将实实在在地减少。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机会的减少也将放缓医学创新的前进步伐。

日本与英国的医疗危机

日本和英国也已步德国、法国及美国的后尘，陷入了医疗困境。日本和英国有能力把国民医疗支出控制在 GDP 的 8% 左右（2005 年）——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一半，是法德两国的 3/4——这个成就看起来极不寻常。简而

言之，日本和英国的情况之所以不同于德、法、美三国，而且差异如此巨大，原因就是对于所有医疗项目的价格，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控制要严格得多。

在日本，医护人员工资收入、医院收费标准、药品价格、医疗设备及附属用品价格，全部是经过谈判之后，由厚生省下属的社会保险厅负责确定。该厅制定的价格标准如此之低，以至于 1980~2000 年间，日本医疗开销增长速度还要低于总体消费价格上涨速度。一个原因就是，每当医疗服务需求高涨的时候，日本政府就会压缩报销额度，以此保持医疗开销向上封顶。例如，2000、2001 那两年，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应用需求急剧增加，日本政府随之把该项目的医院收费标准从 150 美元调低到 100 美元多一点——同样的医疗项目，在美国的收费标准为 650~1 200 美元，德国和法国也便宜不了很多——日本医院及医生接着就开始减少这一检查项目的使用频率。

日本对医疗价格与医生工资实行严格控制，不可避免地压低了医生的补给数量，减少了需要使用昂贵设备的高价医疗服务项目。日本和英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大大少于美国、德国和法国，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医生收入十分微薄。在日本，任何病人都可以看任何医生，不需要转诊意见，就可以选择任何专家；在正常的自付费用之外，更不用额外缴费，因而日本人看医生的频率非常高——尽管人们常说，在日本看一次医生，往往是“等待 3 小时，问诊 3 分钟”。特别昂贵的高科技药物在日本用得也不广泛，每千人拥有的重症监护室与冠心病护理病床的数量还不及美国的一半，手术室数量大约只有美国的 1/3。相反，药物疗法在日本更为普遍——药费占到全部医疗支出的 20%，除法国之外，这个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国家水平的 2 倍——原因就是药物治疗比手术治疗便宜，而且日本医生也可以加价卖药。因此，前面提到的导管消融手术在日本压根儿就不会像在美国那样被广泛应用。

日本的医疗控制政策实现了高科技医疗项目的有效配给，而英国的价格控制则导致医疗供应不足，尤其是医生数量及坐诊时间严重不足，因而形成了医院治病救人的瓶颈。总体而言，英国拥有全世界最简单的公营医疗体系。

英国国家医疗系统拥有医院，雇用医生，制定所有住院病人与门诊病人接受服务的收费标准，然后为病人支付医疗费用，除了15%的少量处方药费及牙科和眼科的高额医疗服务收费，其他的都不需要患者支付相关费用。英国医疗服务收费低廉，再加上可以免费接受医护人员服务，无偿使用医疗设施，因而导致该医疗制度下，病人等待时间过长，医疗质量问题丛生。英国医疗体系现在已经因此声名远播。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英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最少，医疗服务供应不足，首先由此开始。英国国家医疗系统的发展前景对于准医生的吸引力如此之低，以至于英国不得不从欧洲其他国家聘请医生，利用周末时间飞抵英国，随时准备提供支援。据英国医学会报告，2004年参加工作的英国医生当中，有2/3是在英国之外接受训练的，主要来源就是非洲。如果在英国看一个专家门诊，并且需要住院治疗的话，等待时间常常超过两个月。在布莱尔首相的强力推动下，医疗经费大幅增加，为住院治疗而等待6个月以上的患者数量随之大幅减少——究竟减少了多少，也是一个争议话题——但是，对于等待治疗时间高达5个月的大量患者而言，布莱尔的推力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那些有财力不参与公营医疗体系的英国人通常都选择回避，现在购买私营商业医疗保险的英国人约有12%，他们可以选择公营医疗体系之外的医生看病，可以入住非国家医疗系统所属的医院就治。

他们选择规避公共医疗体系，一个原因就是，公开报道和私人调查都表明，英国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太低，已经对医疗治疗造成影响。据英国国家审计委员会报告，英国病人在医院受到感染的纪录为全欧洲最差，感染率高达9%，每年因此造成的非必然死亡情况多达5 000例。类似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发现，英国中风病人发病之后7天之内的平均死亡率相当于其他成员国家的2倍。尽管英国人心脏病发病率高居世界第二，但与日本十分类似，英国医院和英国医生为心脏病人施行手术的比例只有法国和德国的1/3~1/2。

影响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因素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可以通过任何一种

方式，归结出一国医疗制度的特点。例如，与上述数据相反，英国新生儿的报告死亡率低于德国，产妇死亡率低于法国——但其传染病致死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地，最近一项来自伦敦保守智库的报告宣称，在心脏病、呼吸道疾病及癌症方面，由于英国国家医疗系统的医疗质量达不到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每年都有将近 31 000 名患者因此死亡。不过，该报告提供的数据同样表明，英国患者死于心脏病和癌症这两种疾病的比例明显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无论如何评判英国公共医疗系统，在公众普遍不满的压力下，从 2000~2008 年，伦敦被迫把政府医疗支出提高了一倍。随着本国高峰人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英国也将经历德国和法国面临的医疗危机：2003 年，65 岁以下英国人每年平均医疗花费为 440 英镑，而一过 65 岁，人均医疗费用就跃升到每年 1 000 英镑，而到 75 岁或 85 岁，这个数额还会更高。虽然英国婴儿出生率低于许多发达国家，但是，2005~2020 年，英国成年人口数量还是会继续增加，增幅接近 23%。

英国医疗体系的财政来源主要是薪资税，外加所得税及 17.5% 的增值税作为补充。据英国政府估算，英国医疗体系要想维持运转，到 2020 年，将需要增加大约 2/3 的财政支出。这在政治上希望渺茫。比如，即使英国所得税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也只能解决医疗开支缺口的 1/4。但是，当皇家外科医学院院长伯尼 · 理波罗最近敦促英国引进各国普遍采用的患者共同付费制度时，随即遭到英国最大的工会组织首领的激烈抨击。然而，未来 10~15 年，英国医疗体系不仅要引进患者共同付费制度，而且还得提高税率，同时不管给医疗质量造成怎样的后果，必然也要减少昂贵的新兴医疗技术的使用，这在事实上不可避免的。

萦绕日本的问题是，降低医疗技术含量的成本控制策略与人口结构的严重冲突。过去一代人的时间内，日本一直都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到 2020 年，将有 1/3 以上的日本人超过 60 岁。高峰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

都要面临的普遍问题，但是，无论哪个国家，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制度造成的影响都没有日本大。日本老年人的人均医疗开销高达年轻人的 5 倍，因为日本低技术含量的医疗政策不太适用于老年人病情，这些病症包括心脏病和癌症，而约有 2/3 的日本人死于这两种疾病。

未来 10~15 年，这个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峻。哈佛大学医疗卫生经济学家大卫 · 卡特勒最近研究发现，虽然日本一直严格控制医疗价格，但是整个医疗体系的成本支出还是不断上升，原因同样可以追溯到高峰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技术变革。而且，当前取得进展的造价昂贵的新设备、新疗法、新药物大都集中于心脏病和癌症治疗领域。据准确估计，到 2020 年，因为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两个因素，日本医疗支出将会增加 75%，甚至更多——尽管实行严格控制政策——日本用于卫生医疗的开销比例将会提高 4 个百分点，达到 GDP 的 50%。

日本医疗开销的财政来源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包括财政税收和患者自付两部分。过去 15 年，日本政府已经把劳动者缴付的基于工资的税率提高了一倍，这项税收占到医疗支出的 70%。日本政府也分两步，把年轻人的自付费用比例从 10% 提高到 30%，不过这对医疗服务需求并没有产生明显影响。2000 年，日本政府为了节省短期医疗成本，一味盲目蛮干，鼓励住院病人回家疗养（这一政策并未奏效），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而又与如何实现医疗的全民覆盖这个长期问题纠结在一起。因此，到了 2006 年，日本政府只好也把老年人医疗费用的自付比例同样提高到 30%，并以年龄和收入为基础，要求儿童缴付 20% 的医疗费用，同时再次削减医院、门诊、医生及药房的收费标准。

未来 10 年，随着医疗开销急剧增加，留给日本政府的可行选择非常之少。据一些日本专家估计，要想满足医疗成本需要，工作人口承担的税负还需要再翻一番。如果日本不能实行经济开放，并最终刺激经济快速增长，也就无法扩大税源，那么实际形成的医疗危机必将更加严重。在上述所有力量

的作用下，日本将要面临一场针对医疗问题的重大政治战争，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即使断言几年之内，没有一个日本民选政府能够把支持医疗开销的薪资税再次大幅提高 50%，医疗开支依赖的所得税、增值税及地方税也一样没有增加余地，也保准不会有错。在不削减医疗保险全面覆盖范围的前提下，个人自付费用也很难有大的提高。为缩小医疗开支缺口，继续执行严格的价格控制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不过这将剥夺日本人利用大部分医学进步成果的权利。

日本与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一样，未来 10~15 年，最可能的发展变化就是制定新的医疗政策方案，强制规定使用科技含量较低的治疗手段，即使对于危重病人，也是一样。同时，税负也会增加，病人自付费用比例将会提高，科技含量较高的治疗项目收费还会降低。与其他国家的富人群体一样，日本富人当然也有财力享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生物医药。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医疗待遇的长期发展趋势可能就是进展步伐放缓，甚至停滞不前。

中国版医疗危机

未来 10 年，中国将要面对自己独一无二的医疗危机。历史上中国曾经建立起全面覆盖的基本医疗体系，后来该体系又分崩离析，作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国家，中国现在面临的前景是，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为十几亿人口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医疗保障系统。这就得把大量资源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工程，转移到医疗系统上来。

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农村公社管理运行的庞大诊所网络，所有中国农民事实上都可以享受非常基本的医疗待遇；而其他人几乎都供职于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这些单位则通过城镇医院为他们提供全面医疗保障。到 20 世纪 80 年代，绝大多数农村诊所关门大吉，免费医疗宣告结束。过去 15 年来，

随着大量国有企业被淘汰出局，国企员工享受的医疗待遇也随之消失，其中也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国企退休职工。剩下的是一个只能覆盖部分中国人的医疗体系。

由于独立坐诊的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很少，中国人的大部分医疗需求几乎都是由公立医院负责满足，至少对那部分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或者本身具有足够财力，或者居住在拥有现代化医院的大城市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这样。美国观察人士迈克尔·莫顿博士在北京和睦家医院这所中国唯一的西式私有医院有过实践经历，据他描述，在中国各大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医院里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设备”。世界银行报告也指出，70%的中国乡村医生仅有高中文凭，外加平均只有20个月的医学训练。

将近80%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或者无力自行支付医疗费用的中国人，经常看不起病，医院也时常拒绝收治。我有一个熟人，是位年轻的美国人，她和丈夫一起在青岛任教，2007年她生孩子期间，本来已经预交了生产费用，但当她提出皮外注射的要求时，她丈夫还是不得不跑回公寓，取来500元钱交上，然后医院才给打针。

甚至对于儿童疫苗接种和传染病防治，医院同样实行“预先缴费”的政策。比如，麻疹和肺结核仍然还在中国部分地区传播流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这个10年，将有3 000万中国人感染肺结核，其中每年死于肺结核的中国人将多达25万，死于肺炎的中国人数量同样有得一比。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政府在医疗支出方面的退避也是十分明显，数据表明，当前中国人自掏腰包的医疗费用接近中国全部医疗支出的2/3。即使对那20%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中国人来说，也有1/3的医疗费用需要病人及其家庭自行负担。中国政府自己也估计，有一半中国患者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而无法得到救治。

中国人之所以把收入的30%左右储蓄起来，这种医疗前景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尽管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储蓄根本就不足以支付一场大病的医疗

费用。2003 年，中国家庭平均住院费用相当于年均收入的 43%。在中国老人群体当中，这个问题尤其严峻，因为 90% 的中国老人都不享受医疗保险。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老人通常都生活在贫困之中。

当亿万中国人知道本国经济已经比过去繁荣发达得多，而且仍然对历史上曾经享受的免费医疗保障念念不忘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将面临社会及政治的问题。2002 年，中国承诺，到 2010 年重新建立起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随后在多个城市和多个县开始了一系列试点。试点方案以个人缴费、税收补贴的个人医疗账户为基础，这是一个针对大病治疗的自愿制度，参加者每年缴纳 10 元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每年分别再为每个人补贴 10 元。由于是自愿参加，这项计划就无法避免人们做出带有倾向性的不利选择，最有可能接受大病治疗的那些人参加进来的可能性最大。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由上述三部分缴费来源组成的个人账户余额每月仅仅增长 4 美元。

未来 10 年，要为十多亿中国人提供有意义的医疗保障，势必极大地影响中国政府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计划，因为其中涉及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治疗费用。为提供满足需求的治疗条件，中国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新建数以千计的医疗机构，还要为其购置设备，招募人员——而且，同时也将面临推动其他各国医疗成本快速上涨的同样压力。2005~2020 年，60 岁以上中国老人数量将会从 1.44 亿增长到 2.44 亿，所占比例从 11% 上升到 17%。进入这个年龄段，病情最严重、治疗最昂贵的大病往往就会接踵而来。同样没有医疗保险的年轻人的人均医疗开销要少一些，但即使为 10 亿人口提供哪怕是十分有限的医疗保障，也会导致政府财力紧张，压低国内其他领域的投资额度。

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科技含量低于欧美国家，但是，扩展最为昂贵的医疗服务并不会给中国财政带来太大压力。对于城市医院及农村卫生保健中心的经营运行，政府承担“管理职责”，各医疗机构收费标准固定，不管患者有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有权直接向患者收取费用，收费医疗项目的额外

费用则按一定比例收取，具体比例由中央物价部门确定。与其他国家一样，医生推荐的大部分都是收费最高的高科技医疗方案，特别是在医生的奖金所得与其创造的营业收入挂钩之后，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处方药——政府制定医院及医生购买药品的价格，但是他们可以加价卖给病人。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尽管有大量的中国人根本就不能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另外那一部分人却经常得到并非必需的治疗和用药。

世界能源问题

与医疗问题十分相似，未来 10 年，能源价格涨跌幅度有多大，会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这既取决于能源供需关系，也取决于政治因素。在全球化的继续推动下，未来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仍然还会高于现行价格条件下的能源供应增加速度，过去 5 年一直就是这样。未来 10 年，虽然说不管能够想象的能源需求水平有多高，世界上都有足以满足供应的能源储备，但是开采这些潜在能源——沙漠中石油及岩层下石油、太阳能、生物能以及深海天然气——耗费的成本将会远高于大多数人习惯接受的价格。然而，能源价格上涨将对各个国家、企业及家庭产生多大影响，这将取决于是市场机制决定价格情况下的缓步涨价，还是政治因素拉升价格情况下的突然涨价。

随着能源价格逐步上涨，人们可以想法少消耗一些能源，企业也可以在大部分股东和消费者都能接受的前提下，提高产品及服务价格，以冲抵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因此，过去 3 年来，随着油价逐步翻番，大部分家庭和企业都一点一点地成功调整了自己的其他支出及投资。起码在未来 10 年，美国、欧洲及日本企业与家庭都会有更多好的应对办法。不仅是全球化会迫使人人必须适应日益上涨的能源价格，几乎可以肯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

策措施，同样也会推高油价。但是，油价并不总是只会慢慢上涨。中东地区战争不断，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尼日利亚及委内瑞拉等主要石油生产国政局稳定十分脆弱。因此，未来 10 年，石油流通突然中断，价格冲击随即爆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也有好消息：**由于高油价导致新的能源形式与节能技术不断出现，能源价格下跌周期同样也有可能出现。**

根据美国政府最新做出的分析估计，从现在到 2020 年，全世界能源需求将会增加 1/3 以上，其中大部分新增需求来自发展中国家，预计中国、印度及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石油需求暴增幅度将会达到 80%。尽管欧洲、日本及美国石油需求预计增幅只有 14%，但是人人都需要为亚洲快速增长的能源用量承受更高油价。到 2020 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将会消耗掉全世界 50% 的石油产出，55% 的天然气产出，以及将近 70% 的煤炭产出。

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急剧增长，这不仅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经济结构的能源密集程度。对于中国、印度以及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中心几乎全都集中在制造业与农业，而不是服务业。这些国家制造业与农业的生产经营，能源利用效率通常都十分低下，同时又特别偏重于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行业部门，诸如冶炼、水泥、钢铁以及肉类、乳制品、酿造等。在能源密集程度方面，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例如，每创造 1 欧元的 GDP，爱尔兰消耗的能源只有法国和德国的 1/4，这是因为爱尔兰的 GDP 很大部分来自 IT 和金融服务业——不过，在能源密集程度和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发达国家与中国、印度，甚至阿根廷等国不可同日而语。

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急剧增长，这不仅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经济结构的能源密集程度。

一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内，所有这些新增能源需求究竟会对石油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石油生产国都不知道自己的石油储量到底有多少（也可能他们自己知道，不过就是不说）。

例如，科威特宣称本国石油储量为990亿桶，而《石油情报周刊》则估计只有一半。安哥拉则偏好另一个方向，无论是在4个大型油田发现之前，还是之后，安哥拉都宣称本国石油储量为54亿桶，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墨西哥先是于2002年把石油宣称储量从270亿桶下调到130亿桶，第二年则又提高到160亿桶。即便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数据，也一样不可靠，因为沙特政府曾经暗示，该国石油储量应为其长期宣称的2 600亿桶的2倍。不过，总体而言，过去20年全世界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增长了60%，已知天然气储量翻了一番。

不管全世界实际能源储量究竟有多大，未来10年，满足能源需求的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00美元以上高位的可能性极大。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过去10年，开发新油田以及在现有油田中探寻新的产油区的投资力度急剧减少，而这主要是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石油价格一直偏低，以至于让欧佩克确信石油供应过剩。2000~2005年，全球新增石油产量的2/5来自俄罗斯，但在普京总统处理石油联合体尤科斯，并对来自西方的石油投资实行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之后，俄罗斯的石油投资也是不断减少。面对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石油投资偏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全球前10大石油公司全都是国有垄断企业，依次掌握在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委内瑞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政府手中（最大的私营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排在第14位）。麦肯锡公司能源小组估计，未来20年，要想以传统能源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中东及非洲石油生产国的资本投入必须要从每年80亿美元的现有水平跃升到每年450亿美元。但是，由于国有公司控制了全球90%的能源储量和80%的石油产量，他们还会继续限制本身的资本投入，同时也会限制可以填补资金缺口的来自外国私营企业的石油投资。

随着能源价格不断攀升，能源密集程度高、能源需求增长快的那些国家将对此感受最为强烈——这主要是指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以及部分中

东欧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四国、德国、法国及其西欧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小，由于征收高额能源税，而且要解决污染问题，这些国家能源利用效率已经很高。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和英国的影响则介于上述两种情形之间，因为美英两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而且美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又是十分紧密。

过去 10 年，能源投资严重不足，这也引发了关于“石油峰值”问题的公开争论，人们关注世界石油产量是否已经到达最高峰，然后将开始下降，进而将造成更大的价格上升压力。能源专家丹尼尔 · 尤金巧妙地称之为“地质悲观派”与“科技乐观派”之间的争论。悲观派关注的焦点是可以通过廉价的传统方式开采的常规石油，而乐观派指出的则是深藏于焦油沙砾、页岩及深海下的大量“非常规”石油。例如，在位于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阿萨巴斯卡地区，就有 54 000 平方英里富含沥青的沙砾沉积，这种类似焦油的物质可以开采出来，经过加工处理，变成石油。为生产 1 桶石油，开采处理足量沥青所费的成本约为 40 美元，而生产 1 桶传统原油的世界平均成本约为 12~15 美元。以两吨沥青可以提炼 1 桶石油计算，加拿大因此将会成为全球第二储油大国。到 2020 年，加拿大的沥青沙砾每天至少可以产出 400 万桶石油，这相当于沙特当前石油日产量的 1/3——生产成本是传统石油的 3~4 倍。其他许多国家也拥有大量石油页岩，这种岩石，加热之后，能够释放出可以被精炼为石油的液体，这种液体叫做油源。地质学家估计，美国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拥有的页岩石油储量多达 8 000 亿桶，相当于沙特阿拉伯已探明的常规石油储量的 3 倍。爱沙尼亚、巴西及中国的石油公司已经小规模地生产出页岩石油，产量略低于沥青沙砾石油。未来 10 年，由于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速度继续高于传统原油产量增长速度，整个世界势必要以更高的成本，从沥青沙砾和页岩当中提炼更多石油。

世界上同时也有常规与非常规两种类型的丰富天然气储量，帮助满足能源需求。使用天然气面临的最大成本问题就是，如何从产出国输送到消费国。

未来 10 年，各国政府与各大公司将会投入数百亿美元，修建新的天然气管道，建造专用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天然气投资规模虽然如此之大，但是在欧美国家，仍然要比大量使用煤炭或核能来得便宜，而且在环境影响方面，也更容易让人接受。使用燃煤，为了处理碳排放，需要开发、应用新型化学流程；使用核电，也得解决安全处置核废料问题。一旦可选择的替代能源的价格水平具有经济可行性，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形式必将会迎来大规模发展。

一旦可选择的替代能源的价格水平具有经济可行性，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形式必将会迎来大规模发展。

未来 10 年将会证明，“石油峰值”的争辩双方都是对的。全球化进程推动的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将会把石油价格推高到每桶 100 美元以上；在这个油价水平上，沙砾石油与页岩石油就有了强大竞争力，液化天然气的远洋运输同样在经济上十分可行。据美国政府估计，在这样的油价水平上，西方企业和国民也会把更多能源消耗转向可再生能源，另外就是天然气。高油价也会促进高效利用能源技术的发展，以及节能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都有助于缓解石油危机。1977 年油价飙升，并且一直到 80 年代中期都居高不下，为此美国企业、家庭及汽车司机极大地改变了以前的运作模式和生活习惯，足足把美国经济的年均总体石油密集程度降低了 5% 以上。如果这次可再生能源能够大规模使用，那么新型能源应用很可能也会减少石油用量。非石油能源的著名代表人物艾默里 · 洛文斯指出，没用一代人的时间，汽车就取代了马车，内燃机车就取代了蒸汽机车——没有人愿意走回头路。就连美国政府都预测，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将会占到美国能源消耗总量的 10%。

各种不同变化最终也会导致能源价格像过山车一样起伏波动：能源需求遭遇常规石油的产量极限，能源价格就会一路上扬；等到高油价压缩了石油需求，催生了新的能源应用，能源价格又会不断下跌，而且新能源利用技术

的相关成本也会降低。

石油冲击与能源安全

应该说，让大部分人忧心不已的是油价的突然大幅上涨，因为那样一来，人人都将被迫马上改变计划，相应削减有关开销。突如其来的油价飞涨至少已经持续了6~12个月，同时也推动了其他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因而降低了各国投资力度，延缓了全面经济增长。由于政局不稳国家的能源产出在全世界的份额不断提高，再加上已经有迹象显示这些国家面临政治风暴的形势日趋恶化，由政治事件或其他普通事件引发的足以导致混乱的价格峰值很可能会在未来10年出现。大规模的石油生产与远洋运输特别容易遭受攻击，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盖瓦尔（Ghawar）有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拉斯坦努拉（Ras Tanura）有全世界最大的联合炼油项目，海岛上还有全世界最大的储油设施，遭受攻击的危险性特别大。沙特阿拉伯将近一半的石油产出来自拉斯坦努拉及位于海岛上的两大联合炼油项目，根据计算，如果这些设施遭到攻击，两年之内，全球石油供应都会陷入困境。

更一般地，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计算，80%的中东石油出口需要经过3个船运通道，“所有通道都很容易发生意外事故、海盗劫掠、恐怖袭击和战争灾难”——伊朗与阿曼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连接亚丁湾与红海的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及苏麦德输油管道。未来10年，假如任何一个欧佩克主要成员国的石油生产与运输遭受暴力攻击，并长时间陷入瘫痪，国际油价一定会狂涨不止，迅速上升到足以损害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价格水平。

最严重的情形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卷入其中，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日产量分别为1 000万桶和600万~700万桶。

任何其他国家的石油产量与之相比都相去甚远——挪威和伊朗每日输出不足300万桶，尼日利亚、阿联酋、科威特和委内瑞拉每天运出的也只有200万桶稍多。如果发生灾难性事变，突然大幅削减沙特或俄罗斯的石油输出，或者上述任何一国做出某种政治决定，导致同样后果，必将导致全球油价一路飞升。在这两个国家当中，沙特阿拉伯发生灾难性事变的可能性更大，而俄罗斯则更可能是自己做出这种决定。

起码过去20年来，沙特阿拉伯就是主要凭借自己的石油强权来管理欧佩克，维持成员国之间的正常秩序。沙特确定并领导着欧佩克的政策执行，在这一政策指引下，不管什么时候，一旦主要石油消费国的石油库存增多，欧佩克马上就会减少石油配额，这导致2004年以来，国际油价逐步上涨，最终翻了一番。沙特阿拉伯也不允许其他欧佩克成员国违背配额限制。1998年，委内瑞拉增加石油出口，大大超出了配额限制，沙特阿拉伯马上大幅提高本国石油产量，迫使油价不断下跌，一直降到每桶9美元，最后以委内瑞拉屈服告终（这一事件使得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罗德里格斯及其所在的亲西方政党名誉扫地，也帮助反美鼓吹手乌戈·查韦斯成功当选下任总统）。为了自身安全，未来10年，沙特阿拉伯不大可能突然发动一场石油价格冲击，尤其是不会发动伤害美国的油价冲击。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及其同盟军与仿效者已经在沙特阿拉伯北部边境地区站稳脚跟，而在不足100英里之外，就是伊朗，伊朗是一个虔诚的什叶派国家，势力遍布波斯湾。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沙特阿拉伯政权，以及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等国政府还将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

即使在美军撤出伊拉克，任其听天由命之后，美国也会尽其所能，积极参与中东事务，以确保石油流通稳定——其中就包括对沙特阿拉伯政权及其王室统治家族的保护。美国在中东地区承担义务，并不仅仅出于自身获取石油的需要。美国将近60%的石油消耗依靠进口，不过80%的进口石油来自波斯湾之外的地区，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石油也仅占13%。日本与波斯湾地

区的直接利益相关性要高得多，有将近 90% 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目前进口石油总量远低于美国，但是差不多有 60% 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而且到 2015 年，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将会占到中国石油进口的 70%~80%。

即使美国不再从海湾国家进口一桶石油，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利益也还是无法抹煞。源自中东的石油供应冲击一旦形成，势必会对美国从墨西哥、委内瑞拉、加拿大及任何其他国家进口石油的价格造成直接影响。此外，美国以每年近 4 万亿美元的贸易流及大约 13 万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额，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参与者和所有人，因而全球化也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经济与中东稳定的利益相关性。对于可能动摇中国与日本经济发展进而危及全球经济基础的石油冲击，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会不闻不问。作为唯一有能力为全球提供安全措施的国家，如果中东及非洲石油生产国的政治剧变危及各国政府稳定，美国也会付诸行动——但愿会比在伊拉克的行动更加明智、更加有效。未来 10 年以至更长时间内，美国军事力量也会继续为航行于全球各大洋、每天运量多达 4 000 万桶的海上油轮提供世界性安全保障。到 2020 年，全球每日海上石油运量将会达到 6 700 万桶，另外还要加上数百万吨液化天然气。美国海军将会继续成为有能力维护全球海上航线安全的唯一军事力量。

如果未来 10 年的某个时期出现石油冲击，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那一次相比，欧洲、日本与美国的应对准备要好得多。1973 年阿拉伯实施石油禁运之后，上述各国一道创立了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以监控世界能源市场。他们还建立了国家石油储备制度，美国储备石油先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与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动用过两次。各国不断加强储备石油的努力，为应对将来出现的石油供应中断，他们也制订了分享各国石油供给的计划。他们同意采取步骤，实现本国能源进口多元化。为应对本国潜在石油供应中断，他们提高了炼油与储存能力，扩展了石油分送体系，强化了库存设备。

卡特里娜飓风之所以没有击垮美国经济，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现在拥有 100 多家炼油厂，2 000 多个海上石油平台，160 000 英里输油管道，每天处理 1 500 万桶进出口石油的相关设施，410 个地下燃气储藏场，140 万英里天然气管道。

尽管有这些努力步骤和准备措施，未来 10 年一旦出现石油供应中断，还是会把石油价格推高到每桶 100 美元以上，很可能达到每桶 150 美元，随后恐慌情绪就会击垮世界各地的证券市场。石油中断哪怕只持续几个月，也会把全世界推向严重经济衰退，许多国家随之将会进入极易遭受攻击的时期。对欧洲主要经济体而言，严重衰退将会减少财政收入，但不会影响医疗与福利成本，这会给欧盟团结造成巨大压力。如果欧盟内部国与国之间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出现显著差异——极有可能就是这样——这将会破坏南部欧洲国家对欧元的拥护，其中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日本经历了全面经济增长极为缓慢的 10 年之后，严重的衰退最终将会结束自民党摇摇欲坠的执政权力，彻底砸开日本的密室政治。由于美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低于欧洲和日本，因而在未来石油冲击爆发之初，美国暴露出的问题将会更大。但是，美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更高，面对新形势，调整起来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因而可以减小石油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

更大的疑问在于，石油冲击与全球衰退将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与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与投资的依赖程度都要高，而可能的全球经济衰退恰恰会对这两个因素造成严重打击。经济增长突然减缓，也将迫使中国要么暂停国企改革计划，要么任由失业人员急剧增多。中国领导人——同样包括其他国家领导人——面临的最严肃的问题在于，严重经济停顿是否会破坏通过经济持续进步保持中国政治稳定的领导战略。

中国与俄罗斯的石油政治

有时人们会说，能源市场形势正在改变，正在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新型国际“石油政治”。尽管其蕴涵的意义常被夸大，但能源问题还是会给美国未来 10 年的相关政策带来严峻挑战，同时也会提升中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展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就不断接近中东地区，国际能源政治关系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平添了更多的机会主义成分。确保获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量石油与天然气的可靠供应，一直都是贯穿于中国决策过程中恒定不变的根本要素。1990~2002 年，中国石油需求飙升了 90%，而国内石油产量仅提高了 15%，而且最近 5 年，中国石油需求一直都在加速增长。为了满足能源需要，过去 15 年来，中国一直都在笼络欧佩克成员国，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先从阿曼和也门开始，后来又转向科威特、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及苏丹。

到世纪交替的时候，中国的能源注意力已经集中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与伊朗，成为世界能源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1999 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了“战略石油伙伴关系”，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出口原油和天然气，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阿美公司开放炼油部门。沙特阿拉伯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石油供应国与炼油行业的重要投资者。2002 年，中国更进一步采取措施，实行“走出去”的能源新政策，鼓励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购买石油项目股权。对于拥有国有石油企业的那些国家，中国也积极引导本国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扩大出口与投资规模（印度最近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

过去 10 年，中国也在伊朗石油生产领域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资金，大部分采用的都是“产品偿还”的处理方式，即中国出资开发建设油田，然后拥

有一定比例的石油产出。未来 10 年，这种联系可能还会扩大及深化。伊朗今后还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技术与管理经验，因为伊朗现有的石油生产严重依赖少数几个规模庞大、技术落后的油田。如果因为核计划问题，伊朗继续与西方石油公司隔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伊朗将会转向中国等国的石油公司，而中国石油公司通过与西方石油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本身已经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方法。除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几乎在每一个石油生产国，中国也都有能源项目，这些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塞拜疆、加拿大、乍得、厄瓜多尔、埃及、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蒙古、缅甸、尼日尔、尼日利亚、新几内亚、秘鲁、俄罗斯、苏丹、叙利亚、泰国、委内瑞拉以及越南，而其中有些项目，中国是通过与意大利、印度、澳大利亚及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形式参与进来的。对美国、欧洲及其他所有国家而言，上述国家直接吸纳中国的积极能源参与，一直都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有助于扩大全球石油供应。

起码到目前为止，中国能源战略与能源决策的制定，首先是由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能源需求推动的，而不是出于地缘政治野心。2003 年以来，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 40% 来自中国，未来 10 年大部分时间内，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计划的实施，中国能源需求增长速度还会加快。2005 年，约有 2 300 万辆小汽车行驶在中国的公路上，这个数字大致与英国相当，有车族约占中国人口的 5%。到 2020 年，中国小汽车数量预计达到 9 000 万辆，而到 2030 年，则可能达到 1.3 亿辆，大致相当于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水平。在工业化的能源需求之外，在汽车能源需求的推动下，2020 年中国石油进口预计将会达到每天 700 万桶，2030 年预计每天达到 1 000 万桶，这与美国 2006 年的石油进口持平。

尽管在世界能源市场上还没有划出中国的地缘政治跑道，但是中国与国际能源市场正在建立的紧密联系必将产生地缘政治效应。到 2020 年，沙特阿拉伯出口中国的石油数量将会超过对美国的出口，尽管届时沙特阿拉伯还

将继续有赖于美国，但是当沙特阿拉伯发现与美国出现分歧的时候，可能就会从中国寻求支持。中国与伊朗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将产生政治影响。除了石油合作，中国国有企业也在伊朗建立了汽车与电视机生产工厂，并正在建设伊朗地铁延伸线及宽带网络。2006 与 2007 两年，面临美国制裁的威胁，欧洲企业纷纷撤离伊朗，在某些领域，中国企业乘虚而入。

中国在中东、中亚与非洲地区积极进行能源活动，最终将会成为美国在这些地区发挥影响力的有力竞争者——不过，一段时间内还不行。起码在未来 10 年内，还会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阻止中国发挥这种竞争力。美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经济体，而且美国的深蓝海军也是全球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的担保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每天将会有数百万桶外国石油通过海上航道流入中国。此外，中国能源战略表明，下一步中国将会在非洲与拉美地区，与美国石油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在中亚与中东地区，可能也会这样——这与中国同来自意大利及美国等国的西方石油公司在中国境内建立合资企业的做法非常相似。中国成为一个主要军事与海洋大国之后，所有这些情形都可能发生变化，但在 2020 年之前，甚至是其后多年之内，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

正当中国对继续推进本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资源紧盯不放，呈现出咄咄逼人之势的同时，俄罗斯看起来也正在利用自己的能源资源，力图恢复地缘政治的强权地位。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开头几年，俄罗斯从曾经的世界强国滑落为一个经济凋敝、问题丛生的中等国家，还在车臣进行了一场残酷内战，同时也要为自身统一而苦苦争斗。美国将俄罗斯的前附庸国纷纷圈进北约，单方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在中东地区发动两场战争，两度军事干涉东欧国家事务，在中亚附近到处新建军事基地，甚至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支持反俄领导人发动“颜色革命”，俄罗斯对此统统无力阻挡。

2004 年以来，国际石油及天然气价格翻番，这使得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第一次拥有了地缘政治的杠杆优势。作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第

二大石油生产及出口国，俄罗斯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及出口国，俄国油气田每天产出 800 多万桶石油（是伊朗石油产量的两倍多）及 20 亿方天然气（比美国高出 20%）。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每天出口 600 万桶石油，这些石油主要流向欧洲——欧洲每天从俄罗斯购买 400 万桶原油及 200 万桶精炼产品。俄罗斯每天也还出口 6 亿方天然气，满足德国 43%、意大利与法国 26%~30% 的天然气需要，奥地利、匈牙利及土耳其 60%~70% 的天然气供应同样来自俄罗斯，捷克与乌克兰的这一比例则达到 80%。至于希腊、芬兰、保加利亚、格鲁吉亚、斯洛文尼亚、白俄罗斯及波罗的海国家，天然气供应事实上更是全部来自俄罗斯。

共产主义可能已经在俄罗斯消失，但是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石油与天然气生产都还受到政府的有效统一控制，因此，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对外出口和国内使用都会成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有力工具。普京政府不仅处理、肢解了国内石油巨头尤科斯公司，而且还把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企业西伯利亚石油公司收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旗下，这个国有天然气公司的产气量占到俄罗斯全国总产量的 93%，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原本掌握的石油储量多达 1 190 亿桶，这个数字超过沙特和伊朗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石油储量，这样一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该公司也正在开发位于巴伦支海的什托克曼特大气田，计划于 2012 年产出液化天然气，运往美国市场销售。通过新建一条穿越波罗的海，先到德国，最后再到英国的输油管道，克里姆林宫也正在扩展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的输送范围，这个国有企业经营着全球最大的油气管道网络。

俄罗斯政府首先利用其庞大的能源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常常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所引发的国内压力，办法就是以大致相当于国际水平 1/5 的价格向国内企业及家庭出售石油与天然气。结果就是，即使能源出口规模与能源出口价格双双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行业也仅仅能够维持盈亏平衡，基本没有更新设备与生产的必要资源。俄罗斯政府也为能源

出口制定了取决于政治因素的交易价格。当白俄罗斯受到克里姆林宫的青睐时，同样的天然气供应量，它可能仅需支付俄罗斯 50 美元，而欧盟新成员国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则需要支付 110 美元，经常批评俄罗斯的波兰更是需要付出 200 美元的代价。俄罗斯也会毫不犹豫地强行提高其政治价码：2006 年 1 月，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俄罗斯把供应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提高 5 倍，乌克兰拒绝接受，结果普京就切断输往该国的天然气供应——欧盟表示反对之后，克里姆林宫又暗示可能会把送往欧洲的天然气改道送给中国。如果把产自西西伯利亚气田的天然气输往中国，而不是欧洲，俄罗斯将要花费 500 亿 ~700 亿美元——甚至比欧洲为此付出的代价还要高——但对克里姆林宫而言，一切都是为了显示地缘政治的强权力量。

尽管克里姆林宫肯定还会继续利用本国油气供应及其交易价格换取对方的政治让步，但是这个杠杆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俄罗斯大幅提高天然气价格，并没能击退乌克兰的政治变革；其西欧消费国同样也有自己的替代选择。俄罗斯也许有能力胁迫那些严重依赖俄罗斯油气供应的小国，不过，即使在这些小国当中，许多国家也都有潜在的能源供应来源，其中就包括伊朗——几年之后，也许还要加上伊拉克。此外，俄罗斯拼命巩固对能源生产与出口的国家控制，这极大降低了自身获取来自外国的投资、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可能性，因而使得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效率最低的能源生产国。西方分析人士预期，2010 年俄罗斯的油气产量就会真正达到顶峰，随后开始下降——即便是俄罗斯官方，也认为 10 年之内就会出现下滑——产量占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产量 70% 的西伯利亚三大气田的产气量已经开始减少。一旦出现全球能源供应过剩——或者因为全球经济衰退，能源需求减少——克里姆林宫的石油战略马上就会陷入瘫痪，俄罗斯经济随之就会蹒跚不前。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全世界能源利用快速增长的阴暗面，就是其所产生的污染及对气候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首次大力强调，对于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越来越感到不安，气候问题随之首次成为全球关切。作为努力结果的《京都议定书》最终陷入失败，没能让任何一个国家的排放数量大幅减少。不过，未来 10 年，各国很可能会再次展开协商努力，以期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安排，控制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下一次努力很可能会采用不同于京都模式的办法，因为要想取得成功，就不得不由《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反对者美国政府牵头组织，其中肯定还要包括经济快速发展而又不愿加入京都之类计划的那些国家。

关于气候变迁的基本科学机理，如今在国际上已经没有异议。温室气体主要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长期聚集在地球大气层中——大约一个世纪之内都不会分解——大量吸收红外线，而要是没有二氧化碳，这些红外线就会被反射回太空。二氧化碳吸收红外线之后，又将一部分发射到地球上。因此，随着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升高，地球上海水温度与空气温度都会上升。过去 150 年，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水平从 271ppmv 增加到 370ppmv，增幅度为 37%。过去 10 年，我们观察到许许多多更加明显的温室效应及可以归因于温度上升而导致的诸多后果，其中就包括冰河消融、雪山化水、湖泊消失、连年高温，还有就是，美国出现的飓风及龙卷风、亚洲刮起的季候风与台风、欧亚非各地爆发的洪水都是强度更大、频率更高。温室效应恶化的速度有多快、程度有多高，二氧化碳浓度达到多少气候变化就不可逆转，科学家们对此仍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不过，大体共识已经形成：450~500ppmv 的浓度水平就是引发严重的持久性气候效应的临界点，如果不采取严正步骤，到 2050 年，二氧化碳浓度水平将会达到 600 ppmv。

未来 20 年，全球能源消耗将会加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世界各主要

国家政府打算避免出现不可收拾的环境局面，他们必须在几年之内想出办法，使温室气体排放低于当前水平。由于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发展、推广大量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新设备、新材料，甚至可能需要找到新的替代燃料，这一挑战部分地成为一个技术问题。由于每一个应对办法都需要提高能源价格，而这样一来，势必削弱经济增长—为了避免将来付出更大代价，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不愿意这么干，所以这一挑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及政治问题。未来 10 年，许多国家政府必须努力说服选民，让他们接受更加高昂的能源价格，以及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其他挑战。因此，解决气候变迁问题就成为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难题。

气候变迁问题上的最大挑战很大程度上将会来自地缘政治方面。欧盟与日本将会对华盛顿加大施压力度，促使美国发挥带头作用，因为美国经济的能源密集度相对更高，而且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以汽车为中心，这也就决定了，如果要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美国付出的代价比任何国家都要大。此外，实现减排目标的有效努力也还必须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快速发展的大国的积极参与。

鉴于存在诸多障碍，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就气候变迁问题达成全球妥协的希望十分渺茫。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前景一度也很黯淡，但在美国和欧洲的有效带领下，各国日渐认识到接纳比退避的代价要小，世界贸易组织因而获得了强大的发展推力。在气候变迁问题上，美国的领导作用并未到位，但在未来几年内，可能就将发挥出来。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领导的公众教育与媒体轰炸已经改变了美国主流民意，转而支持采取切实行动；拥有国会多数席位的民主党也已经呼吁采取行动，2007 年角逐总统的所有候选人也都坚持同样立场。此外，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及美国其他大型石油公司也于 2007 年首次提出举行关于应对气候变迁问题最佳方式的公开辩论，而不是辩论气候变迁是否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认真实施调整计划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像

很多人担心的那么大。例如，麦肯锡公司于 2007 年做了一项研究，假定主要国家同意对二氧化碳排量实施封顶，以便把 2030 年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限制在 450ppmm 以下，然后对现有选项的所需成本加以分析。研究发现，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现代能源利用方式的大多数方面都得改变，但是并非激烈剧变——缓解温室效应并不需要特别的技术突破。相当一部分努力就是采取有效步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随着时间推移，而这并不需要人们花费任何成本。转向使用混合燃料汽车，提高楼宇、厂房及住宅的隔热性能，使用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加热、制冷及照明系统，所有这些措施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都可以抵消初始阶段的额外成本。据估计，单是采用隔热性能更好、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加热、制冷及照明系统一项，就可以把未来 20 年全世界电力需求的增长幅度减少一半。其次，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广植林木，减少采伐——草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因此多多益善——还有就是改变牲畜饲养习惯。再次，就是成本较高的措施，也是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办法——转向温室气体排放更少的替代能源，诸如风能、太阳能等，以及采用碳捕获技术，随后还有成本更高的措施，诸如在制造业领域使用生物柴油与清洁煤炭等。

未来 10~15 年，在气候变迁问题上取得进展并不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痛苦，不过是需要全世界的真正努力而已。而地缘政治方面这面临挑战：发达国家认真采取有效步骤的可能性极大，但是，仅凭这些国家的自身力量，无法实现上述目标，因为多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低成本措施都需要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例如，以更高效、更清洁的技术装备新建的住宅、楼宇、厂房及新生产的汽车就要比改造既有设施及车辆费用更低——未来 10~15 年，世界上大部分新建筑将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建成，其中主要就是亚洲国家。不过，这些新技术很难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因为采用

未来 10~15 年，在气候变迁问题上取得进展并不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痛苦，不过是需要全世界的真正努力而已。

效率更高、更加清洁的能源技术，需要担负更高的原始成本。除非发达国家能够建立一个全球基金，帮助他们抵消一部分初始开销。另外，通过减少森林采伐、改变牲畜饲养习惯所获得的潜在好处主要来自拉美与非洲，所有这些步骤同样需要原始成本投入。

来自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又有所不同。到 2020 年，美国人、欧洲人与日本人购买的新车数量仍将占全世界的大部分，甚至到 2030 年，可能也是一样，这是因为，每隔 6~8 年，发达国家的汽车大军就翻上一番。不过，未来 10~15 年，中国、印度、印尼、孟加拉国、巴西及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汽车购买量也会大幅增加，但愿他们同样也能转向购买混合动力汽车及充电电池动力汽车。

对中国、印度、韩国——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美国、德国、英国——而言，真正问题在于，为降低全球变暖的风险，究竟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提出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通常得出的结论是：要把未来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人们认为的安全范围内，今后 20~30 年，每减少 1 吨二氧化碳，采用的各种办法的平均成本约为 40~50 欧元。这个数字并非微不足道，但也不至于伤筋动骨：按当前能源消耗量计算，每个美国人每年约需为此付出 300 美元（以美元现价计），欧洲人每年约需 100 美元（因为欧洲能源税率是美国的 4 倍，他们的能源消耗要少），而中国人均每年付出的代价约为 25 美元。到 2020 年，由于能源消耗量更大，人均成本将会更高——不过，到那个时候，大部分人更能承担得起这一成本，因为届时中国、美国及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人均收入都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

障碍在于，大部分人对高于当前水平的开销都抱有抵触情绪，比如，为避免日后支付更高的能源代价而制造的混合动力汽车与节能洗衣机就是很好的例子。克服这种阻力的一个途径就是，在某些领域，由政府颁布法令，实施管制，提高汽车燃料的燃烧效率标准，及家用电器、照明设备和隔热设施的能源效率标准。管制措施起初会让消费者和建设者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日

后又会为消费者和业主节约更多费用。不过，采取这些措施也只是完成一半任务，而且还是在世界各国都参与的前提下。未来 10 年，如果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都能同意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各国人民与各个企业就会发现，他们要么需要应付诸如《京都议定书》之类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解决办法，要么就得缴纳新的排碳税——两种办法都将提高能源价格，提高幅度甚至还要高于全球供需差距对价格造成的影响。

根据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安排，每个国家都应同意按照谈判确定的指标，限制本国二氧化碳的年度排放总量，然后再把排放许可分配给主要的温室气体制造者——公用事业、制造企业、农业企业、石油加工与分销企业——以前几年的排放数量为基础确定他们的排放配额。那些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排放控制的企业，在限额排放的同时，也可以把剩余排放指标卖给无法满足自身指标要求的企业。理论上说，这样一来，每年都可以用最低的总成本，实现排放总量控制。企业与消费者最终分担了这些成本，因为公用事业与制造企业以及那些需要购买排放指标的企业将会把由此增加的成本向下传递。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有效遏制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效率最低的能源消耗。当前，打算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欧美政治人物大都青睐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的办法。不难洞悉这个办法的政治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能源涨价看起来就是来自市场要求，而不是政府政策。

然而，大部分经济学家却钟情于认真行动，而不是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这种意见很有道理。在他们看来，任何设定排放总量的制度办法都会导致能源价格比以往更不稳定，而这对投资及总体经济发展十分不利。经济学家们都还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情形，那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确定了货币供应的总量限额，货币价格——利率，随之飙升。在减排问题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能源需求一旦超出制定排放总量指标时的需求水平，排放许可及潜在能源的价格都会一路飙升——比如，夏天超常炎热，冬天异常寒冷，或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预期，都会加大能源需求。总量管制与排放交

易的办法看来也容易遭到腐败行为与人为操纵的困扰。将来的排放许可价值动辄数百亿美元，无论政府是清正廉洁，还是贪污腐败，都得由他们负责分配各项指标，监管每笔交易。这一制度将会为金融企业带来利好，因为这些企业可以开展排放交易业务，甚至进行投机交易——芝加哥和伦敦已经建立起面向排放许可指标交易的金融市场——金融企业的佣金与利润最终同样也会抬高排放指标价格。

相反，许多环境经济学家对缴纳排碳费或征收排碳税的钟情程度胜过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的办法，因为他们喜欢排碳费政策提供的直接而明确的价格信号，而不喜欢高含碳燃料。而且，当能源需求超出预期时，排碳费也不会加剧能源价格的不稳定。正如在高额燃油税的推动下，欧洲企业与家庭的能源利用效率已经高于美国一样，这类收费或征税肯定也会降低大多数高碳能源形式的实际消耗。而且人人也都同意，征收排碳税要比管理排放许可简单得多，同时也更不容易滋生腐败。经过设计，排碳税制度也可以在保护人们免于付出更高的短期代价的同时，鼓励他们减少对高碳燃料及产品的偏好。比如，可以利用骤然增加的排碳税收入，削减薪资负担。缺点在于，当能源需求增长超过预期的时候，排碳税制度也只能听任排放量继续增长，就像今天一样。

未来 10 年，全世界能否行动起来，努力应对气候变迁问题，最终将取决于美国与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是温室气体的最大生产国；到 2020 年，中国也会迅速跟进。在京都议定问题上，德国、英国、俄罗斯在排放定额方面花招不断，争取到的指标不会给本国带来任何沉重负担，几乎把全世界的所有减排调整责任都留给了美国、澳大利亚（已退出）、日本及加拿大（留在其中，但对《京都议定书》做了重新解释，避免了大部分成本支出），这种形势明确之后，美国退出了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的安排办法。如果第二轮全球努力由美国领导，美国将会尽力利用自己的超级强权优势，调动各种资源，开发生产替代燃料及新型节能技术，与中国、欧洲、及日本一道努力，

共同寻求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解决办法，其他发展中大国将很难不为所动。

除了美国意愿这个因素，未来 10 年，中国解决气候变迁问题的动力也会加强。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有 7 个在中国；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为污染付出的代价达到 GDP 的 8%，令人震惊不已，这些开销主要来自健康问题及对庄稼和建筑设施造成的损害。如果不能切实改变现状，那么到 2020 年，中国的污染严重程度预计还要增加 4 倍，进而造成中国环保部门领导人张力军所说的“中国不可承受”之重。或许最有吸引力的因素在于，中国领导人将会看到，支持针对气候变迁问题的改革办法，有助于减缓中国能源需求增长速度，降低对石油依赖程度。

没人知道全球应对气候变迁的新办法会是什么样子。作为一项严肃认真的承诺约定——现在看来，远未确定——征收排碳税要比《京都议定书》确定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的办法能够更好地满足需要。征收排碳税还有一个十分宝贵的政治优势：能够带来巨额财政收入，可以按照政府意愿支配。中国领导人将会看到，排碳税完全可以作为支付医疗需要的税收来源，而未来的美国总统则更可能利用排碳税收入，削减薪资税及其他税负。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的办法也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是，这些资金流向的是能源生产企业、出售富余排放指标的企业、经营许可指标交易的金融机构以及能够准确猜测排放指标价格短期走向的投机商与投资人。

未来 10 年，不管世界主要国家能否就征收排碳税政策达成一致，或者采用其他途径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抑或什么都不做，能源价格必将保持上升趋势。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推动政府与企业采取有益步骤。由于采取立法手段，或者实行管制政策，哪怕仅仅因为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到远高于欧洲和日本的每加仑 5~6 美元的水平，世界上使用燃料电池、纤维素乙醇及其他生物燃料提供动力的汽车所占比例都将不断增长。巴西已经在生产氢乙醇比例低于汽油的混合燃料汽车，而大众公司与通用公司都已经引入了“弹性燃料汽

车”，可以使用纯汽油，也可以使用纯酒精，还可以使用二者任意配比的混合燃料。虽然用电与取暖价格提高不大可能推动人们翻建自家住宅、更换家用电器，但是能源价格提高将会挤占人们的消费支出，这又会反过来减少一些温室气体排放。

归根到底，无论是世界能源问题，还是气候变迁问题，都不可能通过这些边缘措施加以解决。数以百万计的高峰人口日渐年老，需要为他们提供昂贵的医疗待遇，因而将导致巨大的财政压力。与这个问题十分相似，未来10年，能源紧张与气候变迁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进而引发更加热切的关注，必须采取宏大而又认真的改革措施才能解决。

第八章 08

| 全球发展的变数 |

FUTURECAST

◆ 中国实行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政策，借助全球化进程实现了快速发展，经济日趋繁荣，使得当前发展的力度与深度都在印度之上。不过，只要有开拓进取的领导力量，印度同样也可以推行与中国不相上下的改革。

◆ 未来10年，能够繁荣发展的将是这样一些国家：面对本国企业家的思想创意和推动力量，面对外国公司的经济投资和生产经营，面对全球网络生产制造的商品和服务，他们都能尽量可行地保持开放。实施——或者不实施——这条路线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根本就是当今时代世界上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

◆ 当今时代防止一个国家走向衰退的唯一方针就是，认清这个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本方式，努力去做一切能做的事情——比如，在保持经济开放的同时，提供全面广泛的新技术培训，支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新兴企业形式，降低员工医疗开销增长速度，缓解企业面临的工资成本与能源成本上涨压力。

世界各国无法改变正在影响他们发展道路的独一无二的全球性力量。然而，没有哪一个发展结果是先天注定的，对于无法直接控制的巨大力量，人类社会一直都有可以影响其作用结果的回旋余地。美国对海外移民实行相当开放的政策，这将可以缓解人口结构从生育高峰演变到生育低谷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其他国家同样可以采取类似态度。中国实行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政策，借助全球化进程实现了快速发展，经济日趋繁荣，使得当前发展的力度与深度都在印度之上。不过，只要有开拓进取的领导力量，印度同样也可以推行与中国不相上下的改革。同样也不难想象，德国和法国——尤其是法国——可能会抛弃福利国家制度，借鉴美国或爱尔兰模式，扭转经济缓慢衰退的发展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能够改变美国唯一超级强权地位的情形出现，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将会设法建立联盟，在中亚与南亚地区恢复地缘政治平衡。

就在刚刚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历史进程充满了完全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尤其重要的就是苏联解体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未来 10~20 年，也将会出现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发展变化。即便如此，也不存在能够实质影响本书所讨论的三种巨大力量的可能因素。不过，至少还有两个变数存在——一个

前景不妙，一个充满希望——当然二者也仅仅是有发生的可能而已。那个前景不妙、威力强大、阴暗可怕的可能就是恐怖主义灾难。美国具有不成比例的历史性超强军事优势，这就导致对手努力寻求非常规对抗策略，其中包括游击作战模式，以及路边炸弹、生物武器等非常规武器装备。这些发展变化本来很好理解，可是美国却反应迟缓，这已经损及美国头上绝对不可战胜的光环。尽管可能性仍然很小，但是，未来 10 年，恐怖分子成功改进他们的非常规对抗策略与非常规武器配备，从而跨越发动足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与全球化进程之类攻击的门槛，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比如，恐怖分子发动攻击，摧毁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就会沉重打击世界各地的证券市场，导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并产生不可预见的巨大政治影响。恐怖分子也可能设法打核攻击牌。最容易实现的办法就是攻击核电站或者引爆放射性武器，尽管其产生的经济及政治效应可能并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更致命的可能——虽然同样影响不会太大——就是，利用因“核武库看管不严”而流失的核武器或者自行制造的路边炸弹，在欧美国家大城市发动爆炸袭击。这种情景在恐怖电影里司空见惯，不过一旦真的发生，其影响足以让我们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东西发生改变。

未来 10 年，恐怖分子成功改进他们的非常规对抗策略与非常规武器配备，从而跨越发动足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与全球化进程之类攻击的门槛，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而那个充满希望、更为乐观的历史性变数就是意想不到的科技进展，这些进展如果实现，应该能够缓解甚至解决人们难以应对的经济及社会问题。最近这种情形已经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范围内发生：新一代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持续提高，推动全球化进程不断向前；有了它们的帮助，中国经济持续提升，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最强劲的持续增长纪录。未来 10~15 年，纳米技术取得突破，迅速推动成本低廉的氢燃料与太阳能实现大规模应用，这种可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可能性终究不大。科技的进展应该能够抵消一些能源需

求快速增长而石油投资与生产增长缓慢造成的经济压力，可能也会使得气候变迁成为一个各国不需要付出重大代价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也会削弱俄罗斯与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

就在大部分国家的高峰人口年老退休，并对严峻的医疗问题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如果说基于纳米技术的清洁能源在不远的将来还不会出现，那么，人生老迈的固有含义将会因为生物技术进步而有所改变，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科学家最近取得技术突破，成功绘制出人类基因密码图谱，未来也许可以拿出修复或替换导致许多疾病的缺陷基因的治疗方法，其中就包括对癌症的治疗。或许可能性更大一点的医学进步将会出现在干细胞治疗技术方面，这种技术不仅可以治疗帕金森综合症、亨廷顿舞蹈病及囊肿性纤维化等疾病，而且也能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中风、烧伤、关节炎及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症。这类医学技术飞跃，是将有助于缓解危及各国医疗体系的财政问题，还是会让这一问题雪上加霜，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然而，如果这些技术飞跃真的到来，那将会重新定义人到老年的真正含义，而且也能缓解压在许多国家肩上的人口结构重担。

恐怖主义变数：恐吓谁

未来 10 年，不管谁当总统，美国向恐怖主义开战，都将有助于保卫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然而，采用什么样的反恐战争形式，将要取决于各届政府对敌人及其威胁的定义方式。根据当前美国界定“我们对他们”的范例模式，“他们”被广泛定义为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分子及宗教极端分子。反恐战争的未来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总统与美国国会如何区分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分子与伊斯兰暴力极端分子，对于前者，西方人应该学会和平相处，而后者与任何别人都是不共戴天。

正如伊拉克当前骚乱所证明的那样，伊斯兰教存在严重分裂，这可以追溯到公元 632 年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他的最早追随者之间出现的争议，争议焦点就是，继承穆罕默德地位的“哈里发”[①]应该是他的直系血亲，还是公认为最杰出、最博学、最虔诚的人士。当阿拉伯部族首领宣布穆罕默德的亲密伙伴艾卜 · 伯克尔成为第一任哈里发之后，多数人表示赞成，并自称为“逊尼”，即以穆罕默德为榜样的追随者。但是，少数人坚持认为，应该由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 · 伊本 · 艾布 · 塔利卜继任，他们自称为“什叶阿里”，即阿里的助手。两个哈里发你争我夺的并存局面持续了 3 个世纪，随着一系列谋杀与战斗渐次展开，纷争最终达到高峰，伊斯兰教因此正式分裂为两派。什叶派一直居于少数，今天约占全部穆斯林的 10%~15%，集中居住在伊朗与伊拉克部分地区，也门及中南亚部分国家也有分布。

逊尼派与什叶派在很多问题上观点都不一致，不过，在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什叶派领袖仍然保持着政治与宗教的权威地位，而逊尼派哈里发则在传统上一直从属于穆斯林国王及政府。伊斯兰教逊尼派也发展出不计其数的小派别，起初主要就是因为各自对真主帮助穷人的训诫做出了不同解释。神学争论最终可能演变成为事关所有人的重大问题，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某一种解释就成了逊尼派内部瓦哈比教派的教义基础及领会《古兰经》的基本途径。该教派创始人阿卜杜勒 · 瓦哈卜在 18 世纪与一个叫做穆罕默德 · 伊本 · 沙特的阿拉伯首领建立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宗教联盟。大约两个世纪之后，伊本 · 沙特的后人统一阿拉伯，建立王国，瓦哈比教派随之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

全球化给许许多多伊斯兰瓦哈比教徒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危机，他们跟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很多宗教激进主义信徒一样，始终坚持严格按照教义要求，一字一句地阅读神圣经文。按照《古兰经》的律条生活，就意味着必须

① 伊斯兰教执掌政教大权的领袖的称号。——译者注

拒绝西方价值观，而在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把这些价值观带到了商务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大部分穆斯林家庭。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算合适，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现在成为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教徒在许多方面分化区别的主要依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具有政治与宗教目标的“伊斯兰教派武装”的兴起。尽管所有的宗教激进主义教徒都想恢复纯洁的伊斯兰信仰，为了迅速再造他们的社会形态，伊斯兰教派武装也在追逐政治权力；但对大部分逊尼派宗教激进主义教徒而言，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们都愿意与之共处。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及 90 年代初，出现了“新宗教激进主义”运动，他们力图说服广大穆斯林，逐步改变社会形态，最终成为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的国家，宗教激进主义教徒的内部分化因此而略有缩小。对西方人而言，宗教激进主义运动可能听上去跟伊斯兰教派武装十分相似。双方建立理想的伊斯兰国家的观点是类似的，而且也都拒绝接受民主，因为人们没有篡夺神位的权利。不过，新宗教激进主义运动是想通过改变人的内心世界的办法实现建立理想社会的目标，而伊斯兰教派武装则直接把目标对准他们认为背叛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领导人，以及非穆斯林外国强权。

处在伊斯兰教派武装边缘的就是时刻准备与西方开战的暴力集团，对于挡在他们“正义之路”上的任何人，他们统统格杀勿论。这种激进的暴力集团出现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此同时，为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新宗教激进主义运动也应运而生。为驱逐苏联异教徒及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国家而发动的并肩战斗，让伊斯兰教派武装与杰哈德走到了一起——这场战斗得到了美国的大量物资支持——并为数以千计的年轻穆斯林走向激进及开展训练提供了条件。而且，反苏战争胜利也证明了杰哈德采用的方法的有效性，并造就了大批经过战争检验的追随者，这些人现在可以在任何地方向异教徒开战。美国很快就成为他们攻击的中心目标，因为美国推行世俗的全球性价值观，因为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在麦加建立了军事基地——其后一直持续

存在 12 年——最后，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

未来 10 年，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将会面临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至少三种截然不同的挑战。在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逊尼派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教徒，其中许多人都曾在沙特资助的瓦哈比宗教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认为西方就是《古兰经》所训示的生活方式的直接威胁，今后还会定期表达这一观点。西方领导人与西方民众应该学会忍受这种责骂。在所有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教徒中间，也会有数以万计的新宗教激进主义分子及忠诚的伊斯兰教派武装分子，他们都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重新建成严格的伊斯兰国家。如果他们取得成功，将会带来更大挑战，因为严格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更有可能对抗美国的全球安全政策，阻止海外投资之类的全球化的关键日程，也更可能与属于什叶派的伊朗爆发冲突。如果美国与欧洲以往的成功实践能够恢复，处理这一挑战就将成为他们未来外交折冲与治国理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所有的伊斯兰教派武装分子当中，也有数以千计的暴力狂热分子，他们将会成为第三种挑战，带来的也是最为直接的威胁。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目前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简要归纳为，反恐战争是应该同时针对伊斯兰教派武装与杰哈德——第二及第三种挑战——还是集中对付来自杰哈德的威胁，而对伊斯兰教派武装的挑战，仍然采用传统的外交及政治手段解决。

未来 10 年，美国反恐战争是只以暴力极端分子为目标，还是也要包括伊斯兰教派武装集团，这取决于伊斯兰教派武装建立严格的伊斯兰国家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是会变成恐怖分子的积极同盟，还是只关注自身事务的伊斯兰国家？尽管有美国新保守主义人士的巧言诡辩，但是，伊斯兰教徒反对民主并不等价于支持恐怖主义，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盟国同样也是强烈反对民主。事实上，在全世界伊斯兰教徒占人口多数的 50 个国家当中，只有 19 个国家有点民主政府的样子。西方国家也乐得与抵制民主的其他国家共处，整个冷战期间就是这样过来的。即使把反恐战争的目标

瞄准为恐怖分子提供积极保护的国家，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国家视为威胁，除了采取进攻性政策，为时刻准备对美国发动骇人攻击的恐怖分子提供保护的塔利班这种极端政权。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政府就很难归类，有些时候它支持恐怖主义，有些时候又不支持。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哈马斯通过民主手段取得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又集武力反对以色列与积极参加叙利亚境内的社会活动于一身，对于这样的情形，也无法做出简单反应。

中东与美国的政治现实错综复杂，这就表明，反恐战争将会成为美国今后几年的一项特别事务，反恐焦点主要会瞄准那些坚决通过对西方实施大规模杀伤方式来表达他们不共戴天的反对意见的暴力集团。基地组织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尽管美国一直没有抓获本·拉登，但是已经摧毁了该集团从塔利班获得的国家支持，重创了它的创始领导层，削弱了它在为其他恐怖集团提供技术、资金及意识形态支持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基地组织基本已经恢复到成立之初的状态，成为阿富汗境内的圣战组织，很少具有实际战斗能力，但是会为更加活跃的武装斗争集团筹集资金、招募人员、提供训练。

未来几年的反恐战争可能也会瞄准数以百计的西方本土恐怖组织以及新出现的恐怖集团，他们与基地组织类似，有时也会得到基地组织的支持，这类组织尤其可能出现在欧洲。比如，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估计，单是在荷兰一国，就有 20 个杰哈德组织网络，他们与大约三四百个国外网络都有联系。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就是，有证据表明，很多这类组织现在都与有组织犯罪团伙互通有无，为的就是利用他们的“供应、转运及资金转移网络”。这种联系会为他们带来新的弱点，因为长期以来，犯罪团伙一直都是欧美国家司法部门的情报来源。

最模糊不清的发展趋势就是，伊拉克涌现出新的恐怖组织，有朝一日会像基地组织一样，具有世界性影响力。就像 20 世纪 80 年代的阿富汗一样，现在的伊拉克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恐怖集团的征募人员，不管对于

反抗美国军事力量的杰哈德，还是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冲突派别，吸引力都是一样。就像前苏联占领期间的阿富汗一样，伊拉克已经成为在现实环境中训练没有作战经验的战斗员的理想场地。数以千计的年轻伊斯兰教派武装分子，通过观察美英士兵现场作战，已经学会了如何服从命令、收集情报、制造爆炸装置，而且也能发展出杀伤他们的最有效方式。这些新的恐怖集团看上去主要是以半独立的基层单位为组织基础，以后将会证明，与基地组织那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相比，这类基层单位更难追踪，也更适合发动恐怖袭击。

恐怖主义变数：怕什么

极端暴力恐怖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 1 世纪，那个时候神秘的犹太教信徒组成了“朱迪亚匕首敢死队”，他们对占领朱迪亚（Judea）的罗马士兵（及犹太教内奸）发动袭击，直至最终被消灭于梅察达（Masada）。法国大革命让恐怖主义分子有了现代名称，尽管他们的恐怖统治是以政府政策的形式出现，而这些政策看起来更像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斯大林主义。19 世纪后期，出现了由崇尚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小集团形成的松散网络，他们与现代恐怖主义更为接近，1878~1913 年期间，他们设法暗杀了一位法国总统、两位西班牙首相、一位俄罗斯首相，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xander II）、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及美国总统威廉 · 麦金莱同样都是死于暗杀。

然而，最为现代的恐怖主义一直都是由国内因素引发，而不是出于国际地缘政治原因。现代恐怖主义以爱尔兰恐怖分子为开端，他们与朱迪亚匕首敢死队非常相似，组织了秘密部队，武装反抗外国强权占领。纵观整个 20 世纪，国内秘密武装组织模式蔓延到了西班牙、希腊、德国、日本、墨西哥、

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的大部分恐怖主义集团与以往那些恐怖组织的区别之处在于，他们都有国际地缘政治目标，这些组织的参与者也都乐于使用超常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够导致世界末日的毁灭性武器是抱有地缘政治目标的恐怖分子对付遥远敌人的排他性选择，因为没有一个恐怖组织会在他们希望收复的那个国家引爆核装置，或者施放瘟疫）。

恐怖分子不需要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可以造成巨大影响。但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尽管任何一次重大恐怖行动都会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群紧张不安，不过绝大多数恐怖行动都不会造成多少长期经济、政治影响。那些具有长期影响的恐怖行动，必定是恐怖主义遍布整个社会，而且根深蒂固、旷日持久——就像哥伦比亚、北爱尔兰、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及以色列那样。在这些地方，恐怖主义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社会发展。而在恐怖主义具有偶发性、局部性的任何其他地方，恐怖主义的实际影响一直都是令人惊奇的微弱。只要基地组织及其后继者几年之内无法利用比飞机还要强大的武器发动袭击，也不能像在伊拉克那样定期实施多头攻击，他们给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造成严重损害的野心就不会得逞。

甚至恐怖主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般都不会很高。小规模恐怖行动——政治谋杀或死伤数人的炸弹爆炸——产生的经济影响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对一个大国而言，即使是大规模攻击，也不过是一闪而过。可靠数据表明，“9·11”袭击并没有动摇美国经济，随后一个季度，美国的消费支出、投资规模及 GDP 增长都在加速。由于恶劣天气与自然灾害影响，现代经济体经常规律性地承受比恐怖主义袭击规模大得多的人员及财产损失——例如，1988 年热浪袭击，5 000 多美国人因此丧生；1999 年土耳其伊兹米特地震，17 000 多人死于非命。

恐怖主义利用暴力手段营造了一种更多恐怖行动还在后头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一旦在某个地方出现，人们的恐惧情绪就会妨碍投资。在那些看起

来处处都不安全的小国，尤其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小型经济体，这种恐惧效应表现最突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 年前外国资本选择了从哥伦比亚撤离，以至于哥伦比亚现在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拉美平均水平 40%。当宗教暴力席卷贝尔法斯特[①] 的时候，北爱尔兰就成了英国最贫穷的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暴力活动减缓之后，该地区经济发展又开始恢复。以色列是另一个被恐怖主义削弱经济发展的重要实例。武装袭击在以色列造成了一种战时政治经济氛围，据以色列银行计算，由于外国投资及观光游客减少，财政赤字上升，以色列每年付出的代价高达 GDP 的 4%。然而，在比哥伦比亚、北爱尔兰及以色列大的国家，恐怖主义只能造成局部经济影响。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至今，政治暴力一直深深困扰着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这些年来该地区人均 GDP 只增长了 10%，增速十分缓慢，而西班牙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十分迅速，西班牙已经成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

在美国、日本及其他大型经济体，恐怖行动会把投资从那些被认为特别容易遭受攻击的行业和地区吓跑，而转向更为安全的部门与区域。美国世贸中心遭到袭击，对曼哈顿当地经济造成短期打击，但是不会影响波士顿或芝加哥。即使在曼哈顿当地，影响也只是集中在中心闹市区，那里有近 30% 的 A 类办公区惨遭摧毁。“9 · 11”事件也给航空、酒店及保险行业带来挫折，不过，投资与需求随后转移到了其他行业部门，特别是在美联储为平复市场而放松信贷控制之后，这种现象尤其明显。而且 6 年之后，曼哈顿闹市区的房地产价值也已经远高于 2001 年秋天的水平。类似地，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红色旅”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恐怖活动达到顶峰，受到伤害的也只是旅游业，而不是总体经济发展。

现代大型经济体之所以能应对偶尔发生的恐怖破坏行动，是因为他们的市场机制能够让资本投资与就业岗位迅速转移，免受暴力攻击，随后重新进

① 北爱尔兰首府。——译者注

行分配。尽管这样说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9 · 11”一类袭击事件造成的经济影响的确与一场自然灾害极其类似：遭受突如其来的损失之后，紧接着就是恢复重建的强大经济刺激。对于美国、日本、英国之类经济体，真正能够造成经济混乱的并不是局部攻击，而是能够马上打击全面经济发展的综合性冲击，比如欧佩克在一夜之间把能源价格提高 2 倍。

原则上说，互联网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攻击目标。例如，先是在 2002 年 10 月，后又于 2007 年 2 月，一个身份不明的团伙针对美国军方网络的一系列“根服务器”，发起了十分复杂的“拒绝服务”攻击，目标就是使得使用这些服务器的美国军方网络无法工作。此外，美军在阿富汗缴获的基地组织的计算机中，也含有大量数字设备信息，这些数字设备可以遥控美国的电力、供水、管道、运输及通信网络，其中也有如何对这些设备重新编程的相关信息。一个小型恐怖团伙也曾引起美国官方关注，他们受过计算机训练，企图利用互联网，进入控制铁路道岔扳动的“数字调度控制系统”，关闭电网断路器，修改水利大坝及输送石油、自来水与天然气的管线运行参数。

针对互联网本身发动大规模信息攻击，或者通过互联网，攻击关键性的基础设施系统，都是有可能的，而对电力、管网及大坝系统的攻击完全可以造成数以十亿美元计的灾害损失。不过，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代价与影响则不大可能出现。互联网采用的是分散控制、开放访问的结构方式，这就使得攻击人员有机可乘，同时也使得隔离并修复网络受损区域变得更加容易。尽管基础设施遭受攻击可能产生相当可观的局部损失，不过还是极像一场自然灾害，混乱现象也是很快就会过去。为造成严重损害，网络恐怖分子不得不对互联网或基础设施系统进行长时间攻击，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假如未来 10 年恐怖主义变得更具毁灭性，再认为大部分恐怖行动的影响都很有限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在所有可能性当中，如果恐怖分子利用核武器或生物武器，对欧美国家大城市发动袭击，特别是这种袭击不止

一次地出现，恐怖行动的典型模式就会转变为全面战争。而现代战争将会耗费极其庞大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成本。在当前阶段，欧美国家主要城市遭受核武器或生物武器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而这种恐怖事件极其罕见，很难预测，一旦发生，将会对全球化进程及地缘政治的发展道路产生重大影响。

可能性最大的恐怖袭击（所有恐怖活动的发生概率都很低）可能会涉及核原料，而不是核武器，这种袭击将会造成十分重大但还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破坏效应。比如，一般认为美国、欧洲及日本的核电站非常容易遭受攻击或破坏，但是袭击可能并不会演变为灾难性事件。疯狂的人们撞毁核电站围墙，冲入其中，甚至开车从大门长驱直入，这类事情不胜枚举。这些核电站也可能像五角大楼与世贸中心那样，遭受空中袭击。不过，这类神风敢死队式的恐怖袭击引发大规模毁灭性核辐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想造成毁灭性核辐射，恐怖分子就得穿透围裹核反应堆的厚达 4 英尺的混凝土墙壁，还得穿过核反应堆周边 7~12 英寸厚的钢墙，然后引发化学爆炸，或者纵火，这样才能把核辐射释放到大气层。在 1979 年发生的三里岛事故当中，冷却系统发生故障，核燃料随之熔化，但是并没有导致防泄漏围墙的大规模开裂，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燃烧或爆炸，放射逸出极其微小。据专家说，就是利用一架大型飞机，也无法产生那种效果。

1986 年，由于人为及机械错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被摧毁，如果恐怖分子照搬这些错误，看起来那将是更可能带来真正浩劫的方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熔毁，核辐射范围超过 50 000 平方英里，导致 2 300 多平方英里区域无法居住，估计最终夺走 4 000 人的生命。美国忧思科学家联合会估计，距离曼哈顿 35 英里、位于纽约州威切斯特县的印第安角核电站一旦遭到恐怖袭击，并释放出同样当量的核辐射，那将会杀死 44 000 美国人。不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辐射泄漏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苏联建造核反应堆的时候，没有修筑防泄漏围墙，因而氢爆炸与石墨火焰能够把一部分放射尘直接

吹向太空。在西欧、日本及美国，都不存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种情况。核电站数量最多的法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核电站如果遭到恐怖破坏，那将成为骇人听闻的重大事件，必将激发人们采取严厉得多的安全措施。不过，还是会像三里岛核电站意外事故一样，真正造成的长期经济、社会影响将十分有限。

恐怖组织将会发现，把钚元素加到常规炸药当中，制造出“脏弹”，在技术上要比复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更容易实现。这个办法的障碍在于如何获取、转运、处置钚元素。即使有恐怖集团能够成功做到这一切，其所造成的真正破坏也还是十分有限的。放射性炸弹可能会永久污染英国国会大楼或者纽约证券交易中心，如果钚含量足够大，爆炸力足够强，方圆几个街区可能也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大楼与街区都是可以替换的，国会议员和证券交易人员也完全可以迁往别的地方。更大的破坏效应来自世界上惊恐不安的全体民众，因为人人都会相信这种袭击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每个主要城市都会像华盛顿特区一样，安装精密的放射传感器；每个政府都会彻底加强核原料的周边安全保障——这是早就应该做的工作——对付实施这类袭击的罪犯或嫌疑人，军事报复手段将是致命的、彻底的。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各国做出的反应是否会改变全球化进程与地缘政治的发展道路，还是大有疑问。

然而，如果恐怖分子设法引爆真正核弹，一切断言都将不复存在。可能性最大的武器就是利用高浓缩铀在袭击目标现场组装的“临时核装置”。临时核装置可能就是一个枪械组装设备，像是在广岛投放的核弹的粗糙翻版。广岛核弹桶状弹体直径 6 英寸，两端密封，长为 6 英尺，一端装有标准炸药，紧挨着就是一个高浓缩铀团块，在弹体另一端，是第二个高浓缩铀团块。炸药引爆之后，就会推动第一个高浓缩铀团块进入第二个团块，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团块，进而引发裂变链式反应。制造并引爆核弹当然不会像我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有 5 位洛杉矶核武器专家得出结论，认为恐怖分子不需要先期

经验，只要掌握几项关键技巧，并获得铀元素，就可以制造并引爆核装置，这是足够准确的说法。基地组织寻求核武器的意愿确定无疑：本·拉登曾经告诉他的追随者，他们的宗教职责就包括寻求获得核材料。

恐怖分子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如何获取高浓缩铀。他们最有可能的途径就是窃取，世界核不扩散体制遭遇的令人震惊的失败，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核不扩散体制一直允许各国和平发展核电站，如今在 30 个国家，已经建成 435 座核电站，这些都是失窃高浓缩铀的潜在来源地。然而，人们发现可能性最大的来源还是俄罗斯分崩离析的核工业基础设施，有些专家认为，俄罗斯只有 50% 的裂变原料能够得到充分保护。基地组织、日本奥姆真理教、伊拉克以及伊朗都曾在俄罗斯寻求获得核原料。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于几年前得出结论："（俄罗斯）许多场所还存有大批特种核材料，这些核材料显然缺乏库存控制，内在威胁不断增加。"1991 年，为确保安全，销毁前苏联地区的核材料与核武器，美国制定了《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但是资金规模相当有限，以至于到 2018 年，这项工作才有望完成。

核不扩散工作进展不利，也为恐怖分子窃取成品核武器创造了机会。由于核发电技术很容易转变为核武器生产，而且只有核查才能防止这种转变进行，核武器已经扩散到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及朝鲜。另外，伊朗极有可能很快就拥有核武器。很多专家预测，10~15 年之内，核武俱乐部还要显著壮大，会把日本、韩国、印尼、沙特、埃及、南非、巴西等国包括进来，而且或许还会有别的国家。今天，在美国、英国、法国及中国，可能还有印度与朝鲜，军械库里的核武器都受到严格控制，但是，在前苏联地区，那些没有彻底安全保障的特种核材料当中，还有大量千吨 TNT 当量级的核设施，其中就包括比投放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威力大得多的核装置，对此，人们一直严重关切。

令人鼓舞的事实是，迄今没有一个恐怖集团成功买到或偷到核武器及武器级浓缩铀。如果这一情况发生改变，那么几乎没有什么疑问，恐怖分子

起码可以在世界各地转送并引爆临时核装置。美国每年到港集装箱多达 700 万 ~800 万个，实施核查的大约只有 2%，大部分其他国家的核查比例还要低。美国已经计划对更多集装箱进行放射性屏蔽检查，但是放射传感器对于核武器铀放射的检测效果要好于对高浓缩铀的检测，因为高浓缩铀的放射量非常少。世界各国也都有数百到数千英里不等的边境线，并没有配备放射感应与监控设施。

核武器也可能在接受港口检查之前就被引爆。兰德公司曾经对位于洛杉矶以南 20 英里的长滩港发生万吨 TNT 当量的核爆炸——小型原子弹，不过威力要比临时核装置大——造成的可能影响做过分析。分析表明：大约 60 000 人当场就会丧命，超过 150 000 人会面临遭受放射性污染的水源与沉渣的威胁，二三百万人不得不从核污染地区迁出，另觅居住地，总共会有 600 万人竭力逃出洛杉矶地区；直接经济损失将会超过 1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 8%，相当于英国、法国或中国年度产值的 40%~50%。一个粗劣的核装置如果在曼哈顿爆炸，所造成的损失也至少会有这么大。

未来 10 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其所造成的全球间接损失将远大于此。所有国家都会封锁港口及大部分国界，而且这种封锁会持续很长时间。这首先伤害的就是石油运输，其次就是国际贸易。证券市场将会崩溃，尽管美联储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会采取措施，多少减轻一点恐慌情绪，但是对于规模空前的实际损失，他们都是回天无力。几乎可以肯定，世界经济形势将会急转直下，马上陷入严重经济衰退。

由于大部分经济潜力毫发未损，各国经济最终将会恢复元气，但是，全球化进程与地缘政治格局将再也不会恢复原样。因为大量资本将会流向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的地区，而政府也会更加严格地仔细检查所有资本往来业务，金融流转将会放缓脚步。各国政府也会坚决取缔他们认为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的所有技术输出，其中包括大部分信息技术。没人知道地缘政治方面会造成什么确切影响，不过，包括许多中东国家在内的作为大量恐怖分子及其支

持者藏身之地的那些国家，都将面临美国领导的大规模清剿行动或军事打击的巨大风险。在各国内部产生的后续效应同样令人震撼。恐怖分子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成功实施核袭击，都会引起传统政治自由的重大改变，而与世界大战有关的执法权力将会大大加强，其中包括监控、拘留及新闻审查等。

核爆炸无疑是最坏的变数，不过，未来 10 年可能出现的某种形式的生化恐怖，肯定也会对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当前发展道路造成影响，甚至还会影响到全球人口结构。美国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 · 法奥西博士是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早在“9 · 11”之前，他就提到：“针对美国平民的生化恐怖攻击无法避免……唯一的问题在于他们会采用何种攻击手段，以及攻击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政治上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利用生物手段在欧美城市发动袭击这一策略具有很多特点，会对恐怖分子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这种办法不需要动用庞大的设备及放射性物质，而且相对也不容易被检测到。实施攻击的那些人也很容易逃生，因为在一段时间之内，目标人群甚至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遭到攻击。生物攻击需要的资源也比核武攻击小，而且一旦成功，还很容易重复实施。或许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杀伤性生物攻击手段的潜在来源非常多，也很容易窃取和转运。美国蒙特利国际研究院防扩散研究中心认为，11 个国家确认或涉嫌制定有进攻性生物攻击计划，其中包括伊朗、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苏丹及巴基斯坦。

与其他形式的恐怖行动一样，最容易实施的生物袭击造成的影响往往也很有限。许多专家相信，最可能的攻击目标是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国部队及其盟军，或者是对一个国家的农作物与食品安全发动攻击。对美国海外军事设施发动攻击，将会造成有限的经济损失，人员健康代价也不会太高——当然，遭受感染的那些人除外——但是，这将激发美军所在国政府提出美国撤军的要求，因而具有地缘政治效应。另一个策略就是污染进口食品。然而，在发达国家，这类攻击可以被相当迅速地检测出来，人们也可以避免食用这

些受污染的食品。1996 年，在美国 20 个州，约有 1 500 人意外受到寄生虫感染，感到严重腹部疼痛，原因就是食用了从危地马拉进口的树莓，不过这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经济影响。

令公共卫生专家担忧不已的是，恐怖攻击采用被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归类为“高风险”的生物制剂，这种制剂的致死率很高，足以引发公众恐慌。首选的就是炭疽菌、肉毒杆菌与天花病毒。炭疽菌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它具有致命性，而且易于批量生产：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土壤里滋生着炭疽菌，如果草食动物吸食了它，人们就可以从其血液中提取出炭疽菌，然后就可以在任何实验室里大量培养生长。花 18.11 美元，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买到一步一步详细说明的指导教程，美国“9 · 11”事件调查委员会也发现，“在‘9 · 11’之前，”基地组织“制造炭疽菌的能力正在不断提高”。

不过，利用炭疽菌使大规模人群感染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一个人只有直接接触高密度炭疽孢子，才会感染炭疽病。炭疽孢子可以通过感染者接触过的衣服或其他物品传播，但是这种病不会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人 - 人传播。要想以炭疽病菌为正式武器，恐怖分子就得制造出数百磅炭疽孢子，使用仔细封装的包裹，偷带到美国或英国，然后选择一个或几个主要城市作为目标，利用飞机或汽车播撒病菌。如果条件刚好合适，大批人群将会受到感染，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不过，这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因为这些行动大大超出了当今任何一个恐怖组织的能力范围——而且自 2001 年美国出现炭疽菌袭击事件以来，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都储备了炭疽菌疫苗。

与炭疽菌类似，肉毒杆菌同样容易获得，而且致命性也很强，因而被认为是自然界中毒性最强的蛋白质。但是，恐怖分子同样也会发现，利用肉毒杆菌使大规模人群感染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一旦暴露在空气中，肉毒杆菌就会迅速降解。这也正是日本奥姆真理教花费数百万美元批量制造肉毒杆菌，但是最终抛弃不用，转而使用沙林神经毒气作为攻击手段的原因所在。在 1995 年奥姆真理教发动的东京地铁袭击事件中，沙林神经毒气造成 12 人

死亡，3 800 多人受伤。自 2004 年 7 月以来，按照《生物盾牌工程法》要求，美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对肉毒杆菌以及炭疽菌、天花病毒治疗药品的库存储备。

天花病毒比炭疽菌和肉毒杆菌的传染性更强，也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更加不利的是，全世界大部分人不是没有接种天花疫苗，就是已经超过接种有效期。如果恐怖组织成功散播大量天花病毒，必将产生全面影响。但任何恐怖组织要想做到这一点，同样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将近 30 年之前，天花病毒就已经被彻底根除，目前唯一确定的天花病毒存放在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以及俄罗斯国家实验室。尽管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声称这些存放点存在安全漏洞，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是，单一的天花病毒爆发是可以控制的。如果在接触天花病毒 4 天之内接种疫苗，应该可以避免天花感染，或是降低发病烈度。在天花病毒的发源国，只要有“强大的监控系统”，能够敏锐发现天花病例，以及有良好的公共卫生体系，可以隔离病人，并对所有接触者注射疫苗，就有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切断传播链，阻止天花爆发”。虽然现有疫苗无法覆盖大部分人群——美国约有 1 540 万支，世界卫生组织在荷兰存有 50 万支，以备应对紧急情况之需，其他国家据报约有 6 000 万支，质量及药力参差不齐——但足以控制瘟疫蔓延。

与在重要的都市中心区引爆核武器一样，生物恐怖袭击也可能造成最坏结果：在多个缺乏“强大的监控系统”或无法按计划正确应对的地方，天花之类的病毒同时释放。假如天花瘟疫从毫无防备的国家或城市开始爆发，随后传播过程又失去控制，那么这将演变为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件。为控制疫情蔓延，航空与铁路运输都会停止；由于国家及地方政府竭力封锁边界，大部分贸易活动都将被迫取消；由于害怕传染，公共学校被迫关门，公众活动只好取消；由于大批员工感染患病，或者因担心感染而担惊受怕，很多企业只能关门歇业。唯一繁荣的部门将是医疗行业，该部门很快就会不堪重负，全球经济可能突然陷入衰退。在最坏情况下，人口的大量死亡可能改变一个国

家的人口结构。不然的话，3 个月、6 个月或者 9 个月之后，危机过去，经济政治生活还会恢复原来情形。

另外两个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可能改变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发展轨道的变数就是，在沙特阿拉伯或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武装派别发动政变，接掌政权。在这两个国家，基地组织仍然是一股很有影响的力量，因为西方联军推翻塔利班政权之后，本 · 拉登的追随者大都逃到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或是潜回沙特阿拉伯。一回到老巢，很多人又马上加入了附属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基地组织”。2003 年 5 月，在针对西方人的利雅得爆炸袭击发生之后，虽然沙特警方展开了有力的打击行动，但是，大部分恐怖组织成员仍然逍遥法外，继续效忠于本 · 拉登。

在沙特阿拉伯，基地组织授意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真正前景并不确定。本 · 拉登的副手阿伊曼 · 阿尔－扎瓦希里号召追随者把改变沙特政权作为优先目标，在 2007 年 7 月发布的录像中，敦促他们赢得“人们对伊斯兰圣战的普遍同情，认真积极地推翻那些腐败政权，打倒腐败分子”。在欧洲年轻的中东恐怖主义问题著名专家托马斯 · 黑格玛看来，大部分沙特好战分子都是国家主义者，因而他们更倾向于攻击美国，而不是本国政权。但是，美国专家的看法有所不同，强调伊斯兰瓦哈比教徒信奉苦行节俭、不容异端的意识形态，而沙特王室又以富甲天下、贪污腐化著称，这是他们强烈反对沙特政权的根源所在。

沙特阿拉伯什叶派人口约占 10%，他们被官方的瓦哈比逊尼派边缘化，这是反对王室政权不满情绪的又一块滋生地。什叶派沙特人集中居住在沙特东部地区，大部分石油设施也都在这里，而且这些设施保护不严，很容易遭受攻击，尤其重要的设施有：石油产出占全国 2/3 的布盖格综合炼油项目、主要石油出口终端码头拉斯坦努拉港口，以及从布盖格和盖瓦尔到延布的红海海上输油管道。假如极端分子推翻沙特王室——或许更坏，恐怖分子破坏关键石油设施——石油供应紧张局面就会持续 1 年，甚至长达 2 年。沙特政

府最近已经察觉到这种威胁不断上升，因而于 2007 年 8 月宣布新建一支 35 000 多人的安全部队，以保护石油基础设施免受攻击。这支部队将由美国国防工业巨头洛克希德 · 马丁公司负责训练、提供装备。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可以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沙特石油供应短暂停顿的冲击，但是，**持续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供应停顿将会引发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并会带来严重的潜在政治后果。**

沙特石油供应中断的推想结果令人警醒。全世界所有石油生产国全力以赴加紧生产，每天能比现在多生产 600 万桶石油，这 600 万桶当中，沙特就占了 400 万桶。如果沙特石油产出减少一半——约为每天 500 万桶——即使其他所有国家竭尽全能生产，也会造成每天 300 万桶的石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专家朱利安 · 李说："很难看到全球石油市场上恐慌反应的上限"。保守估计，石油价格会提高到每桶 150 美元以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石油价格每年每桶上涨 10 美元，就会使全球 GDP 减少 0.6%，而美国、欧元区国家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下降幅度则要达到 0.8%。根据这个计算公式，油价涨到每桶 150 美元，美国与欧洲的 GDP 将会减少 5~6 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严重衰退。如果每桶石油价格突然提高 50 或 70 美元，可能也会引发更为严重的激荡效应。中国现代化进程将被迫止步，包括沙特自身在内的多国政府将被推翻，俄罗斯与伊朗这两个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最大产油国的政治优势将大幅提升。

在未来 10~15 年的某个时间，如果沙特现政权被伊斯兰教派武装极端分子推翻，还将带来其他风险。鉴于伊朗的历史经验，沙特新政府同样也承担不起退出石油市场的代价。不过，与伊朗一样，其反西方、反美国情绪将会大大强化，而且这种情绪可能会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将会从美国的主要盟国一举变成美国的潜在敌人。伊斯兰教派武装强烈反对沙特王室的腐化堕落、穷奢极欲，除此之外，他们的经济计划模糊不清。与此同时，他们的外交政策目标异常明确：坚决反对美国、以色列以及西方在中东地区

的存在与影响。**对于美国为全球经济发展而努力维护石油供应稳定的决心而言，世界最大产油国的这一外交目标将会带来严重问题。**

极端分子接管巴基斯坦政权，将会对未来 10 年的地缘政治秩序造成截然不同但又同样意义深远的重大影响。按照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斯蒂芬 · 科恩的说法，巴基斯坦已经是一个“失败了五六次的国家”，国内极端教派武装实力异常强大。就在最近的 2007 年 7 月份，穆沙拉夫总统派出将近 12 000 名装备精良的安全部队，清剿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武装分子”，武装分子竟然有效抵抗一个星期之久。假如这些好战分子及其教派武装支持者在卡拉奇掌权，那就意味着一个掌握核武装、与基地组织联系密切的塔利班式政府赫然出现。一些分析家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在克什米尔地区突然发起与印度的激烈冲突，以激发印度发动先发制人式的军事打击，最终以地区性核交战收场。让许多西方军事专家忧心不已、同样不能掉以轻心的危险情形就是，美国领导的联会军事行动在阿富汗遭遇失败。果真如此的话，这将意味着马上就会出现英国自由民主党前领袖阿什顿勋爵所说的情形：“巴基斯坦陷落……而且你无法阻止随后引发的地区战争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本质上涉及整个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全面战争”。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将会竭尽全力保护穆沙拉夫政府以及推行类似政策的继任者。

未来 10 年，尽管恐怖分子不大可能引发存在变数的任何一个重大事件，但是，这类事件一旦发生，造成的经济政治代价将无法估量，后续效应也会改变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发展道路。面对这些威胁，未来几年，尤其是当美国从伊拉克撤退之后，美国应该把精力高度集中于反恐战争。此类重大恐怖行动导致的严重后果令人警醒，这也应该成为美国、欧盟、中国以及日本之间加强地缘政治合作的现实政治背景与政治议程。

科技变数：期待什么

无法预料的极端恐怖主义可以改变世界，让世界形势变得更加糟糕；未来 10~15 年，同样无法预料的科技突破则可能加强全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且也可能帮助解决很多国家很快就会面对的能源、环境与医疗危机。

改变亿万人民生活与工作方式的科技进步既不会司空见惯，也不是凤毛麟角，下一个重大进展会有什么特点，什么时候出现，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这一切都还无从得知。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科技创新的步伐越来越快，未来 10~15 年出现某些应运而生的重大科技进展的可能性不断提高。一个原因就是，今天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及化学家都可以把新兴信息技术无比强大的威力应用于各自领域，这是前无古人的优势。另一个原因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真正实现了全球化。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最有创造力的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及聪明人，不管来自圣何塞、上海、特拉维夫、斯德哥尔摩，还是其他任何地方，也不需要背上一皮包资料，就可以阅读同一份分析报告，参与同一个话题的讨论，也可以静静观察，然后并肩努力，或者彼此竞争，所有这一切进行得都是那样有条不紊。

在科技进步方面，全球化也发挥了一种不太明显的影响作用。全球化使得大批国家的经济更加繁荣，这就极大地拓展了功能更强的电脑软件、新兴医学治疗手段、燃油效率更高的汽车及其他信息技术的市场空间。更为庞大的潜在市场提高了创新研发的潜在回报，更高的潜在回报又吸引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最终结果就是，更多的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并不断被推广到不计其数的家庭、工厂及办公室。因此，美国这个全世界利润驱动机制最发达、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温室（干细胞研究等少数几项例外），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美国作为单一超级强权的独特地位也发挥了部分作用。两个多世纪之

前，伊曼努尔 · 康德观察发现，通过激发新技术的开发与传播，战争也经常会推动社会进步。今天这种关系仍然适用于美国，五角大楼一年的研发预算就高达 740 亿美元，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全部军费预算还要多。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是美国主要的军事基础研发机构，该机构以设计提出互联网的前身而著称，其现有研究项目包括：用于反恐战争的炸弹部件检测新途径，这项技术可以用来开发医学诊断芯片；可以改变个人电脑系统结构的超级计算技术研究；把疫苗研发周期从几年缩短到几个月的加速开发技术研究。

尽管我们无法预测下一项关键性的科技突破会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辨别今天世界上大量科研人才与科研经费集中在什么地方。纳米技术方面，许多规模庞大的研发项目都把宝押在替代能源技术上，这项技术一旦取得成功，将会产生十分重大的全球性影响。类似地，生物技术领域的前沿科学家正把目标对准癌症、心脏病及遗传疾病的治疗新方法，这些技术最终将会帮助各国医疗系统摆脱困境。信息技术创新方面，当前大量精力看起来正集中于提高计算机的移动性与微型化，这一发展趋势能够促进互联网及通信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普及，加快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全球化推进速度。

纳米技术与全球能源危机

纳米技术的研究对象就是小到简直无法想象的微观结构——尺寸为十亿分之一米（就是所谓的纳米）。研究人员可以自上而下地制造纳米器件，比如，先在硅片上放置超薄膜，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蚀刻处理，就可以制造出 15 纳米厚的计算机芯片。利用化学工艺，先合成特殊的原子或分子，他们也可以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制造出纳米器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罗 · 阿利维萨托斯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把纳米技术的发端称为“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因为纳米技术“不是把物质分解开来，而是把它们

聚合回去”。未来 10 年，把纳米技术的潜在影响与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降临所产生的影响加以比较，就可以确定阿利维萨托斯教授以及其他纳米技术追捧者是否正确。

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明确无误地对纳米技术予以关注，自 1997 年以来，关于纳米技术的研发预算增加了 9 倍，从 4.32 亿美元猛增到 2005 年的 41 亿美元，至少有 60 个国家的公司企业已经正式开展纳米技术研究。大量相关研究都集中在基础成分制造方面，主要包括：纳米管与纳米层技术、简单纳米结构聚合技术以及纳米级原子与分子基本物理特征经常发生变化的运动机理。纳米结构很难让人一睹真容，但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已经出现纳米生物设备、纳米晶体管、纳米放大器、纳米医药、纳米机器、纳米发动机以及发射激光、存储能量的纳米装置。

如今，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不知不觉地用上采用纳米技术的产品。纳米材料可以用于磁带、防晒霜、汽车传感器及催化转化器系统、耐腐蚀及耐刮擦油漆、耐用网球及轻便球拍、无染服装处理以及伤口敷涂制剂。大多数计算机使用的硬盘都含有磁性分子组成的纳米薄层，以提高存储容量。短期内，纳米涂层也将用于药物包装、耐磨地板，飞机与火箭的高硬度部件也会采用纳米技术，以减轻重量，节约燃料。纳米技术应用领域扩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 2007 年纳米材料市场产值已经超过 10 亿美元。产业预测人士预计，2008 年纳米材料市场回报将会增长 40%，到 2020 年，市场产值将会达到 350 亿美元。三菱研究院、德意志银行与美国卢克斯研究公司最近进行了一项联合研究，他们估计，到 2015 年，世界各地将会有价值 1 万亿美元的各种产品包含纳米材料，由 200 万纳米技术工人生产制造。

对许许多多研究者和投资人而言，纳米技术的滚滚财源在于具有实用价值、可以升级改进、人们负担得起、基于纳米技术的氢气或清洁能源制造方法，这种技术可以让整个世界不再为化石燃料行将耗尽而忧心忡忡，而且多少也能减缓一点全球变暖速度。使用清洁的可再生氢燃料，可能是 10 年、

20年或者30年之后的事——对缓解气候变暖压力来说，实在是太晚了——这种技术能否实现，何时实现，可能都要取决于纳米材料。例如，在当今从水中提取氢的最有前途的研究项目当中——不用燃烧化石燃料——不是利用纳米电极产生化学能，就是利用纳米线圈产生电能。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斯莫利预言，1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科学家就会成功开发出使用纳米管制造的燃料电池原型，这种电池就是卷成一卷卷的碳原子“薄片”，另外，也会制造出采用纳米结构的太阳能转换面板。这些技术一旦获得全面发展，就会把氢变成一种实用、清洁、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而且“只需6块面积小于亚利桑那州的太阳能发电场地，就能一举解决全世界的能源问题”。即使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研发人员也可以致力于开发利用纳米结构制造的隔膜，用以消除天然气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及氮气）。

在如何存储作为汽车动力的氢气这类研究项目中，纳米材料也是一个中心课题。产生相当于一整箱汽油的能量，大约需要燃烧10磅氢气，但是在常温下，这么多氢气的体积高达50 000升。为了以氢气为燃料，制造商就不得不造出能在极高气压下储存氢气的汽车——本田公司开发出一款概念车，氢气储存气压相当于存放大型客机液压泵产生的压强——或者也可以使用金属材料或化学复合材料，先吸收氢气，随后再排放氢气，氢气经过热力、电力或化学反应，为汽车提供动力。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谁，能够提出的最好的氢气吸收材料就是金属及化学纳米管。在这个问题上，阿利维萨托斯也认为，用不了10年，基于纳米技术的氢气存储设备就会问世。

纳米技术突破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其他领域就是纳米机器。一种典型产品就是现有机器的缩微版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组科学家制造出了运送原子的输送带，以及世界上最小的纳米发动机，而且这个发动机使用的活塞、机电转换器以及晶体管全都是用纳米管制造的。该小组制造的纳米级“悬臂”，遇到特定分子时，会弯曲变形，从而成为高灵敏度的化学、生物无线传感器。其他研究者正致力于开发相当于几百个原子长度的微型导管，这种

导管就像是一个缩微潜艇，可以被注射到血液中，搜寻并摧毁病患细胞。另一种典型的纳米机器就是分子构造器，或称纳米构造器，理论上它可以一个一个地排列单个原子，形成另一种纳米结构。自然界本身就是最好的榜样：纳米科技先驱拉尔夫 · 默克勒指出，“仅仅依靠一种植物，自然界就可以生长出分子结构极其复杂的各种生物”。

在大部分科学家看来，这类纳米技术的应用还很遥远——如果可能出现的话——但纳米技术的商业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伯克利研究小组带头人、物理学家亚历克斯 · 泽特尔博士解释说：“我们现在制造的大部分纳米设备都是每次只能生产一个，有些时候还是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制造……如果不能提高制造规模，纳米科技就会变成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而不只是一项技术。”IBM 公司院士唐 · 艾格勒是纳米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1989 年他用 35 个个体氙原子组成了 IBM 公司徽标，这是一项著名的纳米技术应用展示，但他依然出言谨慎：“我们可以想象一长串未曾开发的各种应用。但我认为，将来我们能够掌握某些重大应用技术的可能性相当小”。在足以对未来 10~15 年的能源与环境压力产生影响的纳米技术问题上，美国－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 · 菲尼克斯最近所做的预言可能会是正确的，他预计纳米构造器与纳米工厂很快就可以在实验室里实现常规生产，到 2013 年，则会为产业化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未来纳米技术在能源领域取得的突破，将会在很多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太阳能动力与氢动力技术具有足够强的价格竞争力，而且可以大规模投入应用，就可以为制造企业生产运转和楼宇住宅制冷制热提供燃料来源，这将阻止甚至扭转能源价格螺旋上升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会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额外推动力。美国是发达国家当中能源密集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因而也会从中获益匪浅。不过，在诸如印度、拉丁美洲等很多地方，能源技术突破并不是灵丹妙药，因为转向利用新型燃料，需要耗费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新增投资。能源技术取得突破之后，尤其是在前 10 年之内，产生的最大影响

可能在于环境与地缘政治方面，而不在经济方面。对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及其在大气层的聚集浓度，基于纳米技术的新型能源将会做出巨大贡献。这类新能源的不断推广普及，也会让包括俄罗斯、伊朗在内的石油输出国遭受当头一棒，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将会不断降低。

生物科技与医疗危机

潜能巨大的技术突破也可能在生物科技方面出现，尤其重要的突破就是，成熟完善的遗传物质领域再次实现技术飞越，从而使医学治疗技术取得实际进展。通过对人类染色体上 23 000 多个基因对的排列次序、化学特性、空间分布及具体功能进行分析，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已经取得绘制基因图谱的巨大成就，这是当代最为重要的科学风险事业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计划刚刚提出的时候，在美国能源部及几所大学里，人们都觉得稀奇古怪。该计划作为美国能源部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规划项目，正式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其中也包括法国、德国、日本、英国、中国及美国一些研究机构的相关合作。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计算机软件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在其推动下，人类基因组于 2000 年宣布绘制出第一张基因草图，后又分别于 2003 年 4 月和 2005 年 5 月绘制出更完善、更详细的基因图谱，覆盖了人类全部基因序列的 92%。私营企业也承担了绘制基因图谱的任务，其中就包括塞莱拉公司与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前者与人类基因组同时公布了自己的基因图谱，后者已经把研究结果用于开发新的医疗手段。破解剩余 8% 基因序列，包括位于染色体核心及两端的数百万个 DNA 碱基对的遗传密码，将不得不等待新技术出现，不过，很多科学家相信，大部分剩余序列都是“垃圾 DNA”，可能根本就不包含遗传基因。

尽管塞莱拉公司一直没有向医学研究人员公布其 DNA 序列图，但人类

基因组的分析报告已经放在美国基因数据库中，任何人在互联网上都能看到，同时还配有每一系列的科学参考资料。人们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解释还相当简单，不过，研究人员正在开发计算机软件，以便分析、挖掘深层结果，最终将会有助于开发出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型治疗手段。到目前为止，这些技术主要用于乳腺癌、囊肿性纤维化及肝脏疾病等遗传性多发病的治疗试验，在别的癌症及老年痴呆症治疗试验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据估计，截至2001年，全世界已经有2亿人接受过基因工程治疗试验，或者服用过基因工程药物；而到今天，这个数字又增加了7倍。**未来10年，基因疗法将会成为发达国家患者的常规治疗办法。**

生物科技方面另一个尚待开发的相关领域就是，识别人体内20多万种蛋白质及其与基因之间的互动机理，因为通常认为很多疾病就是由于缺陷基因没能对蛋白质进行正确编码导致的。迄今为止，科学家已经针对500种不同蛋白质，开发出实验性治疗方法，不过这些蛋白质仅占人体总数的0.25%。很多研究人员及其供职的生物科技公司都认为，5年之内他们就可以绘制出大部分重要蛋白质的分析图谱，此后10年，就能够开发出针对相关疾病的基因疗法，可以修复或替换导致特定疾病的缺陷基因。在有关蛋白质的基因研究领域，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创始人威廉·哈兹尔廷博士正在带领另一班人马摇旗呐喊，他们的研究目标是避免出现绝大部分药物造成的不良反应——在美国，每年大约都有1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致死率高于糖尿病、艾滋病、肺炎及交通事故。这个研究团体的目标就是，识别并分离出特定基因，然后将其注入病患细胞，诱导细胞生成想要的蛋白质，这样就可以让药物“下岗”。

应用干细胞治疗甚至治愈“单细胞疾病”的医疗技术则成功在望。干细胞治疗今天已经成功应用于癌症、白血病及其他重症血液疾病患者的骨髓移植。按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说法，在不远的将来，干细胞就会成为“细胞与组织替换的可再生来源”，可以用于治疗帕金森综合征、老年痴呆症、

脊髓损伤、中风、烧伤、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炎及风湿性关节炎。在这个领域的前沿阵地，英国科学家利用来自新生儿脐带的干细胞，已经在实验室里培育出小型肝脏。他们希望再用 5 年时间，就能够利用干细胞修复受损的肝脏，之后再过 10 年，就能培育出可供移植的人类肝脏。

类似研究也正在其他国家展开。阿根廷医生已经把骨髓干细胞成功注入糖尿病患者的胰腺，使他们能够自行产生胰岛素，降低血糖水平。意大利研究人员通过向患有肌肉萎缩的金毛猎犬注射干细胞，有效缓解了它们的症状。也许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是，西班牙科学家已经利用干细胞为遭受心绞痛与心力衰竭折磨的病人提供治疗；瑞士科学家已经利用羊水干细胞，在实验室里培育出心脏瓣膜；美国科学家最近利用胚胎干细胞，在实验鼠心脏损伤 4 天之后，为其成功再造心肌，并进而提高了它的生理机能。尽管许许多多科学技术障碍依然存在，但在 10~15 年内，科学家有能力利用干细胞技术，成功治疗相当一部分现有癌症及心脏病患者，并培育出更多可供移植的新器官，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医学领域的预言经常落空。正如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埃里克 · 朱恩斯特博士所说："生物学一直就比我们想的更复杂。"首份公开发表的基因组序列图谱的作者埃里克 · 兰德博士认为，还需要再等几十年时间，才能利用基因组计划的有关成果开发出有效药物。别的科学家则预言，在下一个 10 年，经过"人工设计"的第一代基因改良婴儿将会诞生，能够"关闭"某些癌症致病基因的新一代基因药物也将面世。

可以准确预言的是，文化、宗教与哲学方面的反对意见还会继续提出，这将继续延缓某些研究进展。但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实现全球化，一国甚至数国对研究项目加以限制，并不能永远阻挡科学发展。布什政府拒绝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许多研究团队随之转向脐带干细胞研究，或者利用其他国家提供的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实现全球化，一国甚至数国对研究项目加以限制，并不能永远阻挡科学发展。

便利条件继续进行研究，关于后者从欧洲、拉美及亚洲国家干细胞治疗技术的近期进展当中可见一斑。伦敦大学杰出的遗传学家斯蒂芬 · 琼斯博士预言，第一例克隆人将会出现在下一个 5 年。如果他的预言不错，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在美国。类似地，欧洲抵制转基因食品，同样无法阻挡该地区生物科技方面预期出现的快速进步。比如，在不远的将来，在那些普遍缺乏维生素 A 的发展中国家，经过基因改良、富含 β - 胡萝卜素的“金色稻米”族系应该将会面世。根据“绿色革命”之父诺曼 · 波尔罗格的说法，很快“我们就会掌握实用知识，生产出足以养活将于 2025 年达到 83 亿的全球人口”。

未来 10 年，在心脏病、糖尿病及癌症治疗方面，安全有效的基因工程疗法和干细胞疗法将会成为现实，这些疗法将会取代数以百万计的患者接受的昂贵手术及长期治疗，进而帮助束手无策的各国医疗系统摆脱困境。对于更加常见的严重病症——还是不外乎心脏病、癌症及糖尿病——如果在治疗甚至治愈技术方面出现突破，那么，在采用这些新技术的国家，由于千千万万国民恢复健康，再次参加全职工作，用不了几年，就会实现更加强劲的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势头也会进一步加强。这些领域的重大进展能够延长老龄人口高效率工作的年限，因而可以帮助一些国家有效应对人口结构的压力。不过，这些治疗技术的开发、应用成本也都很高，势必会让发达国家医疗系统已经面临的财政负担雪上加霜，也会迫使某些国家放弃这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信息技术与全球化前景

对于各自从事的全新研究领域，纳米科技专家和生物科技专家经常津津乐道，而信息技术专家看上去通常更加谦虚谨慎。经历了几十年令人震惊的技术突破之后，在很多 IT 科学家看来，功能更加强大的硬件和软件很快就

会出现，但是不会发生革命性变化。然而，单是运算性能提高、软件功能加强，就意味着软硬件价格还会双双下降，这将进一步加快 IT 技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普及速度。

在发达国家，大部分 IT 研发经费将会投向软件开发。在微软国际业务总裁让－菲利浦 · 克托斯看来，即将问世的智能软件会按照人的方式处理问题，能够针对每个用户的不同特点自动定制自身功能。在 IT 行业发展趋势方面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博客主人罗伯特 · 斯科利认为，新软件会把元数据附加到图片上，使得搜索图片就像搜索文本一样容易；新的计算机程序能够把文字转换成语音，然后还可以再转换回去，二者之间轻松实现无缝转换，这样一来，通过手机或电脑在网上搜索餐馆或宾馆，就会得到语音答复。

其他行业专家则看到了另一种发展趋势，微软之类公司将不受欢迎——因为随着开放源代码运动愈演愈烈，人们可以免费获得计算机软件及其源代码，从而可以随意对其修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雇人修改软件代码。阳升微系统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乔纳森 · 施瓦兹预言，“有朝一日”，随着“阳升公司所有产品全部免费供应，源代码统统开放，这一浪潮将会席卷整个市场”；而且还有其他人也认为这一浪潮即将到来。根据《哈佛商业评论》前执行主编尼古拉斯 · 卡尔的看法，还有一种潜在趋势，可能会动摇当前统治软件市场的那些公司的商业地位，这就是 IT “公用事业”将会在今后几年问世，到那个时候，企业及消费者都可以在线访问、使用千千万万个软件程序。100 年前，自备发电设施的制造厂商开始购买集中供电的公用事业部门输送的电力，软件供应方式的转变将与此类似。

宽带技术加速普及，正在把互联网从一种基于文本的媒体形式转变为基于视频的媒体。今天互联网上的视频信息基本上还是娱乐节目，几年之内，视频就会成为电子邮件与商务交流的主要形式。这一转变可能将会改变大部分人的上网付费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还会提高远程办公的可能性。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于网络接入如何收费，在美国是一个政治问题，披着应否实行“网络中性”这一激烈争论的外衣出现，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否可以根据不同网站内容需要的不同带宽，按照不同价格收取网络接入费。经济压力来自如下事实：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接入率已经高达70%~80%，即使新增网络用户数量预计很快就会减少，由于视频信息大量普及，网络带宽需求也正在急剧攀升。浏览 1 分钟文本仅需占用 2~200KB 带宽，对比鲜明的是，看 1 分钟视频，即便采用先进压缩技术，至少也需要占用 4 000KB 带宽。视频流已经占到全世界全部网络信息流量的 50%~60%，而且随着包括互联网高清电视在内的新型视频应用不断出现，到 2010 年，视频流所占比例预计将会达到 80%~90%。

届时，带宽需求将会超出互联网的传输能力，除非网络服务提供商及骨干网络公司能够把投资提高 3~4 倍，否则，势必造成网络严重阻塞、网速急剧降低。由于大部分新增带宽需求都来自视频应用，而不是来自新增用户，因而每月固定不变的互联网接入收费将无法支持相关投资的大幅增长。因为千千万万个个人及企业用户无法容忍互联网的真正阻塞，所以互联网的上网付费方式将会发生变化，要么是提高固定费用，网民根据自己选用的带宽等级付费，要么根据网站带宽流量，由内容提供商按照不同档次缴费。

更为重要的是，视频应用的不断增长，将会对很多国家的企业经营方式产生影响。几年之内，互联网就可以传输大屏幕直播移动图像，而其清晰度简直可以媲美电影。这将允许数百万人也加入到远程办公，特别是在家办公的行列中来，他们只需要与老板和同事保持定期会面接触就可以。远程办公技术一旦到位，其经济性决定了这种模式一定会迅速推广。这样一来，公司不仅可以节省通勤成本，而且也可以节省办公场所的一般费用支出。远程办公模式的大规模推广，对带孩子的数百万双职工家庭来说，也可以有效缓解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压力。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力推远程办公已经有几年时间了，据他们计算，该公司 2005 年在固定办公场所上班的职员减少了一半，

1 年就因此节省了 3 000 万美元，而产值则达到 1.5 亿美元。该领域专家估计，2006 年每天采用远程工作模式的美国人起码有 1 200 万人，到 2008 年或 2009 年，以远程工作模式为主的美国人还会增加 2 400 万人，全世界则会增加 1 个亿。

到 2015 年或 2020 年，假如远程工作模式的相关技术和经济效益发挥到极致，那么，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数以千万计的上班男女的工作日安排就会与现在大相径庭。大批员工在家或在次级中心地区全时远程办公，以及大批员工可以在家庭与办公室之间合理分配工作时间，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可以帮助公司增加利润，扩大投资，促进增长。也许同样重要的是，远程工作模式的极大推广，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大部分 IT 专家预期，未来 10 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保持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性能的继续提高。计算机性能继续提高，这就意味着，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现有技术，尤其是无线移动技术价格还会继续降低，而在发展中大国，IT 技术的推广速度也会进一步加快。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在亚洲与非洲产生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地区许多国家采用的都是最新的现代通信系统，而不是发达国家那种在旧版无线系统基础上的替代性、补充性技术。在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无线通信与无线技术将会成为未来 10 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技术成本低廉。与有线网络相比，无线系统的建设成本如此之低，以至于无线服务的价格大约只有铜缆或光缆网络服务价格的 1/3。

发展中国家无线应用的持续增长，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麦肯锡公司最近所做的研究表明，无线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2006 年对印度、中国、菲律宾的经济增长贡献分别为 GDP 的 2%、5% 和 7.5%。例如，北京和马尼拉的出租车司机可以减少到处兜圈，从而减少了时间浪费，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利用手机打电话确定行车方向，他们的老主顾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叫车。类似地，印度渔民可以使用手机确定该把鱼送往哪个码头；非

律宾农民可以使用手机比较牲畜饲料和生产设备的不同售价；贫穷的拉美短工也可以到处打电话，看看附近哪个村子需要他们提供服务。移动通信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普及，也可以缓解现代化进程中某些方面的紧张压力，比如，中国农民得以在到许多城市打工的同时，可以随时与仍然留在当地的家人保持联系（同样地，预付费国际长途电话卡也让那些来自拉美及亚洲的美国移民打得起电话，得以与家人保持联系）。到目前为止，印度无线应用带来的经济效益低于中国和菲律宾，唯一原因就是印度的普及程度没有中、菲两国高，因为印度国民更加贫穷，而移动电话及其服务费用都很昂贵。不过，印度无线通信成本也在下降，2006 年 4 月，无线用户数量标志性地突破了 1 亿，2010 年有望达到 2 亿。

未来 10 年，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带来费用低廉的无线上网服务。建设一个 Wi-Fi 之类的无线宽带网络所需成本大约只有有线网络的 1/9，因为无线网络可以利用更少设备，满足更多用户需要，而且无线网络的配置与修复速度更快、费用更低。当有多家无线上网服务商存在的时候，他们之间为了相互竞争，以及要与有线运营商展开竞争，都会采用降价策略——就像发达国家过去经历的那样，价格下降，用户激增。2003~2006 年，美国家庭宽带用户数量从不足 2 100 万跃升到 5 000 万以上。行业专家预计，到 2010 年，全世界家庭宽带用户数量将会从 2007 年的大约 2.5 亿，增长到 4.74 亿。上网费用降低之后，尽管晚了 5~6 年，美国低收入家庭的网络接入率已经与高收入家庭持平。与此类似，未来 10 年，贫穷国家也会大规模普及上网业务，尤其是无线上网业务。

随着笔记本电脑价格降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大人孩子很快都能普遍用上，而且这种趋势还会得以加强。3 年前，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发起了一项名为“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OLPC：One Laptop Per Child）的巨大工程。该工程推出的“XO”电脑使用开放源代码的免费软件，每台造价 176 美元。这种电脑也融合了许多针对

发展中国家应用环境专门设计的创新技术，不过这些技术可能也会成为很多笔记本电脑的标准配置——亮光条件下可读显示屏，高防雨、高防尘性能，免受损宽频 Wi-Fi 天线，附带太阳能面板或太阳能充电器可选备件的 12 小时供电电池。在巴西、尼日利亚、泰国、乌拉圭等国学校里，“XO”样机已经投入使用。“XO”正式机型发布之后，实施 OLPC 计划的各国政府就能够以成本价购买数以万计的这种机器，而且这些机器安装的操作系统及其他软件全都使用本国语言。因为希望进一步降低在发展中国家的售价，每台“XO”电脑在美国和欧洲也只卖 350~525 美元。

与纳米科技和生物科技领域的技术突破带来的发展前景一样，IT 行业的发展趋势也会对很多国家未来 10 年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

与纳米科技和生物科技领域的技术突破带来的发展前景一样，IT 行业的发展趋势也会对很多国家未来 10 年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未来 10 年，移动电话、移动互联网及廉价笔记本电脑形成的汇聚效应，将会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实现新一轮爆发——在那些欢迎外资企业参与网络建设、提供软硬件产品，并能保证教育投入、培养学生和工人使用这些技术的国家，尤其如此。

拉美地区部分国家最近放松了外商投资限制，非洲一些地区也不再遭受内战困扰，在这些地方，或许还要加上印度，上述发展将会特别强劲有力。在发达国家，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高，软件价格的降低，也会再次推动生产力发展，尤其是在美国等管制措施较少的发达国家，为了利用新技术，各企业的经营运作更容易实施自我调整，因而对生产力的推动也就更为明显。不过，如果说 IT 领域还有什么其他即将到来的技术突破，足以与纳米技术进步带来的廉价清洁能源及生物技术进步带来的革命性癌症治疗技术相提并论，那只能认为正在开发这些技术的 IT 科学家迄今尚未提及。

无法回避的未来

这是一个新纪元，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国家都得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时代交替的历史关头，非凡超群的政治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查尔斯·戴高乐、毛泽东、马丁·路德·金——总能激励鼓舞各国人民追随自己，走向新的发展道路，并能在几代人的历史跨度内，改变各自社会的发展历程。在政治领域之外，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人物及其团队能够取得技术突破的伟大成就，最终也能使得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改进。几乎可以说，在全球任何地方，上述任何一项伟大进展明天都有可能发生。然而，本书讨论的三项天翻地覆的重大进展全都已经深深地嵌入各个主要国家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而且这些进展即将导致的重要结果，实质上已经确定。

已经出生的一代又一代的人口规模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影响而有丝毫改变，因此，历史性的人口老龄化给各国造成的绝大部分直接影响都无法避免。对大多数人而言，影响最大的结果就是，政府承诺并提供的养老及医疗待遇总是越来越好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 10~15 年，整个西欧地区新增退休老人领到的养老金将会低于他们今天期望的水平；为养老支出提供财政支持的相关税率还会更高；预算赤字将会再次面临一年更比一年高的困境。不过，最严重的问题还在医疗领域，由于所有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急剧增多，他们求医问药所需要的高额费用势必超出各国实际支付能力。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都将看到，与医疗卫生有关的税收、保费及自付医药费都会大幅提高——而且，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和保险机构都将着手控制极其昂贵的先进治疗手段的广泛应用。

几乎可以肯定，各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同时也意味着使经济进步放缓，对欧洲和日本的下一代人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人口老龄化已经开始蚕食劳动力规模、降低储蓄水平；反过来，这又会拉低投资比例，削减生产力收益。

未来几年，欧洲与日本二三十岁国民比其父辈更高的教育程度可以抵消生产力增长遭遇的阻力——1970~2000 年，在校大学生占所有适龄人口的比例从不足 20% 提高到接近 50%。不过，如果各国政府不能实施经济改革，增加公共投入，进而保证他们可以获得高薪职位，他们接受的较好教育一样无济于事。而在上述大多数地方，改革可能都不会发生，因为在欧洲和日本，大部分有工作的国民都会抵制可能削弱他们自身就业安全的改革政策，况且增加公共投入所需各种资源的来源与高峰人口养老福利的财政来源同出一辙。

起码在下一个 10 年，美国面临的人口结构压力将会小于欧洲和日本——先不说医疗问题——中国也有能力把本国快速老龄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控制在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预算支出的承受范围之内。但是，美国和中国的优势也只是暂时的。展望 2020 年之后的 10~15 年，中美两国都将面临老龄化造成的经济压力和财政压力，这种压力与欧洲和日本早就不得不应对的压力难分伯仲。

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将要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甚至还要大于人口结构变迁造成的影响。可以说，全球化释放的关键推动力就是，打破各国赖以保护本国企业免受竞争压力、本国工人少担失业风险的传统壁垒，全球化的中心价值就是实现各国国内以及全球范围的全面竞争。全球化的承诺就是，通过打破壁垒、加强竞争，工人及企业将会创造更多财富——先期回报已经说明，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承诺是切实可靠的：过去 5~10 年来，由于全球化进程全面推开，全球产出的增长速度高于有史以来任何一个时期。至于企图阻碍本国全球化发展进程的那些经济体，诸如俄罗斯及部分拉美国家，以及紧抱各自原有制度安排不放的那些经济体，诸如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他们正在付出更大的代价。

未来 10 年，对大部分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准则还将继续是：面向国内人民的勃勃雄心及外国公司的过人才能，全面开放本国经济。未来 10 年，能够繁荣发展的将是这样一些国家：面对本国企业家的思想创意和推动力

量，面对外国公司的经济投资和生产经营，面对全球网络生产制造的商品和服务，他们都能尽量可行地保持开放。实施——或者不实施——这条路线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根本就是当今时代世界上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

全球化还将造就数以万计的赢家，他们会遵循全球化的规则行事。未来10年，最繁荣的发达国家将是那些在发达经济体最擅长的领域，集中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创造、采用及适应力量强大的新兴科学技术与生产流程；引进新的融资、营销及配送方式；导入新的企业组织、管理方法。为保护工人与小企业，日本与许多欧洲国家现在仍然大量采取管制政策，这将会让他们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爱尔兰及少数几个其他国家将会实现更加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公司企业通常将会攫取更多利润、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些国家的消费者也可以享受更低的商品及服务价格。在所有发达国家，某些企业的员工、经理及股东将会成为经济发展回报的最大受益人，这些企业要么自行开发创新成果，要么能把创新成果商业化，抑或只是简单地有效应用这些成果。

到2020年，中国可能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大部分世界级制造企业将是中国本土公司，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的迁移过来的生产工厂。

未来10年，中国及其他坚持奉行全球化规则的发展中国家还将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也会继续迈着历史性的步伐，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会让数以亿计的国民改善生活。到2020年，中国可能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大部分世界级制造企业将是中国本土公司，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的迁移过来的生产工厂。

未来10年，中国也将成为一个对外投资大国及欧美公司的大股东。2000~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20倍，达到160亿美元。美国2006年的海外投资额为2 170亿美元，相形之下，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仍然很小。而且，迄今为止，每年流入中国的数千亿美元、欧元、日元，大部分

又以购买西方国家政府公债及投资中东石油项目的形式流出。但自 2006 年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标日趋多元、档次不断提高，其中包括：中资机构购买贝尔斯登公司、巴莱银行、黑石集团和 3M 公司的大额股份，南京汽车集团收购英国 MG 汽车品牌，联想集团收购 IBM 个人电脑业务。未来 10~15 年，中国国有及私营企业将会大量购买美国和欧洲银行、制造企业及服务业企业的股份——或者一次性直接收购——尤其是在西方市场直接经营的企业，包括汽车、飞机、电子、机械及软件等中国计划进入的行业中的企业。

未来 10 年的全球化进展也会让所有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开放程度较低，在基础设施和国民教育方面没能认真投入的发展中国家——最显著的就是俄罗斯、部分拉美国家、许多非洲国家——将会被甩得更远。例如，许多非洲国家将会面临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及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纷纷迁居海外的移民大潮。这一浪潮来势汹汹，势必损及各国发展前途；反过来，又会动摇某些国家的政权稳定。

未来 10 年，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很多人的日子也不好过。过去 5 年来，在普通工人人均实际工资收入方面，法德两国双双下降，日本略有增长，即使美国年均增长也不超过 1%，虽然年均生产力增长达到 3%。工资收入缩水，是全球化推动的市场竞争与经济增长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副作用，而且还不会就此远去。千千万万家公司企业正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劳工、原料、金融及服务，他们为了推出创新成果，进而抢占竞争对手的一线商机而努力奋斗，竞争日趋激烈，这又导致所有企业全都很难提高价格（一段时间以来，全面通货膨胀没有爆发，而且未来 10 年可能还会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由于能源成本与医疗成本扶摇直上，而企业又常常无法提价，企业最后被迫转而寻求降低劳工成本。没有什么未来因素能够改变这些强大力量，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亿万工人可以期待的最好情形也只能是工资收入轻微增长。在发达国家，即使这种轻微增长，也不是学历只有高中甚至以下水平的那些人能享受到的。

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也会让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付出额外代价。无论哪个政府做出什么努力，大批基础制造业的生产经营与就业岗位都不可能回归发达国家了。数以千万计的服务业岗位很快就可以实现电子化、远程化操作，这些岗位也将从发达国家流失，对此，同样任何人也都无法阻挡。美国、爱尔兰、瑞典以及对全球化与技术创新持开放态度的其他国家，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抵消原有岗位的不断流失。欧美国家的轮胎厂、钢铁厂不会再有招聘计划，但是，美国这类企业的工人可以转行成为电缆安装工或医疗机械工——其他求职者可以在谷歌之类蓬勃发展的新兴公司找到工作，过去 3 年来，谷歌公司差不多每周都会发布一款新产品，员工人数也增加了 2 倍。但是，如果大部分欧洲公司对欧美之外其他国家继续不屑一顾，那么他们必将丢失更多的国内及海外市场。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承诺，要取消某些用工限制，类似地，日本最近也采取行动，消除某些外商投资壁垒——如果他们能够贯彻下去——这都会在几年之内发挥作用。但在大多数方面，欧洲与日本企业受制于国内压力，其竞争力还将保持疲软。然而，如果这些国家还不改弦更张，全球化就将成为不可原谅的罪魁。除了工资收入缩水，上述问题也会导致欧洲与日本国民 2020 年的人均收入低于今天，这对一个发达经济体而言，无疑是不同寻常的失败。

在全球化大潮的无情冲击之下，工人、企业以至不同国家将分化为赢家和输家，他们之间的差距或缩小，或扩大。在经济学家所谓的“趋同(convergence)”[①] 进程中，以韩国、新加坡及葡萄牙为引导，先后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将会消弭他们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某些收入差距。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尽管财富均衡的标准衡量指标不会有大的提高，但还是会有大批极度贫困的国民将会过上好得多的日子。在拉美、非洲及亚洲部分地区，更为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将会脱离落后迟缓的国家

① “趋同”原本是一个生物术语，指异种生物由于处在相同的环境中而在结构上具有相同的特征和功能。荷兰经济学家廷伯根在 1961 年将这一术语移植到经济领域。——编者注

行列。

由于美国、瑞典、爱尔兰及其他少数国家经济增长还将继续领先于希腊、法国及日本之类的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也将继续加大。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内部，尤其是美国国内，不平衡现象也会加剧。资本回报率提高，将使得富人更富，开发、掌握、使用 21 世纪创新成果的那些人，工资收入增长速度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高——同时，在美国、欧洲及日本，那些不得不与遥远的发展中国家同行直接竞争的工人将会发现自己的收入不断缩水，大部分工人的工资收入也会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的无情挤压。

全球化也将会给发达国家带来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挑战。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未来 10 年的政治斗争议题将会集中在价格不断攀升的能源与医疗问题上，这些问题产生的部分原因来自全球化。不过，最严峻的政治挑战还是，如何在很多人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时候，维持国民对经济开放的普遍支持。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当今时代防止一个国家走向衰退的唯一方针就是，认清这个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本方式，努力去做一切能做的事情——比如，在保持经济开放的同时，提供全面广泛的新技术培训，支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新兴企业形式，降低员工医疗开销增长速度，缓解企业面临的工资成本与能源成本上涨压力。能够顺应推动全球化车轮滚滚向前的强大力量的那些国家——美国、爱尔兰和瑞典，以及亚洲国家当中的韩国和中国——将会发现，未来 10~15 年必定是一个真正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

能够顺应推动全球化车轮滚滚向前的强大力量的那些国家——美国、爱尔兰和瑞典，以及亚洲国家当中的韩国和中国——将会发现，未来 10~15 年必定是一个真正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

至少到 2020 年，当今世界地缘政治领域的核心要素不会改变。美国继续作为没有匹敌对手的唯一超级强权，这一地位不会改变；美国领导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各种可能都有；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内，甚至更长时期，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有实力真正制衡美国的强权势

力。无论美国选民最终如何评判布什政府的相关政策，也不管他们会选谁当下任总统，美国为全世界提供安全保护的使命都不可能改变。

当今时代，美国的全球强权地位不是建立在政治手腕与外交技巧上，而是建立在美国的全球使命如何服务于大多数国家的实际需要，以及履行这一使命的强大不对称实力上。无论别的国家领导人有时由于国内政治原因说些什么，对于美国坚决阻止地区强权吞并邻国——比如科威特和波斯尼亚——以及保卫世界贸易与石油供应所依赖的海上航道和空中航线安全的默认承诺，几乎每个国家都会欢迎。世界各国政府都认可，如果没人承担这些责任，他们的自身安全就有危险——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除了美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因此，随着伊朗以及后来的叙利亚在寻求核武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或者巴基斯坦伊斯兰教派激进分子取得政权——法国、德国、中国甚至俄罗斯，都会接受并暗暗欢迎美国领导的反制行动。

今天尚不可知的其他发展变化也可能会对未来 10 年的地缘政治进程造成影响，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处在领导地位、带领整个世界作出反应的也只能是美国。欧洲与日本拥有在地缘政治方面发挥自身重要作用的所需资源，但在几十年前，他们都抛弃了这样的意愿和义务。在伊拉克战争政策这类问题上，要想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制衡或挑战美国，需要具备支持制衡或实施挑战的能力。鉴于欧洲和日本飘忽不定的国内要求以及为应对全球化而面临的经济问题，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地缘政治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倒是想挑战美国，而且言辞上也常常这么做，但是，俄罗斯军事实力太弱，经济规模太小，实在无法支持他们的夸口狂言。展望未来，俄罗斯人口形势将呈现灾难性发展趋势，经济畸形根深蒂固，贪污腐败司空见惯，这些因素势必排除俄罗斯重建约束世界唯一超级强权所需资源的任何可能。兰德公司一项题为《评估俄罗斯衰落》的研究得出结论：曾经的超级强权已经变成一个“弱国”，“军事、社会及经济力量不断衰落”，没有什么“能力处理本国经济麻烦”。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向使自己

最终成为让人言听行从的国家。不过，未来 10~15 年，中国并不会急着这么办，因为中国领导人确信，政治权威有赖于经济快速增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和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未来几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至少可以通过一种重要方式感受到。中国已经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以及有朝一日足以挑战美国的发展前景，将会使得中国成为许多国家追捧的政治经济榜样，从而与美国模式形成彻底而直接的竞争。美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吸引力——金融市场开放、个人政治自由、多元并存及法律准则于一体——既来自当前美国政治、经济的主导地位，也来自美国政治、社会长期稳定的良好纪录。在中东欧地区、大部分亚洲地区及大部分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重新建国的时候，都选择了美国模式。**中国则提供了一个威权政治与西方先进技术及商业方法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许诺，可以实现比耽于妥协和迟缓的民主政治更快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未来 10 年，这种模式及其许诺几乎肯定会吸引亚洲、非洲及拉美地区的许多政府效法。当今世界上同样存在第三种模式：在宗教领域实行专制主义的新伊斯兰路线。这种模式一贯敌视西方价值观，有时也会对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采取敌对态度。就像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严格执行这条路线的发展模式产生的国际吸引力与影响范围都很有限。不过，结合西方投资与经贸往来的伊斯兰模式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引人注目的发展道路，而且未来 10 年，也可能传播推广到非洲与亚洲地区部分国家。

尽管美国拥有不对称的经济、军事强权实力，但是当它挥舞强权大棒、决定世界事务发展方向的时候，还是会受到国内民意的限制，尤其是再想单枪匹马对外开战的时候，更会如此。正如兹比格纽 · 布热津斯基通过观察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表现，最近指出的那样："尽管（美国）强权优势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国内原因，它无法动员足够规模的力量，通过武力方式强行实现自己的意愿"。无论美国下任总统认为外交政策应该关注哪些事务，她或他都不得不重新寻求美国国内对单一超级强权维护

全球稳定这一不可推卸的使命的支持。基地组织及其效仿者如果再次发动“9·11”级别的恐怖袭击，将会使得美国执行这一任务的政治难度降低。然而，最本质的一点还是，美国下届政府事实上肯定要回归传统国际路线，通过建立并领导广泛的国际合作来解决安全威胁。

例如，降低气候变迁风险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下一次全球金融混乱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流动的威胁不断加大，面对这些问题，未来10年美国将会采用广泛合作的国际路线予以解决。对于石油输出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政局不稳及遭受攻击问题，解决办法同样也需要包括美国的领导作用和相关国家的积极参与两个方面，这些国家涉及主要伊斯兰国家、法国与德国，可能还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此外，就在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也得积极参与，努力减缓核能力的继续扩散进程，避免拥有核武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阻止恐怖分子获取核材料、核武器。未来10年也可能会证明上述合作的局限性——也可能还要考验美国单独做出反应的效力——如果俄罗斯陷入政治混乱，局势危及政权稳定。

古希腊人教导他们的孩子，宙斯与正义女神忒弥斯结合，生下三个女儿，合称为命运之神摩伊拉，由她决定人的寿命长短与人生历程。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当然不会这样认识世界，我们相信，人的决定与偶然事件一道，共同决定着个人和社会即将面临的未来境况及他们所走的道路。不过，大自然一直都有一只力大无比的巨手，掌控着人类一切事务。我们这个时代，三种历史性变化在各自领域的表现就是大自然施予的现实力量。然而，在地缘政治方面，雄才大略或昏聩庸碌的政治领导人都有可能引发出人意料的重大转变；面对全球化浪潮洗礼，企业和政府也都可以提出新的应对方法，抓住机遇，化解压力；即使对于席卷绝大多数国家的残酷无情的人口老龄化，人们同样也可以作出意料之外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反应。不过，这些历史性变化的要求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起码在这个时代，这些要求全都无法拒绝。

致　谢

FUTURECAST

本书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几年前一个让我谦卑感油然而生，私底下深为不安的时刻。其时我在华盛顿参加一个研讨会，我的发言涵盖美国面临的各种经济、政治挑战。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关于美国及全球经济问题的发言内容，与十年前甚至更早之前的观点相比，竟然了无新意。无法否认也不容忽略的事实是，现实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重新加以认真思考。随后数月，我在那次及其他多场研讨会上，认真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进而认识到，别的政策分析家和决策者所提出的绝大部分观点同样也是十多年来没有变化。因此，我着手重新审视决定美国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基本经济、政治情形的因素和力量，以此重新思考过去的所知所信。

一开始，我是把重新思索这些问题作为思想功课来对待的，最后它却演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接受再教育的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根本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不过现在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人们面前。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苏联骤然解体，中国的现代化征途史无前例地突飞猛进，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风起云涌的全球化急剧转变，迅速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发展动力，具备了更为突出的重大意义。

由于苏联解体，1 000 多年来第一个没有匹敌对手的单一超级大国孑然独立，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本书坚持认为，上述发展变化对于世界各主要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本人对这一观点负完全责任。不过，假如没有来自许许多多热诚慷慨的有识之士的帮助、支持与鼓励，这些分析结论以及本书根本就不可能问世。本书写作，从一开始就得到我的朋友伊凡 · 克罗恩菲尔德（Ivan Kronenfeld）的鞭策，而且三年来，他每周都会始终如一地给我提出鞭辟入里的建议。我的经纪人及朋友弗兰克 · 韦曼（Frank Weimann）使我确信，我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完全可以作为一本书的著述素材，他同样也成功说服了圣马丁出版公司相信这一点。圣马丁出版公司的编辑迈克尔 · 弗拉米尼（Michael Flamini）具有超乎寻常的耐心，给了我难以描述的帮助，如果没有他的努力，读者将无缘读到这本书。

很多朋友和同事也都给我提供了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帮助。库尔特 · 阿姆奎斯特（Kurt Almquist）、安东尼娅 · 埃克森－约翰逊（Antonia Axson-Johnson）、弗兰克 · 阿诺德（Frank Arnold）、蒂姆 · 巴里克尔（Tim Barnicle）、埃文 · 贝赫（Evan Bayh）、埃里克 · 伯格洛夫（Eric Bergloff）、艾伦 · 布林德（Alan Blinder）、安德烈 · 切尼（Andrei Cherny）、比尔 · 克林顿（Bill Clinton）、希拉里 ·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彼得 · 哈特（Peter Harter）、凯文 · 哈赛特（Kevin Hassett）、罗伯特 · 霍马茨（Robert Hormats）、维基 · 约翰逊（Vicky Johnson）、艾琳 · 卡马克（Elaine Kamarck）、格雷格 · 莫茨（Greg Mertz）、大卫 · 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加里 · 马蒂亚斯（Gary Mathias）、谢尔比 · 帕金斯（Shelby Perkins）、贾斯汀 · 彼得森（Justin Peterson）、乔纳森 · 鲍威尔（Jonathan Powell）、马克 · 佩恩（Mark Penn）、纳姆 · 伐姆（Nam Pham）、希格里德 · 罗森（Sigrid Rausing）、西蒙 · 罗森伯格（Simon Rosenberg）以及大卫 · 罗斯考福特（David Rothkopft）等人，或在会议座谈期间，或在酒席

餐桌之上，甚至于在深更半夜，都为我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真知灼见。我要特别感谢斯坦福大学的保罗 · 斯托克顿（Paul Stockton），在世界范围内，他对地缘政治的见解不让他人；还有来自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阿尔 · 弗洛姆（Al From），在华盛顿，他对美国政治的分析最为精辟。特别值得一提的下面两位对我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她们分别是邦妮 · 安东尼（Bonnie Anthony）和安妮 · 迈克比（Annie Maccoby）。当我几乎难敌诱惑，将要全盘放弃的时候，她们给我以鼓励；当我有意拖延一两年完成本书时，她们鞭策我直面现实。在本书写作期间，我姐姐贝蒂（Betty）和哥哥艾伦（Alan）总是对我迁就有加。

洞悉全世界人口结构、全球化进程以及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现实变化，需要进行大量调查研究，有一个极富才华的青年团队为我提供了重要帮助。在这些难分伯仲的年轻人中，我首先感谢现供职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郑基元（音）（Giwon Jeong），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有关亚洲地区的调查研究。欧洲国家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由来自高级国际研究院的迪莫 · 伯尔（Timo Behr）负责，我从中受益匪浅。我也要向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乔治娜 · 沃斯（Georgina Voss）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格雷格 · 泰恩特斯（Greg Tenentes）表示感谢，他们完成了科技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方面，米格汉 · 凯西（Meaghan Casey）和基安尼斯 · 杜里密斯（Giannis Doulimis）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我还要感谢大卫 · 戴特勒（David Datelle），他在医疗卫生领域做了大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最后，感谢乔茜 · 威弗斯（Josie Weefus）和艾姆博 · 莱格特（Amber Leggett）一直给予我的挚爱。